



全 国 中 文 核 心 期 刊
中 国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核 心 期 刊
中 文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CSSCI) 来 源 期 刊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05

2006年第5期



朱德生

朱德生，1931年生。1949年高中毕业。1951年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2年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6年毕业于该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班，并留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任教。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强烈不满，所以选择了西方哲学史作为工作专业。从零开始，边工作边学习。1958年下放京郊劳动，1959年重返校园继续工作。1960年参加北大、人大负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组（中央在全国组织的多本教材之一）工作。同年6月调到全国统编教材（《西方哲学史》组）编写组。在此，系统阅读了一些古典哲学原著，开始发表自己独立研究的哲学史论文。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明白了要搞好哲学史，先要搞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革”结束后，大部分时间从事拨乱反正，重建教学、科研新秩序的党政工作，1978—1994年先后担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哲学系主任等职，在国内学术团体中还曾兼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1981—2001年）、北京市哲学学会副会长（1986—2003年）等职。

发表个人署名的著作有《实践、异化与人性》（台湾森大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燕园沉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形上之思》（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联合署名的著作有《简明欧洲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西方认识论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9部。另外发表论文100多篇。

长期以来坚持以“史论结合”的方法从事教学与研究。本人多年来坚持的一个观点是：哲学不是关于自然、历史和思维三大领域的普遍规律的学问，而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意义的反思。人的存在是一种超越性和开放性的存在，他面对着一个二重化的世界，即事实的和价值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辩证统一，便是人类文明前进发展的道路。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社 长：李恒瑞

主 编：郑英隆

副主编：叶金宝 陶原珂

编辑部主任：雷比璐

学术研究

(月刊)

2006年第5期 总第258期 出版日期:5月20日

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	乌家培	5
管理转型及其思想特点	蔡茂生	8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较	许卓云	12
析两种市场学的并存、差异与共同发展	王冰 徐慧	18
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	徐育才	22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撤资、再投资行为研究	刘阳春 毛蕴诗	27
企业衰亡的生态化过程与制度化过程	彭璧玉	32

对三个基础问题的辩证思考		
——读稿札记	朱德生	37
哲学原理教科书中若干问题质疑	杨寿堪	45
重估《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价值	刘秀萍	50

马克思休闲价值思想探析	许斗斗	55
休闲教育的伦理限度	刘海春	62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论纲	薄贵利	66
唐甄政治批判思想的三个层面展开	黄强	70

从道德危机的范围、程度看道德重建		
——对广东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问卷调查的分析	李江涛 吴重庆	75
城中村“景观”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蓝宇蕴 郭志坚	83

以广东人为主体的晚清中国驻美公使	梁碧莹	88
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陈超	94
晚清军费政策的演变	申学锋	99
新朝与旧主的抉择		
——清史馆设置缘起与赵尔巽的就任	伏传伟	104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政法 gzphilaw@yahoo.com.cn
哲学 gzphl@yahoo.com.cn	历史 gzhist@yahoo.com.cn
经济 gzronger88@yahoo.com.cn	文学 gzliter@yahoo.com.cn

(1958 年创刊)

•岭南文化•

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背景	曾大兴	110
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商榷	吴宏岐	117

教育贫困与反教育贫困	牛利华	121
学校变革: 现代学习型学校制度建设研究	杨天平 陈光祥	125

西方近代美学思潮的主导精神和基本倾向	彭立勋	129
文学价值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伍世昭	135

高本汉与贺登崧对汉语方言研究的不同学术路向	刘新中	140
-----------------------	-----	-----

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管 华 管 林	144
--------------------	---------	-----

•学术动态•

走向多元化的古代文学研究		
——广东省古代文学、古代文论2005年学术研讨会简述	夏 晴	146
《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在广州首发	周 义	139

英文摘要		147
------	--	-----

The Change of Management Pattern and the Management with a Changed Pattern	Wu Jiapei (5)
Managing Transformation and Its Idealistic Characteristics	Cai Maosheng (8)
A Methodological Comparison between Marx's Economics and Western Economics	Xu Zuoyun (12)
Difference of Two Market Theories and Their Existing and Developing	Wang Bing and Xu Hui (18)
' The Pattern of Three Forces' as a New Pattern of Transmitting the Rural Surplus Labors in China	Xu Yucai (22)
An Approach to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Original Investments, Disinvestments, and Reinvestments in China	Liu Yangchun and Mao Yunshi (27)
On the Ecological Process and Institutional Process of Enterprise's Withering Away	Peng Biyu (32)
A Dialectical Thinking over Three Foundational Problems	Zhu Desheng (37)
A Query to Some Problems Raised from Textbooks of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Yang Shoukan (45)
Re-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Drafts of 'Natural Dialects'	Liu Xiuping (50)
An Analysis of Marx's Thought of the Value of Leisure	Xu Doudou (55)
On the Ethical Limitation of Leisure Education	Liu Haichun (62)
An Outline on China's General Strategy of Institutional Administration Reform	Bo Guili (66)
A Trial Approach to Mr. Tang Yin's Thought of Political Criticism at Three Levels	Huang Qiang (70)
An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s about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ree Civilizations' in Guangdong	Li Jiangtao and Wu Chongqing (75)
A Sociological Thinking over the Problem of Villages within City as a Landscape	Lan Yuyun and Guo Zhijian (83)
On the Chinese Ministers in USA Mainly from Guangdo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ang Biying (88)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upon French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Sciences Spread in Eastern Countries'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Chen Chao (94)
About the Change of the Ministry Expenditure Polic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en Xuefeng (99)
The Cause of Setting up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Qing Dynasty History and Mr. Zhao Erxun's Taking the Post of Its Director	Fu Chuanwei (104)
On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Literators in Guangdong in the Ancient Dynasties	Zeng Daxing (110)
Deliberation on the Viewpoint That the Location of Canton City Was Not Moved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Wu Hongqi (117)
Poorness Caused by Education and Correspondent Policies against the Poorness	Niu Lihua (121)
A Research on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Study-type School System and the Reform of School	Yang Tianping, Chen Guangxiang and Zhang Shuiling (125)
The Leading Spirit and Basic Trend of Western Modern Thoughts in Aesthetics	Peng Lixun (129)
On the View of Literature Value and the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 th Century	Wu Shizhao (135)
Different Academic Methods of Mr. Bernhard Karlgren and Mr. Willem Grootaers in Studying Chinese Dialects	Liu Xinzhong (140)
A Book Review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y in the 20 th Century'	Guan Hua and Guan Lin (144)
A Report on the 05' Annual Meeting of Guangdo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ory Study under the Trend Leading to Multiple Ways	Xia Qing (146)
Book News about a Series of Ten Works on the Culture of the Pearl River	Zhou Yi (139)

•经济学 管理学•

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

◎ 乌家培

[摘要]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这是两次大的社会转型。与双重的社会转型相适应,中国还经历着双重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以及相应的组织转型必然引发管理转型。要科学地把握分析企业管理转型的主要成因、各种表现和基本特点,揭示转型管理的混合状态和存在矛盾及其解决的途径,阐释转型管理对转型组织的反作用。

[关键词] 管理 转型 转型组织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05-03

一、从社会转型到管理转型

人类社会在时间和空间变迁的过程中,充满各种各样的转型。这些转型标志着客观事物或主体从一个阶段演进到另一个阶段所发生的质的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在转型,经济在转型,与之相关的各种组织及其管理也在转型。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这就是两次大的社会转型。农业社会使用的是手工工具,以体力(或畜力)为动力;工业社会使用的是靠电力发动的机器;信息社会使用的能源和工具中就有新能源、信息网络和智能工具。从生产要素看,土地、劳动力、资本、信息与知识在上述三个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明显的差别,社会越先进,信息与知识的作用越突出。目前中国正经历着双重的社会转型。为了进入国际社会先进国家的行列,中国有必要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参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但由于尚未最终完成工业化,农村还有几亿剩余劳动力要进行非农化转移,中国又必须同时进一步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与双重的社会转型相适应,中国还经历着双重的经济转型。一方面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即由原来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向新兴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前一个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算起,时间短,任务重,路途还很遥远。后一个转型从改革开放算起,已有28年的历史,虽然已于20世纪末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距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

与经济体制转型相联的还有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这一转型提出于“九五”计划初期,但迄今为止进展不快,收效不大。究其原因,可谓不少,但首先与体制转型不彻底有关。当然也与依靠科技不够、劳动者素质提高不快有关。拼资源,牺牲环境和生态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它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增长方式的转型尤为迫切。实际上,它也是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必然导致管理转型。集约型发展与粗放型的发展不同,需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特征的高级管理方式和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应以价格调节供求同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相结合,远比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偏重于实物性指标管理,无疑复杂得多。传统经济的管理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新经济的管理则是信息革命的产物,更注重信息和知识在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信息社会的管理同工业社会的管理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别。作为管理基础的组织形式,就有根本不同。它不再是金

作者简介 乌家培,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10)。

金字塔式等级分明的官僚型组织结构，而是富于柔性的扁平型、网络型的组织结构，甚至还有虚拟组织形式。一般说来，当管理的外部环境、内部资源、组织结构、主体及其行为、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等诸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大的变化时，管理本身就需要通过转型来完成它的质变。

二、企业管理转型的成因、表现与特征

试以企业为例，探讨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过程中的管理转型问题。

从成因看，这个历史时期的企业管理转型，首先是由信息社会的来临所决定的。近10年来，发达国家讨论进入信息社会和发展中国家讨论面向信息社会的问题多起来了，究竟信息社会的企业管理怎样不同于工业社会的企业管理，目前还不可能完全看清。但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企业管理中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企业管理的巨大变化，则随处可见，正在引发管理转型。其次，这种转型还与传统管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有关。传统管理在工业时代发挥过重大作用，如泰罗的科学管理、福特流水线生产的大批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等，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传统管理的有效部分和积极因素，将作为科学管理的组成要素被继承下来。但那些基于过细分工的职能管理、囿于僵化程序的流程管理，特别是管理中的非人性因素和机械死板部分，已与企业外部管理环境极不相称，也与企业内部资源优化配置不相适应，而难以持续了，必须加以革除和改变。

从表现看，企业管理转型反映在与企业本身发生变化相联系的受管理信息化和信息化管理影响的众多方面。

1. 在管理目标上，企业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在完成本身任务的同时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义务，更多地参与公益活动。

2. 在经营重点上，企业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固然重要，为顾客利益服务，以增进顾客的信任感、满意度和忠诚度更加重要。

3. 在生产方向上，企业从为增加供给而生产转向为满足需求而生产，不再是通过大批量生产把库存塞满后再去促销，而是直接采用定单生产，加强和完善定单管理。

4. 管理主体从资本家、职业经理人变为以企业家为主包括员工、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和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管理的群体。

5. 管理对象中的劳动者，除“蓝领”外，“白领”的人数和比重大大提高，尤其是“白领”中具备专业知识的员工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他们的特点去进行管理，激励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提高知识劳动的生产率，成了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6. 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变成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最重要资源，相应地出现了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企业越来越多地依赖信息和知识来进行管理。

7. 在组织结构上，垂直的层阶式组织趋向扁平化，上传下达的中间组织作用缩小了，高层与基层可直接“对话”，管理决策下移，还出现了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如矩阵型、网络型、虚拟化的组织形式。

8. 在管理中重视分工的同时，更强调集成和整合，跨部门、多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职能调整和流程重组变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9. 管理由内部向外部延伸，出现了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新内容，在企业内部相对于战术管理、操作管理，战略管理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因为战略管理不仅要考虑企业内部情况，更为重要的还必须掌握企业外部环境变化，以及预测未来，从未来审视现在。

10. 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管理内容越来越丰富，管理种类越来越多，出现了创新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以及项目管理、业务外包等管理形式。

11. 企业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竞争关系转向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的关系，与此相适应，竞争情报分析与竞争谈判和合约管理等开始流行。

12. 由于全球化发展和跨国企业的出现，管理的范围突破了国界，扩展到全世界，企业信息系统和

网络的发展，使跨国管理成为可能。

上述列举的企业管理转型中的各种变化并不是相互孤立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涌现出来的，而是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开始不显著的量变到最终实现飞跃的质变。

最后，从特征看，企业管理转型具有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从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从以物为本的管理转向以人为本的管理、从有形的“原子”管理转向无形的“比特”管理即虚拟管理或数字管理等性质。

三、转型管理中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

在管理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转型管理即转型时期的管理状态。转型管理表现为传统管理与现代管理或者说新管理与老管理同时并存的混合管理，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混合性。

在混合的转型管理中，新、老管理的成份孰多孰少、孰强孰弱，在转型初期、中期、末期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和相互渗透、结合的关系。

转型管理一般有两种混合模式。一种是板块式的机械性混合，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价格管理中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在并轨之前两种价格管理时有磨擦甚至冲突。另一种是渗透式的有机性混合，如我国实施的渐进式改革中，老的管理体制并不是一下子就为新的管理体制所取代，而是在建立新体制的同时改造和提升老体制，使它们逐步接近而趋于一致，达到管理上新陈代谢的目的。

传统与现代、新与老的对立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为老的管理是由新的管理变过来的。传统管理（如工业时代的管理）曾经一度也是现代管理（相对于农业时代的管理而言），不同时代的管理尽管有质的差别，但也还有共同点，有些管理因素会逐渐传承下去。比方说，管理是基于组织的，任何管理决不可能脱离组织而存在，这不会因时代变迁而使管理有所不同。

再以企业管理为例，企业管理文化即体现于管理中的企业文化，它是联系新老管理的纽带，它的继承和发扬促使转型管理中的矛盾得到平缓化解，导致管理转型顺利完成。企业管理的百年基业，文化是根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它指引和激励着企业的组织行为，调整和提升着企业的管理方式。世界一些著名企业，如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多数创立于工业时代，但在它们的优秀企业文化影响下，与时俱进地调整了业务和管理，在业务上从制造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在管理上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如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以及价值链管理等，从而使企业重振雄风。一般企业往往由于文化底蕴差，经不起时代变迁的冲击，未能解决好转型管理中的根本矛盾，以致缩短了企业寿命而使基业最终毁于一旦。

四、转型管理与转型组织的互动关系

由于管理依附于一定的组织，转型管理总是与转型中的一些组织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这种组织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政府，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组织。

仍以企业管理为例。随着工业时代转向信息时代，转型中的企业管理不仅以转型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而且是为转型企业和企业转型服务的。我国企业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其管理相应从偏重于计划导向的生产管理转向市场导向的经营管理，而在工业社会或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的转型期，其管理则从传统的工业管理转向现代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知识管理。转型企业需要转型管理，而转型管理又推动转型企业的发展，最终完成企业及其管理的转型。

转型管理的任务，决不是“守住昨天、牺牲明天”，而是“延续过去、展示未来”，把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之一的管理推向前进，以更新它赖以滋生的转型组织。

[参考文献]

- [1]（美国）Peter F. Drucker (1909- 2005). 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的管理挑战)[M]. 1999.
- [2] 乌家培. 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 [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黄振荣

管理转型及其思想特点

◎ 蔡茂生

[摘要] 当今经济社会转型过程正在引发一个新的管理转型问题。因为传统战略决策的基础与条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现行的组织结构形态和管理机制存在诸多不能适应新环境的方面。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管理转型的主要方向是从效率中心到人文价值中心的管理理念的转型、从工业经济管理形态到知识经济管理形态的转型、由企业内部向外部以至全球范围的延伸的管理空间范围的转移、从硬性组织向柔性组织和虚拟组织转变的管理组织的转型。转型管理思想的特点是创新性、融合性、动态性。

[关键词] 经济转型 管理转型 动态融合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08-04

世界经济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 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深入, 这同时意味着剧烈的经济转型到来。经济的转型必然引起管理的转型, 本文试对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引起的管理转型及其特点作一探讨。

一、经济转型过程中引发的管理转型问题

管理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的合理组织方式, 是由各个时代物质财富的获得方式, 或者说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的每一次重大变革, 必然引起管理活动的重大变革。纵观人类历史, 随着农业取代狩猎和采集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角, 围绕土地资源的配置和有效利用的农业管理方式是漫长农业社会的管理模式。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角, 产生了工业时代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当今, 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周期, 及新的产业经济变革时代。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 人们的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形态等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为主要特征的当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正在迅速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引导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

综合学界有关转型经济的观点, 大致可概括出以下特征: 经济信息化、市场全球化、产业形态知识化、产业构成的服务转向、知识资本化、设施网络化、教育终身化等。总的来说, 人类社会正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推进, 经济和社会在转型, 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势必是管理的转型。

1. 传统战略决策的基础和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战略理论是以市场环境的有规律变化、企业内部资源优势的相对稳定性等假设为前提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技术革命使企业的经营环境和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世界各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以市场为纽带, 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 在相互交织中融合, 形成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 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 实现资本、物资、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打破国界局限, 在走向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上展开多样化竞争, 市场需求更加多变, 产品寿命周期一再缩短, 企业的生产、服务系统更具动态性。对现代企业而言, 则意味着传统战略决策基础和条件不复存在, 因为产品竞争优势的暂时性、市场态势的不稳定性、技术垄断的不可能性等造成了竞争环境的不可预测性, 以往关于竞争的分析框架和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不再有效, 原有的模式已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

2. 传统的组织结构形态和管理机制不可能适应新的环境。传统的组织管理以职能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 在这种组织结构下, 管理流程被分割为不同的“条块”, 管理职能分散, 层次较多, 管理者和被

作者简介 蔡茂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65)。

管理者是一种“命令-执行”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进程的加快,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的变化,传统的企业组织已不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其突出表现是许多在历史上曾名噪一时的大公司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为适应新的知识经济环境,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延长组织寿命,企业界和理论界提出或者正在试图对原有组织结构形态进行改革,纷纷探讨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各种组织结构形式。

3·实物资本与知识位置的转换,导致管理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知识经济扑面而来,要素市场和企业内部要素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其趋势是实物资本与知识位置的转换,知识的增值能力逐步超过资本的增值能力,并且知识与人力资本的投资超过实物资本的投资。知识日渐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管理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意味着管理的重心将从重视实物资本转向重视知识和人力资本,管理活动也将围绕知识人力资本这一重心展开。这将导致管理形态的变化。

4·管理日益全球化,文化碰撞加剧。在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管理者与世界近在咫尺。世界金融市场24小时运转,一个电话可以直达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一家工厂或企业,都是世界的工厂或企业,都是国际分工和全球市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因此都要遵循共同的运行规则和国际惯例。管理的对象不限于本土的员工,也包括不同肤色、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员工,当代的管理是全球化管理。具有不同价值观念和信仰的人群及其经济主体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与合作。由于经济组织由不同性别、民族、种族和国籍的人群组成,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都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人员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多样化。如何对这种具有多样文化的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是摆在新时代管理者面前的新课题。

5·管理手段信息化。当代信息科技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把全球企业带进了电子商务时代,企业内部的管理手段和设施也就不可避免地把与国际互联网联系到一起,从而改变企业组织结构、管理程序、管理方法等。这要求管理者要适应管理环境变化的要求,创新管理手段。

从前面简单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和发展的要求;经济转型必然引起管理的转型,催生新的管理模式。

二、管理转型的主要方向

1·管理理念的转型:从效率中心到人文价值中心。

所谓管理理念,是关于管理的本质、中心、任务、出发点和归宿等问题的基本假设和价值观点。管理理念支配管理活动,有什么样的管理理念必将产生什么样的管理。

对什么是管理,古今中外和不同时期的理解不尽相同。中国古代重视人在管理中的中心位置,孔子认为管理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修己安人”。近代西方管理思想则与工业文明密切相关。本世纪初有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泰罗的所谓科学管理,认为管理的中心是提高效率,人的一切行动都得符合效率逻辑,每个人都是实现高效率的工具。管理就是要设立一套非人格化的管理机构,为他们设计标准的程序和行为规范,并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经济刺激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见物不见人”、“讲理不讲情”的管理理念是西方管理思想的传统。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基于“社会人”假设的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管理和50年代基于“自我实现人”假设的行为管理,把管理的重心由“物”转移到“人”,但人仍然是被作为实现提高效率这一管理目的的重要资源而加以重视和尽量开发而已。

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新背景下,管理理念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手段人”、“工具人”向“目的”人、“创造人”和“文化人”转变,更加强调人的个性、人的本性和人的独立性。管理不再是“管理”人,而是“领导人”,^{[1] (P26)}一起实现共同的目标。有的学者将这种管理理念概括为“3P”管理,即of the People (企业是由人组成的); by the People (企业要依靠人进行管理); for the People (办企业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这种管理将不再把人看成纯粹理性的经济人,人除了把工作作为谋生的手段以外,同

时越来越多地把工作视为实现个人社会价值、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因此管理就要更加重视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这种管理是鼓励创新的，不是管理者强调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而是讲学习、交流、创新，按自己的想法干。不是组织叫干啥就干啥，而是帮助员工制定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干最想干的，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目标。总之，这种管理即所谓实现从重视“硬管理”到重视“软管理”的转变，从强调理性到重视情感的转变，从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的转变。

文化管理是人性化管理的最高层次。它通过企业文化培育、管理文化模式的推进，使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规范。学习型组织，是实现文化管理的组织模式。这一人性化管理形式，是行为科学的发展和继续，但决不是行为科学的简单重复。正如杜拉克所说，20世纪管理学的最伟大贡献在于，它让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倍。21世纪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提高知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1] (P173)}

2·管理形态的转型：从工业经济的管理形态向知识经济的管理形态转变。

工业经济的管理形态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传统工业的特点是专业化分工、大量资金的聚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企业管理的重点是产品的生产，最重要的资源是资金和技术，竞争致胜的关键是产品的质量和生产的效率。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企业的成败在于是否掌握或者获得知识。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推进，管理形态也相应发生变化，企业管理即将进入知识管理阶段。知识管理，作为一种管理形态，其本质的含义就是把知识视为最重要的资源、通过最大限度掌握和运用知识提高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它强调“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2] (P67)} 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织理论一脉相承，两者都把知识的生产、知识共享、知识的运用和全员参与组织创新作为新型管理头等重要的内容。知识管理与人本管理和文化管理也相通。人本管理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由于人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管理必然十分重视人才。知识管理和文化管理的相通之处则在于，两者都是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把组织成员的聪明才智和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企业管理形态从工业社会的生产管理向今天及未来的知识管理转变，跟科学管理向人本管理和文化管理转变，权力型组织向学习型组织演变的方向是完全相吻合的。

3·管理空间范围的转移：由企业内部向外部以至全球范围的延伸。

关于管理的空间概念从某种侧面反映管理的不同类型。西方古典管理阶段管理的空间概念是本企业，而且是不问环境的封闭式管理。巴纳德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组织是协作系统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封闭性。60年代初系统管理学派把组织看成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子系统，为管理突破组织的边界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人们开始重视组织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但直到70年代战略研究提出对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分析的TOWS矩阵（即威胁、机会、弱处、强处）理论框架时，人们的战略分析的空间概念仍然停留在或主要是本国甚至是本行业。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通讯、金融、运输与资讯的发展，使全球市场成为一个无国界的统一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无论资金、人才、货品与信息的流通都畅行无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加入世界开放的市场中，将自己置身于这个市场之外的国家和企业变得越来越少。企业的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区域内进行，而是以全球作为竞争的舞台。在这种环境下，要求企业经营管理的空间概念由内部扩展到外部，由本土转向全球，由只重视局部优化（例如产品的生产）转向重视从物料的供应、加工到产品的运输、配送、仓储、销售、客户、消费者和售后服务等整个链条的紧密结合和整体优化。因此，企业要从全球的范围内部统筹考虑资源的合理配置，即依据不同地区的不同利税和不同金融风险来配置资本，依据不同地区技术发展特点和优势来设置相应的技术研发中心，依据不同地区的经营需要合理利用和开发人力资源。为此，企业经营管理者必须扩大自己的视野，由只注重内部的管理转变到内外结

合而以外部的管理为主。为了适应管理范围的扩大和重点转移,企业只有在更高水平上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改革与创新,重新设计业务流程,建立起更灵活的、能对环境作出快速反应的组织及其运行机制,才能适应竞争的需要。

4·管理组织的转型:从硬性组织向柔性组织和虚拟组织转变。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企业的组织模式先后经历了等级制、职能制、分权制等,但过去的组织,多是典型的正金字塔型组织。这种由上而下,重视等级的管理组织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企业界和理论界提出或者正在试图对原有组织结构形态进行改革:一是组织的扁平化。减少组织层次,压缩职能机构、打破严格的分工和专业化,建立起一种柔性、经济、灵活、高效的团队组织,管理组织开始朝扁平化方向发展。二是组织的虚拟化。以各种方式与外部建立一种网络状的虚拟性联盟,进行虚拟式运作,利用外部资源(这些资源多为自己的弱项或别人的强项),以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网络状的虚拟组织模糊了企业的边界,增强了组织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正在逐步成为重要的管理组织形式。

三、转型管理思想的特点

转型管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定型的”理论体系,但我们感到一种新的管理范式已具雏形。转型管理思想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创新性。这个时期出现的管理新理论都不是对传统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而是使用一些全新的概念和术语,例如:核心竞争力、企业流程再造、供应链管理、学习型组织、标杆管理、虚拟组织、知识管理、跨文化管理、全球化管理、顾客价值管理、连锁经营、绿色营销等等。在这些新理论中,我们已难以找到以往理论中所熟悉的话语和论题。这表明新经济时代的这场管理变革是管理范式的变化。

2·融合性。正像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依赖和相互更紧密地联系一样,各种管理思想不是日渐疏远、背离、对立,而是相互融合。传统的管理理论偏重从不同的角度和利用不同的学科工具进行研究,虽然今天多个学派仍然并存,但在初显轮廓的新的管理主流范式中,各理论学派显示出了明显的融合趋势,系统思维将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动态融合中,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与非理性主义的人本管理、硬的管理与软的管理的日渐融合是转型管理的主题。这两种管理思想的相互融合,^[3]不但反映了管理活动的内在规律和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过程。西方传统管理以追求科学和理性为主流,东方传统管理重视人文和伦理,追求人际的和谐。管理向人性化和软化转移,反映了东方管理思想更加适合新的环境。在转型的和未来的管理中,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仍然十分重要,但将作为管理的方法手段纳入新型的管理体系中,人文价值将提升到新的高度。人本管理和文化管理将成为21世纪管理思想发展的主流。

3·动态性。转型的管理面临的是快速变化的环境,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管理理念,产生新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因此,转型的管理思想和理论与环境在动态中保持其适应性。不断创新是新型管理思想的品格。

[参考文献]

[1] F. 杜拉克. 21世纪的管理挑战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2] 秦言. 关注知识经济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3] 崔援民, 黄群慧. 21世纪管理学发展与现代管理方法论 [J]. 中国软科学, 1998, (3).

责任编辑: 黄振荣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较

◎ 许卓云

[摘要]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经济学体系。本文就两门学科在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等方面作了简明概括的比较,论证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缺陷,提出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扩展和细化马克思经济学宏观分析框架的设想。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F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12-06

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源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它们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但它们毕竟是两个有联系的经济学体系。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研究造成它们之间差异的经济学方法论,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社会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支配社会物质财富生产与交换的客观规律。在研究对象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上,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却存在着重大分歧。分歧主要不在研究对象、内容与范围,而在于研究视角、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一、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

1. 研究物质财富生产的两种视角: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

从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看,它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增长,体现为人利用自然、从自然界获得满足自己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物质产品的能力,即劳动的生产效率;后者表现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与分配关系。前者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自然形式,后者是物质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两个方面有时互相适应,有时又互相对立,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即物质财富的社会生产方式。因此,从最广的意义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生产方式的一门社会科学。马克思经济学就是研究物质财富生产方式的科学。

资源配置是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概念。自罗宾斯(L.Robbins)1932年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之后,研究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或有竞争性的目标中怎样配置稀缺资源,就成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定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萨缪尔森在他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说道:“经济学者们都同意一个类似下列的一般定义: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作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要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1] P5)}

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是建基于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前提上的,主要研究商品生产者或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市场交换关系。由于市场交换会反作用于生产,因而市场交换关系

作者简介 许卓云,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631)。

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关系。因此，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会反作用于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讲的是同一回事。因为资源配置方式是指人们在组织和交换各自生产的产品时，“如何使用相对稀缺的资源来满足无限多样的需要”。在这里，已经隐含着生产力诸要素如何组合，以及人们在组合各要素时所必然发生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无非也包含着这两方面内容。

不过，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生产活动不仅决定着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而且决定着社会的政治活动与精神活动。从人类的历史发展看，在分工、交换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着生产。分工与交换不过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方式，更能准确地把握经济学的任务，从而更好地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此相反，把资源配置方式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会把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向资源的交换和分配领域，容易颠倒生产与交换、生产与分配的相互关系，难以正确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经济的生产方式更科学、更合理。

2. 研究物质财富生产的两个侧重点：物的关系与人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历来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一种天然的、永恒的制度，因而从不研究这种关系本身，甚至有意、无意地用物的交换关系来掩盖人的交往关系、利益关系，把研究重点放在物的发展上，忽视人的发展；把研究的焦点放在资源的边际替代和商品交换上，忽视商品交换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特殊的历史形式，它绝非从来就有，也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理想的形式。因而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物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人的关系——尤其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这样，便形成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古典经济学两个不同的研究体系。

在马克思看来，决定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本质差别的，不是一切时代都有的共同点，如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样的“生产一般”，而是建立在不同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规律为己任的马克思，当然就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宣布：“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

不过，马克思经济学着重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非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的关系。而是密切结合着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深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马克思首先从组成资本主义财富的最简单的细胞——商品去展开他的分析。通过对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矛盾分析，揭示商品价值形成和价值交换的规律；通过对资本与劳动交换的分析，揭露工资的性质和资本增殖的秘密；通过对商品流通与价值实现的分析，揭示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两大部类社会产品的平衡关系；通过对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分析，揭示调节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与分配的规律等等。很显然，西方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即生产要素价格理论）、流通理论以及消费不足理论、周期性危机理论等，都为马克思经济学所揭示，而且比西方经济学分析得更深刻、更科学。

从人与人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它的意义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总结的：“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

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7] P123)}

二、研究方法

1. 经济学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最高和最抽象层次的方法论，也就是基本方法论。它所讨论的是经济学的价值观、真理观、科学观。主要内容包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或经济世界观；如何认识和判断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如何看待经济活动主体；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的价值标准，等等。人们通常所谓的经济学以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为基础，就是指经济学以上述哲学思潮或流派作为基本方法论。

第二个层次的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的思维原理和方法，或者说，是经济学家观察经验事实、从事理论研究、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综合与分析、逻辑与历史、结构与制度、实证与规范、动态与静态、宏观与微观等研究方法。

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的技术性方法，即为了使经济学理论精确化、趋于完善而对特定研究对象或理论所采用的具有技术性的具体方法。如：数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等等。^{[8] P108-110)}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分野，主要表现在第一个层次上。

2. 西方经济学奉行的研究方法是唯心主义、个体理性主义、机械均衡论和不可知论。

从18世纪的休谟开始，西方经济学就把人性、个人动机作为经济分析的哲学基础，把私有制的产生视为人类欲望超过自然界稀少供应的产物。到了19世纪中叶，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和自利选择原理，则成了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信奉的教条。在19世纪末兴起的边际效用学派那里，物品的效用完全成了个人主观心理的体验。

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传统，坚持用个体理性分析方法来研究制度与制度变迁。这种方法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人类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的起因。个体理性方法论内容包括以下几个命题。(1)只有个体才有目标和利益，才是社会历史中实在的范畴，因此，任何社会科学除了“个人”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科学的解释基础。(2)社会整体是个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社会整体是可改变的，对社会整体的认识则必须归结到“个体行为”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理论的一致性和可驳性。(3)个体行为的动力是由个体主观效用最大化构成的，个体行为的性质是由认知结构决定的。因此，对制度等整体范畴的认识必须从个体心理出发。^{[9] P36)}

J.M.布坎南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说，“新制度经济学核心前提是只有个体才进行选择和行动，而群体本身既不选择又不行动，如果所分析的群体同样进行选择或行动，则就不符合科学的准则。社会总量被认为只是个体所作的选择和采取行动的结果。”^[10]

哈耶克的自生秩序的制度观，亦都建立在个体理性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他认为人类是无知的，只能通过自己的经验去了解社会、了解别人；而知识分散在每个人那里，概念、经验都是个人的主观认识，不能离开个人而存在。只能发挥个人认识社会、把握社会的能动性。社会、集体则是抽象的，没有意识，因而无法思考。^[11]

基于个人理性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其研究方法有三个逻辑要点。

(1) 社会经济的变迁来源于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人的自利性动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因而，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动因，要从人类的自利动机及由它所决定的行为方式去寻找。

(2) 构成社会整体的是一个独立的、平等的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利益和目标，其对效用的评判、得与失的思考以及行为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心理和认知结构。而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则是社会利益冲突的根源。

(3) 人生来平等，每个人都从自利动机出发进行选择，通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通过相互间的对等谈判和博弈，修订和改变契约关系，推动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

用个人的动机和选择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存在着两个根本缺陷。一是违背了社会发展并非以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客观事实。个人的动机和选择多种多样，它们常常相互对立、互相冲突，不可能形成一致同意的计算。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结局，不过是各种矛盾冲突力量形成的合力的产物，而非个人动机和选择的结果。二是无法解释不同个人动机产生的缘由，也无法说明不同个人所拥有的选择力量的成因。实际上人的理性、动机及其行为能力（选择能力），都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活动环境所决定的。离开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和活动条件的分析，便无法解释人的动机和行为能力产生的原因，也就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趋势。

3. 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个原理既反对唯心论哲学，又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既反对黑格尔唯理主义的先验论，又反对休谟、康德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它强调独立于人们思想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决定着人们思想意识的内容及其发展，规定着人类可能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限度；但又承认人的思想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反作用。认为人类能够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根据自己对客观世界必然性的认识能动地推动着客观世界的发展。

应用这一原理于经济学研究中，就是坚持以下几个基本点。

(1) 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必须首先研究人类社会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所决定的人们的相互关系。即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① ② P32}

因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第一位的、基本的实践活动。它是人类从事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精神活动以及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一切历史现象，以及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都应当而且“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① ② P41}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① ② P424-425}

(2) 人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主体，又是其社会关系形成与创新的主体。但作为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现实中的社会的人，是受一定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制约着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一方面，每一个人都受到其生活中现实存在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其思想、行为和能力都受到其所处条件及社会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每一个人又都在其社会约束条件下

发挥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推动着社会生产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演变。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在一定的制约中进行选择，在改造环境的同时改造自身，——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的观点。

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① 31 P87}“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10 P56}“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有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③ 8 P29-30}所以马克思非常客观地指出：在他的经济分析中，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④ 3 P12}

(3) 尽管社会的运动是由个体的选择和行为汇合而成的，但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个人的行为受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分析社会经济史的变迁，不能由个人的心理和行为选择去解释；相反，个人的心理和行为选择要由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去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的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⑤ 11 P532}“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⑥ 10 P385}“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⑦ 8 P51}

社会经济变迁的最终结果，也不是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无数个人意志的相互冲突所形成的合力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其演变进程决定的。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⑧ 11 P697}

(4) 社会业已形成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不过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在政治、法律意志关系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只有依据经济关系的分析才能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不过，已经形成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又会对经济关系的演变产生影响：或者促进经济关系的演变，或者阻碍经济关系的演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的深刻根源在于物质利益的冲突。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任何重大变动,都会影响不同阶级、集团和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引起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而一切重大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得以推进,并通过建立相应的政治制度才得以确立。“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7][8][9]}因此,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整体变迁,必须研究社会经济的生产方式,研究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各个阶级、阶层、集团以及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形成及其在政治、法律权利制度上的反映,研究他们相互之间如何为争得自己的利益进行联合与竞争、博弈与合作,如何在既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下进行竞争与博弈,又在竞争与博弈中推动着旧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不断推动着人类物质利益的增进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由于研究重点、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学围绕着社会生产与交换过程中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建立了由劳动价值理论(商品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构成的理论体系。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出发,分析了存在于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交换过程中资本增殖的二重性(剩余产品与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性生产的对立、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消费与生产的对立,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的结论。

西方经济学则围绕着社会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的物与物的交易关系,形成了以供求理论(价格均衡理论)、消费理论(效用论)、生产交换理论(成本理论)、分配理论(生产要素价格论)和宏观调节理论(包括财政理论、货币理论)为主线的理论体系。

三、简短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主体(人)与客体(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它强调客观世界的演进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在实践中逐步认识这一规律,顺应这一规律,而不能改变这一规律。人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越多、越深刻,也就越自由。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就是认识和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2. 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从唯心主义、个体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世界观出发,把经济学视为个人选择的科学,研究利己的个人理性,研究在这种利己个性驱使下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以及它对市场交易、资源配置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框架:理性—最大化—均衡。

[参考文献]

- [1] 萨缪尔森. 经济学(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4] 吴宣恭等. 产权理论比较——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产权学派[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 [5] 刘元春. 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A]. 林岗, 张宇. 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 [6]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 [7] 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自由秩序原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黄振荣

析两种市场学的并存、差异与共同发展

◎ 王 冰 徐 慧

[摘要] 市场学是一门经济学科,而市场营销学则是一门管理学科,但是目前市场营销学常被误认为是市场学,这种混淆既不利于它们的共同发展,也不利于它们对市场经济发展不同作用的发挥。

[关键词] 市场学 市场营销学 并存 区别 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18-04

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在学界并存,本属一个正常的现象,问题在现实中存在这两种市场学的混淆。这种学科的相互混淆容易模糊学科的定位,影响学科的后继发展,也影响两门学科对现实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的发挥。

一、两种市场学的并存

根据学科性质的界定,每种学科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名称。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成长起来的 two 门学科,有着明显的差异,却出现了同名并存现象。在学科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并没有完全混同。但在各种市场相关理论应该更加成熟的今天,学术界却出现了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混名的情况。这种混淆的主要表现是,无论市场学还是市场营销学,均被统称为“市场学”,在各类学术著作与刊物中频频出现。

1. 学科同名并存现象。

(1) 学术刊物方面。如果对“市场学”的论文进行检索,结果中会列出两种学科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在同一文章中,同时出现市场学和市场营销学两种说法,但实质上均是指市场营销学,例如繁多的分析企业市场营销行为的论文,这类论文通常将市场学等同于营销理论;第二类,全文只出现市场学,但实质上却是指市场营销学,这类文章大多被命名为《市场学》,实为市场营销学的教学探讨型的论文,如《〈市场学基础〉研究性教学策略初探》等;第三类,真正的市场学论文,如屈炳祥的《论〈资本论〉中的市场学》等。

(2) 书籍著作方面。从中国最早的营销学教材——丁馨伯先生1933年译编并由复旦大学出版的《市场学》到今天,市场营销学依然常被称作市场学。例如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顾国祥主编的《市场学》,明确提出市场学是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涉及的原理、方法和技巧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成败,实际上就是市场营销学。早一点的还有1982年出版的《市场学浅说》(闽建蜀,广东科技出版社)、《社会主义市场学》(励瑞云、夏蔚菀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市场学》(吴凤山、洪宝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国市场学》(杨岳全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市场学》(彭星闻,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现代市场学》(邝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此外,还有高等院校内部交流的著作,1981年由暨南大学傅汉章、何永祺编的《市场学概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吴凤山编的《市场学》;1982年由北京商学院贺名仑编的《市场学概论》,云南财贸学院吴健安编的《市场学》等营销学著作,均是以市场学冠名。中国营销学家邝鸿教授本人也认为“市场学”的名称是不够准确的,应改为市场营销学。^{[1][P2-3]}此外,天津大学出版社“当代营销管理丛书”收编的《市场学原理》(万成林主编)可作为市场营销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一本市场学著作。

这种对学科性质不加区分、一概而论的情况,难免会对学科定位产生不良影响。消除这种影响,得先从分析这两门学科的发展与现状入手。

2. 学科基础与现状。

(1) 市场学是由市场经济中分离出来的一门独立的经济类学科。市场学在实践发展中,形成了一个与多门学科都有交叉范围的理论体系。从有关市场的著作方面来看,市场学也可称为市场理论。早期涉及到市场领域的理论有马克思的市场理论。马克思的市场理论并未明确建立市场理论体系,而是散见于很多关于市场理论和市场问题的论述,^{[1][P103]}但这些论述已经清楚地总结了马克思对市场的观点和结论,其中对“市场”的抽象论述是非常精辟、完整的。马克思理论对市场基本范畴的一些基本看法,已使市场学初见理论雏形。

目前流行的各类市场经济学都与市场理论有一定的联系。西方的经济学大都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因此西方经济学也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这些市场经济理论都无一例外地会涉及市场研究,其中关于市场理论的思想精华也形成了市场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即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则促使市场理论在马克思市场

作者简介 王冰,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慧,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2)。

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形成自己完整的理论结构。

以上这些都成为市场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从市场学的理论基础来看,市场早已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虽然在早期的经济类著作中,并不能找出一部以市场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著作,它们更多只是侧重市场某个方面的研究。但从各家各派对市场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出,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此,以市场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专门化的市场学理论应该被列入经济学的学科范畴。

市场学现今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关于市场的专门著作,包括万成林等主编的《市场学原理》及其他学者的专著等,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市场理论的研究范畴,有理论体系,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学著作。

(2) 市场营销学理论是一门在企业经营与管理实践中发展的、日益成熟的管理类学科。从市场营销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市场营销学是在满足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适应市场要求的整个企业活动,研究市场问题的管理类学科,它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以及现代企业管理科学基础之上的应用科学。市场营销学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适应现代工商企业经营管理决策需要的产物。它的学科特点:一是经验性,即市场营销学的内容是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二是实践性,指市场营销学的内容和理论都来源于实践,研究目的是为了指导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被充实和发展;三是综合性,指市场营销学是一门综合科学,它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又与心理学、社会学、计量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管理学等相结合,吸收了这些学科的理论成果。市场营销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企业的行为准则,还是一种艺术,一种创新的总结。^[1]市场营销学在现阶段被许多的学者简称为市场学,这是不准确的。从本质上来看,市场营销学应该归属管理类学科。市场营销学已经是一门发展得非常完善的学科了,有着大量的相关著作,涉及企业营销的方方面面,比较著名的包括“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的经典著作《市场营销学》、麦克·R·所罗门的著作《市场营销学》等系列营销学专著。

目前,在市场营销学的大科目下,逐渐出现了许多更为细化的营销类学术著作,如《麦肯锡营销方法》、《整合营销传播战略管理》等。从市场营销学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市场营销学的发展将进一步向实践性的市场策略与管理靠拢,表现出与市场学范围更大、程度更深刻的差异。实际上,市场营销学在国外是很少与市场学混淆的,但该学科在国内发展时,被过分强调与市场学的相关性,而忽视了学科性质与市场学的差异性,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定位逐渐模糊,出现了名称被混同于市场学的现象。对于这个现象,中国市场营销学专家卢鸿教授也曾这样解释,由于“市场学”这个译名在中国颇为流行,在多年习惯的影响下,即使知道这个译名不恰当,易使某些同志误解,产生混淆,也依然沿袭了原来的习惯。^[10]因此,市场营销学就一直顶着市场学的名字出现,引起了不少初学者的疑惑。

二、两种市场学并存的原因分析

市场学的发展源于市场的发展,市场是市场学发展的实践基础。市场学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市场也随之出现不同的新发展和新形式。实际上,商品经济即使在一个社会形态中也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基本规定也不断地丰富,并且带有历史性,因此与市场相关的学科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着自身特定的发展和完善的要求。在早期较为简单的商品经济时期,市场的形式和要素较为单一,相关理论研究也相对较为简单。进入复杂的高级商品经济阶段后,市场表现出越来越复杂的构成因素,市场的相关学科更丰富,研究内容也更复杂。应该说,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市场学学科的混淆是实践的复杂性及学科性质的相关性共同造成的。

1. 两种市场学研究对象的交叉性。

市场学和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都包括市场,如图1所示。市场学研究市场运行基本的、抽象的、一般性的规律;市场营销学则是研究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两种理论都与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这种学科研究对象的交叉性,导致了它们被并称为市场学。例如,市场学和市场营销学都是研究市场体系,但市场学研究市场体系的发展规律和完善途径,而市场营销学则是研究如何在已有的市场体系下使企业的运作更有效率。又如,市场学和市场营销学都研究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但市场学研究如何丰富与完善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而市场营销学则研究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对企业的生存发展的影响。此外,市场学和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的重合性还体现在对市场结构的研究方面,如两者都研究主体市场、客体市场、时序市场和地域市场四个部分,包括主体市场里划分出的所有权市场、占有权市场、使用权市场,在客体市场里划分出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文化市场,在时序市场里划分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在地域市场里划分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如此等等。^[13] P210)可见,这两种学科被混同是有客观原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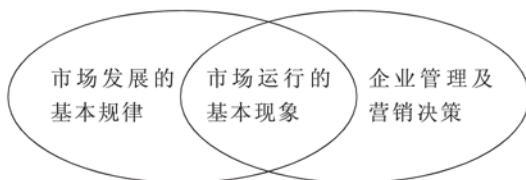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对象的交叉性

2. 两种市场学学科性质的相关性。

经济学与管理学是两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学科。经济类学科是管理类学科的理论基础,而管理类学科是经济类学科在实践上的应用与发展。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正是这种关系。市场学的发展离不开市场营销学指导下的企业实践的促动,企业的实践活动丰富了市场形态,市场学在研究市场时,必须研

究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市场营销学作为一门管理类学科，其发展是建立在市场学发展的基础上的。市场营销学有着两个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其一是企业管理理论，其二便是市场学理论。市场营销学虽然是一门研究如何“做市场”的学问，但市场营销学不可避免地要以一定的市场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为自己理论的营养元素。例如，市场营销学的核心——营销策略的制定，不能在脱离市场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它除了要参考相关的企业管理理论外，更主要地是要了解市场各个方面，而这脱离市场学是办不到的。可见，两门学科性质相关、联系紧密，发展上相互促进，也就是这种学科性质的相关性导致了目前将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混为一谈的现象。也就是说，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的关系可以被定为基础性的经济理论学科与以之为基础的实践型管理学科的关系，而两者之间这种以市场为纽带的“基础—应用”关系正是两种市场学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的差异点分析

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毕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两者之间存在诸多不同。要消除目前两种不同市场学相互混淆的情况，理顺两种市场学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两门学科的门户界限，而这两门学科的涵义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其次，要找出两门学科其它的主要区别。

1. 学科涵义的不同。

(1) 市场学的涵义。市场学是随着市场的产生、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一门学问。市场指的是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交换环节。研究市场理论的市场学认为市场或者交换环节是市场理论研究的范围或领域，市场学即为研究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运行内部各个方面的联系，从而揭示市场发展变化（即市场运行）一般规律的学问。市场学是一门研究市场的经济学，正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环节——市场的本质与规律。所以，市场学也可称作市场经济学，但为了和目前流行的市场经济学区分开来，避免混淆，故将其命名为市场学。

(2) 市场营销学的涵义。要了解市场营销学的涵义，首先要知道“市场营销”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早期的认识是较为肤浅、片面的。许多人把市场营销理解为推销和广告，这并不难理解，毕竟我们的周围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商业广告和各式各样的推销人员。但实际上，推销与广告只是实现市场营销众多功能中的两项具体手段而已。英国市场营销协会将市场营销与生产决策直接联系起来，明确指出：“企业如果要生存、发展和盈利，就必须有意识地根据用户和消费者的需要来安排生产。”此时，市场营销的定义向其本质靠近了一大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市场营销的含义也得到了更为深刻的揭示和极大的丰富、发展。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其一是美国市场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的观点：市场营销是个人和群体通过创造产品和价值，并经由交易的过程，满足需要与欲望的社会及管理过程。^{[1][P6]}其二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尔康·麦克纳尔的独到见解：市场营销是创造和传递新的生活标准给社会。简言之，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应用型的学问。所以我国著名市场营销学家邝鸿指出，市场营销学这门学科定名为市场学是不恰当的，应该叫做市场营销学或市场经营学较好。^{[1][P2-3]}

2. 研究重点的不同。

(1) 市场学侧重理论研究。市场学作为一门研究市场运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比营销更基础也更广泛。总的来说，市场学的研究范围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市场学研究市场结构和市场供求均衡两大板块的内容；从宏观的角度看，市场学主要研究市场的基本涵义、市场的构成要素及市场规则、机能、管理与国家宏观调控这些密切相关的内容。

(2) 市场营销学侧重实践研究。市场营销学作为一门指导企业具体市场实践活动的学科，它主要关注企业在市场营销活动中的具体技巧问题。可以说市场营销学中的市场指的是与交易这层含义直接关联的市场，是市场的实践操作性方面。市场营销学的主体内容可以简要分为企业对消费市场的分析和营销策略的制定两部分，即从“买”的方面入手，以制定“卖”的策略为目的。因此，也有人将市场营销学归纳为简明扼要的“4Ps”，4P指的是Product（产品）、Price（价格）、Place（地点，即分销，或曰渠道）和Promotion（促销）四个英文单词。根据市场营销学，一个营销组合中包括合适的产品、合适的价格、合适的分销策略和合适的促销策略，就是一个成功的营销组合，企业的营销目标也可以藉以实现。随着企业营销实践的发展，该理论体系已在实践的推动下，扩大为“6Ps”、“8Ps”，甚至“10Ps”，可见该理论研究对象的鲜明的企业实践导向性。

3. 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1) 市场学的研究方法侧重理论分析。市场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是一个方法论体系，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抽象研究法、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与规范分析方法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此外，还有系统分析、比较分析、行为分析、制度分析、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等。^{[1][P7-10]}在诸多的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是一切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既适用于自然科学，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可以揭示出一切事物运动的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因此它也是研究市场学基本的、主要的方法，是站在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没有这一科学方法，就不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市场的各种表象进行科学、准确地分析，从而找出市场运行过程中矛盾运动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从而

得出带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同时,其他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市场学也有重要意义,也是市场学的辅助研究方法。

(2) 市场营销学的研究方法侧重实证分析。市场营销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传统的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管理研究法或决策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法。传统研究法主要以产品、营销机构和营销职能研究为主。历史研究法以分析研究市场营销涵义的发展变化为主,管理(或决策)研究法主要研究最优营销决策,系统研究法主要研究如何促进营销体系的组成部分协调合作。^{[1][P16-19]}因为市场营销学是一门研究企业市场问题的学科,是在大量的工商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市场营销学的学科特点,是以大量案例为基础,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寻找问题的答案,从而形成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所以市场营销学偏重使用实证分析方法。且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目标是形成具体的营销策略,因此,市场营销学不可避免要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大量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在上述研究方法中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是常用的分析手段。

4. 学科的性质不同。

(1) 市场学是一门经济类学科。从市场学的研究对象中,可以明确看出该学科的经济学性质。市场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的方方面面,通过对市场本身及运行等方面的联系的分析研究,揭示出市场发展变化(即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性。该学科的研究目的就是寻求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市场实践活动。关于市场学的学科性质,我们认为市场学是具有理论经济学性质的经济学科。具体地说,市场学就是探讨市场运行过程中市场内部各方面相互联系、发展变化中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规律的经济学学科。如果将市场学与其他经济及管理类学科进行具体的比较,如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及市场营销学等,其独立的经济学学科性质就会更加明晰。市场学与这些相关学科有本质区别,有着既不同于其他经济类学科,更不同于管理类学科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2)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管理类学科。市场营销学不是一门经济科学,而是一门应用科学。^{[2][P2]}市场营销学源于工商管理实践,市场营销是一种企业职能,它识别顾客的需要和欲望,确定企业所能提供最佳产品或服务的目标市场,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虽然市场营销学也综合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但它主要植根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从整体及本质上,它更适宜归入管理类学科,是一门指导企业如何管理、直接与经济运行中微观主体行为有密切联系的学科,与市场学的宏观性、理论性的特质是完全不同的。

四、在差异中求共同发展

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能相互混淆。我们必须明晰它们各自的学科性质,各自的任务,从而促进它们在差异中寻求共同发展之路。

1. 划清界限,消除混淆。

每个学科的发展,都必须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才能科学地揭示出其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划清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的界限,有利于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更准确地定位自己的发展方向,避免混淆。准确阐述学科的基本范畴,并按照一定的规则或逻辑建立一个较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得以建立的基石,混淆的学科界限只会降低研究效率。划清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的界限,比如在如何认识市场,如何认识市场中的各种现象,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和关系中抓住市场的本质,如何解决企业与市场相关的各种问题,如何把握市场种种复杂的动态等等问题中,准确地划分出市场学及市场营销学的研究范畴。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两门学科的交互发展。

2. 重视联系,相互促进。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行为越来越复杂,市场的各种外在表现也相应越来越复杂。市场学作为一门研究市场本质的学科,市场的发展对市场学的发展有着根本性、决定性的意义。要研究市场规律,找出现象与本质的联系,难免要受企业市场行为的影响。市场学作为一门经济类学科,离不开实践,离不开市场,也离不开市场营销学的推动。市场学的发展对市场营销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市场学的发展为市场营销学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学理论基础,使市场营销学在发展中为企业提供更有效的指导。总之,企业实践是市场发展的动力,实践发展是市场学发展的源泉;企业实践离不开市场营销学的指导,市场营销学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学的理论支持。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对彼此的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市场学与市场营销学又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促进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必须重视它们之间这种联系,使其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实现两门学科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邝鸿.现代市场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2] 王冰.现代市场理论 [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 [3] 屈炳祥.论《资本论》中的市场学 [J].江汉大学学报,1995,(8).
- [4] 菲利普·科特勒.市场营销导论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黄振荣

农村劳动力转移: 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

◎ 徐育才

[摘要] “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但是, 该模型存在着忽略劳动者能力、政府的社会改革行为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等缺陷。鉴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 本文提出了“三力模型”。该模型认为, 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和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大因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市场、政治与行政制度和劳动者能力在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破除这些制度性障碍, 促进劳动力有序、顺利转移离不开政府管理模式改革与转型。

[关键词]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推拉理论 三力模型 政府作用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22-05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的现象。在我国,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农村被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 伴随国家的城市化战略的推进, 出现了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象。

“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但该模型存在着忽略劳动者能力、政府的社会改革行为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等缺陷。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三力模型”。

二、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

1. “推拉模型”的简单回顾

“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推拉理论”最早是博格 (D.J.Bogue) 在1961年世界人口大会上提交的解释移民成因的论文中提出来的, 其主要观点如下。从运动学观点看, 在人口迁出地, 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 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但在迁出地存在“推”人口转移因素的同时, 也存在“拉”人口的若干因素, 如故乡情结、饮食习惯、家人团聚等, 只不过相比较起来, 迁出地的“推”的力量比“拉”的力量大, 占有主导地位。同样, 在转入地, 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是: 较优越的经济、文化氛围, 较高的工资收入, 较好的生活水平等。与此同时, 转入地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转入的“推”的因素, 如就业歧视、居住条件差、激烈的工作竞争环境等。但综合起来, 人口之所以迁移, 转入地的“拉”力必定比“推”力更大, 占有主导地位, 否则人口将不会流动。^{[1] 196}

国内学者在借鉴“推拉理论”分析农民流动原因的同时, 也在不断利用中国经验丰富的推拉理论。“推力”和“拉力”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而是具体化为影响农民流动的各种因素。黄平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 农村的人地矛盾、恶劣的自然条件, 再加上某些不利的政策性因素和制度性安排, 致使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相当低, 是农民外出寻求生存的十分重要的“推力”因素。^{[2] 3}“拉力”不仅具体化为高收入, 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且城市里的生活方式, 包括受商业消费文化影响的‘城市魅力’及其通过电视等传媒手段向乡村社区的直接延伸, 也是吸引农村劳动力的重要因素。”^{[3] P382}而且许多研究者指出, 农民流动

作者简介 徐育才,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广东 广州, 510275)。

是在“推拉”二力的双重作用下发生的。王小广曾经谈到,“现在民工流动的动机基本不是因温饱没有解决而进行的迫不得已去外地谋生,也不仅是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部分不足,而主要是受一种强烈的致富愿望的推动。民工较少受生存力(谋生或求活路,但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农民受生存力的推动)的作用。而要使这种流动能顺利进行还需要强有力的拉力的作用,这种拉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建筑业、饮食业以及开放城市和沿海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已形成区域性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这为民工大量向东部流动提供了大好机遇。”^[7] P332)

从“推拉理论”的产生及其流变中,我们可以发现该理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非常重视市场因素的作用。例如,无论是“推力”中的人地矛盾、恶劣的自然条件等,还是“拉力”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等,都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理解农民流动的发生。第二,强调农民的流动是在一定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下进行的。例如,徐增阳就认为,除了人地矛盾外,农民流动与国家对乡村的治理是有着紧密关联的。他把这种因行政村治理体制而产生的农民流动称为“压力型”农民流动,即在行政化村治对村庄经济资源的过度汲取下,农民被迫在社区外寻求生存的一种努力。^[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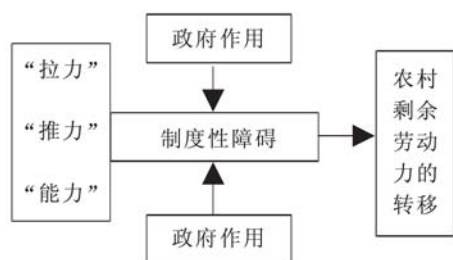
2. “推拉模型”的缺陷

“推拉理论”在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它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主体的能力问题。因为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本身是否具备转移的思想准备,即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态度,是否具有适应转移后生活或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其次,它侧重于“地域”而非“个人”的研究视角。“推拉理论”主要采用“地域”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推力和拉力的分析来解释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从劳动者个体出发,可以为我们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如果从劳动者个体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们则会发现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三类: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因素以及劳动者个体能力因素。对于某一个农村劳动者而言,他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是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高工资的吸引、传统城市就业制度的瓦解和自身素质与工作技能提高,这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后,它忽略了政府的社会改革行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建立但仍未完善,传统的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虽被打破但新的制度仍未建立,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仍然未能满足第二、三产业的用工要求,这些都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

三、“三力模型”预设

经过比较研究,笔者总结出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即“三力”理论——“拉力”、“能力”和“推力”——并对这三种“力”的内涵作特殊的理解。笔者认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三个因素: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因素以及劳动者个体能力因素。在这里,我把市场因素的作用称为“拉力”——来源于市场发展所产生的对劳动力资源的吸引力。农村改革的成功,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产生市场拉力的三个经济原因。政治与行政制度因素所起的作用称为“推力”——来源于政府为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而制定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具体表现在政府对传统的劳动就业制度进行改革。劳动者个体能力因素所起的作用称为“能力”——来源于农村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素质,低素质的农村人力资本因无法适应城市工作的要求而降低其转移的自由度。

上述三种“力”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总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制度性障碍,解决这些制度性障碍只有通过制度变迁来实现。例如,“拉力”的作用有赖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推力”的作用更是有赖于政府对传统劳动就业制度的变革,“能力”的作用有赖于农村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城市职业教育体制的发展。由于我国的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因此破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各种制度性障碍,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换言之,作为制度变迁主导者的政府在“拉力”、“推力”和“能力”中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图一 “三力理论”结构图

1. “拉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力”来源于市场发展所产生的对劳动力资源的吸引力。农村改革的成功，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产生市场“拉力”的三个经济原因。

首先，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成的根本性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一方面打破了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管理体制

制，农户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从而使农业劳动力由过去的“隐性剩余”转化为现实的“显性剩余”；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达到了基本上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的需要，这就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物质生活条件保障。

其次，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成的重要拉动力量。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逐步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二、三产业，进一步拓宽了农民流动就业的空间。

最后，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成的直接动因。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布取决于产业结构和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结构。恩格尔定律揭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因而大部分农产品都是收入弹性较低的商品。无论从产值结构还是从就业结构来衡量，中国都是一个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国家，即高生产率、高工资的城市工业部门与低生产率、低收入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因此，在农民依靠农业致富面临着市场有限性和资源性有限性的双重约束下，部分思想灵活、敢于冒险的青年农民率先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求就业机会。

2. “推力”

劳动力转移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下进行的。户籍制度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传统劳动就业制度是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制度障碍。

(1) 户籍制度的逐步瓦解

户籍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在国家工业化进程曲折发展的情况下逐步建立和形成的。它用行政手段把全体公民划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城镇居民享有福利待遇和劳动就业机会，而农民则被束缚在土地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身份等级制度，这一制度违背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

进入21世纪，我国户籍制度已逐步瓦解。蔡昉依据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的强弱提出了三种改革模式。^{[3] P270}第一种模式以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为代表，特点是“最低条件，全面放开”。第二种模式以中等城市以及一些大城市为代表，特点是“取消限额，条件准入”。第三种模式以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为代表，特点是“筑高门槛，开大城门”。

(2) 传统劳动就业制度的逐步瓦解

在计划体制下，户籍制度是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制度安排。由于户籍制度能够有效地把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城市福利体制就可以相应地建立起来了。其中，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的排他性劳动就业制度是这种福利体制的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绝对排他性的全面就业的政策，即只要一个人没有城市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就不能得到雇用。第二，建立以企业办社会为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被排除在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

19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以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都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且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随着城市福利制度改革的深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根据农业部2001年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2000年农村劳动力跨向流动的数量高达7550万人。^{[9 P272)}

3. “能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农民的人力资本构成了一种较高的转移阻碍。^{[9 P154)}这是因为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在技能上有不同的要求，一个从前仅仅务农的劳动力，直接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中，显然不如那些已经在农村从事过非农产业活动的劳动力。因此，劳动者个体是否具有与从事非农产业相适应的各种能力，将影响着该劳动者流动的自由度。

农民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 (健康状况) 等质量因素之和，是开发和培训人力资源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劳动者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和有经济含义的经历特征等。农民人力资本质量的高低与教育相关。教育是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年来关于市场过渡与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中，就教育的作用提出了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假设：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过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其回报率将不断提高。^{[9}国内一些学者用人们在经济收入上的回报为这个假设提供了许多中国内地的经验数据。不少学者也运用相关理论对教育在农民流动中的作用进行分析。^[7]

四、政府在“三力模型”中的作用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建立但仍未完善，传统的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虽被打破但新的制度仍未建立，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仍然未能满足第二、三产业的用工要求。因此，破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市场、制度和劳动者能力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都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

1. 引导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首先，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在十届政协三次会议上，林毅夫说，中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难题在农村。对农民收入如何提高的问题，林毅夫认为，需要从整个社会来考虑，因为最重要的是要减少农民；要让农民到城市里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多一点的就业机会，包括第二、三产业，同时在农村内部留下，这是最重要的。第三产业灵活多样，能吸纳各种层次的劳动力，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很大潜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开始时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现在已转向餐饮、零售等行业。

根据2004年全国第四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数据显示（见表1），第四季度117个城市的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2.6%、31.9%和65.5%。从总量结构看，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依然占主体地位。与上季度相比，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有所回升，上升了0.7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略有下降，下降了1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依旧呈现下降态势，下降了0.7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呈现上升态势，上升了0.3个百分点。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在2004年第四季度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包括很多领域，在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政府要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上发挥引导和推动作用。

其次，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地处农村地区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其产生都与当地的农业特色、经济要素特点密切相关；它们机制活，危机意识强，对市场冷暖有更敏锐的把握，是当地经济的“激活剂”。所以它们的发展，必然对当地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起到直接带动作用。在内蒙古的畜牧区、山东的蔬菜产区等，都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带动一

表1 按产业分组的需求人数

产业	需求人数（人）	所占比重（%）	与上季度相比 需求变化（百分点）	与上年同期相比 需求变化（百分点）
第一产业	88555	2.6	+0.3	+0.4
第二产业	1108998	31.9	- 1.0	+0.3
第三产业	2276701	65.5	+0.7	- 0.7
合计	3474254	100	/	/

个农（牧）业产业化基地形成的例子。

国家应优化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涉农领域，尤其应针对一些地方基层农业科研和推广力量投入不足、农村医疗条件较差、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覆盖面小等状况，引导、吸引民营资本的流向，让民营经济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

我国已经出台了关于社会保障的一些法律文件，但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郑功成教授指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个日益尖锐的特殊问题，农业人口的户籍身份与他们从事的非农职业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如果仍按旧的户籍制度将其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显然有违公平，但如果将其全部纳入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又欠缺财政、技术及相关政策条件。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农民的需求与目前的条件，按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来提供社会保障。有学者把农民工分为以下3类。第一类为有雇主且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此类农民工绝大多数已在城市居住多年，与城市居民已无二致。第二类为有雇主但职业不稳定、也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工，此类农民工一般流动性较强。第三类为无雇主的农民工。对于第一类农民工其社会保障项目的设置及经费筹集方式均可与城镇职工相同。对于后两类农民工，由于其流动性较强，宜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

我认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除了按工作的稳定性来处理以外，还应该考虑农民工的年龄问题。对那些工作状况相同，尤其是那些没有稳定工作而且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应采取倾斜的政策。大年龄而外出找工应该是出于不得已，在找不到工作甚至流浪街头的情况下，容易对社会产生失望的情绪，对这些人要采取优待的保障政策。所以，政府应切合实际根据不同情况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多点安全感，在政府的引导下大胆走向城市，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顺利转移。

3. 发展农村教育和农民工职业教育

首先，发展农村教育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础。我们国家尽管实施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由于某些原因，我国的农村教育发展还很落后。“民工荒”可以说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一个很好证明。近年来，“民工荒”之声时有所闻，如“广东缺100万民工”，“珠三角惊呼民工短缺”等等。据我们调研，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仍将是供大于求，就业难与个别企业招工难并存，“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同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应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大力普及义务教育，提高义务教育的层次。

其次，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目前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工作的经验与技能，只有事先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才能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培训的实施力度；组织实施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项目；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民创业培植试点；创新培训模式，提高针对性，着力构建和健全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 [1] 龚维斌. 外出劳动力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 [2] 徐增阳. “压力型”农民流动: 一个解释模式 [Z]. 中国三农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876.
- [3] 黄平. 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4] 王小广. 农民现代化之路: “成功制造成功”[A]. 社会学家的视野: 中国社会与现代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5] 蔡昉. 民生经济学——“三农”与就业问题的解析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6]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663- 681.
- [7] 赵伟人. 中国居民收入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 黄振荣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撤资、再投资行为研究*

◎ 刘阳春 毛蕴诗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大批的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扩张。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外商撤出中国市场,后又重新进入的再投资现象。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过程的观点出发,探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过程,尤其是撤资与再投资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

[关键词] 跨国公司 投资 撤资 再投资

(中图分类号) F2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27-05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535亿美元,成为超过美国在全球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6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48万多家,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353亿美元。

然而,在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不断流入我国的同时,也出现了一部分外商撤资和撤资后又重新进入的再投资现象。经国家外经贸部初步统计,截至到2002年11月底,在我国累计批准设立的42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中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有20万多家,仍在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约18.9万家。尽管存在一些外商因假投资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并购等情况,大部分外商由于各种原因而撤资是外资企业终止在华经营的主要原因。撤资的外商中不乏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退出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又不失时机地重新进入中国市场。

许多在华跨国企业经历了明显的投资、撤资、再投资过程。本文将从外商直接投资过程的理论观点出发,探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撤资、再投资的背景及原因。

二、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献综述

国内外许多文献和作者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1] 173-105}这些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能解释跨国公司再投资的原因,也为研究其撤资提供了分析的出发点。

美国学者博迪温将邓宁的三个对外直接投资前提逆转过来,提出了跨国公司从国外撤资的三个条件:第一,企业不再拥有比其他国家企业更强的优势;第二,企业还拥有竞争性优势,但内部化并不能使企业有利可图;第三,在企业看来,凭借其内部化的竞争性优势在国外进行生产已不再有利可图,也即通过出口比对外直接投资更为有利。他认为,从国外撤资只要具备上述条件中的一个就够了。^[2]

薛敬孝1994年在分析了日本企业海外撤资的情况和原因,认为撤资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并提出了使外商撤资比率下降的对策,如与外商合营时要加强互相了解,让外商了解我国的投资环境 and 市场情况等等。^[3]

徐艳梅、李玫2003年以惠而浦从北京雪花撤资、韩资企业撤出中国市场和啤酒行业外资企业纷纷撤出等为案例,对外商直接投资减撤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市场期望值过高、国际资本流动特征发生变化、中国市场发展进入转折期、投资决策者因有限理性而决策失误、合资企业内部管理失误和源于母国方面的障碍构成了外资企业在华撤资的现实原因。^[4]王志乐对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跨国公司出售投资项目有三种情况:重组性撤资、获利性撤资和亏损性撤资。^[5]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企业经营不善产生严重亏损,在扭亏无望的时候,为了减少更大的损失而撤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跨国公司在华策略与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批准号:70132010)”资助。

作者简介 刘阳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毛蕴诗,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275)。

Child 在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投资的管理体制后，指出许多外商在华经营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例如，一些地区基础设施和服务欠佳，供货质量低和市场信息不足，假冒国际名牌和侵犯知识产权，中外员工的关系难处等等。更大的问题是，当地有能力胜任中外合营企业和外资机构经理的人才短缺。中国投资环境的上述缺陷，对现有的外商在华经营产生了不利影响。^[9]

国内外文献研究表明，有关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过程中的撤资与再投资关系的研究处于缺位状态，本文试图就此投资行为现象及其动因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撤资、再投资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增长，对华投资母国已逐步扩大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不断扩大。^[7]到目前，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全球最大500家企业中，已有400家在华投资。世界上最主要的计算机、电子产品、电信设备、制药、石油化工和发电设备的制造厂家都已在中国投资。加入WTO之后，一些过去不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如金融、保险、物流、公共事业等也在逐步向外开放。

在汽车行业，世界500强公司中的51家主营和兼营汽车产品的公司都在中国建立了合资汽车企业。在零售业，随着市场开放的扩大，跨国零售巨头如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进入中国后迅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沃尔玛已在中国开设了56家分店，雇佣了近3万名员工，并计划在今年再增加20个分店。在乳品业，全世界排名前20名的乳业品牌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了中国市场。在啤酒业，到1998年底，全国啤酒行业吸引外资近8亿美元，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外国啤酒品牌有46个，啤酒“三资”企业90多家，其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32.9%。^[8 P76]但在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主流下，不同行业的撤资现象也时有发生。

在乳品等行业，由于一批本土优秀企业迅速成长，保持并扩大其市场份额，许多跨国公司被迫退出。2001年美国菲利普莫里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在北京的卡夫食品有限公司85%的股权出售给了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并许可其无偿使用“卡夫”品牌，退出了中国的酸奶市场。意大利的帕马拉特将其旗下的黑龙江乳品厂以5年期约出租给了伊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初法国达能公司将其下属的两个乳品企业的资产作价入股中国乳品市场销量第一的上海光明公司（占5%的股份），并允许其免费使用“达能”品牌。

啤酒行业的撤资现象尤其突出。根据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啤酒分会提供的数据，基于1998年50%以上的三资啤酒企业出现严重的亏损，许多跨国啤酒企业从1998年下半年起放弃股份，撤走资本。1990年代末至2002年以前，青啤在全国各地先后收购兼并了23家国外品牌和中外合资啤酒厂。表1是部分跨国公司在华啤酒行业的撤资情况。

表1 部分跨国公司撤出在华啤酒企业情况

跨国公司名称	撤出投资企业名称	所占股份	撤资时间
(新) 第一家食品有限公司	第一家(福建)啤酒有限公司	100%	2001.7
(丹) 嘉士伯(香港)公司	嘉酿(上海)有限公司	95%	2000.8
(马来西亚) 香港亚洲啤酒国际公司	上海啤酒厂	100%	1999
(美) 亚洲战略投资公司	北京亚洲双合盛五星啤酒公司	62.64%	2000.8
(美) 亚洲战略投资公司	北京三环啤酒公司	54%	2000.8
(英) 巴斯国际啤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吉林四平金士百啤酒集团公司	—	2000.4
(澳) 富仕达酿酒公司	广东富仕达酿酒有限公司	95%	1999.7
(澳) 富仕达酿酒公司	天津富仕达酿酒有限公司	60%	1999.6
(法) 达能公司	武汉欧联东西湖啤酒有限公司	54.2%	2002.5
(法) 达能公司	唐山欧联豪门啤酒有限公司	—	2002.7

资料来源：毛蕴诗、蒋敦福、曾国军：《跨国公司在华撤资——行为、过程、动因与案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在家电行业，美国三大家电巨头——惠而浦、通用电气和美泰克在中国大规模的投资遭遇不同程度的亏损后也逐步退出中国市场。惠而浦雪花电器有限公司是冰箱行业中最早的一个合资企业，也是合资时间最短的企业之一，合资不足3年亏损即达2.7亿元。为此，1997年11月，惠而浦将其60%的股本以200万美元有偿转让给雪花集团，并负责偿还合资公司的全部贷款1.4亿元人民币；1998年惠而浦以13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出其在深圳蓝波空调的全部股权。对中国家电市场和中国本土企业之实力认识不足是惠而浦退出中国冰箱和空调市场的主要原因。

成立于1981年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家电企业。由于中国彩电市场竞争剧烈，福日盈利的压力越来越大。2002年3月日立公司停止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显像管式彩色电视机，并把它在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中48%的股权出售给中资伙伴，即从合资公司中撤资。

三洋电机公司也是对华投资较早的跨国公司之一。1983年三洋电机公司在深圳设立了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1990年代中期开始对华进行大规模投资，目前在华投资企业32家，它们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有12家）和环渤海地区。作为一家跨国程度较高的公司，三洋电机围绕海外业务重构进行了大量投资或撤资。其一方面在华创建新公司，另一方面又撤出了2家亏损的制冷企业。一家是广东三洋空调机有限公司，设立于1984年，先后与广州市第二轻工局、佛山市第二轻工局合资，于2001年撤资，撤资额为1000万美元。另一家是广东三洋科龙冷柜有限公司，设立于1995年，合资方为广东科龙集团，后于2002年清算撤资，撤资额为2.37亿元人民币。两个合资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合资双方观念不一，对市场把握不当。

在汽车行业，法国标致在中国的投资和撤资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法国标致公司是全球著名的汽车制造商，1985年3月开始在北京设立代表处，1985-1997年与广州市政府成立合资公司——广州标致汽车有限公司。该合资公司由广州汽车集团公司（占股46%）、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占股22%）、中信汽车公司（占股20%）、国际金融公司（占股8%）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占股4%）共同投资组建，是当时全国“三大三小”之小轿车生产基地之一。从1985年到1995年，公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规模小，生产成本低，车型老，配件贵，市场售价偏高，再加上我国汽车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国内生产厂家的崛起，广州标致的市场份额逐年下降，市场占有率从1991年的1.6%跌至1996年的0.7%。产品大量积压，从1995年开始企业连年亏损，至1997年8月，亏损额高达10.5亿元人民币。在双方无法就继续合作达成一致时，法国标致汽车公司退出了合资公司。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尽管遭受了挫折和失败，但并不一定会全部或者永久退出中国市场。处于战略方面的考虑，他们会收缩战线，却仍保留一定的生产基地，等待时机成熟，又会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如澳大利亚的富仕达公司，由于亏损严重，不得不将其在天津和珠海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保留了上海一家企业。菲利普莫里斯公司退出中国的酸奶市场，而将主要精力和资源集中在天津天美食品公司的果珍和广州的麦氏咖啡上。上海SC庄臣公司不得不放弃非核心产品洗发水和护肤品，而保留了最有核心竞争力的家庭用品（如杀虫剂和清洁剂）。

2001年，惠而浦宣告重返中国市场。2002年，惠而浦以900万美元收购水仙电器剩余全部20%股份，更名为上海惠而浦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与此同时，上海惠而浦亚洲地区织物研发中心建成，惠而浦微波炉技术中心落户深圳，从瑞典诺尔彻平迁移部分微波炉生产线至中国广东顺德。为在中国立足和获得竞争优势，惠而浦加强供应链管理，频频推出新产品，并对售后产品实行终生保修。2002年3月，日立公司从福建日立撤资，几乎同时，日立又重新成立了新的合资公司日立（福建），与原来的合资企业福建日立在股权结构上完全倒置。原福建日立注册资金8460万元人民币，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占有50%的股份，日立制作所和日本东荣商行分别持股48%和2%。日立（福建）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日立集团出资51%，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和东荣商行则分别出资47%和2%。根据合资双方的商定，日立（福建）成立后，福建日立公司的彩电设计、销售和服务部门同时移交给新公司，而变为接受委托生产CRT型彩电。通过撤资与再投资，日立公司掌握了新公司中至关重要的控股权，福建日立公司变成了日立（福建）的

一个彩电生产车间。

三洋电机从广东撤资后，又于第二年（2003年）6月前将其在印尼生产基地的部分重要资源，包括原先在印尼制造销往日本的数字彩电产品全部转入中国生产，使得三洋电视在中国的彩电生产能力突破150万台，占三洋全球彩电生产总量的20%。这一生产能力也相当于三洋在欧洲生产基地的总和。三洋电机从三洋科龙和三洋空调撤资，以及三洋电机将印尼基地转移到中国均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体现着三洋电机全球子公司能力的消长和三洋电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再分配。

法国标致于1997年从广州撤资后又于2002年4月重新进入中国市场，通过与5家进口商的合作在中国销售进口汽车，产品系列包括206CC、307SW、406、607以及807。2002年10月，标致雪铁龙集团与东风汽车公司签署扩大合资协议，宣布由原来东风与雪铁龙的合资，提升为与标致雪铁龙集团（PSA）的合资，标致也随之重返中国市场。两家还将合资本增加10亿元，PSA所持股份提高到32%，与东风持平，而原来中法双方的银行股东总持股比例则从42.1%下降到36%。PSA除了在中国合资生产雪铁龙、标致两大品牌的产品外，还将探讨在中国向海外出口的可能性。2004年，东风标致推出PSA集团6个新车型，其中包括标致的产品。合作内容还将包括合资生产、新产品计划和销售三大部分。PSA集团总裁佛尔兹认为其在中国市场8%的份额远远不够，计划将与东风进行全面合作，共同开拓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中国市场。^{[9] P72-80)}

啤酒行业的跨国公司在华经历了一轮撤资高峰之后，进行了短暂的调整，以新的策略和更大的规模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从2002年起，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啤酒企业都以“资本介入”的方式重新进入中国啤酒行业。一方面，他们参股啤酒行业的龙头企业，与国内的龙头企业进行战略合作，以分享中国市场的投资收益。表2是参股国内龙头企业的部分外资啤酒公司。

表2 与国内龙头企业联合的世界啤酒商

外 商	中 方	外方参股比例
安海斯-布希	青岛啤酒	(通过债转股将达到) 27%
英特布鲁	珠江啤酒	24%
安海斯-布希	哈尔滨啤酒	29.64%
苏格兰纽卡斯尔	重庆啤酒	19.51%
荷兰喜力	粤海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21%
南非啤酒与华润	蓝剑啤酒	30.38%

资料来源：酒业信息网：www.brewchina.com，2004年6月。

另一方面，跨国啤酒企业积极实施本土化战略。他们选择区域性的优势啤酒企业作为合资对象，通过技术改造来满足不同地区的不同口味。在销售方面通过利用合资伙伴已建立的庞大销售网络来降低成本，取得价格优势，进入区域市场。如嘉士伯收购云南大理啤酒、昆明华狮啤酒又与西藏发展合资，以期在西南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英特布鲁在中国参控股企业达16家，触角由此深入沿海的浙江、江苏及湖南等中部地区市场。

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撤资、再投资的动因分析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动因源于不同层面的因素，如区位因素、政府政策等。跨国公司从在华企业撤资的动因也可从战略上划分为两类：公司总体重构战略和中国区位战略。对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进行总体重构时，可能会全部或者部分撤出在华投资企业。跨国公司在华区位投资战略下的撤资行为是跨国公司面对中国市场环境变化而作出的战略反应。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退出缺乏竞争优势的业务或完全撤出在华投资。完全撤出在华投资在多数情况下是投资失败造成的。即一个国外分支机构在盈利水平、投资回报和成长等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迫使母公司放弃该分支机构，以保持和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与再投资行为同中国国内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制约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国内市场环境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使国内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产品供过

于求。因此,那些以寻求市场为主要目标而又没有明显技术和品牌优势的跨国公司,以及产品定价定位高的公司在华投资很难取得成功。其次,跨国公司的大量集中进入使之面临跨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的竞争。还有与中国本土优秀企业的竞争。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借着“本土”的比较优势和由跨国公司技术外溢而产生的后发优势,在国内市场上首先利用低成本和低价优势占领中低档产品市场,替代跨国公司的同档产品,导致跨国公司退出低端产品市场。^{[9] (P72-80)}然而,跨国公司经过调整又伴随新的技术而进入高端产品市场。

跨国公司减撤在华企业的投资还与国际经济环境、母公司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跨国公司的母国经济不景气,会影响跨国公司维持包括对华投资在内的海外投资能力,甚至撤资。而当国际经济环境好转,或公司环境好转,则又会诱发部分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

尽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遭遇种种困难而撤资,但是,中国巨大的市场仍然是吸引其重新进入的动因。中国市场对他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中国市场和产业带来巨大冲击的跨国公司大都是全球竞争者。他们清楚进入中国市场会有风险,但不进入风险会更大。在中国市场全面开放之后,若放弃中国市场,或者不能巩固其在中国市场的地位,跨国公司就会失去与竞争对手在全球最大市场竞争的机会,从而可能失去竞争优势。因此,跨国公司为拥有销售渠道,抢占市场,扩大市场份额,甚至基于战略布局考虑而暂不计代价地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扩展。事实上,中国市场对于跨国公司分散风险、平衡经济波动周期带来影响的作用已日渐彰显。许多著名跨国公司,如GM,在全球其他国家市场都出现下滑、亏损,而唯有在中国市场一枝独秀。

跨国公司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也是母公司全球战略动态调整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许多跨国公司都在进行重组,包括形成新的业务与地区分布。市场环境变化了,竞争战略也就可能发生变化。^{[10] (P8)}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可能会减撤一部分不盈利的业务、缺乏前景的业务,而再投资另外一些业务,或将其从母国、海外转移到中国,形成再投资。

本文重点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尤其是投资过程中撤资与再投资的现象及其动因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但有些问题还有待作进一步的专题调查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毛蕴诗. 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
- [2] Jean J Boddewyn. Foreign and Domestic Divestment and Investment Decision: Like or unlik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3, Vol. 14:23- 36.
- [3] 薛敬孝. 外商撤资:“胜利大逃亡”? [N]. 亚太经济时报, 1994- 07- 31.
- [4] 徐艳梅, 李玫.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减撤实证分析 [J]. 中国软科学, 2003, (1).
- [5] 王志乐. 跨国公司在华的竞争及战略调整 [J]. 中国外资, 1999, (2).
- [6] 毛蕴诗, 蒋敦福. 跨国公司撤资理论及其新发展 [J].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2, (2).
- [7] 外经贸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2001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报告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 [8] 中国食品工业年鉴 (1984- 2001) [M]. 北京: 食品工业出版社, 2002.
- [9] 毛蕴诗, 蒋敦福, 曾国军.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行为、过程、动因与案例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 [10] 毛蕴诗. 全球公司重构——案例研究与中国企业战略重组 [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黄振荣

企业衰亡的生态化过程与制度化过程

◎ 彭璧玉

[摘要] 组织生态学是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目前已发展成为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衰亡是组织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组织生态学认为,企业衰亡受生态化过程、制度化过程的多重影响。生态化过程由企业种群的种内竞争、企业生态位的重叠程度来决定,并受到企业种群空间特性的制约。制度化过程强调企业合法性和制度镶嵌性等因素对企业衰亡的影响。

[关键词] 组织生态学 组织衰亡 生态化过程 制度化过程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32-05

企业的衰亡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据Dun & Brandstreet对美国1920-1982年间失败企业的统计,在大多数时间内,美国企业的死亡率都维持在1%左右的高水平。^{[1] [P51]}对企业衰亡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是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组织生态学 (organizational ecology) (Hannan, 1977)。彭璧玉^{[2] [P21-26]} (2005)分析了组织生态学对企业衰亡问题的理解,概括了影响企业衰亡的若干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经验和生存学习、企业年龄、管理连续性、企业种群内部的接触性传染、企业群落的内部调整和企业入侵等。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生态化过程和制度化过程两个方面来进一步研究企业衰亡的生态学机理。

一、企业衰亡的生态化过程

生态化过程强调企业种群动态对企业衰亡的影响。影响企业种群动态的关键因素是种群的内部竞争,而决定种群内部竞争程度的关键因素则是企业生态位的重叠程度。此外,企业种群的空间特性也对企业的衰亡机率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 企业种群的种内竞争

种内竞争是指同一区域内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组织生态学认为,企业竞争是由企业资源需求的相似性引起的,企业间所需的资源越相似,则竞争程度就越高。因此,企业之间的潜在竞争程度与其所需资源的重叠度紧密度相关。种群中一个地方企业与它的竞争对手越相似,则它所面临的竞争就越激烈。但随着企业规模和企业类型的不同,竞争对企业衰亡的影响也有较大的差异。

1. 本地化竞争模型 (localized competition model)。在生态位重叠模型 (niche-overlap model) 中,两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它们资源基础重叠的程度成正比:当两个企业对资源有着类似的需求时,彼此竞争的压力将会十分巨大;而当两个企业之间的功能互补时,它们之间相互扶助的效果也就越强。这一概念衍生出了本地化竞争理论 (localized competition theory),即当两个企业间在专长领域、能力、价格、坐落位置等维度上的距离越接近,它们之间的竞争就会越激烈。同一产业在同一空间上的群聚,会增加竞争压力,进而导致群体内的企业衰亡率也随之上升。

Hannan和Freeman (1977) 建立的规模性本地化竞争模型说明三点。(1) 规模性的本地竞争会降低企业的存活比率。(2) 不同规模的企业,其相互竞争的程度是不同的。相似规模的企业,竞争最为激烈。种群中一个企业面对的竞争程度不仅取决于种群中企业的数量,还取决于其他企业的规模。(3) 大规模的企

作者简介 彭璧玉,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广东 广州,510631)。

业会对中等规模的企业产生威胁，但不会威胁小规模的企业；中等规模的企业在与大规模的企业竞争的同时，还容易受到小规模企业的攻击。大规模企业出现的同时，中等规模的企业会衰落，而小规模企业则蓬勃发展。^{[3] P580-605)}

Silverman^{[4] P31-52)}等(1997)研究了美国汽车运输业小公司的发展对大公司死亡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小公司与大公司之间存在竞争效应，小公司数量的增长会提高大公司的死亡率。因此，小公司的种群密度与大公司的死亡率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由于互利共生关系的存在，小公司种群密度的提高开始会降低大公司的死亡率。但随着竞争效应的加强，小公司种群密度的进一步提高就会提高大公司的死亡率。

2. 资源分割模型。企业种群内组织专业化程度的差异是影响种内竞争的主要因素，Carroll (1985)为此建立了资源分割模型。模型假定种群中大型通用性企业间的竞争大都发生在市场的中心业务地带，这样就可能把市场外围的资源留给了小型专业性企业去自由使用。它意味着随着少数大型通用性企业市场竞争的集中，小型专业性企业可能会挖掘更多的外围可用资源而不必参与到直接的聚集竞争中。这种获取资源过程的差异被称为资源分割。资源分割模型说明，大型通用性企业市场竞争的集中会提高它们破产的比率，但会为小型专业性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型通用性企业会保持通用化优势，小型专业性企业容易得到专门化优势。他们以美国报社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随着竞争范围的集中，大型通用性企业的破产比率提升，而小型专业化企业的破产比率下降。

3. 社会区分模型。Hawley (1950)建立的社会区分模型说明，为了有限资源，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会导致生存环境的分化。随着竞争的演进，选择机制使一些不适应的竞争者退出市场，促使失败的企业去寻找适合其生存的特殊环境。在描述竞争的社会过程方面，本地化竞争模型和资源分割模型与社会区分模型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前两种都认为失败的企业会走向衰亡。而社会区分模型则认为，失败的企业可以通过地域和功能区分而得以转型，从而有机会获得新生。

(二) 企业生态位的重叠程度

企业生态位 (enterprise niche) 分为微观生态位和宏观生态位两个层面。微观生态位是指在个体企业层次的资源需求及生产能力的变异，而宏观生态位则涵盖多重的微观生态位，亦即使企业种群的成长率不为负的环境条件 (Hannan和Freeman, 1989)。环境对企业种群具有特定的承载力 (carrying capacity)。所谓承载力是指环境对某一种群所能承载的最大数量 (Hannan和Freeman, 1989)。新的宏观生态位出现后，种群密度就会增加，当种群密度逐渐接近承载力时，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加剧，种群内的企业死亡率会增加 (Petersen和Koput, 1991)。所以，宏观生态位的出现、萎缩、扩大或消逝，对种群内的企业竞争及企业死亡具有重大影响。

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种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密度主要由资源需求的相似性决定。企业种群中任何两个企业之间生态位的竞争程度与其对资源需求的重叠程度成比例。既然企业种群内部企业生态位重叠密度越大，企业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就越大，而竞争强度又影响企业衰亡，因此，重叠密度与企业死亡率负相关。非重叠密度反映了企业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导致非重叠生态位企业之间的互惠性相互依赖。处在非重叠密度生态位上的企业可能具有不同的能力，从而可导致企业之间的直接合作。非重叠密度还反映了合法性和组织制度植根性的信息 (Baum和Oliver, 1992; Hannan和Freeman, 1989)。因此，非重叠密度与企业死亡率负相关。^{[5] P346-358)}

(三) 企业种群的空间特性

企业种群具有时间和空间特性。对企业空间种群的研究包括空间种群密度、数量动态等种群自我调节规律和动态过程及其对空间个体的影响，并分析空间种群 (如住宅群、商店群、工厂群) 的增长率、种内关系和空间分布格局等。这方面的工作有Kirschenmann对居住区与住宅群的研究、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Losch的景观理论、Allen的城镇空间自组织模型、Zeenlan的形态发生学等。

部分具有地理空间敏感度的社会地理学家已开始探索企业密度对于企业种群出生及衰亡率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地理分析层次的高低而有所差异。Carroll和Wade (1991) 在全国、大的地理区域、州和市这几个层次研究了美国酿酒业企业的设立率和衰亡率。Swaminat和Wiedemayer (1991) 在邦、区及市的层次对德国Bavaria地区的酿酒业做了相似的研究。

随着产业组织演化程度的加深,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相关产业在特定地区集结成产业集群,在这些产业集群里,专长互补的企业通过协作网络彼此连结起来,形成在生产层面上分散,但在社会层面上凝聚的产业体系,这一区域即被称为产业区 (Industrial district)。陈明祺 (2002) 认为,产业区对企业存活机率的影响取决于地域内企业之间的行动方式。如果一个产业集群能同时鼓励身处其中的企业深化其技术能力、促进企业之间的水平合作,则该产业区将能够支持更多的企业;相反,如果一个产业集群里的企业都没有意愿对其他的企业采取开放的态度,强调自给自足及企业秘密,那么企业将会倾向与其它同处一个地区的企业竞争有限的地方资源及市场。^{[9] P1-6} 产业区的重要性并不只限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空间距离,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区域有着截然不同的生产社会组织。他以社会地理学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自行车制造商1980-1996年的存活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

1. 产业区内的企业比地域外的企业有较低的死亡率。位于中国台湾自行车地域内的企业比非地域企业在存活机率上有显著的优势。地域企业的衰亡率比要非地域企业低50%左右。地域企业比非地域企业在企业衰亡比 (企业衰亡率/企业存活率) 上低约30%。

2. 随着产业区里企业密度的增加,企业衰亡率将会降低,但是递减的幅度也会逐步缩小;而坐落在非产业区的企业则无法从其它邻近的企业那里得到类似的相互扶持的好处。在非产业区的县市,地方层次的企业密度对企业的衰亡率没有显著的影响;而非地方性的企业密度对企业存活的影响,则和企业密度理论的预测一致。

3. 在产业区内,专才企业比通才企业有更好的存活机会;但在非产业区的地区则没有这样的差别。在台湾中部的自行车产业区里,通才企业的衰亡率比专才企业高98%。相对地,在非产业区的县市里,这个数字是10%,而且没有达到统计的显著水平。由此可以推论,如果没有以协作网络为基础的区域产业体系的支持,专才企业并不具有显著的存活优势。

4. 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产业区内的企业与地域外的企业之间的存活机率的差异也会随之变大。对地域企业而言,每增加一位员工,企业衰亡比大约下降0.4%,而对非地域企业而言,每增加一位员工,企业衰亡比大约只下降0.22%左右。

二、企业死亡的制度化过程

制度化过程强调组织合法性和制度镶嵌性等因素对企业衰亡的影响。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变革、制度环境等因素具有明显的制度特性。新企业、小规模企业、变革的企业在维持组织合法性和制度镶嵌性方面面临较多的障碍,具有较高的衰亡风险。

(一) 新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存活不利性

1. 新企业的存活不利性 (liability of newness)。Stinchcombe (1965) 提出了新企业的存活不利性论点。他认为新企业比老企业有更高的衰亡风险,其原因在于:(1)新企业意味着企业与其成员都扮演社会行动者的新角色,在此期间,新企业较易犯下重大错误。(2)调整和学习新企业的角色需要许多时间与努力,会影响新企业表现的稳定性。(3)新企业的成员主要由新人组成,成员之间薄弱的互信基础会影响社会化的过程。(4)新企业不易与已拥有固定客户群的既存企业展开竞争。

此外,新企业缺乏影响力基础、正当性以及与外部环境的稳定关系 (Baum, 1996),而且新企业在可靠性 (reliability) 及解释性 (accountability) 方面的能力较差。可靠性指企业能重复产生特定水平的产

品的能力，而解释性则指企业可对资源配置及组织行动提出说明的能力。可靠性和解释性要求企业结构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由于内部的学习、协调功能的强化和外部合法性的强化，企业结构的可复制性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提高。因为环境倾向于选择具有高度可靠性及解释性的企业，企业的衰亡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就是所谓的年龄依赖（age dependence）。

2. 小规模企业的存活不利性（liability of smallness）。组织生态理论将企业规模与企业衰亡率之间的反向关系称为小规模企业的存活不利性（Wholey和Brittain, 1986）。造成此种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小规模企业为遵循政府规章而产生的行政成本过于沉重、小规模企业在筹集资本方面较困难、税法不利小规模企业的生存、小规模企业较缺乏工作保障及生涯规划的能力（Aldrich和Auster, 1986）。此外，在面临经济衰退时，大型企业可以藉由缩小经营规模来应对；而小型企业则没有多少空间可以缩减，因此会被较快地淘汰出局。除此之外，大型企业较有能力去发掘和维系可靠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时间、资金、订单和人力等组织资源，有能力去维修关系网络。

（二）企业变革的生存不利性：结构惰性理论

传统的组织理论和经济学理论认为，组织变革会随时发生。而且，实施重大变革的组织，其绩效比没有进行变革的组织要好，因此更不易衰亡（Tushman和Romanelli, 1985）。但组织生态学却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Hannan和Freeman, 1989）。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过程相类似，组织生态学认为，由于组织结构惰性（structural inertia）的存在，种群层次的变革伴随着不适应环境的企业的衰亡。

企业结构惰性的形成受到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1）企业在设备、厂房、人员等方面的投资不易转移，变成沉没成本；（2）企业决策所依赖的组织内部信息具有不确定性、不完备性；（3）企业结构的调整会造成企业内部角色和资源的再分配，容易产生内部政治性对抗，阻碍变革的进行或降低变革的效力；（4）企业基于过去的经验和历史，在企业内部已经形成了许多的共识、规范和惯例。结构惰性形成的外部因素包括：（1）由法律或政策形成的进入或离开壁垒；（2）企业外部有效信息的取得与信息渠道建立的困难；（3）企业面对的环境与社会合法性影响组织资源的正常流动和获取。Dobrev, Kim和Carroll^{[7] (P1-12)}（2001）指出，企业之所以不离开竞争激烈的区域，原因在于竞争激烈往往代表该群企业的定位具有很强的合法性，企业之间可共享合法性，并建立相互连结关系。

Hannan和Freeman（1984）提出的结构惰性理论认为，企业的核心改变降低了企业的结构性再生能力，因此降低了企业实体的可信赖性和责任性，提高了企业的衰亡风险。与此相反，持续地复制其结构和惯例（routines）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存活机率。同时，越能复制惯例的企业，其惰性也就越大。

企业变革会引发企业内部重组和外部合法性问题。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大和复制惯例能力的增强，其惰性也越来越大，变革的成本也越来越大（Amburge, 1993）。对于Stinchcombe（1965）提出的新组织的生存不利性，Hannan和Freeman（1984）认为，是企业变革产生了新企业的生存不利性，新企业高的失败率或许该称为变化的生存不利性（liability of change）（Amburge等, 1993）。因为企业变革会产生新的角色和新的关系。Amburge等对芬兰报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变革提高了企业的失败风险，但这种风险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降低。Hannan和Carroll（2002）的最新研究认为，企业变革程度越大，企业衰亡的可能性越大；企业变革越复杂（complexity）、越不透明（Opacity），企业衰亡的可能性越大。核心改变提高企业衰亡概率的实证研究还包括报业组织种群（Carroll, 1984; Mine, 1990; Dobrev, 1999）、电话公司（Barnett, 1994）、社会服务志愿者协会（Singh等, 1986）、社会运动组织（Minkoff, 1999）、银行（Han, 1998）和电影制作商（Kim, 2000）。

（三）制度环境对组织衰亡的影响

制度环境由社会规则、社会信仰及社会关系网络所组成（Meyer和Scott, 1983），它涵盖政治、社会、文化及经济环境等层面（Carroll, 1988）。组织生态学认为，制度环境的改变会塑造出不同的企业组织形

式及组织关系,影响企业组织存活的机率 (Hannan和Freeman, 1989)。

1. 政治动乱对企业衰亡具有正向的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会干扰企业与社会的历史连结关系,并释放资源给其它组织 (Baum, 1996),此种环境的冲击将会造成企业种群衰亡率的提高 (Amburger, 1990)。换言之,企业较能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进行前瞻性的行动 (Aldrich, 1979),因为政治动乱会扰乱既有的社会配置,改变社会群体与社会资源之间的连结 (Carroll和Delacroix, 1982)。因此,政治动乱会使企业的衰亡率增加。

2. 经济条件对企业衰亡具有反向的影响。很多研究曾以经济成长率、经济发展阶段、通膨率、失业率、出口成长率、进口成长率等指标为基础,探讨经济条件对企业衰亡的影响。Carroll和Delacroix (1982)认为,企业所面对的经济条件越好,则衰亡的可能性越低。因为经济水平越高,意味着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愈充裕 (Stinchcombe, 1965),而且企业之间的网络具有较高的整合性,彼此较能保持共生 (symbiotic) 的关系 (Hawley, 1978)。因此,经济水平愈高,企业存活的机会愈高。

3. 政府解除管制或放宽法令对企业衰亡具有反向的影响。政府政策可通过增加公平性、刺激需求、提供补助、管制竞争等措施,达到影响企业创建与衰亡的效果 (Baum, 1996),换言之,法规的变动会使企业所受到的限制产生改变,并使企业种群所赖以兴起的生态位亦随之扩大或萎缩,进而影响企业的存活机会。

4. 前一年同业企业的衰亡数量对当年的企业死亡具有正向的影响。同业企业的衰亡对尚存企业的影响取决于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类型及其竞争-合作程度。如果同业企业之间缺乏合作,则前一年同业企业的衰亡能减少竞争者数量,降低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有利于尚存企业的生存。但随着生产外包形式的不断普及,企业之间基于合同制造的网络生产方式逐渐流行,各种协作网络随即出现。虽然协作网络可协助组织降低交易成本、取得关键资源、进行资源交换、取得合法性,并使企业与其它成员达到互补互惠的作用,但网络对企业存活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网络的连结程度越高,网络成员在资金、加工、原料调度等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越强,成员的衰亡连带造成企业衰亡的可能性就越大。(8 P327-353)

[参考文献]

- [1] 林瑞基. 企业组织发育与死亡的影响因素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 (8).
- [2] 彭璧玉. 生态学视角的组织死亡理论研究 [J]. 当代经济研究, 2005, (8).
- [3] Baum, Joel A C, Mezias, Stephen J. Localized compet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ailure in the Manhattan hotel industry, 1898-1990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2, 4: 580- 605.
- [4] Brians Silverman; Jack A Nickerson; John Freeman. Profitability, Transactional Alig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 31- 52.
- [5] Baum, Joel A C; Singh, Jitendra V. Organizational niches and the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2: 346- 358.
- [6] 陈明祺. 从空间经济学到地方社会学: 台湾自行车产业企业存活率的事件史分析, 1980- 1996 [J]. 2002年台湾社会学年会论文.
- [7] Dobrev, D, Tai- Young Kim, Carroll, R. Niche and Scale in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 Unified Empirical Model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s in the US. 1885- 1981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aheim, 2001.
- [8] 吴孟玲, 林月云. 组织死亡与产业变迁——石材制品制造业之生态研究 [J]. 管理学报, 2001, (2).

责任编辑: 黄振荣

·哲学·

对三个基础性问题的辩证思考

——读稿札记

◎ 朱德生

[摘要] 本人在受命读了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书稿后,得到不少启示,觉得要促进我们的理论研究发展,就要多点辩证的思考。(1)认识的客观性不是要根本排斥主观性,而是要否定主观的外在独立性,使之成为客观性实现自身的环节。(2)大自然的活动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但大自然的整体却是有序的、合目的的;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其结果却常常是无序反目的的。人类实践活动的长远目标就是要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这才能真正建构起人与自然的和谐。(3)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命题要说明的主要是: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僵死的、对立的。它的现实表现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辩证运动。

[关键词] 客观性和主观性 历史和自然的统一性 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5-0037-08

2005年我受命读了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书稿,从中得到不少启发。一方面看到参与写作的青年朋友都十分努力,希望克服以往研究中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恶习,注意去探索一些新问题和新思路。这反映了我们的理论研究正在深入、新的理论人才正在成长,令人鼓舞。但另一方面也发现,要前进,阻力还不小。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非理论的,二是理论的。

所谓非理论的原因,即领导的要求,似乎哲学的任务,只要归结为满足当前政策上的需求就可以了。结果把理论工作变成了当前政策的注释,使它丧失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犹如芭蕾舞演员似的,不停地在舞台上转圆圈,而且是转得圆、转得快,可惜脚跟不着地。还自以为是“常有理”。其实,“常有理”即“常没有理”。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工作的威信一落千丈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本来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为什么这么难以克服呢?我看问题在于有些领导者,总以为自己比理论研究者要高明,必须为理论研究者划定活动的框框。这是从“仕而优则学”中引伸出的一种怪论在作祟。似乎一个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不是数十年刻苦学习钻研的结果,而是官位大小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出,理论工作的发展能否顺利,不仅取决于理论工作本身,还取决于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步。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此暂不展开讨论。

另一部分阻力来自理论研究本身,即理论研究中,有一些错误观念被认为是不可不尊的主臬。不过这些主臬有的是以往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形成的,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西方思想“食洋不化”导致的。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方面常常能合而为一。为什么?就是因为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蔑视辩证法。所以我想挑几个问题,稍稍具体一点来谈谈我的看法。

一

先谈认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

作者简介 朱德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是人类开始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之日起便存在的一个难题。不过，难在何处？在近代以前，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按素朴的经验主义原则来理解这个问题的。按经验主义的原则，感觉是被动的。例如眼睛的作用是看，如果没有外物作用于眼睛，眼睛当然什么也看不到。人们以为自己所看到的，正是对外物的原有面目的反映。所以反映论的观点一直在真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到了近代，思想家们在反思人类的思想活动与认识活动时，却发现反映论一说，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这些反思的理论中，最典型的是休谟的怀疑论。休谟说，如果人类的认识全部都来源于经验，那么，在经验以外，还有没有某种不依赖于经验的东西，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只能求助于经验，可是经验在这里沉默了，而且也不得不沉默。

所谓不得不沉默，就是说经验对所提问题回答不了，不管回答有还是没有，在经验里都找不到根据。因为经验只能告诉我们经验到了什么，不可能告诉我们没有经验到的；因此，经验当然没法告诉我们在经验之外有没有不依赖于经验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按此来推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必然会被绝对化地对立起来，似乎主观的即是和客观无关的；反之，何为客观的，就是和主观无关的。如果这样，人们怎么能知道自己认识到的东西，是不是该物在被认识以前的样子呢？一定要说人们认识到的正好是该物没有被认识以前的原貌，那就等于说，我只认识张三，不认识李四，却能断言两人相像或不相像。所以说，如果认识的作用仅仅如照镜子似的，只能被动地在被给予的意义上把握对象，那么它就永远不可能回答认识的真实的客观性，这就是机械反映论的内在困境。

休谟发现了这个矛盾，这是他不朽的功绩。因为这本来就是每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每时每刻都遇到的问题。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这里有什么矛盾，只有休谟才揭示了这种盲目性。这对理论思维的发展给了强有力的推动，使人类对外部世界以及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

康德哲学的出现，就是这一进步的最初表现。康德比较明确地看到了，如果认识永远只是处于被动地接受状态，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使认识的真理性和客观性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因而，他提出了要在哲学中发动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要将认识论理论从以往的以客体为轴心，让主体围绕客体来旋转，改造成以主体为轴心，使客体围绕主体来旋转。于是他把以往主体只是被动地接受的认识论理论，改造成主体主动地建立认识对象的理论，即对象不是简单地给予主体的，而是主体在整理加工来自客体的质料中主动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认识得以成立的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得以成立的条件。为此，他改造了以往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即把以往大家认为有经验实在性的自我（如唯心主义唯理论者所理解的）改造成了先验的自我，它是在和经验材料结合时，即在认识过程中获得了经验实在性的；同样的道理，把以往明明白白的客体（如唯物主义经验论者所理解的），改造成了无以名状的自在之物或物自体。它也是在认识过程中，才明确了自己的规定性，名之为某物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康德所谓的认识对象，是认识者主观主义地杜撰出来的。不是的。相反地，康德认为他关于对象的认识是客观的，因为它是知性按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必然性，整理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

显然，康德对客观性的了解，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客观性的了解刚好相反。但是，黑格尔却认为，康德的了解比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了解要深刻得多。因为平时我们总是用思想中所把握的一般来称呼一个个体，而不是用感觉经验直接把握到的来称呼它。第一是因为，感觉经验直接把握到的，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第二是因为思想中把握到的比感觉经验中直接把握到的要深刻。不过，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普遍必然性并不是像康德所理解的那样是存在于感觉经验材料之外的，而是感觉经验材料的本质。黑格尔说：“哲学最初起源于后天的事实，是依靠经验而产生的（其实，思维本质上就是对当前的直接经验的否定），正如人的饮食依靠食物，因为没有食物，人即无法饮食。就这种关系而论，饮食对于食物，可以说是太不知感恩了。因为饮食全靠有食物，而且全靠消灭食物。在这个

意义下，思维对于感官经验也可以说是一样地不知感恩。（因为思维所以成为思维，全靠有感官材料，而且全靠消化，否定感官材料。）^{[7] P53)}

到此为止，正如黑格尔所说，客观性就有了三种理解：是经验主义的自在者给予意义上的；康德所说的普遍必然性意义上的；黑格尔所说的感觉经验的理性本质意义上的。在这三种客观性中，黑格尔当然认为第一种是错的，因为它容易导致认识对象是独立于认识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康德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比经验主义要深刻，但仍然不妥。因为他把客观性囿于先验的观念论原则中了，即把客观性主观化了。黑格尔自认为只有他的观点才全面，即普遍必然的思想既是我们的思想，同时也是事物的本质。其实不然。当黑格尔认为事物的本质是思想时，也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因为他认为思想是第一性的。

如果认识对象是思想性的事物，说其本质是思想还可以，如果认识对象是物质性的东西，怎么能说其本质为思想呢？今天的科学是相当发达了，也没有能证明有什么非物质的精神实体的存在。精神作为精神，思想作为思想，其经验实在性恰恰就在于它思维非精神性的东西。所以要谈思想的客观性，便不可能不谈异于思想的存在，不可能不谈这种存在对思想的给予作用。问题在于客体给予主体是通过感官实现的，但感官所直接把握到的客体是个别的、分散的，只能体会，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一旦能用语词来表达自己感受到的东西时，便已经由感觉上升到了理性概念了。

这种理性概念之所以可靠，或者说，它所表达的不是主观主义的东西，而是客观的，那是因为这种普遍的理性概念既不是康德所说的那样，是某种先验的东西；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事物的先在的本质；而是从感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形式上它否定了感觉经验，超越了感觉经验，实际上它却更深刻地揭示了感觉经验的内在本质。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用一般性的语词来表达自己对个别对象的认识，听众却并没有因此而不知其所指何物，相反地却清楚地知道其具体所指。在这里，我们必须说，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提出的“具体概念”一说，是颇有道理的。

因此，客观之所以叫客观，并不在于它完全排斥主观，而是因为它否定了主观的外在独立性，把它变成了实现客观自身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同样相似的道理，主观之所以叫主观，并不在于它完全排斥客观，而在于它企图否定客观对自身的制约，把它变成自身独立自主的内容。

所以，在谈到真理的客观性时，一定要破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形成的一种错误观念，以为客观性即思想把握到了对象的原始的自在面貌。这是个极其混乱的想法。因为，思想把握到的是不是对象的原始的自在面貌，即思想把握到的是不是对象被认识以前的原貌，这是个有待证明的结论。把有待证明的结论当作自明的前提，这是不对的！在休谟指出这个错误300多年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仍然在犯休谟指出的错误，岂不是太可悲了吗？认识的客观真理性，并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我们假设的原始的自在面貌，而在于它是不是符合实践在特定历史阶段上所提示的总图景。认识对象是在发展中的，认识也是在发展中的。对象无所谓原始的自在的面貌，认识无所谓最终的绝对真理。人们的认识是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相适应的。所以实践能证明认识的客观有效性与真理性。

二

其次谈谈自然与历史的统一性问题。其实质即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按照传统的看法，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赤裸裸的盲目的必然性，在社会历史中起作用的是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在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有这种和那种唯物主义理论，但是在对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始终是各种唯心主义观点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时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时，历史在他的视野以外：当他去研究历史时，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正是这种分裂，导致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发现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也像在自然领域中一样，存在着不依个人意

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但是并没有因此便否定了人们合目的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地肯定了人们合目的性活动根源于合规律性的现实。对现实存在的规律性认识得越深刻，合目的性活动成功的可能性便越大。所以要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就得把两者统一起来。可是，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这两种研究仍然是各自独立的。这就造成了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种片面性，即把哲学中的“真理”概念等同于科学中的“真”的概念。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实证性的认识，它所追求的是“是非”问题，但哲学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生存意义的反思。人的存在方式的最基本的特点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人在实践中所追求的真理，永远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社会历史现象是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它的内在必然性是隐藏在人们自主活动造成的种种现象背后的。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在自觉地追求着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些各不相同的目标，或者是相互矛盾，或者是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由此种种，这些个人的目标能够如愿以偿的几乎微乎其微。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3] P478-479}这就充分说明了，历史的合规律性的发展，是通过人的合目的性活动来实现的。也就是在历史发展中，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性是历史性，只有在无止境的发展中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人们常常断言，自然和社会似乎是完全不同的。即自然环境似乎与我们的主动奋斗无关，特别是对于个人而言，外在的环境似乎完全是给定的。但是，这种说法是十分近视的。人是从自然界中发展出来的。从这个侧面来说，自然环境是先于人而存在的、给定的。不过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自己的历史活动的产物，即人是在改造自然界的历史活动中才成为人的。从这个侧面来说，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自然环境，恰恰就不是先于人而给定的，而是在人和自然界的互为中介的发展中给定的，或者说，人的生存环境是人自己创造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指出的，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历史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历史性的。因为，每一代人“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如果“把人对自然界的联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必然会造成“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3] P43,44)}

抽象地说，自然界是无意识的，它并不懂得谋自己的未来与创造自己的明天。但是人们不难发现，在纷繁复杂的大自然中，处处都表现出是合目的和有序的。相反地，按照上面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我们却发现人们自觉活动的结果却经常表现出无目的和无序的，否则今天我们便不会遇到环境、生态问题等等世界性问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事呢？那是因为大自然是一个无限的整体，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这个无限的整体便成了一个合目的的整体，即有机的整体。所以自然的活动虽然是无意识的，但这个整体却是有序的。人类的实践是基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之上的，不过这种认识仅仅是对局部世界的认识，即使从局部世界看，我们的实践成功了，但从无限的整体看，它仍是对合目的有机整体的扰乱，即表现为无序和混乱。所以，自然现象显然和社会现象有很大差别。但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一

致性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当然，合规律的认识，不仅仅是指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时亦应包括对社会的认识。但是，对自然的合规律的认识，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对自然的合规律的认识，便谈不到创造历史的活动。以往我们常常说生产决定生产关系，前者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是前者决定后者。所以，我们说自然和历史的统一是人们在实践中求得合规律性活动和合目的性活动一致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的根本途径。

总之，人的存在是自然和历史统一的存在。人是从自然界中发展出来的，他当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却又是对自然界的超越，形成了在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的社会，由自然发展而来的人也就成了社会的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122]

树立牢固的自然和历史的统一性的理念，在今天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近代以来，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结果造成了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即对自己生存环境的破坏。因而人们提出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问题。结果有不少人便盲目地鼓吹古代所谓的天人合一如何如何美妙，似乎忘记了今天的文明比古代文明要进步。当我们说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时，并不是要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去。相反地，是要在今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古代的和谐基本上是满足于自然对于我们的恩赐。现在我们要建设的和谐却是要充分发挥自然的潜能。

所谓自然和历史的统一性，就是要使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认识真正统一起来，以便人类文明的发展走上更顺利的康庄大道。即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这就是新的唯物主义。

三

再次，来谈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从字面上看，这个问题在古希腊巴门尼德那里便已经明确提出来了。因为他说过：“作为思想和思想的对象是同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思想表达于其中的存在的东西，你便不会找到思想。现在和将来都没有任何东西异于存在。”^[123]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巴门尼德一节中也引证了这段语录。（只不过译文略有不同：“思想与思想为了它而存在的东西是同一之物，因为没有存在着并对之有所言说（或表现），你将寻找不到思想。因此在存在者之外，它（思想）是无物，也将是无物。”）但是，这个命题，与后来黑格尔在批判康德哲学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相比，其理论内容是十分不同的。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命题，最主要的是要表达一种辩证思维方式。恩格斯在解读这一理论时，说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指谁是第一性的；第二方面是思想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可知不可知的问题。这样的概括，我认为太简单了，把主要的问题抛开了。

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命题，是由改造康德关于认识的两个来源，即改造了先验的自我和自在之物的关系而来的。康德虽然注意到了认识对象并不是强加于主体的，而是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但是他仍然保留了二元对立的出发点。黑格尔认为要克服康德的不可知论，就得消除这种二元对立的根据。为此，他把康德的没有经验实在性的先验的自我，改造成了作为思维的思维，即纯思维；同时把康德的无以言说的自在之物改造成了作为存在的存在，即纯存在。在这里，思维和存在既是有区别的又是没有区别的。即作静态分析时，不论是作为思维的思维，或作为存在的存在，都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纯概念。实际上，两者是同一的。反之，如果作动态分析，我们将发现，作为思维的思维并不是

空无内容的纯概念，只不过不是以他物为内容而是以自身为内容的直接性思维。犹如失眠的人告诫自己什么也别想，但“什么也别想”时，恰恰便想了。同样的，作为存在的存在，并非空无内容的纯概念，只不过是理性直接把握到的、已经扬弃了感性内容的直接性存在（下面我将会指出，这种了解是错的，因为事实上不是如此的）。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的对立并不是先验的，而是随着认识活动的开始而开始的。所以，黑格尔在批判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时说，这不是认识前的活动，已经是认识活动本身了。

而且这种认识活动，正是反思性的哲学的认识活动。哲学不是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实证性的认识，而是对这种实证性认识的再认识。在这种认识活动中，黑格尔发现了人的认识对象不仅不是外界对象强加的，甚至也不能归结为人在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而是思维以自身为对象的活动。所谓以自身为对象，即是要使自己一分为二，把自己的本质当作独立于和异于自己的对象来对待。经过认识，人们才知道这个异于自己的本质，恰恰便是自己的本质，从而达到了思维与自身的重合，即真理。认识就是在这种正反合的曲折中前进的。

显然，这里充满了唯心主义观点。这些观点我们当然是不同意的，不过我们暂时不来讨论这些。我们只问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有其合理之处呢？是不是比以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要合理些呢？

在黑格尔以前，其实并没有专门讨论名之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著作。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黑格尔在阐述自己的辩证思维方式时对以往的思维方式作出的一种概括。古代的哲学家们相信，人类是有能力认识客观对象的。客观对象也就如在直观中给定的那样：他们并没有发现认识 and 对象之间有什么内在矛盾。所以，他们相信人对对象的认识或者是错的或者是对的，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孕育于古代形而上学理论中，所以叫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不过这种思维方式是在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这点大家可以从勒奈·笛卡尔和法兰西斯·培根的著作中得到清楚的证明。

当然，在理论水平上，近代经验主义者和唯理主义者比古代形而上学家要前进了。例如他们发现了认识 and 对象之间有矛盾。所以，经验主义者说，对象就如经验中呈现的那样，唯理主义者则说对象就如理性所把握的那样。从他们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看到了矛盾，可是他们的思想深处仍然认为不应有矛盾、有矛盾即是错的。所以前者认为只有经验把握到的是对的，后者认为只有理性把握的才是真理。

事实上，实际情况并不是如他们所坚持的那样，客观对象的真相恰恰是在感性和理性的矛盾统一呈现出来的，不管是否定了感性还是否定了理性，都不可能把握对象的真正的本来面目。所以，我认为，辩证思维发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

不过，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辩证的思维方式既然这么重要，那为什么在黑格尔以后，真正重视这一理论的人却很少，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家是公开宣布自己继承了这一传统（不过也没有能使辩证法得到应有的发展）。这主要不是哲学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与这一时代人的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有关。大家知道，欧洲哲学自近代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发展以来，科学主义的思想越来越突出。而且，20世纪初还出现了以哲学是科学知识的系统化、为口号的实证主义思潮。刚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是近代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所以不少思想家认为，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哲学是多余的了，辩证法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产生了。生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生活中和谐与民主问题，……所以，人们不得不反思，科学技术的如此这般的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何在呢？到底如何去鉴定人类文明的进步？显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同

时也是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不是科学方法所回答的是与否的问题，而是是不是与应不应该的矛盾统一的问题。

自觉的辩证法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命运一直很坎坷。这是因为，人类虽然意识到了自身的能动性，但是却没有充分意识由此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将引起什么样性质上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时，人们对自身的能力充满了乐观和希望，人类似乎无所不能，可以任意命令自然了。但是，没有多久，人们便发现，他们的这种盲目乐观，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即在不知不觉中，人类把自己的生存环境破坏了。以至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也发出呼吁，人类的生产如果不加改变地继续下去，那末人类在地球上可以生活的年月将屈指可数了。这说明，人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一句话是辩证的。所以今天再来解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如果不讲辩证的内容，至少在理论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当然，如何来理解和表达唯物辩证法，这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不过，从黑格尔那里大概能得到一些启发和帮助。

黑格尔是从纯存在开始展开他的辩证体系的表述的。但是在我看来，黑格尔的这个开端，包含着双重的错误：一是犯了由思想到存在的唯心主义错误，二是混淆了理性的直接性和感性的直接性。无论是感性直接把握到的还是理性直接把握到的，都是没有任何规定的纯存在。不过在我看来，只有感性直接把握到的纯存在，才真正是具体的，即它的规定性是潜在的，尚没有被展开和扬弃。相反的，理性直接把握到的纯存在，已经不能称为具体概念了。因为它的规定性已经被展开和扬弃，所以它仅仅是抽象概念。黑格尔所以要用理性的直接性来取代感性的直接性，当然仍然是为了突出思想第一性的唯心主义原则。

在我看来，作为辩证出发点的是活生生的人。这既避免了从一个既定的前提开始，也避免了先验的二元论。人是在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中才成为人的。要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就得把世界二重化，形成主体和客体；要使世界二重化，主体首先要使自身二重化（如说得“我”来）。二重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超越二重化，达到新的基础上的统一。这就是前进和发展。

四

如上讨论的目的是希望新的哲学教材能突出唯物辩证法，使这一理论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内容。而不是像现行的教材那样，仅仅把辩证法当作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

体系是内容的表现。要改革目前的理论体系，首先要改革目前的理论内容。马克思说，新哲学不是要颁布适合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的永恒真理的教条，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我认为，这说得十分中肯。它是在充分吸取了以往哲学理论思维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结论。所谓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就是要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生存意义作出反思。

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哲学是研究横跨自然、历史、思维三大领域的普遍规律的。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吧哲学当成了绝对真理的总和，即重复了旧哲学的错误。绝对意义上的普遍规律是不可能当作直接对象来研究的，除非是在神学中，科学永远是通过相对来把握绝对的。

人的存在方式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是在改造世界中求得存在和发展的。要改造世界就得认识世界。所以，古代（如古希腊）的思想家以为，凡是探求世界存在的原则和原因的学问，便是哲学。到了近代，各门实证科学纷纷脱离哲学母胎而独立出来了。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在19世纪下半叶曾经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已经用不着哲学来包办代替了，今后留给哲学的只有纯思维的领域了，即逻辑和辩证法了。不过，今天看来，纯思维的领域也用不着哲学来包办代替了，一句话，所有实证研究的领域，都用不着哲学来费劲了。真正留给哲学的领域，只有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生存意义的反思了，这就是康德为什么要提出人是什么以及黑格尔所以能总结出所谓的存在关系命题来的原因。

如果对人的存在方式作抽象的思辩的表述，那末，我们可以这样说，人是一种二重化的存在，这种二重化即理想与现实的二重化。如食草动物，一定要生活在有草食供应的地方，食肉动物，一定要生活在有肉食供应的地方。这些动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直接同一的关系。人则不同，他的存在和发展，主要是靠自己的生产。生产不仅根本改变了人的消费性质，而且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在自然界的动物那里，消费仅仅是一种生理的需要，在人这里变成了社会的需要。例如动物只要吃饱就满足了，人还要求吃好，即人吃东西不仅是为了活命，还是社会地位和社会礼仪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直接提供的消费是一个有限量，消费者很快便能满意，相反的，生产提供的消费却是个永远没有满足的无限量，即暂时的满足会引起更大的不满足。像俗语中说的，有了千钱盼万钱，做了皇帝盼登继。人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而且越来越不满足。因此人生活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中，却天天在追求超经验的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说，他生活在形而下的世界中，却天天去追求形而上的世界。人既是一种经验性的存在物，又是一种超验性的存在物。

但是，大家都知道，理想之所以叫理想，永远不等于现实，因为理想实现了，便不再是理想了。不过经过人们在实践中的努力，理想又必须能转化为现实，否则它便不成其为理想，只不过是空想而已。同时，现实之所以为现实，正因为它不是理想的，如果它成了理想的，那历史就到尽头了。而经过人们的奋斗，现实又必须能向理想转化，否则现实便成了没有明天、没有未来的世界末日了。

为了更好地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运动能不断地转化和前进，便得改造近代以来欧洲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认识论。实际上，他们的理论只研究事实判断的知识论，不研究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如何统一的认识论。这种把认识论和知识论等同起来的观点是不对的。当他们把近代科学中的方法移植到哲学中来时，对推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是有所贡献的，但是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对立了起来，这便错了。只要上面所说的自然和历史的统一性没有解决，那么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统一性也就解决不了，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唯物主义。

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上述观点要成为真理的唯一占有者。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要求我们的理论同样是五彩缤纷的。没有一种理论能成为真理的垄断者。另外，我同意不同意某一思想观点，不是因为这一观点来自何人，而是因为这一思想是合情合理的。所谓合理的，即不仅是合乎论理的理，也符合情理的理。我不认为前人已经把我们要探索的真理都揭示出来了，他们只是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不同的帮助（包括经验与教训）。

总之，我们应走的路，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完成：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我们去实现。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小逻辑 [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苗力田主编. 古希腊哲学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罗 苹

哲学原理教科书中若干问题质疑

◎ 杨寿堪

[摘要] 对哲学原理教科书中若干问题的质疑,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教科书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关于说明世界本原的某种具体物质形态理解为古代的物质概念,把近代自然科学家解释物质结构的观点当成近代的物质范畴,这是不妥的。关于物质与运动的关系,教科书将一切运动都归结为物质运动,否认精神的运动,这是庸俗的唯“物”的观点。教科书对发展只理解为上升前进的运动,理解为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灭亡的运动,而无视发展是上升与下降、前进与倒退、新与旧相结合的辩证过程。矛盾同一的相对性,教科书按传统观点进行解释,即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失去一方,另一方便不存在,此理由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凡是矛盾,必然既有矛,又有盾,否则就不成为矛盾。教科书把真理的绝对性与绝对真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其实人的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绝对真理,只能不断地接近绝对真理,如果有一天达到绝对真理,人的认识也就停止了。

[关键词] 哲学原理 物质概念 发展 矛盾 绝对真理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45-05

一、关于古代和近代的物质概念

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产生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范畴),教科书在阐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念(范畴)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物质概念(范畴)时,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关于探究宇宙万物本原的某种或几种具体物质形态,解释为古代的物质观、物质概念(范畴),近代自然科学家关于说明物质结构的观点(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物质最小单位),当成是近代物质概念(范畴)。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探索宇宙万物本原时,往往把水,气,火或者水、土、火、气四根说成是万物的本原。但这些都只是说明宇宙是由哪些具体物质形态构成的,并不是一种哲学意义的物质概念(范畴)。严格来说,由于古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对物质的认识)还处在幼年时期,哲学家们还不可能对物质进行科学的概括。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认真深入地去探究的话,也可以发现古代物质概念的雏形或萌芽,但这不是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关于宇宙本原的论述,而是在古代哲学家、“百科全书”式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论著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有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他还认为形式既是事物存在追求的目的又是推动事物形成与发展的力量,因此他把四因归结为质料因和形式因。他指出:自然界一切事物“永远具有质料”,质料是万物的“底层”,它不依赖于别的东西,而万物却依赖于它。质料是实体,其它范畴如数量、性质等都是用来述说它的,而它却不是用来说明数量、性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一个具体事物,如果我们将它一切特性都剥去,剩下的就只是质料。“我所说的质料,就其自身既不是某物,也不是量,也不是规定存在的任何其他范畴。”^{[1] P155}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与“形式”相对的“质料”,实际上是人类最早使用“物质”这个概念的开始。

作者简介 杨寿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兼珠海分校教授(北京,100875)。

我们知道，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到了近代，认识论被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人们对物质的认识也大大前进了。不少哲学家在阐述自己哲学思想时或多或少涉及到物质概念。例如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就给物质下过定义：“物质是许多影响我们感官的性质所寄托的某种东西。”^①（P258）物质有许多性质，诸如形状、重量、运动等等，但这些性质必有一个统一者、依托物，这就是物质实体。尽管他认为物质实体同精神实体一样，是远非我们所能认识的，但不能否认物质的存在。我认为在近代哲学中比较科学和完整地提出物质概念的，要算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在其巨著《自然的体系》中，他一方面反对唯心主义者对“物质”的攻击，另一方面批评了一些唯物主义者对物质概念的肤浅论述。他说：“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对于物质还没有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被成见欺骗了的人们，对物质只有一些不完善的、泛泛的、肤浅的概念。”他给物质下了一个定义：“对于我们说，物质，一般地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我们归之于各种不同物质的那些性质，是以物质在我们内心所造成的不同的印象或变化为基础的。”^②（P28）霍氏这个物质定义，从认识论角度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于我们感觉、并刺激于我们感官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我们的感觉是物质的那些特性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这种物质概念，较之当时一些唯物主义者把物质归结为某种具体的特性（例如认为物质是长、宽、高三量向的实体）的狭隘理解大大前进了一步，它为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概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二、关于物质与运动的关系

教科书谈到物质与运动的关系时，认为不存在没有运动的物质，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运动；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都是无法想象的。前一句话（不存在没有运动的物质）当然是对的，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凡是物质内部都存在矛盾，矛盾是事物运动的源泉。但是后一句话（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运动）却是错的。因为世界上不仅存在物质的运动，同样也存在精神的运动。教科书之所以把运动归结为物质的运动，在其看来，精神的运动也是物质的运动，理由是：运动一定要有运动的主体，各种运动的主体只能是物质，思维和精神运动的主体是人脑。这种观点与方法，很值得商榷。

首先，这种观点有庸俗唯物主义之嫌。18世纪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的毕希纳、福格特，荷兰的摩莱肖特等人，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把意识、精神直接归结为物质性的东西，取消物质与意识、精神的区别。例如毕希纳在《力与物质》一书中断言：物质、力、精神是同一原初的或者说基本原理的不同表现。福格特在《生理学通讯集》中说得更明显：以精神活动之名著称的一切能力，只不过是脑物质的分泌物，思想对大脑的关系，差不多同胆汁对肝脏和尿对肾脏的关系一样。教科书上面的看法，把精神运动归结为人脑（尽管有“主体”两字也无济于事）同精神活动归结为大脑物质的分泌物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是何等相似。如果按此教科书的观点和这种论证方法，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的一切的一切都可归结到物质上去，都可用“物质”两个字来说明。这实际上是一种在理论上十分粗浅和简单的做法。虽然有了人脑才有意识、精神，人脑是意识与精神的物质基础，但不能以此就把意识、精神归结为大脑。事实上有了人类以来世界上就存在着两大类现象，即物质与精神。正因为如此，使哲学从它产生之日起，哲学家们就对物质与精神何者“在先”的问题争论不休，一直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还在进行着。

其次，教科书论证方法也是前后矛盾的。教科书当谈及为什么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基本问题时，明确指出：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并产生了人类意识、精神以来，世界上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事物，归结起来只有两大类，一类是物质及其各种表现形态，另一类是各种精神现象。所以一切哲学家都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这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证，就已经否定运动只有物质的运动、把精神运动归结为物质运动的观点，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嘴巴！从这里我们自然想到两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唯“物”论。类似教科书上面的观点和方法，在我们宣传、传播马克思

主义哲学时，随处可见，即一切归之为物质，以“物质”说明一切，自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实际上是一种懒汉哲学。如果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如此简单的话，那么我们也无需进行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也太肤浅不过了，这也许是不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什么可学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诡辩论。当你为了说明世界上一切运动都是物质运动时，你就把精神归结为物质；而当你为了论证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基本问题时，你就认为从有人类以来世界上就存在物质与精神两大类现象。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难道不是诡辩论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吗？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为了迎合或适应形势的需要，对待同一个问题，今天如是说，而明天如彼说。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主观随意性在很大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失去了威信，难怪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诡辩法。今天我们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认真吸取这种教训。

三、关于辩证法的发展观

教科书指出：发展是运动变化的结果，但并非任何运动变化都是发展，辩证法所理解的发展是前进上升运动，其实质是新生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我认为，这不是辩证法的发展观，而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把运动变化与发展截然区别开来，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实质是相同的，没有运动、变化也就无所谓发展。所以我们阐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时候，运动、变化和发展三个词可以在相同意义上使用，没有必要加以区分。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并非就是一种上升运动，同样也可能是下降运动；发展并非就是新生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同样也存在新生事物的夭折、旧事物的复辟。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认识的发展概莫能外。例如人类的家园——地球，从它诞生发展到今天，由于环境变化，对人类有利的一些物种消失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害虫、病毒等出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如此，既是前进运动，又是下降倒退运动。早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就看到这点，他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产生，它使人类脱离了野蛮落后的“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这是一种进步；但同时它又使平等社会的人产生贫富的分化与政治上的对立，社会成了冲突与残杀的战场，毁灭了人类原来的自由平等，因此它又是一个退步。人类社会历史正是在这种进步与退步的矛盾中发展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时，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当两者不适应，就阻碍了社会发展，这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种社会形态可以发展成为较之先进的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也可以发展成为较之落后的低一级的社会形态。一个国家的发展既可以成为先进国家，也可以成为落后国家。这种现象在历史和现实中是屡见不鲜的。人类自身的发展也是如此。从生理上说，人都有生老病死。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个人得了一种病，起初不明显，甚至用现代化的仪器也难以发现，但随着时间推移，发展越来越厉害，最后吞没了这个人的生命。从人的思想和习惯来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存在一种错误思想意识或坏习惯，起初微不足道，但如果不加注意，任其发展，就可能铸成大错，这种教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人们在经验中总结出一句警语：“防微杜渐”，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的事实说明一个道理：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只是上升前进运动，还存在下降倒退运动；不只是存在新事物的产生，还存在旧事物的“复辟”。总之，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中的发展是上升与下降、前进与倒退、进步与落后、好与坏、福与祸、新与旧等等交织在一起形成的。我认为这样去理解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科学的发展观。

四、关于矛盾同一的相对性

关于矛盾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认为矛盾（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矛盾（对立）的同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已成为无可置疑的经典的表述，无论哪一本教科书都不例外。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深入去思考和分析的话，问题就来了，这个一贯被视为无可置疑的真理又可

以置疑了。

毫无疑问，有矛盾就有斗争，矛盾始终都贯穿着斗争，尽管斗争有各种不同形式与性质，这的确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问题是为什么说矛盾（对立）同一是相对的？按传统说法，是因为矛盾（对立）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失去其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我认为这作为矛盾（对立）相对性、有条件性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凡是称为矛盾的，必然是既有矛，又有盾，否则就不成为矛盾。就是说没有对立的双方，也就不存在矛盾了，所以，所谓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的问题完全是多余的。由此可见，以所谓矛盾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为理由，来说明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有条件性，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里我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在讲解矛盾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时，不要区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矛盾同一的相对性，把什么是矛盾的斗争性与矛盾的同一性解释清楚即可，如果把绝对性、相对性加上，反而变得不科学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矛盾双方（对立双方）的转化问题。矛盾（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看法也值得推敲。为什么？因为从事实来看，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矛盾（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大家经常举的例子，诸如战争与和平、福与祸、好与坏、成功与失败等等。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无论是什么情况都不可能转化，例如人之生与死，死而不复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至于《圣经》上说的耶稣的复活，那只是神话故事，没有现实的真实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似乎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范畴篇》中，论证“对立”范畴时，提出“对立”有四种意义：相互关系的两种事物的对立，如“两倍”与“一半”；两个相反者的对立，如好与坏：缺失与具有的对立，如盲与视力：肯定与否定的对立，如“他生着”和“他没有生着”。他指出：对于相反者的对立，有的两者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健康与疾病，热与冷，好与坏等。但有的对立却不能相互转化，例如具有与缺失就不能相互转化为对方。因为转化只能出现在从具有到缺失之中，却不能出现在缺失到具有之中，例如一个盲人不可能再恢复视力，一个秃了头的人不能生出头发，一个掉了牙的老人也不能再长牙齿，等等。^{[4] P30-39)}

五、关于真理的绝对性与绝对真理

教科书在“认识与真理”这一章，把“真理的绝对性”与“绝对真理”混为一谈，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真理是人的思想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从真理反映形式来看是主观的；从其内容来看则是客观的，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且真理在此时此地对事物的认识是正确的。例如今天我们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当作是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特征的认识等等，我们都无法否认其正确性。

但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永远是相对的，因为在一定时间内人的认识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或是人的认识能力上，都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人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正确。同时也意味着人们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实践的深入总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点上。这清楚地说明：人的认识在一定时间内是无法达到绝对真理的，如果认为有一天人的认识达到了绝对真理，那么人的认识也就停止了。所以“绝对真理”与真理的绝对性是两个不同概念，把两者看作是相同的东西，显然是错误的。

我想大家还没有忘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批判杜林所谓永恒真理、终极真理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首先对所谓“思维至上性”和认识的“绝对可靠性”问题进行分析：“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5] P427)}这样，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须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的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是有限的。即从思维本性、使命的终极目的来

说，是至上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人们对真理性的认识也是如此。

恩格斯指出：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实使用“真理”这个大字眼的话，那么可以说，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就是永恒真理、终极的真理！但这不是我们科学中所讨论的真理问题。

恩格斯把整个认识领域的科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非生物界的科学（或者主要能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恩格斯认为：在数学中由于变数的应用以及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一向被认为非常循规蹈矩的数学“犯了原罪”，同时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和造成谬误的道路。这样，“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证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王国出现了”。^{[1] 3 P428}在物理学、化学方面，“人们就像处在蜂群之中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2 3 P428}天文学和力学会更糟。第二类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即生物学。在这一领域，显现出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为了对各种联系作系统的理解，“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3 3 P429}例如常常有像细胞的发现那样，迫使我们对生物学领域中以前已经确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甚至整个地抛弃掉。第三类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这类科学是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国家形式以及哲学、宗教、艺术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社会历史科学。如果有机体的科学，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的话，那么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情况则相反，重复只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在历史领域认识本质上是相对的，认识到的东西只限于在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之中，并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人们认识到真理，哪怕是当时认为无可质疑的真理，都只是一定时间范围之内有效，超越此时、此地就可能失效。所以谁想在这领域来猎取永恒真理、终极真理，那是徒劳的。

恩格斯指出：“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美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1] 3 P431}

这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复述恩格斯在100多年前这段精彩的论述，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真理问题上对所谓“绝对真理”、“永恒真理”有正确的、科学的认识，不重蹈当年恩格斯批判过的杜林在真理问题上的覆辙。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 [2]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 [M]，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3]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M]，管士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何蔚荣 罗 苹

重估《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价值

◎ 刘秀萍

[摘要] 恩格斯在不同时间段写下的一批以《自然辩证法》命名的手稿,在1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引起了毁誉不一的评论。时至今日,理性地分析这些评论,发现它们并不是或不完全是恩格斯创作时的实际经历、当时流传下来手稿的具体状况的真实反映,也没有将恩格斯的论述置于当时自然哲学总体图景中看待其得失,而主要是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考量从文本之外所生发出来的抽象论见。有鉴于此,本文紧扣恩格斯手稿文本,通过对其创作历程、体系安排以及传播途径的分析来重新估量其价值,认为既不应该抹杀恩格斯所做过的工作和努力,包括从他的手稿及其他书信和谈话中所透露的见解和观点,也不应该把他对自己零星思想的梳理和一些初步性的考虑甚至准备性的材料收集工作提高到所谓完善性的、体系化的地步。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手稿 评价

〔中图分类号〕A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5-0050-05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不同时间段写下的一批以《自然辩证法》命名的手稿,在1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引起了毁誉不一的评论。赞誉者将其视为“不朽巨著”,认为恩格斯通过它事实上建构了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完整体系,并且形成了一门新型的学科,即“自然辩证法”。与此同时,这一看法遭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断然否定,他们认为恩格斯的理论工作及其观点根本就是“虚妄的”与“充满荒谬的”,因为压根就不存在所谓“自然辩证法”,而只有社会辩证法、人的辩证法。时至今日,理性地分析这两种评论,我们发现,尽管表面看来二者是对立的,然而“两极相同”,共同的症结在于作出这些论断的依据都不正确。这样所作出的评判就有可能不够客观、全面和公正。有鉴于此,本文拟紧扣这批手稿文本,通过对其创作历程、体系安排及其传播途径的分析,来重新估量其价值。

一、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

1885年,恩格斯在回顾他与马克思的研究经历时曾指出:“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① P349这里所说的“脱毛”,指的是跟踪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使原有的科学观念得以递换或更新,就像使“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量更轻快”。^② P832而这段话里所说的“八年”,指的是恩格斯思考和探讨自然界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规律、写作《自然辩证法》这批手稿的时间,即从1873年5月至1876年5月、又从1878年7月至1883年8月这两个阶段,中间因《反杜林论》的撰写这一工作暂时中断,而1883年后因马克思去世这一工作完全终止。

恩格斯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思考自然界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规律,并且力图从哲学上给予解释和说明的?具体时间很难说清楚,迄今为止能找到他这方面的最早论述,是1873年5月30日他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自此之后,恩格斯就大致围绕《自然辩证法》开始了写作。从1873年5月至1876年5月这3年中,恩格斯共写了2篇论文、91篇零散的札记,还有一些材料不能肯定是不是这段时间写作的。这是《自然辩证法》写作的第一阶段。

作者简介 刘秀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44)。

这一阶段恩格斯写作的两篇论文是《导言》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导言》是对他此前写成的关于自然界的历史和认识自然的历史的诸多札记进行的加工，在全部《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中，它也是比较完整和重要的一篇。《导言》共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可能写于1875年，着重以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为依据，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代替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必然性；第二部分写于1876年，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描绘了自然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旨在说明唯物辩证法是惟一适合于自然科学发展需要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写于1876年。最初它是恩格斯当时计划写作的另一部独立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亦名《对工人的奴役》）的导言，以后这本书没有继续写下去，恩格斯就把它放到《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此文研究了人类起源问题，论述了劳动对人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写了上述论文和大量的札记后，恩格斯于1876年5月28日写信给马克思说：“这部著作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的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在海滨这里的闲散对此有不小的帮助，我可以有功夫推敲各个细目。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绝对有必要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①从此信可以看到，经过从1873年到1876年这3年的努力，《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最终的全貌和它的清晰的轮廓已经开始呈现，但是，有关细目还有待进一步推敲，一些问题还要作深入的思考。但是，这时恩格斯由于承担了批判杜林的任务，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①

《反杜林论》写完后，从1878年7月起直到1883年3月，恩格斯又比较集中地进行《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在这将近5年的时间内，恩格斯拟定了未来著作的具体计划，写了8篇论文和相当数量的札记片断。这是《自然辩证法》写作的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恩格斯为《自然辩证法》一书拟定的具体计划有2个：即《总计划草案》和《局部计划草案》。《总计划草案》编制的时间大约在1878年8月，它有11项内容，大体上论及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其在各门科学中的体现，以及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机械论、不可知论及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批判。这个计划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面貌比较清晰地展现出来了。《局部计划草案》写于1880年，它的基本部分是恩格斯即将写作的一篇论文《运动的基本形式》的计划。

恩格斯在这个阶段所写的论文计有8篇，即《〈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辩证法》、《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的尺度——功》、《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台特》、《热》和《电》。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是在1878年写成的。这两篇论文所论述的内容比较接近，讲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必须以辩证法为指导。《〈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本来是恩格斯为《反杜林论》的初版而写的序言，所以称它为“旧序”。这是继《导言》之后从另一方面阐述哲学和自然科学关系的一篇论文。《导言》主要通过历史的线索说明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而《旧序》则主要从理论上论证哲学对自然科学的作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一文原标题为《自然研究和神灵世界》，恩格斯在文中揭示了自然科学家蔑视辩证法而受到惩罚的惨痛教训。

《辩证法》写于1879年底。从这篇论文的开头几段及《总计划草案》的第三项内容可以看出，恩格斯原拟根据自然科学的材料，系统说明辩证法的一般性质和三个基本规律。但是此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①恩格斯在1876年6月—1878年6月这两年时间内，并未因撰写《反杜林论》而放弃继续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打算。他在1877年7月25日致弗兰茨·维德的信中写道：“我为《前进报》写完分析批判杜林的文章之后，立即就要集中全副精力去写一部篇幅巨大的独立的著作，这部著作我已经构思好几年了，我之所以至今未能完成这部著作，除了各种外部条件，为各社会主义机关刊物撰稿也是原因之一。已经过了五十六岁了，应该最终下决心节省自己的时间，以便从准备工作中最终得出某种成果。”（《恩格斯致弗兰茨·维德（187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1页）

只写了质量互变规律。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辩证法的三个规律是：“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3] P310}这个提法与《总计划草案》第三项是一致的。

其余5篇文章同1880年写作的《局部计划草案》相对应，大约写于1880~1882年。在《运动的基本形式》一文中，恩格斯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批判了机械论的运动观；同时分析了吸引和排斥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只注意吸引而忽视排斥的重力论观点。在《运动的尺度——功》一文中，恩格斯考察了欧洲科学史上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关于运动量度问题的争论，揭示了“功”的本质意义，并批判了以亥姆霍茨等人的形而上学、经验论的错误。在《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台特》一文中，恩格斯应用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考察了潮汐摩擦理论的发展，批判了在潮汐摩擦理论中以汤姆生和台特为代表的机械论观点。在《热》一文中，恩格斯不仅论述了热运动和其他运动形式的关系，指出热是分子运动，而且通过人类掌握机械运动与热运动相互转化以及认识热的本质的历史，阐明了实践对认识的巨大作用。在《电》一文中，恩格斯批判了以德国物理学家维德曼为代表的、统治当时电学领域的经验主义，分析了电的本质，并对已有的各种见解作了评述，预示了电学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在这一阶段，恩格斯除了完成上述8篇论文外，还写了若干札记片断，在这些札记片断中，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关于判断分类的论述。

1882年底，恩格斯认为《自然辩证法》一书应尽快完成，便在11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除了谈到他“在电学方面获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之外，还说“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4] P114-115}的写作。但是，恩格斯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1883年3月19日马克思不幸逝世了，恩格斯不得不再一次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这样直到1895年8月6日恩格斯逝世，他再也没有回到《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写作上来，留给我们的仍是一批没有写完的、有的部分即使写了也没有得到系统整理的手稿。

总括地说，从1873年5月至1876年5月、从1878年7月至1883年8月这两个阶段，恩格斯围绕《自然辩证法》这个大的题目先后写出10篇论文、169篇札记和片断、2个计划草案，共计181个部分，其中119个部分写作时间已确切知道，而其余62个部分的写作时间，由于资料不足而未能考证清楚。

二、就留下的手稿看，能否说《自然辩证法》已经有了确定的内容并且建构起完整的体系

从恩格斯上述手稿的写作情况看，其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撰写一部名为《自然辩证法》的书，但这些尚未完成或基本上没有整理就绪的手稿本身是否表明，《自然辩证法》已经有了确定的内容、完整的结构和严密的体系？这是需要考虑的。其实，在8年的写作过程中，恩格斯的目标虽然明确，但各个议题本身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显得非常零散，至于全书的结构和基本思想，他明确谈到的有三次，这是我们进行分析非常重要的依据。

第一次是在恩格斯于1873年5月3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他明确地表述了如下的思想：“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是离不开运动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处于运动之外，处于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之外的物体，是谈不上的。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在物体的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恩格斯还扼要地说明了如何从最简单的机械运动转化为物理运动，又从物理运动转化为化学运动。他还明确指出生命运动是从化学运动转化而来的，“人工制造这些物质越来越成为化学的主要任务”。恩格斯认为当时科学对生命运动的研究还十分不够，所以他对生命运动问题“暂时不谈任何辩证法”。^{[5] P614-615}这是恩格斯当时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基本论点，是他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原始考虑。

第二次是在恩格斯于1878年制订的《总计划草案》中。^{[6] P259-260}这计划草案共有11项。其中第一项“历史的导言”，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这是《导言》的总的指导思想。第二项按照《〈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的内容，主要论述理论思维回复

到辩证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三项“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明确指出辩证法有三个主要规律。第四项“各种科学的联系”，揭示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的分类与联系，并在批判圣西门和黑格尔的基础上，阐明了科学分类的客观基础。第五项“关于各门科学及其辩证内容的概要”，深入到各门基础科学中揭示蕴藏其中的丰富辩证思想，如数学的无限，惯性是运动不灭性的反面表现，分子运动的相互转化，生物进化中的必然与偶然等。第六项“认识的界限”，通过批判康德、休谟及亥姆霍茨、杜布瓦-雷蒙、耐格里等人的“认识有限”说，阐明自然界的可知性和人类认识自然的无限能力。第七项批判海克尔的机械论观点。第八项批判海克尔、耐格里在1877年9月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原生粒的灵魂”问题所作的发言。第九项“科学和讲授”，对1877年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的演说与海克尔《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的小册子发表评论。第十项“细胞国家”，着重批判微耳和《细胞病理学》中关于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的观点。第十一项“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说”，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并强调劳动在人的分化中的作用，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联。我们可以说，《总计划草案》试图勾勒当时恩格斯所欲撰写的《自然辩证法》的大致框架，但把第六至十一项对一系列机械论、不可知论及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批判与前面单纯正面见解的阐述并列起来，显然不对称，说明恩格斯的考虑还是初步的，不是定论，《总计划草案》还不是《自然辩证法》的正式“目录”。

第三次是在恩格斯逝世前，他曾对其自然辩证法手稿进行了整理，把包括论文、札记和计划草案在内的181篇手稿分成四束，分别加了醒目的标题。第一束题为《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共127篇，大部分是较短的札记和片断；第二束题为《自然研究和辩证法》，共6篇，包括1885年为《反杜林论》写的两篇注释和1886年写的《〈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第三束题为《自然辩证法》，包括6篇已完成的论文；第四束题为《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共42篇，包括《总计划草案》和《局部计划草案》及其他札记和片断。恩格斯这时还为第二、三束编了目录。

如何看待恩格斯逝世前整理工作的性质呢？有的论著认为，“恩格斯对四束手稿的分类和标题，是他晚年对自然辩证法体系的最后构想和完善，后人根据其所提供的可靠的原始材料就可以逻辑地完成自然辩证法体系的建立”。^{[9] P435}这种看法明显过于武断。如果从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全部工作的日程与他为人的性格和特点看，他是全力以赴地扑在《资本论》手稿整理上的。即便如此，在《资本论》第2卷、第3卷出版后，他已经没有余力进行第4卷的整理工作了，只好委托给考茨基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接续自己过去的理论工作，完成尚未完成的手稿。所以这次对自然辩证法手稿进行的整理只是他在“安排后事”，而不可能是回到中断了的自然辩证法的思考和写作中去了。

总之，我们认为，恩格斯留下的只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的零散材料，其内容和结构虽经长期的演变已见宏大的规模，但究竟怎样确定自然辩证法的体系，恩格斯自己也未必很清楚，留下的仍是有待我们探索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自然辩证法》的三种编排方案与爱因斯坦的评论

恩格斯逝世后，他的遗稿与马克思的遗稿是由当时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的伯恩斯坦负责处理的。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曾委托党员、物理学家列奥·阿龙斯去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数学和自然辩证法遗稿是否值得出版。阿龙斯是个实验物理学家，有点轻视理论思维，他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内容太陈旧，因而认为不宜公开出版。阿龙斯的看法对伯恩斯坦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在刊发恩格斯的这份遗稿方面一直比较迟疑，只在1896年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1898年世界新历画报》年鉴中发表了《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布）中央派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到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馆进行全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的照相复制工作。这期间梁赞诺夫发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

稿，这样，由他主持编辑的全部手稿于1925年以俄、德文对照的形式第一次在苏联公开出版，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书前有梁赞诺夫写的长篇序言。

1940年苏联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重编《自然辩证法》的新版本，这个新版本改变了按照手稿原始次序编排的原则，改为按照思想主题分类，打乱了恩格斯本人给手稿的最后分束整理次序。这一版是马克西莫夫主编的。1941年出版后，流传到今，1961年编入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成为影响最大的权威版本。

上世纪80年代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小组，在总结以往的经验 and 认识的基础上，对《自然辩证法》作出更加客观的评注，包括编写《自然辩证法》的创作史，内容丰富的注释和各种各样的索引。19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的第1部分第26卷刊出他们编辑的新版《自然辩证法》，共收入197件文字材料，并分别按照写作时间顺序和主题内容编排次序重复发表。后一种编排方式的分篇和标题的设置，以恩格斯的写作计划为基本依据。

此外，我们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作为20世纪最卓越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恩格斯手稿的评价。爱因斯坦可以说是比较早地仔细看过恩格斯原始手稿的学者之一。当年伯恩施坦在是否公开手稿而犹豫不决的时候，曾把它们交给爱因斯坦审读。爱因斯坦对恩格斯手稿的看法，见诸于公开文件的总共是两封信。一封是1924年给伯恩施坦的回信，一封是1940年给西德尼·胡克的回信。

1924年6月30日爱因斯坦写道：“爱德华·伯恩施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末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但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意义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1]（P202）

1940年6月17日爱因斯坦又写道：“爱德华·伯恩施坦曾把全部手稿交给我处理。我的评价的措词是针对全部手稿而说的。我坚决地确信，如果恩格斯本人能够看到，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后，他的谨慎的尝试竟被赐与了^①如此巨大的重要地位，他也会觉得这是荒谬的。”^[2]（P202）

可以看出，爱因斯坦是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对恩格斯的手稿作出评价的。同时他还对后来有的苏联学者把恩格斯的手稿捧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的作法非常不以为然。我们认为爱因斯坦“针对全部手稿”而作出的这种评价是较为客观、公允的。

总之，应该紧扣恩格斯手稿文本，通过对其创作历程、体系安排及其传播途径的分析来重新估量其价值，既不应该抹杀恩格斯所做过的工作和努力，包括从他的手稿及其书信和谈话中所透露的见解和观点，也不应该把他对自己零星思想的梳理和一些初步性的考虑甚至准备性的材料收集工作提高到所谓完善性的、体系化的地步。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5] 黄顺基等主编，自然辩证法发展史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6]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责任编辑：何蔚荣

① “被赐与了”那个词组是“is being attributed to”，似可意译为“被拔高、被抬到了”，这更符合爱因斯坦的原意。

马克思休闲价值思想探析

◎ 许斗斗

[摘要] 面对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休闲新现象,本文以哲学为基点,并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分析。虽然休闲概念的界定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一个难题,但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可以肯定,休闲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自由时间是休闲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不是休闲本身,休闲的本质应该体现在对待和处理自由时间上;休闲是一种需要价值建构和培养的活动,反映着人类的生存价值观,所以在本质上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表现。

[关键词] 马克思 休闲 生活方式 自由时间 人的价值存在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55-07

一、休闲的概念辨析

作为世界范围内新兴的社会现象和事业,休闲无疑还是一个尚待进一步界定的概念。以最先将休闲从隐问题凸现为显问题的美国学者为例,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休闲一般被定义为空闲时间,即:除了工作和其它责任之外的时间”,托马斯·古德和杰弗瑞·戈比指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为,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①这个休闲定义较有包容性,它把休闲看作是一种理想化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但它不仅没对这种生活的内在性给予必要的解释,而且“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为“信仰”留下了地盘,从而陷入了一种神秘的状态中。约翰·凯利认为,“任何单一的含义或层面似乎都难以尽述休闲这一大标题下的所有内容。任何单一的取向或情境也必然使我们难以理解所有其它的含义与情境。”因此,他主张,对休闲的思考应该始于它“就像是”什么,于是,休闲普遍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是一种“在摆脱义务责任的同时对具有自身意义和目的的活动的选择。”^②这些看法表明,休闲主要被看作一种摆脱责任的生存方式,或者确切地说,是一种摆脱工作责任的方式。当代法国著名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那只是它的一个标签。其基本规定性就是区别于劳动时间的束缚。所以它是不自主的:它是由劳动时间的缺席规定的。”^③但是,即便是这样一种界定休闲的方法,也还有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必要。因为,此界定的思路除了表明人类至今仍力图摆脱为谋生而劳作之辛苦的期望外,在对“工作”的界定上仍显模糊。例如读书对学生、教师等而言是分内的工作,而对于其他许多行业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休闲活动,鲁迅先生也曾将读书看作是一种休息。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工作的性质与场所将发生重大变化,工作的界限将越发模糊。而“工作”概念的模糊使得与之相对的休闲也就难以确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仅仅为摆脱(工作的)义务与责任也不能成为休闲的主要标志,因为在休闲活动中,我们同样应负有对社会活动的应有义务与责任,如保护休闲环境、爱护公共休闲设施等等。而且,以摆脱某种义务与责任来界定休闲活动,这似乎是从外在方面来规定休闲,而并未从休闲本身的内在性质方面来规范,因而总有一种未能“切脉”之感。

法国学者罗歇·苏在其著作《休闲》中认为:由于对休闲缺乏完整的定义,所以从休闲的以下主要

作者简介 许斗斗,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福建 福州,350002)。

内涵来界定,“用作复数时,是指根据个人的愿望和爱好所自由选择的活动。……休闲活动的范围实际上是无限的,因为它取决于每个个人的动机。”^[1]“用作单数时,休闲可有两种含义:第一,是将休闲与休闲的时间等同起来;第二,休闲首先甚至是独立于可能填补这一可自由支配时间的活动的空闲时间。总之,懒惰、‘无所事事’都可当作休闲度过。但是,休闲不能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混同于业余时间。”因为,人们花费在因城市扩大而致的交通时间,以及人们从事家务活动和满足睡觉、吃饭等生理需要的时间都是业余时间,而不是休闲时间;此外,“休闲将首先是个人的一种心理态度。……根据这种观点,甚至工作都能够带有娱乐的形式。”^[2]而德国学者约瑟夫·皮珀也是将休闲规定为精神状态,他说:闲暇“是一种精神的现象”,“闲暇是一种灵魂的状态!”^[3]在此,我们看到,休闲概念的界定在法国和德国学术界同样是一个难题。因为,倘若将休闲与个人的动机和心态相联系,这固然说明了休闲的一个内涵,但却陷入主观相对性的难以把握之困境,因此,“把休闲定义为某种精神状态,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4]这说明,休闲不是纯粹的精神状态,否则,休闲问题就可能陷入心理主义之中,它应该是一种现实性和存在性的活动。将休闲与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相区别,这是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的,但若不能将休闲与懒惰和无所事事相区分,这无疑使休闲失去积极的生存意义,失去了追求的价值性目标。

该如何界定休闲呢?我们认为,理清研究思路并从内在本质上定义休闲是至关重要的。从“工作”或“劳动”的视角来界定“休闲”,就当前的状态上来看,这应该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和直观的思路,它在本质上也是无可质疑的。但是,我们不禁还要指出这种思路的狭隘性,因为这是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期的研究视野,是生产性思维的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在“工作”、“劳动”之余才进行或享受着可能的休闲活动。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对休闲的渴望才是摆脱工作的义务与责任:也是在这种思路下,对休闲的界定才是与工作、劳动相对应;也正是在这种思路下,倘若休闲的内容被界定为休息、睡觉也是完全合理的(尽管很多人并不愿意这样消极地界定休闲,力图赋予其积极的生存意义,但却说不出不愿意或反对的理由)。现代社会,特别是将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休闲就将不会依靠对“工作”、“劳动”等外在规定或对比来确定自己,它将更加展示自身的内涵,并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丰富自己。正如约瑟夫·皮珀所说的:“闲暇并不是为了工作的目的而存在,一个正在工作中的人不管如何努力从中得到多少新的力量,借以重新投入工作,闲暇从来不会是为了工作而存在。……闲暇的意义并非由此而得到证明。”^[5]美国当代学者S·沙耶斯(Sean Sayers)也说:“然而,与休息和睡觉不同,(因为)这种活动并不是人类的一种本质需要,不是人类生活本质的一部分。相反,休闲是一个历史地发展的活动空间。”^[6]这种从休闲的角度看待人类历史和发展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视角转变,是一种休闲性思维的体现,在此,休闲被看作是人的历史存在之一种,并且这种存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将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形式(空间)。可惜,S·沙耶斯等人并没有从休闲的内在本质上给予展开说明,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活思想却在此绽放光芒。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界定和论述休闲问题,但他的相关论述为我们把握休闲概念提供了三条重要思路:其一是从生活的立场展开理解休闲的内涵,即休闲是生活的重要内容,生活本身含有休闲之意,即从社会生活的本质中展示出休闲本质的内涵;其二是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之关系的角度来说明休闲,即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为休闲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客观基础;其三是从人的价值存在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说明休闲,即休闲在生成和丰富人的价值存在上起到重要作用,人的休闲存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从社会生活与人的价值存在的内在本质中展现休闲的内涵,这是摆脱休闲界定中所具有的相对性和模糊性的最有效途径,这正是马克思在休闲问题的研究思路发动的一场最具革命性的转变。因而这应该是马克思休闲价值思想的独特之处,是把握和展示马克思休闲价值思想的关键。

二、休闲与社会生活

如何说明马克思的这一指导性革命呢？或者说，马克思是如何展现社会生活的本质与休闲的关系的呢？我们认为，休闲作为人类的一种现代社会现象，在本质上是人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因而，马克思关于“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我们探讨休闲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⑦ P72}这样，马克思就把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看作人类根本的价值存在方式，换句话说，人的价值存在应该实际地表现为他们的现实生活实践过程，而这种现实生活是“自由的和有意识的活动”，是一个生成生命的活动。人类的生活总体上可分为“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两大类，前者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来满足人类生存所必要的物质基础为内容；后者的范围相对广泛，马克思在运用这一概念时也较为灵活，它不仅包括除了物质生产以外的社会交往关系，还包含了在物质交往基础上产生的“精神交往”（当然有时也包括“物质生产”在内）。因此，我们姑且把马克思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统称为“社会交往”。而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休闲活动，笔者认为，本质上应该属于人们的社会交往的范围，这不仅因为：一方面，休闲活动是人们实际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是体现马克思关于生活之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有如约翰·凯利所言：“在界定休闲时，某种自由的概念似乎很普遍，这里的自由并不必然是毫无约束的开放，其实，休闲的自由是一种成为状态的自由，是在生活规范内做决定的自由空间。”^{①⑧ P20}而且，另一方面，休闲本身也是一种精神体验和享受，一种人在休闲活动时对人与休闲环境（存在的“在场性”）融合的感觉。正如马克思说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①⑨ P83}因而，人们在休闲活动中体验与享受到的是人的社会性、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存在。

当然，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休闲活动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社会生活，尽管休闲活动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生活方式，但没有相对发达的物质生产能力为基础，休闲是不能凸现为人们自我体验和享受的生活过程的。而休闲活动的凸现，不仅对于进一步发展物质生产大有益处，它也成为物质生产发展的一种标志。但是，由于以往人们观念中的生产性思维，使得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即只从生产方式方面来理解生活，似乎人们的社会生活就只是生产劳动，人们的社会关系只是生产关系，完全忽略了休闲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殊不知，人们的生产劳动以及为了生产劳动而结成的生产关系，其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人们更好生活，其中包括更好地休闲。换句话说，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目的是为了更好生活，更好地休闲。尽管从根本上说，生产方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在更大的范围内来看，人们的生产方式、生产活动在本质上只能是人们一定的生活方式的表现。生活方式的改善和提高才是人们生产活动的目的，休闲作为生活方式的一种，应该也是生产活动提高后所追求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①⑩ P287}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还做过休闲状态的形象描述，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①⑪ P89}虽然在此马克思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生产力相对落后时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局限性，或者说，分工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局限性的表现，但他同时也描绘出了社会高度发展基础上人的休闲生活的多样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向我们表明，休闲活动正是人类生活追求的目标，是未来理想社会的生活方式。

面对以往人类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生存危机状态，人类重视和强调发展生产，以生产性思维来认识、审视、谋划和算计外部世界，这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这种生产性思维也导致对人类自身生活方式和生存目的的根本性误解或忽视，这种误解或忽视的极端或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自然界）的生产性糟蹋和破坏，是人类与自然界等多种关系的

破坏。而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关注，特别是休闲问题的凸现，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人的存在价值问题应该是大有意义的。因此，从生产性思维向休闲性思维的转化，应该是人类生活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是人类整体人生观的根本性飞跃。因此，当我们说马克思把人的社会生活看作是人的本质的价值存在时，休闲活动的跃然凸现，以及人们对休闲活动的体验和享受正是人的价值存在的重要表征，是人们把全面发展作为自身价值追求的重要体现。

三、休闲与自由时间

与工作和劳动相对应的休闲，只能在劳动时间之外的自由时间中才能进行，因而，休闲问题的探讨似乎总与自由时间相关联。但我们必须指出，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并不就是休闲问题的真正解决，或者确切地说，自由时间的增加并不就是休闲本质的展开，否则休闲问题又成为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了。尽管现代社会的休闲活动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不仅在可能性上（即在自由时间的增加上）保证了休闲，而且在休闲手段上保证了休闲方式的丰富多样性。但休闲本质上不体现技术，休闲的本质也不可能在技术中体现，或靠技术来解决。休闲问题决没有这么简单。正如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剥削性时所说的：“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9] P222}这说明，技术能够增加自由时间，但技术同样可以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剥削强度。休闲问题也决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关乎人的存在的价值问题。自由时间的增加只是休闲活动的条件，自由时间不等于休闲，仅仅为“自由时间”而休闲，这岂不是把时间当成了目的。而对时间被如何利用和度过却不加追究呢？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自由时间同样可以用于懒惰地睡觉和无所事事。因而，如何对待和处理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加的自由时间问题应该是休闲必须关注的本质问题，这也是休闲成为国内外理论界之严肃对待的原因所在。因此，对休闲的研究必然要关涉到如何理解和对待“自由时间”的问题。

在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关系上，马克思从“劳动”和“工作”的角度上认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10]“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11] P225,221}在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由时间增加的目的是为了“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即人们在自由时间中是以“人本身”的发展为核心的。尽管由于受到生产性思维的影响，这个发展的目的与核心在马克思当时的工业社会乃至我们当今的现代社会最终都是作为恢复和积蓄生产力而重新反作用于劳动生产过程的，但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马克思对休闲之核心目的的根本指向：人本身的充分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由于社会性质的原因，劳动者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12] P222}因而，要在劳动时间之外再想有任何的自由时间，即“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13] P294}等都是不可能的。在此，马克思不仅直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剥削压迫程度在时间上的表现，而且他还告诉了我们，自由时间在促进人本身的发展上在时间分割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随着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里，劳动时间将主要被技术所占有，人们在自由时间中的休闲活动就可能发生目的性的转向。即，其恢复和积蓄的能力就不完全为了反作用于直接的劳动生产过程，而转变成为人的各种能力的充分展示和发展了，那时才能真正体验马克思对自由时间以人本身的充分发展为目的的深刻内涵，也才能充分体现休闲的本质意义。

但是，现实社会的发展有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如意，以对现代社会给予后现代性批判而著称的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就深刻地指出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区分在现代社会的不可能性，因为，劳动时间历来是被金钱所支配，而在现代消费社会里，金钱同样支配着自由时间，支配着休闲。他说：“自由时间，也许意味着人们用以填满它的种种游戏活动，但它首先意味着可以自由地耗费时间、有时是将它‘消磨’掉、纯粹地浪费掉。（这就是为什么说休闲‘被异化了’，因为它仅仅是恢复劳动力所必需的时间——这是不够的。休闲的‘异化’更加深刻：它并不直接隶属于劳动时间，而是与消磨时间之不可能性本身相联系。）”^①（P172）波德里亚的这段话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区分依然模糊，在现代科技和金钱的支配下，自由时间已经被劳动时间无形地侵占了。人们只有在消磨和浪费时间中达到休闲，于是，休闲被异化了，它仅仅成为恢复体力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永远无法消磨足够多的时间以战胜那种从度日生活到从中赚取利益的命定必然性的时代。”^②“不要相信关于休闲中自由的假象，‘自由’时间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只可能存在着受制约的时间。消费的时间即是生产的时间。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从来就只是生产循环中的一个‘模糊’阶段。”^③（P173）所以，在波德里亚那里，在现代消费社会中，休闲是不可能的，是悲剧，是人的异化的表现。休闲异化的存在恰恰说明休闲内涵并未彰显，恰恰说明休闲与自由时间是不能等同的。

正如马克思并没有对日益增加的自由时间该如何具体度过或具体“消费”予以详细说明一样，休闲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的具体形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但它那以人本身充分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却在马克思对自由时间的论述中得到阐明。以这种规定性为评价标准，则在自由时间中的懒惰和无所事事、甚至纯粹的恢复体力就自然被排除在休闲活动之外了。休闲应该是一种有价值的追求活动，是使人成为人并力图展示人的价值存在的一种活动。马克思的这一休闲价值思想在现代一些美国学者中也获得了一定的认同。约翰·凯利指出：“休闲是创造的行动和可能性”，“这种创造活动（艺术是这种活动的范例和舞台，但并非唯一的领域）拿现有的材料努力塑造出‘未然’的东西。”因此，休闲是“通过在‘成为’的行动中行使自由而成为人。”^④（P260）S·沙耶斯也认为：“休闲就其现代意义——属于劳动大众享有的积极的非劳动活动的领域而言——也是一种现代现象和现代工业的产物之一。对休闲发展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且是对休闲活动的需要和能力的发展。正是这些给予休闲以鲜明的特性，并使它不是简单的消极度日和无所事事，而是一个积极的和创造的空间。”^⑤（P70）可见，休闲一旦获得以人的充分发展为核心的规定性，也就排除了其他的一些消极内涵。我们看到，当休闲是使人成为人的活动时，它就是一个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问题，就是一种生存活动状态和过程，它并不追求某种具体的形式，也不在乎某些实际的效果，它只注重人本身的发展及其过程的本质内涵。

四、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

如上所述，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其目的是为了“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自由时间里，在自己的必要劳动时间被减缩之外，“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⑥（P219）当然，马克思在此所列举的艺术和科学等仅仅是劳动之外的例子，其目的是为了说明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对此，恩格斯的这段话也说明了这点，他指出：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的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⑦（P150）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描述的未来社会中，人们既是猎人、又是渔夫，既是牧人、又是批判者的观点，

这不仅是对休闲具体形式的规定或说明，而且是对休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论述。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7] P130}我们知道，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对艺术、科学的追求和展示中，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核心内涵。“休闲正是真、善、美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休闲同知识、美德、愉快与幸福是不可分离的。正是它们为我们创造了好的生活。”^{[1] P34}而据有关资料研究表明，休闲在中国早期本义上就是以追求美为核心的。“原来，中国上古时代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休’字并以此引申出‘淡然无极’之大美与之相应，或者说，是其渊源！”^[2]“‘闲’之于文心，是一种美的心态和创造美的心态。”^{[12] P106-107}因而，休闲与美的创造和追求是有一定关联的。

然而，休闲与工作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工作是一个群体性的活动，活动本身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和秩序，追求一种普遍性和制度性；休闲则常常是一种个体性的活动，活动本身具有较多的随意性和个性化特征。对于休闲活动，个性化应该是重要特征之一。正因为这种个性化特征，休闲活动对每个休闲个体才可能具有互补作用，人们才能够通过休闲活动达到能力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非艺术类人员通过艺术类的休闲活动，接受艺术的熏陶，实现对艺术美的追求与享受；艺术类人员可以通过参加体育活动来达到强身健体追求和享受另一种美；人文类教学科研人员通过参观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活动来弥补这类知识的不足；而自然科学类的教学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参观历史文化博物馆的活动以补充自身在这方面的缺陷。当然这些极特殊的事例只是表明，休闲活动的个体化特征能够丰富和发展人的各种能力。但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和商业化特性一方面为休闲活动的设施建设、内容发展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和商业化基础上的唱片业、图书业和体育用品业的普及使得人人都有可能分享现代的娱乐文化休闲；但另一方面，正是这个现代工业化和商业化特性，使得休闲活动在规模化和标准化中陷入个性化消失的困境。“娱乐的大规模商业在曾经是休闲实践民主化的条件下，也引起了娱乐的某种标准化。所以人们常说大众文化，大众娱乐，它们强制一种行为模式，几乎不给个人表现留有余地。”^{[7] P29}休闲活动的这一丧失个性化特征的致命缺点是由个性化与普及化、标准化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而其中个性化的丧失和普及化、标准化的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工业化和商业化所带来的，其根本原因则是由现代技术导致的。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社会之“文化工业”的深刻批判对理解这一问题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

如何在休闲活动中保持并凸显个性化特征，这是我们关注休闲活动所必须注意的问题，它不仅是使休闲活动本身得以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的根据，而且直接关系到人们在休闲活动中能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的问题。我们现在很难在个性化和普及化、标准化的休闲矛盾中获得一个平衡的、圆满的解决方案，这或许是人在全面发展中始终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而这一难题或许也只能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中才能得到逐步的解决和完善。但从辩证关系的角度考虑，我们应该肯定，休闲的个性化特征、人在全面发展中凸显个性化色彩应该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因为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单个人的发展程度是与整个人类发展程度相一致的，而每一个单个人的发展程度是整个人类发展程度的前提。

五、小结

休闲自古就有，它与人生共存。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休闲就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种方式是与理想的美德和教育相联系的。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愉快的真正源泉，因而自由地选择一种美德的生活是一种休闲。在他看来，沉思是一种最好的休闲活动。在古希腊语中，休闲是用“scholē”来表达，“scholē”是英语中“school”一词的原始涵义。这说明，在古希腊时期，休闲与教育就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人们在发展娱乐休闲中，也不忘记对人的培养和塑造。“休闲的这种精华涵义以一定的受教育程度为前提，至今还存在，并将有社会价值的娱乐区别于其它娱乐。”^{[7] P9}尽管古希腊

时期的休闲活动是在排除奴隶之外的公民活动,但它还有社会的合理性,是被人们作为目的所追求的;同时,休闲与教育的联系也表明,休闲是被教化的,人的休闲观是被当作生存价值观而被建构,是通过教育而被塑造和培养的。这种建构实质上是人类生存价值观的建构。而早在我国远古、上古时代,就有以“休”喻“美”的倾向,表达了我国古人以休闲来追求美德、享受美感的一种生活状态。中西方古代思想家的论述表明,休闲原本就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只是由于后来要解决物质生活资料问题,人类的生产性思维才占据主导意识而被忽视。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人类休闲的生活观(休闲性思维)才再次凸显出来。

只要有生活,就难免有休闲活动,休闲是生活之一种。马克思的生活哲学理应含有休闲的内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生活不是一个不变的事实,而是一个生成过程,生活的这一特性是我们理解休闲的重要基础。休闲,作为人的生活方式,是使人成为人的一种活动。在此意义上,笔者赞同这样一种休闲界定方式:“休闲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成为状态’(state of becoming),也就是说,休闲并不仅是当前的现实,而是动态的;它包含许多面向未来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现状的形式、情境和意义。因此,应该通过其行为取向而不应以时空、形式或结果来对休闲加以界定。”^{[13] P220}换句话说,休闲只有在人的动态中存在,即在“成为”和“去生存”(海德格尔)的意义上才是一种本真的含义,对人才是一种体验和享受。

自由时间是休闲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但自由时间并不就是休闲活动,否则,休闲就可能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技术问题。因此,笔者认为,面对日益增加的自由时间,休闲体现在对自由时间的看待和处置上,体现在利用自由时间以充分发展人自身上。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休闲的经济性质。正如技术时代,我们并不排除技术对休闲活动的影响一样。在现代生产主义的社会,休闲的合理性还要依赖于经济性质。于是,休闲经济、休闲消费已备受国内外政府和商家、学者的重视。但是,作为人类的社会活动,休闲、消费的经济性质同样不能掩蔽它的非经济性质的客观性。^{[13] P50}只要社会消灭了生产劳动中的异化性质,消费就能够成为人的本质的展现活动,成为“作为人的人”的价值活动的重要部分。这才是消费活动的本体论意义,也才是我们当前一再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所不容忽视的方面。

[参考文献]

- [1] [美] 托马斯·古德爾, 杰弗瑞·戈比. 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 [2] [美] 约翰·凯利. 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 [3] [法] 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4] [法] 罗歇·苏. 休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5] [德] 约瑟夫·皮珀. 闲暇: 文化的基础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 [6] Sean Sayers. Marxism and Human Na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8.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8]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陈良运. “休”——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美学观念 [J]. 文史哲, 2002, (2).
- [13] 参见许斗斗. 休闲、消费与人的价值存在——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考察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 (5).

责任编辑: 罗 苹

休闲教育的伦理限度

◎ 刘海春

[摘要] 休闲教育不应只强调休闲而忽视工作。休闲教育有一个从“谋生休闲”到“乐生休闲”的过程。物质生产是休闲教育的前提。以历史的维度来看,从工作伦理到休闲伦理的变迁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不断更新。但是“谋生休闲”仍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休闲教育目标,休闲教育更不可忽视工作伦理的价值。

[关键词] 休闲 工作 休闲教育 伦理限度

(中图分类号) B82-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62-04

休闲教育指对人们休闲生活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引导,使之“成为人”的过程。休闲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如何理解休闲,如何科学安排休闲生活、体验生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领悟生命的真正意义。但是休闲教育并不是只强调休闲而忽视工作,休闲教育必须有一个伦理限度,就是休闲要以工作为前提,否则人类就丧失了生存的物质基础,休闲也就失去了它的合目的性。

一、价值观的更新:从工作伦理到休闲伦理

休闲教育是以人们价值观的变化、观念的更新为前提的。这种价值观的变化就表现在人们对休闲与工作(劳动)这对关系的认识上。在古希腊人眼里,休闲的地位高于工作,休闲同教育、知识、美德、愉快和幸福是不可分离的,休闲是真、善、美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认为工作是一种诅咒,没有尊严、没有价值,惟有音乐和冥想才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境界;工作是人们脱离饥饿的手段,也是人们达到富裕的手段,当人们处在富裕阶段时,才会有美德、善良和独立。早期的希伯莱人认为工作不仅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赎罪的方式;工作能够惩罚人也能够使人重获新生。早期基督徒也相信工作是对原罪的惩罚,但是他们用“赎罪”的观念来修正原本完全否定工作的教义,除此之外,工作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罗马时代以及公元的前几世纪,在西方的文化中,休闲的重要性仍是大于工作的。当时,人们认为工作与财富会使得一个人无法专心地侍奉上帝,工作虽然有其重要性,但它只是提供给一个人基本的温饱而已。

到16、17世纪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后,人们对休闲与工作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在圣经新约中,圣保罗肯定了维持秩序所需的工作、公平的报酬和纪律的重要性,强调工作是规律生活的一部分,不亲自努力赚取食物是不公平的。马丁·路德认为工作是人人都应该负起的道德责任,工作是神圣的,是服侍上帝的方法,能够将人类精力妥善地转化到物质世界中去。卡尔文进一步引申了这个观念:工作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最珍视的,只有无休无止地努力工作才能取悦上帝。在这一时期,清教徒的工作观念正逐渐崛起。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清教徒工作伦理,要求人人恪尽职守,并以非人化的组织方式管理时间的运用。休闲反被认为是一个罪恶的诱惑,耽于逸乐的人被认为是缺乏自我控制、缺乏人生目标、缺乏理性思考,而且是不敬神的。在韦伯看来,以禁欲、节俭和苦干为特征的新教伦理正是资本主义发源的文化条件。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清教徒的工作伦理观颠覆了传统的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平衡,他们认为需透过勤奋的工作来侍奉上帝,节庆的休闲是不必要的。这一时期,在经济领域力量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

作者简介 刘海春,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631)。

赋予其逐利活动以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而清教徒工作伦理观恰恰能为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新教工作伦理的影响下，西方许多国家以工作时间为生活轴心的观念相当普遍。劳动者的休闲被看作是为工作服务的，其目的是让劳动者在工作之余能有所放松，恢复体能，以便下一步能以比较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从而实现比较高的工作效率。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价值伦理观在不断转换和演变。“为工作而生活”的传统价值观逐步被“为生活而工作”的新型价值观所取代，休闲伦理将取代工作伦理成为人类社会新的价值伦理观。这种取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古希腊休闲思想的一种“回归”，但是这种“回归”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或恢复，而是否定之否定的超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休闲的期望越来越高，虽然勤奋劳动的美德无处不受欢迎，工作也常常被视为一种生财之道，但休闲及其应用正逐渐代替工作而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中心。美国1990年发表的一项国家抽样调查表明，41%的被调查者认为，休闲比工作重要，36%的人认为工作比休闲重要，23%的人认为工作和休闲同等重要。而1975—1985年，更多的公众认为工作较为重要。休闲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休闲观的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休闲才是生活的目的，工作仅仅是手段；人类只有在休闲中才能不断完善自我，彻底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最终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

二、休闲教育的“谋生”维度

休闲伦理将取代工作伦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休闲教育要始终坚持的伦理限度就是必须以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为前提。马克思说过，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的风景也无动于衷。这句话既说明了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也说明了人们对休闲内涵的理解并由此而成的休闲教育在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具有的不同的表现形态。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下，人类为了谋生不得不付出全部或绝大部分的生命能力和生命代价，此时的休闲只能是少数人的特权又或是一种“异化性”或强迫式的休闲。真正的休闲则标志着人们摆脱了生存危机，获得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财富和自由时间。人类只有在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后，才开始追求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在充分的闲暇的时间中享受文化、科学、艺术、社交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在休闲教育中享受自由和创造的快乐。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休闲是少数贵族阶级的特权，而现代工业化的狂飙突进一方面使许多普通劳动者从过去繁重而长时间的体力劳动状态下获得空前的解放而享受到现代休闲；另一方面却又导致无数人的失业或下岗，这是一种“异化性”或强迫式的休闲，这种休闲只是时间表象上的休闲，它不仅没能让人们消解生存的困境，而且给人的精神带来巨大的压抑和伤害。当前我国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所以我国当前的休闲教育面临着双重的目标，即既要让已获得了休闲生活的人如何进入具有共产主义韵味式的“乐生的休闲”，又要让那些因失去劳动的机会或仍然处于艰辛的体力劳动者如何享有“谋生的休闲”。显然，由于我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的过程中，劳动基本上仍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谋生的手段，因此，“谋生的休闲”更具有普遍性。人类社会休闲生活的历史发展表明，如果人们连基本的物质保障都没有，再多的闲暇时间对个人而言也没有任何价值，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只会增加社会的风险系数。现实中有一部分人渴望休闲，希望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另外有一部分人却拒绝、害怕休闲，担心失去工作。有人做过调查，假设在每周工作6天的情况下，是愿意多劳多得还是愿意少劳少得，结果显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居民，有91.4%的人不愿意减少工作时间，其中更有46.3%的人愿意放弃休息，多工作一天以获得多一天的报酬；而在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居民中，有80.3%的人不愿意增加工作时间，其中有24.7%的人宁愿放弃一天的收入，以获得多一天的自由时间。虽然有部分人每天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但他们并未因此而获得自由；相反，他们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工作的自由，因为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一点选择都没有。这种闲暇严格来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休闲，

它只是具备休闲的外部形态特征即闲暇时间，而根本没有休闲的本质反映，即自由。

在我国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出现了大量的民工涌入城市寻求工作的现象。在城市，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工作的需求，还有社会转型期机构改革、国企重组又迫使一部分人纷纷下岗，失业者不断增多。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和失业者，拥有的闲暇时间不可谓不多，但是他们根本无法休闲。如果我们对这种被迫性休闲引导不合理，还会对社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因此，休闲教育必须充分开发和利用这种“以闲暇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把富余劳动者、失业者生活闲置时间转化为劳动素质和技能，转化为新的人力资源。对于农民，“休闲”教育必须立足于提高农民的农业知识和生产技能，增强他们的生产能力。对于城市底层的劳动者或失业者，“休闲”教育必须立足于提高他们的基本劳动素质，使他们掌握某一行业的劳动技能，不断增强其谋生能力。另外，“休闲”教育还要在农村营造一种健康、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氛围，让人们“闲”得有意义。在城市还要大力建设文明的社区文化，让健康、合理、科学的生活方式占据人们的整个生活空间。

以“谋生”为目的的休闲教育虽然从人的全面自由的本质来讲是一种错位，但是从现实的实际来看又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与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后，面临的的就是发展问题，这时休闲教育就具有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因此，我们只有满足了这种以“谋生”为目的的休闲教育，才有可能实现以“乐生”为目的的休闲教育。

三、休闲教育中的工作伦理

休闲是人类较高层次的生存状态，需要有较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作为保障，而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是人自己劳动创造的结果。因此，休闲与工作（劳动）是有机的统一。人类不能只休闲而没有劳动，否则休闲就失去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人类生存的合法性就将面临挑战，也就谈不上还会有什么休闲。在1688年英国革命中，自由主义者们提出了一个口号：“无财产即无自由。”我们也可以说，无财产即无休闲。财产从何而来？当然只能由劳动创造。就我国而言，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算进入小康社会，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推动是以劳动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因此，劳动仍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劳动光荣仍然是我们进行休闲教育的基本伦理限度。

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劳动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因而也就是人之为本质的确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仅是人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发生联系的根本途径，因而也就是人的价值和人的个性的实现和张扬的基本方式。人类社会及其每个个体最终都是在劳动实践中获得发展的。即使在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尽管它对劳动者个体在肉体和精神上可能都是一种摧残，但却是人类社会整体及其后世中的个体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3] P125}马克思还指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不仅仍然将劳动看作是最高尚的事情，而且还看作是人生意义的第一需要，或称“乐生”的意义之所在。这时的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3] P333}不仅如此，由于共产主义实现劳动的普遍化，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一切社会成员的可供支配的时间都包括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两部分，每个人既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物质生产，又享有自由时间并运用自由时间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从而达到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人在自由时间内的发展同时也是劳动力在更大规模上的再生产。人运用自由时间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陶冶自己的精神，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发挥和发展自己的各种能力，丰富和完善自身，使自己成为社会、劳动和生活中的真正主体。同时，劳动时间由于是劳动者的天赋才能的发挥和彰显，所以劳动时间具有了自由的性质，劳动成了自由发挥和发展人的才能的场所。尽管物质生产仍是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须进行的的活动，但此时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成了以发展自身能力为目的的活动，成了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休闲教育不仅不消解劳动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它还必须培养人们的劳动美德观。我们

虽然不能完全认同新教工作伦理观,但是也不能忽视工作伦理的价值,只有工作才能换取休闲,任何不求工作但求休闲的想法或行为不仅没有道德,同样也是不合法理的。人类毕竟从属于自然,劳动作为创造人本身的决定因素在人类的潜意识中是不可替代的。远离了劳动,人类也将失去休闲的乐趣。休闲既是我们的生活目的,勤奋工作也是我们提倡的伦理价值,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对于个体来说,工作和休闲并不是对立的,两者不能割裂开来。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只要是个体自觉选择的行为,都能体现生活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贬低工作而强调闲暇使人们感到极为空虚,不知所措。闲暇本身不能决定工作的好坏,但工作的不顺却可以使闲暇失去乐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工作有意义,闲暇才变得更有意义。所以,只有到了社会和政治活动共同反对工作与闲暇割裂的历史阶段,我们寻找闲暇的意义才会最终出现。”^[1] P33)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悖论:虽然休闲作为人的生存理想,但却有不少人不愿“闲着”,宁可选择去工作,而且可以说得上是疯狂地工作。工作因满足人的高级创造性需要和情感需要而变得富有意义和使人产生满足感,工作“为人们提供了身份、自尊、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潜在源泉”。^[2] P72)而休闲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慢性自杀,工作才是他们生活的目的。由此,我们对“休闲”也应该有更高层次的理解。他们在工作所拥有的这种痴迷、投入的状态其实就是“天地自由的境界”,达到了生命自由状态,实现了休闲的本质。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这种工作的境界就是最高层次的最本真的“休闲”。他们的工作和我们通常所讲的工作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是自愿的、自觉的,而另一个却是非自愿的、强迫的。这种休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休闲。“人们究竟是更看重工作,还是更看重工作以外的其他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能从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那些认为工作是生活中最重要或者最有趣的事情的人,并不见得会说他们在生活中全无休闲式的体验。只不过他们可以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一定的满足,而其他人却是从休闲生活中获得这种满足感。”^[3] P126)

休闲教育要让人们明白,未来社会虽然休闲的价值将大大提升,却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工作的价值,休闲是相对于工作而存在的,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所谓休闲。一个人的工作质量越高、越有成效、越有创造性,那么他(她)的休闲活动才能越充实,也才能成为必要的活动。相反,一个不工作的人是谈不上什么休闲的。再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看,劳动和休闲是人格培养、心理合理调整、智力健康发育、能力全面提高的两翼,两者缺一不可,两者也不可偏颇,要彼此协调。在这个问题上有人预测未来的社会:“后工业社会尽管在实际上确实会使正式工作时间减少,但闲暇活动的组织仍将主要取决于工作所创造的社会化条件,这就是无职业的妇女为什么无闲暇的原因。简而言之,闲暇仅仅作为工作的对立面而存在,因而……只有工作……被确定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的社会里,闲暇才能获得完全的重要性和意义。”^[4] P18)一个人的工作越充实,通过工作获得的报酬越多,那么他(她)的休闲活动也就更丰富。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美] 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M].王崑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5] [英] D.哈丁, J.希克斯普尔斯.新的工作价值观:理论与实践[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13(3).
- [6] [美]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箴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 [7] [爱尔兰] 利亚姆·班农等主编.信息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罗 苹

•政治学•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论纲

◎ 薄贵利

[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总体战略的指导。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包括总体目标、总体方案和总体对策三方面的内容。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必须按照科学决策的程序进行。

[关键词] 行政体制改革 总体战略 攻坚阶段

(中图分类号) D0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66-04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在各项改革中,行政体制改革成为聚焦点和突破口。为了更加积极、稳妥和有效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迫切需要研究和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

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总体战略的指导

战略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谋划。研究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首先是对以往行政体制改革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的总结。

从1982年至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24个春秋。2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不断深化,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突破,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然,还必须看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也存在一些值得总结和吸取的教训。其中之一,就是总体战略研究、规划和指导不够,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不够清晰。比如,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是什么?这届政府的改革与下届政府的改革是什么关系?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又是什么关系?如何协调配套?对这些问题,至今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更缺乏总体性的战略规划和指导。这不仅使行政体制改革缺乏科学明确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标,也使行政体制改革各阶段之间、行政体制改革与其他体制改革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和配套,既增加了改革的成本,又降低了改革的效率。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一次强调“加强改革开放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

研究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突出特点是:(1)改革越来越触及到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和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突破、不解决,行政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向前推进,也很难进一步取得成效。(2)由于改革所触及的深层次问题和重大问题,往往都涉及到重要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改革的难度和敏感性进一步加大。(3)改革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进

作者简介 薄贵利,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100089)。

一步加强，它不仅要求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研究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同时要求把行政体制改革放到各项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中，处理好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的关系，使它们之间相互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相互促进。只有在科学的战略指导下，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做到方向清楚，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协调配套，有条不紊，整体推进，并最终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

研究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是减少改革失误、降低改革成本、更加有效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的战略举措。改革的总体战略具有如下功能：(1)通过研究和确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指明方向，使行政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着这一方向和目标稳步向前推进，有效防止和克服各种偏离改革方向的措施或做法。(2)通过研究、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规划，使行政体制改革与其他各项改革相互协调，各个阶段相互衔接，通过不断累积，稳步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3)通过研究、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政策和各项措施，形成行政体制改革的政策系统，使各项政策相互配套，各项措施相互补充，从而形成改革的巨大合力，收到协同动作、整体推进的效果。

二、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战略的主要内容

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是有关行政体制改革全局的谋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总体方案和总体对策。

(一) 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行政体制属于上层建筑，其变革必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行政体制又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也必须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同时，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也必然对行政体制改革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新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结构正在由过去的政府一统天下向社会自治方向稳步发展。这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变革，要求完善的公共行政体制与之相适应、相配套。因此，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是新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所谓公共行政体制，即执行公共意志，行使公共权力，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生产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政府组织体系和行政管理制度。

首先，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是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是：经济主体多元化而非一元化；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是市场而不是权力；在经济运行中是市场经济规律起支配作用而不是长官意志。市场经济的这些特性，要求限制和规范政府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公共意志的执行者，其经济管理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就要求将政府的权力限定在公共领域——从事公共管理，生产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为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管理的这一基本要求，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

其次，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致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即由过去的阶级社会已经基本进入了无阶级社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民主也由过去的阶级民主逐步发展为社会公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社会公共民主所集中的是社会公共意志，所代表和维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政治的执行系统。既然我国所要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公共民主政治，那么，它必

然要求公共行政体制与之相适应、相协调、相配套。否则，社会公共民主政治就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其所集中起来的社会公共意志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再次，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是社会治理结构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治理结构已经从过去的政府单一治理结构向社会多元自治治理结构转变，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以及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就是典型的表现。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多繁重而生疏的事情。”^① P328) 社会的治理结构的重要变化，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下放权力，将应由企业、事业和社会单位自主管理的事情下放给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单位，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管理好应由政府管理的事情。在社会日趋多元自治的治理结构下，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公共行政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公共行政职能。适应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和转变政府角色、政府职能的要求，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

(二) 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明确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就需要研究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一方案应包括如下内容。

1. 制定实现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时间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即按照既定目标，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行政体制改革至今没有提出时间表。从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因为任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有一个时间概念，否则就无法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方案，也无法对行政体制改革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行科学的评估。

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相适应。依据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进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应确定这样一个时间表，即：到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行政体制框架，到2020年建立完善的公共行政体制。

2. 行政体制改革阶段的划分和改革重点的确定。

行政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经过较长的时间，通过累积性战略，逐步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这就需要将行政体制改革划分为若干阶段，并确定每一阶段的改革目标和改革重点。

行政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可以与“五年规划”相适应。今年是国家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从今年开始到2020年，可以将未来行政体制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06—2010年为实施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战略的第一阶段，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2016—2020年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构建公共行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依法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合理设置政府机构。第二阶段，应以优化政府的组织结构，改革行政区划体制，实现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为重点，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扩大地方和基层政府的管理自主权。第三阶段，以完善公共行政体制为重点，加强各项配套改革，真正实现政府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高效化。

3. 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衔接与配套。

行政体制属于上层建筑，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在研究和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中，必须深入、系统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使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相互促进，以便协调配套地整体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体制改革。

4. 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阶段性评估和改革方案的反馈性调整。

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分阶段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客观条件的制约或主观认识的偏差，有可能出现改革偏离、改革失误或改革不到位等现象。因此，必须对每一阶段改革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以便对改革方案进行及时的反馈调整，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改革效能。

（三）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对策

为了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落实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需要研究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对策和各项具体政策。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对策和各项具体政策要相互衔接，各项具体政策要相互配套，从而形成行政体制改革的强有力的科学的政策体系。

三、制定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战略的基本程序

研究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活动。因此，必须按照科学决策的程序进行。

1. 组织专家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构想。这里的专家，既包括研究与行政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也包括熟悉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践的实际工作者。(1)组织专家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成效、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总结，以便为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2)组织专家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和国外公共行政改革实践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3)在调查研究、理论研究、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构想。

2. 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进行科学论证。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提出以后，需要组织专家学者、实际部门进行多方面的论证，同时要广泛听取各领域、各阶层代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修改和完善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包括总体战略目标、总体战略规划、具体实施方案和各项改革政策）。

3. 提交最高权威部门审定。经反复研究、论证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需将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提交最高权威部门审定，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以最高权力机关的名义颁布实施。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雨 童

唐甄政治批判思想的三个层面展开

◎ 黄 强

[摘要] 唐甄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他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帝王,犀利地声讨专制政治,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重要代表。对唐甄的政治批判思想可从三个层面展开,包括抨击封建制君主的启蒙思想特征,对维系封建君主专制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激烈批判,以及以民生政策为根本的现实政治批判。

[关键词] 唐甄 政治批判思想 封建君主专制 民本论

(中图分类号) D092; B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70-05

唐甄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他曾经被称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群体中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四大家”之一。对唐甄的政治批判思想,学术界有几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侯外庐认为,唐甄思想的精华是“平民干政的精神”,“他把君主看作一个公仆以及把匹夫看作上帝的思想,代表了近代的城市平民反对派的阶级要求”。^[1] P301-302 萧笈父和许苏民认为,唐甄敏锐地洞见了君主专制的主要弊端,提出了改革君主专制政体的初步民主要求。^[2] P321-323 刘泽华认为,唐甄是民本论的鼓吹者,他抨击暴君、调整王权的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3] P662-673 刘蔚华等人认为,唐甄抨击封建专制、倡导社会平等的启蒙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4] P1500 本文旨在综合参考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作一整体性探讨。

一、抨击封建专制君主的启蒙思想特征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根本特征,就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其间,对于专制君主的批判,是最为重要的一环。道理十分简单,专制君主是专制政治的总代表,要批判专制政治、改变专制政治,首先必须批判、清算专制君主。

在对专制君主进行深刻批判的启蒙思想家中,人所共知,黄宗羲是典型代表人物。黄宗羲撰写了著名的政治批判专论《原君》,空前痛彻淋漓地对专制君主的丑陋本质进行了无情批判。唐甄对封建专制君主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黄宗羲。他认为,君主为了夺取天下,其军队经过乡里城镇,将人民掠夺一空,甚至“屠城”!但大将、偏将、卒伍、官吏们杀人,其根子在于君主,“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5]《室语》而万恶的君主,在人民因不义的战争而遭受巨大摧残,“暴骨未收,哭声未绝”之时,就已经华服冠冕地坐于朝堂之上,接受百官的朝贺,并扩建宫室、扩大园林,“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唐甄痛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他异常激愤地宣称:“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6]《室语》公然宣示要杀死不义(无道)之君,这在秦汉封建专制政治建立以后,可谓振聋发聩!

唐甄激烈批判专制政治的一个著名论断是:“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7]《室语》他论证说,平民百姓“杀一人而取其布粟”,就被当作“贼”,而“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的人,不仅不被当作贼,还成了帝王,这是极大的不公!实际上,这种杀天下之人而获得其布粟之富的帝王,是真正的贼,最大的贼!他还认为,历史上各种乱世的出现,罪过在于帝王。在他看来,“乱天下者惟君。”^[8]《鲜君》各种小人、盗贼、奸雄扰乱天下,其原因在于天下无道,政治黑暗,根本的症结在于帝王的昏乱。显而易

作者简介 黄强,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275)。

见，唐甄在专制政治极为严酷的时代，能够明确地把政治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帝王，反映了他政治观察的深刻，以及批判精神的强烈和坚韧！他要处死无道之君，宣布秦汉以来帝王皆贼，在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中，其激烈程度、其思想的深刻，较之黄宗羲的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君主是人民的寇仇的思想，没有丝毫逊色！至少，在这方面，唐甄和黄宗羲是双峰并峙！

唐甄不自觉地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谬论，动摇帝王专制的理论基础。自古以来，都说帝王承命于天，是天的儿子，“故号为天子”，^[1]汉儒董仲舒也说“王”字三横表示“天、地、人”，贯通天地人谓之“王”。^[2]《深察名号》君主权力来自天、神的授予，因此，“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成为封建社会的神圣政治准则，历代统治者就是靠这套理论来神化其专制政治的合理性并以此牢笼人心的。唐甄针锋相对地指出：帝王是人，不是神，不是圣。他大胆地指出：“天子虽尊亦人也。”^[3]《善游》“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亦人也。”^[4]《抑尊》把皇帝从“天帝大神”的尊位拉回人间并和老百姓等同起来，这就打击了所谓“天子”、“龙种”的神话，动摇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理论基础，拨去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云雾，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极为激进而又进步的思想，是唐甄启蒙思想的重要表现。

认为统治者和人民之间，逻辑地具有不平等，统治者高高在上，人民应当自觉自愿地接受其统治，是历代封建专制政治的基本论调。而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专制统治的前提。唐甄对此也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唐甄认为，帝王与庶民生来平等，古已如此，推导下去，一人独坐万人之上就是违背古时的道理了。唐甄指出，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5]《止杀》“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6]《全学》唐甄认为，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谄诈无实”^[7]《仁师》的独夫民贼。

应当指出的是，唐甄所反对的君主，是自秦以来的暴君昏主，而不是反对一切君主。他钦佩、赞美三代以前的圣君明主。他在《潜书·鲜君》中的表白相当清楚：“上观古昔，尧舜禹启，治世惟久。夏殷西周西汉，治多于乱。治世多者，虽有昏主，赖前王以安也，其余一代之中，治世十一二，乱者十八九。前帝泽薄，无以保后故也。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其如彼为君者何哉。”自秦以后的帝王，为争夺天下而残害百姓。因此，唐甄反对的是“非屠府县百十城，杀无辜数千百万人，绝烟火，绝鸡犬之声千百里者，不可以得天下”的暴君，认为“不明不仁，不可以为天下主”。^[8]《仁师》因为“治天下者惟君”。^[9]《鲜君》可见，唐甄反对的并非所有君主，而是无道之君而已。其实，就是在他十分著名的反对专制君主的命题“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前面，就有一句：“大清有天下，仁矣。”^[10]《宝语》在《潜书》中，唐甄恭维“大清”的词句，此处并非孤例。

二、对维系封建君主专制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激烈批判

唐甄政治批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激烈批判反映君主专制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激烈批判封建传统伦理思想，具体表现为对封建政治伦理、封建家庭伦理、封建经济伦理、封建个人伦理的批判。

1. 对封建政治伦理的批判。

秦汉以降，政治伦理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君主居于君臣关系的绝对主导方面。臣绝对服从君，君绝对支配臣；只有犯错的臣，没有犯错的君，是封建政治伦理的神圣原则。无条件地“忠君”，成为天经地义。作为臣民，只有效忠于君主才是忠臣良民，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唐甄却认为，并非任何条件下都要忠于君主。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臣可以不忠于君。一是在君昏政暗之时，不必忠于昏君。所以他说“君子之道，先爱其身，不立乱朝，不事暗君”；^[11]《有为》二是君死国亡不必为故君去殉死。他认为在“大命既倾，人不能支”的情况下，君死国亡乃是时势所趋，所以“非其股肱之佐，

守疆之重臣，而委身徇之，则过矣”，正确的做法应是“君子不死”。^{〔9〕《利才》}这表明，唐甄在政治伦理观上，坚持了传统儒家“以道事君”的传统，提倡从道不从君。这对于“君为臣纲”的封建政治伦理，对于后期封建社会盛行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是有力的批判和大胆的超越。

2. 对封建家庭伦理的批判。

封建社会家庭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夫为妻纲，即妻子必须一切听命于丈夫，男尊女卑，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从一而终，是封建社会家庭伦理对妇女提出的片面义务要求。唐甄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地之下于天，妻之下于夫者，位也；天之下于地，夫之下于妻者，德也”。他对丈夫虐待妻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今人多暴其妻，屈于外而威于内；忍于仆而逞于内，以妻为迁怒之地。不祥如是，何以为家！”^{〔10〕《内伦》}他赞美尊重妻子，认为“好内”虽非美德，但欺负妻子、暴虐妻子是“大恶”。^{〔11〕《夫妇》}唐甄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夫妇和才能家道兴，而夫妇欲和，必须倡导一种新的夫妻关系，即夫为妻下。若“夫不下于妻，是谓夫亢；夫亢，则门内不和，家道不成。”^{〔12〕《内伦》}所以“夫妇之道，以和不以私。和则顺于父母，私则妨于兄弟。和则不失其情，私则不保其终。”^{〔13〕《居室》}在这里，他强调了夫下于妻。尽管这种夫下于妻并不是“位置”上的，而只是“德”方面的，但唐甄这种观念，已经是对封建的三纲五常道德中“夫为妻纲”的有力针砭，是提倡新型的夫妻关系，这实际上是把女子从附庸地位提高到与男人对等的水平。虽然这里仅是就夫妻关系而言，还没有涉及到整个家庭制度，但已经可以看出唐甄思想的启蒙性质，看出其家庭伦理观方面的明显的进步性。

3. 对封建经济伦理的批判。

封建社会经济伦理的基本旨趣，是重义轻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4〕《董仲舒传》}是其典型表述。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农轻商，重农抑商，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唐甄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批判了传统的封建伦理。唐甄认为，商业自有商业的价值。他认为吕尚“居朝歌之市，操刀屠牛”，在孟津“身自执炊，卖饭以给食”，并非什么可以嘲笑之事，而是值得赞赏的“守身之道”。^{〔15〕《贞隐》}唐甄这种看法，是典型的“生存才能发展”的思想。实际上，唐甄就曾经商。唐甄在弃农经商之后，有人劝他归本弃末，又有人讥讽经商是自辱其身。而唐甄却说道：“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他认为经商同农耕一样是求财之道，这比既不耕田又不经商而求财之人强多了。唐甄斥责非耕非商行为是“小人之为”，^{〔16〕《养重》}而称他的经商与吕尚卖饭同为一义：“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一也。”^{〔17〕《食难》}唐甄不仅对轻商观念进行反驳，而且还敢于弃农经商。虽然这一行为与生活所迫有关，但毕竟反映了其观念的转变。这是用实际行动批判重农轻商的传统经济伦理，和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是同一思想基调。

4. 对封建个人伦理的批判。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后期封建社会在家庭伦理方面束缚、压抑妇女的礼教精髓之一。这样一种家庭伦理的价值取向，其主导精神是所谓“气节”。对于这类气节，唐甄有很强的批判性看法。他尖锐指出，气节之类的东西，不过是某些人博取虚名的手段而已。他指出，社会上提倡气节、崇尚气节成风，则人们会以气节为名，追崇气节，结果人人都以自己有气节而自诩，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结果败坏了社会风气。其实，提倡并利用气节来谋取私利的人，居心不良，“害心之大。”^{〔18〕《去名》}唐甄公开反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所谓气节，认为衣食足则气节立，衣食不足则气节丧失。有人愿意应聘进京当官，是因为其家里贫穷，甚至连老婆都娶不上；有人不愿应聘进京当官，是因为其家庭富裕。在富裕者看来，“公卿之禄，不如我岁入之多。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是愚蠢之举。唐甄评论说：（进京当官者不能守节）“不能守其节者，食不足也”；能够拒绝进京当官的诱惑，保全名节者，是因为“食足也”。可见，“节之立不立，由于食之足不足。”^{〔19〕《养重》}唐甄以此例子论证了其食足则节立、食缺则节失的观点，这是与理学家的封建气节观明显不同的新气节观。唐甄这种观点，从实际利益出

发，考察人性和人际关系，是对儒家空谈仁义受惠的批判，它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反映了市民阶层重视实际、崇尚实利的价值观，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

三、以民生政策为根本的现实政治批判

唐甄作为一个激进的批判思想家，还对现实政治作了激烈的批判，这集中体现为对清初实行的民生政策的批判。

唐甄认为，清朝的政治是虐民之政。清朝建立五十余年后，不仅没有做到国盛民富，反而“日益困穷”，体现为四空：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具体表现为：谷贱伤农，人们果腹艰难；布帛贱而伤商，人们难以暖衣；商人经商而亏本；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这样，导致社会风俗日益败坏，道德礼仪日益绝灭，“小民攘利而不避刑，士大夫殉财而不知耻。”谄媚之风盛行，怠惰纵乐恶习嚣张，人心陷溺，“此天下之大忧也。”^①《存言》之所以出现这种道德颓败的现象，唐甄认为，是因为人民的穷困造成的。而人民穷困的根本原因，则是清朝的现行政治造成的。他尖锐指出，清朝的现行政治是“虐民”之政，“害民”之政，“攘民”之政，“弃民”之政，“忘民”之政，所以，清朝建国五十年以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②《存言》可见，朝廷的政治不是“为民”的。这样，“上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吏以富民为务”，^③《考功》是根本不可能的。朝廷的这种政治，就决定了国家的大小官吏，“明于家而昧于国”，为个人谋求私利，“营田园，计子孙，莫不求富而忧贫”，^④《存言》置老百姓的利益而不顾，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贪官污吏对人民的危害，远远超过打洞翻墙偷东西、手持利刃进屋抢劫、光天化日拦路抢劫之类的歹徒行为对人民的危害。他悲愤地说：“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⑤《富民》

唐甄指出，虐民政治和贪渎成风的结果，是败坏社会风气，使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在不正之风盛行的社会里面，贪官污吏的恶劣行径反而成了正常现象。相反，清官廉吏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肯定，反而受到讽刺、打击和刁难。个别官员能够做到为政清廉，人品端正，但是出无车，食无肉，衣无裘，世俗之人不但不会赞扬他，反而认为他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而那些贪官污吏，由于衣着光鲜，出手阔绰，别人反而尊敬他羡慕他，教育子弟时以他为表率，以致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几乎达至无官不贪的地步。

唐甄针对当时统治者对人民的过度剥削，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之所以穷困如此，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封建国家赋税太重。唐甄在《潜书》的《食难》篇里面，叙述了自己谋食的困难情形，揭露当时田赋繁重的情况。当他有70亩田的时候，丰收年成，交了赋税之后，可供六口之家半年之用；收成一般，则交了赋税之后，没有什么剩余；歉收之年，则需要典当家产而交纳赋税。由于如此，“于是有田而无食，且有害于食，将及于冻馁矣。”^⑥《食难》唐甄比较说，以他自己的情况，按照明朝的赋税的情况，日子虽然艰难，但是应该还是过得去。但是，现在赋税太重，以致连他这样的人都无法正常生活，更何况普通农民。赋税重了，地主向农民征收的地租也就必然要加重。所以，佃农的处境比唐甄的处境更糟。这样，人民怎么不困穷呢？因此，唐甄感慨道：“今若此，虽有善为谋者，亦无可奈何矣。”^⑦《食难》根据唐甄的自述，他之所以弃农经商，其实也是和政府当局赋税太重有关。

唐甄指出，人民穷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源枯竭，货币数量少，财货不得通其流。因此，他主张废银用钱，以避免地主官僚囤积白银，使得财货畅其流。他说：“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白花花的银子，炫目耀眼，“人所贪爱”，容易导致聚敛。而当时是“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纵观历史，“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尝旬月不见株两，谷贱不得饭，肉贱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不得衣食，银少故也。”^⑧《更币》因此，“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⑨《更币》唐甄这种主张，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一》中所提出的废银用钱之说，具有思想脉络的贯通性。可以看到，唐甄在这里初步认识到货币是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数量少，

就会影响商品的流通。而大地主积聚白银，垄断了货币，就导致一方面商品所有者手中的商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劳动人民手中毫无分文。这样，财货无法流通，使得小农业生产者和小商品生产者处于贫穷境地。这实际上是从货币政策方面，对现实政治进行的批评。

总括而言，唐甄的政治批判思想是深刻的，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不屈抗争和无畏精神。就其启蒙思想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而言，应当说是市民阶级。学术界有人认为，“与黄宗羲等人相较，唐甄抨击暴君、暴政的言辞更为激烈”，^{[3] P666}“比起黄宗羲来犹有过之”，^{[9] P331}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唐甄对封建政治的批判，确实触及到了封建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触及到了封建政治的问题，表现了其思想的先进性。他曾目睹明末农民起义，感受到了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总结过明朝灭亡的教训。他亲历了明末清初社会的发展，感受到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种种弊端，从而使得他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分析社会问题，提出矫正的思路。但是，唐甄本身并不是要根本变革封建制度，也不是要彻底取消君主制度。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出身和认识水平，还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他的政治批判，其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完善当时的政治制度，为了帮助君主（圣明的君主）治国安邦而已。他反对的，是暴政、暴君，他期盼的，乐意帮助的，是仁政，是圣君、明君、贤君！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所掀起的启蒙思潮，始终在逆流回旋中前进，而最终也没有达到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思潮的水准，并最终夭折！

学术界对于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评价，见仁见智。刘泽华先生认为：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潮，几乎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各种积极因素发挥到极致，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时代的脉搏。“不过，他们又没有跳出传统政治文化的圈子。圣人之道是他们政论的理论基础，‘君为政本’是他们政论的根基。”^{[7] P600}我认为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唐甄的政治批判也属于这个范畴。刘泽华先生还认为，唐甄“帝王皆贼”的命题，在其思想的逻辑中，并不导致对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否定，而是“君为政本”观念的表现，“‘帝王皆贼’的命题不是出于对君主制度的否定，而是来自对君权的肯定和认同。罪君的目的是训诫君主，进而论证为君之道。……罪君旨在尊君，这是唐甄政治思想的悲剧，也是清初士大夫群体批判思潮的悲剧。”^{[7] P666}蒋国保等先生认为，唐甄所无情抨击的，是“无道之君”、“不义之民”及其暴政。对于“贤君”、“明君”及其仁政，唐甄则予以充分肯定。^{[1] P331}根据我对唐甄著作的研读，我认为，这些评析是理性的。因此，我们今天在研讨唐甄启蒙思想的时候，既要注意不能贬低其历史功绩，也不能拔高溢美。

[参考文献]

- [1]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2] 萧蓬父，许苏民.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 [3] 刘泽华主编. 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4] 刘蔚华，赵宗正主编. 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 [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 [5] 潜书.
- [6] 说文解字.
- [7] 春秋繁露.
- [8] 汉书.
- [9] 蒋国保等. 清代哲学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雨 童

从道德危机的范围、程度看道德重建

——对广东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问卷调查的分析

◎ 李江涛 吴重庆

[摘要] 不良社会环境下的“道德不作为”和“陌生人社会”里的道德失范,表明道德危机存在着程度不等、范围不一的区别。导致“程度不等”和“范围不一”的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差异。因此,道德建设的基点是社会基础的重建和社会环境的改善。

[关键词] 道德危机 社会基础 社会环境 道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 B82-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75-08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努力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

为了深入了解广东“三个文明”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于2005年4-5月先后在广州、珠海、云浮、梅州、韶关等地进行了广东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状况问卷调查,同时,在调查地区召开了干部、市民或农民的小型座谈会。

我们运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调查地区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数量以及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确定了在抽样点发放调查问卷的单位类型与数量。按照社会调查研究的规范要求,将Z值设定为1.96,置信度设定为95%,抽样误差率为3%,通过计算,得出样本规模数为1071。实际上,我们总共发出问卷1500份,收回有效问卷137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1.33%。样本的具体情况如下:

在1370个调查对象中,全部为年龄在18-60岁之间的成年人,男性794,占58%,女性576,占42%;城市居民760,占56.2%,城镇居民204,占15.1%,农村居民384,占28.4%;小学以下文化程度37人,占2.7%,初中到研究生毕业1326,占97.3%;中共党员633人,占47.5%,共青团员196人,占14.7%,民主党派人士20人,占1.5%,普通群众488人,占36.5%。这些情况表明,本次调查所获得的样本有效,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尽管调查结果不能用于进行统计类推,但是可以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重要依据。

下面我们将利用“广东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调查问卷”的数据材料,着重探讨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关度最高的道德建设问题。

一、道德失范的程度与范围

(1) 对“道德危机”的分析

人们常用“道德危机”来形容当前的道德状况,其主要依据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所有的人只关注个人的眼前利益。我们认为,这一判断是有偏差的,即没有区分正当的自利与不正当的自私。“道德建设的基点不应是在否定自利行为的前提下倡导利他行为,而应是在否定不正当的自私行为的同时,提倡正当的自利行为(包括互惠双赢和短期利他长期利己的行为),并鼓励利他主义。”^[1]在此,道德行为可分低中高三个层次:不损人利己、互利和利他。如果把最高层次的道德行为视为唯一的道德

作者简介 李江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吴重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410)。

标准（所谓“高标准严要求”），必然低估甚至忽视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准和道德意识，从而作出“道德危机”的判断，这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有害的，即使普通人的道德践履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并最终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道德行为虽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实践，但它同时又极大地与日常生活的社会环境相关连。从积极意义言，道德行为是个人对社会环境的主动适应；从消极意义言，道德行为又是个人受社会环境的被动约束。因此，我们在讨论“道德危机”时，不能仅仅谴责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意识淡薄”，而且更需分析社会环境的变迁。“道德危机”并非由市场经济所促成，而是由社会的转型所导致。在从传统的身份社会到现代契约社会的转型即“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各国无不前后不一、程度不等地出现过特定阶段的道德失范，所以，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危机”绝非当今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明乎此，我们对“道德危机”的抨击就可以少一点偏见与激愤，而对道德规范的建设就可多一份冷静与努力。

（2）不良社会环境下的“道德不作为”

广东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调查问卷表明，对“道德危机”的说法，我们须持谨慎的态度。

在回答“有人说当前人际关系冷漠，缺乏同情心，缺少互相帮助，你同意吗”的问题时，32.3%的人表示“同意”，49.9%的人表示“不同意”，17.8%的人表示“不知道”，就是说，近七成的人并不赞同“当前人际关系冷漠”的说法，此一比例之高超乎我们的想象。而在回答“假如在路上遇到有人被车撞伤，你认为自己会怎么做”时，91.9%的人选择“打110、120电话报案，通知有关部门”，27.3%的人选择“在警察到来之前去帮助他”，4.0%的人选择“站在旁边观看事态的发展”，4.2%的人选择“离开现场”，1.6%的人选择“其它”。就是说，在对个人的道德勇气、能力和生命并不构成挑战和威胁的情景下，即使面对陌生的路人，人们的同情心和爱心依然较普遍地存在着，因为只有不到10%的人才选择“事不关己”的态度。

另一组数据也可以支持我们的上述判断，即我们请答卷人根据自己的意见，将属于个人“优良品质”的“责任心”、“勇敢”、“诚实”、“自律”、“爱心”和“勤劳”进行“重要性”排序时，38.5%的人首选“诚实”，33.8%的人首选“责任心”，12.1%的人首选“爱心”，9.1%的人首选“勤劳”，3.9%的人首选“自律”，2.5%的人首选“勇敢”。就是说，不管舆论如何低估当前的社会道德水准，人们依然特别看重自身的诚实、责任心和爱心，而此三者，恰是构成道德意识或保证“良知不泯”的最重要因素。而为什么“自律”和“勇敢”的首选率又如此之低？事实上，此二者属于道德实践的范畴，可以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并不缺乏基本的道德意识，但缺乏道德实践的意愿、能力和勇气，我们可称之为“道德不作为”。这貌似悖论，但其实又是可解的。

问卷调查的另一数据可说明人们对社会环境不良感受的程度，即在我们列举的社会治安、医疗服务、社会风气、交通条件、文化教育、就业状况、住房条件、政治参与机会、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十个领域，对社会治安明确表示“不满意”（不包括“一般”和“不太满意”）的人占17.6%，位居十个领域之首（对其它九个领域明确表示“不满意”的比例依次为16.2%、11.6%、8.8%、6.5%、12.1%、6.6%、8.6%、15.4%和15.6%），而对社会风气明确表示“满意”的人仅占2.4%。

如果社会治安状况恶劣，恶性刑事案件频频发生或时有耳闻，这事实上对个人的道德勇气、道德实践能力和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在此情景下，我们怎能以诸如“舍身取义”的至高道德标准去要求普通人的道德作为？至于能否“自律”，同样与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感受相关，即如果公共权力腐败成风，社会不公随处可见，贫富差距愈演愈烈，我们又何从要求作为无助的个体或弱势的群体进行严格的“自律”？对他们来说，“道德不作为”毋宁是“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2] 在此，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密切相关，即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性取决于政治的清明。

（3）“陌生人社会”里的道德失范

如上所述,“道德危机”现象往往发生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转型期。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总是与城市化进程和社会成员的高度流动相伴随。对农村来说,是绝大多数的中青年劳动力离土离乡,汇入奔向广东打工的洪流;对城市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单位社会”特征的削弱甚至部分“单位”(如国有企业)的解体。总之,社会转型的大潮已快速地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陌生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从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向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在“熟人社会”中,由于道德监督权威(如民间领袖)的存在和舆论约束途径的顺畅(如熟人邻里的议论指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及人们出于对熟人和熟悉环境的切身责任感,对人们在“熟人社会”里的越轨冲动构成有效的潜在约束。另一方面,大量的历史经验和实证研究都表明,社会流动程度与道德失范的概率成正比。美国社会学家的调查认为,在家庭小汽车普及后,人们以车代步,其活动范围空前扩大,从而可以轻易脱离日常熟悉的人际圈,也可轻易免去对某种越轨行为发生后可能来自熟人的道德舆论压力的顾忌,于是,道德失范现象随之增加。^{[3] P391}在“陌生人社会”里,人员流动迁徙的频率和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际关系日趋呈现暂时性和纯事务性特征,交往双方的责任意识也因此淡薄。更由于工商社会里交易对象的非特定性,一次性交易增多,诚信度下降。“陌生人社会”的高度流动性为道德失范和越轨行为的免受制裁创造了条件,同时,这种“制裁缺席”实际上导致了越轨行为的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化,结果从反面鼓励了更多和更严重的越轨行为。

“陌生人社会”里的道德失范既表现为某些社会成员的主动越轨,也表现为大多数成员(如打工者)对某些新的道德规范(如秩序规则)的无所适从。按费孝通先生的话讲,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根据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所以,社会道德也只是在私人联系中发生的,如“五伦”之中没有一伦属于公德。^{[4] P30}由此,当我们看到刚从乡土“熟人社会”走进工商“陌生人社会”的打工者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违反公德的行为时,并不需要作“中国人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自私了”的发问,因为他们此前本来就一直是在“私人”的圈子里活动的,他们对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本来就是极为陌生的。更重要的是,道德规范并非一种可以简单传授的知识,也不可能像法规一样以一纸条文行令天下,从根本上说,道德规范是社会成员对新的社会生活形态逐渐适应的产物。在社会急速转型的过程中,在缺乏或未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新的道德规范的情景下,人们更多地只能凭惯习和直觉行为。

正因为“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行动规则和心理逻辑的差异,所以,同一社会成员在两种社会环境下的道德水准也可能大为悬殊。而对社会道德水准的测量或抽样调查,也必因范围选择(是具“熟人社会”特征的乡村与城市老社区还是具“陌生人社会”特征的闹市、工业园区与新住宅区)的差异而得出相异的结论。由此可对我们在此次问卷调查中所获的两项数据进行较合理的解释,即虽只有2.4%的人对当前“社会风气”明确表示“满意”,但依然有近七成的人并不赞成“当前人际关系冷漠,缺乏同情心,缺少互相帮助”的说法,因为对“社会风气”的评价是基于对社会整体状况(包括“陌生人社会”)的感受,而对“人际关系”的评价则更多地着眼于周边的“熟人社会”。明乎此,我们便不应以“陌生人社会”的道德状况作为当前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评价依据,否则将低估甚至忽视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从而无益于道德建设的策略选择。

结合以上“不良社会环境下的‘道德不作为’”和“‘陌生人社会’里的道德失范”两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说,所谓“道德危机”乃存在着程度不等、范围不一的区别。“程度不等”指社会成员缺乏道德实践的能力与决心,但依然具有较明确的道德意识;“范围不一”指“道德危机”更多地出现于“陌生人社会”而非“熟人社会”。而导致“程度不等”和“范围不一”的原因,皆缘于社会环境的差异。所以,对道德建设来说,我们应把着手点和着重点放在改善社会环境上,而不仅仅是思想舆论的宣传,这也是道德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深刻道理所在。

二、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

(1) 从“社会资本”角度的分析

如果说道德建设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宏观联系,那么其微观机制则落实在“社会资本”的运作上。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如各种民间社团),以及体现在这种参与过程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9] P24)} 社会资本的产生、累积与运作如何导致“去陌生化”(去除“陌生人社会”特征)?

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即不愿为集体利益而付出个人的成本,哪怕个人也可以分享到集体利益。所以,每个人都想“搭便车”,这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9] P2)} 照此逻辑,人人都倾向采取孤立的行动,共同利益无从实现。社会资本的视角事实上是对集体行动困境的突破,第一,互动产生互信,有效提高诚信程度。民间参与网络的发达导致人际互动,互动将提供有关他人可靠性的信息,增进彼此了解,促进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流动,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也增加了欺骗性交易的潜在成本。第二,互动产生互惠规范,有效约束投机行为。民间参与网络培养了参与人合作的技巧和共同分担责任的意识,增进了“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增进有效的社会合作,而不断重复的合作又鼓励着普遍互惠规范的发展。

社会资本运作的重要特征是,使用与供给成正比,如两个人之间互相展示的信任越多,他们的互相信任也就越大,若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处于不运作状态,则必然日趋萎缩,这也是社会资本运作的恶性循环。那么我们当前的社会资本究竟处于什么状况?

关系网络是中国人重要的社会资本,“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几乎达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但人际互信基本呈由家人而亲属而熟人而陌生人的差序格局,与私人小圈子关系网发达并存的是社会资本的范围狭窄,社会的整体互信水平低下。这也是中国社会资本的悖论景象。我们的问卷调查大体也支持了这一判断,在回答“当你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你会采取哪一种行动”时,40.6%的人首先想到“找亲戚、朋友、同学等社会关系,通过他们进行斡旋”,可见“关系”对个人所具的重要性非同小可。但在回答“有人说当前社会的诚信度降低,你认为是这样吗”时,只有28.8%的人认为当前社会的诚信度没有降低。另外,据美国、香港、内地三地学者对上海、天津、武汉和深圳所作的调查显示,平均只有30%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其中深圳的该项比例最低,仅为16.8%。由此可见社会整体的互信水平的低下。

互信水平的低下反映了社会资本整体存量不足,而社会资本整体存量不足,既与乡村社区呈“差序格局”特征的传统社会结构有关,也与1949年以来主要在城市以垂直型的“单位”体制重构社会有关。单位之间相对独立和封闭,但单位的资源配置却绝对依附于其上级,而单位里的人则更是依附于单位本身,一旦失去单位,几乎无法生存。这是一种“庇护-附庸”型的垂直纵向社会结构,而“垂直网络无论多么密集,也无法维系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因为信息的垂直流动不如水平流动可靠,更重要的是,确保互惠规范的惩罚手段,不可能向上实施,即使实施,也不可能被接受”。^{[7] P204)} 这样的社会结构孕育出来的文化是不信任的文化。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的使用与供给是成正比的,即社会资本(信任和互惠规范)在社会运作过程中被发挥作用的机会越少,其总存量也会日趋减少。这也是制度经济学North所说的“制度模式具有自我增强性”(即使它没有社会效率)和“路径依赖”。不同的“路径依赖”导致完全不同的两种结局:社会资本运作的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在良性循环中,社会资本如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网络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累积性,从而形成更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和参与。相反,在恶性循环里,背叛、猜疑、逃避、利用和混乱在相互强化着”,^{[1] P208)} 在此不良的社会环境里,每个人虽都不甘情愿地处身其中,但每个人又都以理性的方式对不良社会环境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反应,而正是每个人的理性行为,共同加深了社会的病变。反观我们当前社会的现状,腐败和欺诈之风似乎难以一时遏止,我们是不是已相当程度地被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为了社会主义“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我们

必须“另辟蹊径”(而非“路径依赖”),打破“恶性循环”,重点建构以互信、互惠与合作的横向联系(而非庇护-附庸式的纵向联系)为联结纽带的共同体。

(2) 缔造以横向联系为特征的“熟人社会”

我们传统的“熟人社会”要么呈以亲情为基点的圈层结构或差序格局(如乡村社区),要么呈庇护-附庸式的纵向结构(如城市里的“单位社会”),生活在这两种不同结构模式的“熟人社会”里的人,其道德失范的可能性自然远低于“陌生人社会”,但随着社会的急速转型和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一方面是农村出现“无主体熟人社会”,^{[8] P292-294)}另一方面是城市中的陌生化程度越来越高和陌生化社会范围越来越广,在此,我们不可能再以复制传统社会结构的方式来缔造“熟人社会”。从促进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和和谐社会建构的角度看,我们必须缔造以横向联系为特征的新型的“熟人社会”——社会成员横向间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互惠、互信与合作。

问卷调查显示,我们的基层社会与这一目标之间的距离还很远。大约只有两成人认为自己算是经常参加所居住社区的活动,约七成人从未参加社区活动,而约一成人更是不知道社区活动为何物,另有一项耐人寻味的数据是,20.5%的人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社区是否有公共图书阅览室,这表明社区与居民之间的疏离程度。社区成员的互动与公共事务的开展当然大都利用业余时间,但调查显示,83.7%的人是选择在家里看电视来打发业余时间,此可说明社会成员“原子化”的程度。在请答卷人就我们列出的八个项目(生活环境、收入水平、娱乐活动、职业、工作稳定性、家庭生活、健康情况、与同事关系)进行“满意度”比较时,“娱乐活动”与“收入水平”的满意度并列倒数第一,只有20.7%的人对之感到满意;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与同事关系”这一项,竟高居“满意度”榜首,72%的人对“与同事关系”感到满意,“家庭生活”的“满意度”虽位居第二,但首选“家庭生活”者的比例远低于首选“与同事关系”者,仅为58.8%,此说明在业余生活孤单无聊的情况下,人们把兴趣放在与同事的交往上。另一组相关的数据是,在回答“你是否经常和你周围的人讨论社区中发生的事情”时,26.6%的人选择“家人”,25.6%的人选择“同事”,本来,讨论社区事务的最合适对象乃是邻居,但选择“邻居”的,却只有9.7%。

以上数据共同表明,在社区生活中,具有横向联系的“熟人社会”的空间还是非常狭窄的,社会成员互动和横向联系的途径极其缺乏,所以,人们只好无奈地退缩家中,或就近就便选择工作单位的同事作为交往对象。这可视为对垂直纵向社会结构惯性的一种沿袭,一种“路径依赖”。

从亲缘维系的家庭家族、从业缘维系的单位公司里走出来,参与到具有地缘特征的社区公共事务中,与他人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和互动网络,在合作互惠中产生范围更广的社会信任——社会资本,这是今天重建新型“熟人社会”的重要目标。解决社会资本匮乏的办法是放手给予相应的政策,让民间社会自己发展出一套机制来激发社会资本的成长。

根据广东城乡(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人口多的特点,我们可以先依托于现有的基层组织(如城市居委会、乡村村委会),引入志愿者机制,招募热心的志愿者(不分本地人和外来人,但必须绝对无薪,有多少人算多少人),在以下方面对社区居民(尤其应包括外来的临时人口)进行无偿的义务服务(只有无偿性,才能突显公益性,才能增强互动互信):第一,房屋租赁的相关服务,帮助寻找房源,介绍房客房东的义务和权利,协调租赁纠纷;第二,社区居民相关技能服务,帮助贫困家庭和外来户中的家长或孩子学习计算机基本操作技术,帮助外来者学习粤语,介绍新住地的风土人情习俗惯例,让外来者尽快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第三,社区经济发展,为新兴小企业、小商铺提供技术支持,如市场营销、合同知识、会计知识和如何申请贷款等实务介绍;第四,社区居民互惠活动,为有技能专长和特长的社区居民建立技能登记卡,凡社区居民需要某一方面的技能服务,都可以派人上门服务,同时也可实现互惠式服务;第五,社区文化活动,逢法定节假日及中国传统节日,邀请外来者参加表演,展示各地不同特色的文化风情;第六,民间参与社区规划和建筑设计活动,在决定一块土地应该为了哪一种公

共利益而拨出、又应该如何规划和使用的的问题上，政府尽可能避免以行政效率为理由而完全由自己拍板，事实上，社区的发展因为有居民参与规划，不仅使社区成为一个可居住可工作可休闲的亲近民生的空间，而且并无损害经济的发展。

社会学家给“社区感”下的定义是：“集体关于资源价值的社会性共识”。^{[9] P30}社区参与的发达网络、社区成员间的互惠互信，这才是弥足珍贵的社区资源价值，而只有在成员间广泛频繁的互动中，才可能达成对这一资源价值的社会性共识，才可能有引以为豪的、视为居住归属的“社区感”。这样，社会资本的累积、横向联系的“熟人社会”的出现以及社区居民道德水平的提升，才能找到一块坚实的基础，并真正生根、开花和结果。

(3) 推动民间社会的培育与发展，扩大NGO的生存空间

NGO是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英文简写，根据联合国的定义，NGO应该是一个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征的正式组织。^[9]如果说缔造横向联系的“熟人社会”主要侧重于社区地缘因素的话，那么NGO所开展的活动则不受社区地缘因素的限制，其目的不单是缔造横向联系的“熟人社会”，更包括对重视个体权利、参与和宽容精神的“公民社会”的培育，“提倡以人为本，却又期望公民从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中，学习自我制约”。

在我们经济繁荣的背后，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贫富分化，无助的劳工，失学的儿童，社会保障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面对这些单靠政府的力量可能一时无法救济到位的社会问题，不少欲施以援手的民间热心人士却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在咀嚼着孤立时的“无力感”——不知道自己能从何处着手，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这种“无力感”与当前NGO的缺乏相关，我们的问卷调查透露了与此相关的信息。在回答“你如果捐钱做善事，将把钱捐给哪里”时，5.9%的人回答“我不知道到哪里捐钱”，63.4%的人选择“直接捐给需要帮助的人”，此表明NGO的缺乏，也表明人们对已有民政救济部门及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没有足够的信任。可以说，NGO的缺乏以及社会信任水平的低下，已成为公民适时适当地向他人表达关爱和社会参与的制约瓶颈，甚至也是构成我们努力打破不良社会环境恶性循环的障碍性因素。

改革开放前，我国大一统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以及高度公有制和“泛行政化”倾向，使得民间资源萎缩，形成了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态势。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民间资源开始增长，除了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外，民间组织资源也开始发育，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对三个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在制度上存在民间社团成长的障碍，因而真正的所谓“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还远未形成。

计划经济时代结束以后，我们的政府就逐渐从全能政府变成了有限责任政府，“小政府大社会”已成社会共识。中国之大和社会转型之迅猛，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包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从国际社会经验和中国少量NGO的运作情况看，NGO凭借其对民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灵活高效的社区工作经验和技巧，以及在政府公务员中罕见的志愿精神和工作热情，在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中开展了许许多多直接、有效、切实的社会救济活动。但是，由于思想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非政府组织”就是与政府作对的反政府、无政府组织。这种观念的障碍，导致NGO在中国的诞生困难重重。大多数NGO因为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为合法社团，从而也只能在地下做着充满阳光的爱心事业。这不仅使NGO无法扩展其公民参与网络，同时也因“地下”性质而无法以向社会公布的方式使其收支帐目充分透明化，其结果是来之不易的社会信任受到损害，人们的参与热心受到抑制，甚至怀疑自己的爱心受到玷污，而最大的受害者还是社会自身——一个亟待打破恶性循环、累积社会资本、提升道德水准的转型期中国。

值得欣慰的是，2004年12月10日，全国先进民间组织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540个民间组织获表彰，这应该是政府发出鼓励民间组织发展的信号，也是对公民社会壮大的的一种肯定。我们希

望NGO的发展,将成为培育社会信任、促进公众参与和道德行为能力、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第一,要切实落实宪法中“结社自由”的精神,修改和完善相关条例。既存的社团条例中,除了要依法向社团管理机构登记注册外,还要求社团组建的申请者找到一家行政部门作行政主管。这一条规定毫无道理。1998年10月国务院对原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并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但是,国家对NGO采取了过于严厉的政策,其核心是对NGO采取双重管理体制,即NGO需要有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两个政府部门进行双重管理。而事实上,完全由民间人士成立的NGO是很难找到业务主管部门的,主要因为很少有政府部门愿为其承担责任和风险,因而往往因为找不到主管部门而使NGO流产。我们应当降低门槛,就像组建企业一样,只要具备简单的条件,就可以注册成立。关键在于依法活动,只要管住社团的行为,就不会出现混乱局面。

第二,政府要为弱势群体和公益社团提供必要的组织成本。一个充分组织起来的社会,其治理成本会很低。社会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在多方博弈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直接的原因是缺乏组织成本。从实现公平的角度讲,公共财政应向弱势群体作适当倾斜,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对诸如农民协会、残疾人团体、妇女组织、失业者同盟等等,政府都应采取资助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还应作出预算安排,支持公益性社团的为民服务活动。例如志愿者组织、社区服务组织、义务性心理辅导活动、环保组织、动物及资源保护组织、扶贫助困活动、基层调解组织等等,都应依据其活动计划和实际需要,作出资助安排。实践表明,由民间机构去做这些公益性事情,成本相对较低,效果也比较好,而且会减轻政府的负担和压力。

第三,充分发挥宗教组织的积极作用,使其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现代社会的政教分离格局,使得宗教团体干扰政局的能力下降,却在心灵净化、心理调适、扶贫助困、规范行为、提高社会组织制度等方面,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权衡利弊,宗教组织对约束人们的行为、稳定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减少对之的限制和设置障碍。问题在于,中国传统上宗教活动基础不牢,本土教派如儒教、道教日渐式微,信众弱且寡。虽然外来宗教如佛教曾鼎盛一时,但如今亦缺乏继者,并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相反,邪教组织却迎合了部分人的兴趣,此消彼长,折腾不断。应当依法打击破坏公共秩序的非法邪教活动,保护正当、合法的宗教活动。并且对宗教组织发动的慈善活动,给予税收上的优惠。例如,美国对于捐赠给教会救助机构的纳税人,给予捐赠额折抵应纳税额的待遇。

第四,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变一个积极性为两个积极性。我国的政府管了太多“管不了又管不好”的事(邓小平语),常常是疲于奔命却得到不少抱怨,而且使社会普遍形成一定程度的依赖思想。这种被动局面一定要扭转。过去一段时间虽然讲过“小政府、大社会”,但包揽一切的模式和“父母官”思维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政府的权力过大,民间的空间偏窄。正因为如此,反复多次的机构精减都未见实效,从基层乡镇政府到县、市、省乃至中央部门,大都喊人手不足,临时性机构层出不穷,向下借调人事的事已见惯不怪。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连共青团、妇联、工会、残联、侨联、科协、社联这样的群众团体都纳入体制内,连民主党派都由公共财政支持,那还有什么事不用政府管呢?

因此,必须减少政府的职能,将社会群众性组织还于社会,真正成为民间机构,并且将对它们,包括对各政党的财政全额拨款改为申请资助方式,每年依据其活动内容、资助理由提出申请,由人代会批准。将纯粹属于服务性的政府机构剥离出来,变为中介组织;将监管市场、规范经济业务活动的职能部分地转向行业公会,增强社会组织的自律能力。

(4) 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

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作了宽泛的解释: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社会的博弈规则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虽然道德规范属于非正式制度,而且,我们对违反道德规范的人的惩罚也不能动用正式制度(如法律),但是,正式制度却可以影响非正式制度的惯性,缓解甚至部分地改变“路径依赖”,这也是“(正式)制度绩效”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可以把正式制度的改进与创新视

为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之一。

正式制度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比如偷窃（其数量尚不足定罪的小偷小摸）。在所有者不具体或太抽象，产权制度不明确或太笼统的情况下，不少人都有“偷公不算偷”（被称为“拿”）的心理，因为在“公”的东西中似乎也有自己的一份，因为偷了公物，也并未明显地对周边的熟人构成直接的伤害。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基层社会偷窃公产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的。反观今日，所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和暴利的行为，几乎都发生在“公”的领域——或是对公权缺乏严格制约的某些行政部门，或是至今仍属国有垄断经营的某些行业（如教育、医院、通信、电力），而其行为与偷窃公物在性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反对行业不正之风，必须落实到反垄断经营及清晰产权制度上。当一些人以“市场化—私有化”过程中自利行为的普遍化作为当前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证据时，事实上却忽略了其所具有的另一正面功能，即有效缩小了“偷公”行为的发生范围，这又何尝不是社会道德水平得以提升的保障！

又如职业道德的滑坡问题。客观地说，提升职业道德水平，绝对不能仅靠道德教化，而必须将之落实于正式制度的调整上，它包括：第一，对职业活动本身的制度约束，如职业活动者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职业报酬的社会收益定价制度，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行业约束和社会约束，以及明确界定“非道德”和“渎职违法行为”的界限，并对后者予以违法惩戒。如果违反职业道德者的获利甚于遵守职业道德者，那么，职业道德只会无可挽回地滑坡，即经济学所谓的“劣币驱除良币”。^[10] 第二，对职业活动环境的制度调整，如乡村教师无心教学，这既表明职业道德的缺乏，也反映资源配置的制度缺陷，如果扩大教育投入，并从制度上考虑劳动要素的“报酬”与其“边际收益”大体相符，那么，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将伴随教师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

我们强调正式制度的改善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以道德（非正式制度）建设代替正式制度的建设，相反，我们应该警惕现代法治社会下的“泛道德主义”，警惕将由于现代法制的不严明而造成的社会无序视为当前道德失范的证据。在现代法治社会，道德与法制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应划界，从总的趋势看，法制管辖的社会生活领域应越来越广，道德约束的领域则日趋缩小。强调道德的规范功能，须以现代法制的健全严明为前提，否则，对道德建设的过度突显，反而无益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也从另一角度显明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包括健全的现代法制）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深刻含义。

[参考文献]

- [1] 张曙光. “自私与自利”. 道德中国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2] Scott, J.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3] 吴重庆. “道德重建如何可能”. 道德中国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5] 林南. 社会资本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6] Mancur Olson. 集体行动的逻辑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 [7] 罗伯特D·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8] 吴重庆. “乡土儒学资源的再生”. 2004年中国最佳讲座 [M]. 武昌: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 [9] 朱健刚. “草根NGO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J]. 开放时代, 2004, (6).
- [10] 王跃生. “关于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观点”. 道德中国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雨 童

城中村“景观”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 蓝宇蕴 郭志坚

[摘要] 城中村“景观”问题是具有共识性的“问题”性现象,且普遍存在于我国大中城市中。该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不仅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社会结构中的某些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如缺乏“内植”的规划先行发展观,城市规划实施效果“软化”,农民对城市化利益的个别争取是诱发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力求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超越物质“景观”层面的关注,并在基层依托基础上强化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 城中村“景观”问题 城中村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C91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83-05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作为我国城市化“特产”的城中村,无论是其形成原由、存在方式,还是其所发挥的功能,都是难以一言蔽之的复杂问题。但城中村社区“景观”问题则是有着共识的“问题”性现象。目前,城市化中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背景是,在许多新城市发展区域,大量景观层次上的城中村雏形正在加速度地形成,甚至成为难以抑制的“潮流”,并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基层政府“没有办法控制”的、“最头痛的问题”。^①预防城中村“景观”问题,对节约政府城市化成本,实现多方利益共赢,最终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中村“景观”问题及其消极影响

所谓城中村“景观”问题,笔者在这里界定为,城市规划或者建成区内,以农村传统自然村落为雏形、以农民宅基地为基础形成的社区性住宅群落,由于依托传统农村住宅格局建筑而成,与周边标准城市建筑形成鲜明反差,成为城市环境比照下的不和谐空间结构状态和景观性“问题”。城中村广为人知的“握手楼”、“接吻楼”、“一线天”、“不现天”的社区性视景,就是这种景观状态和问题的典型表现。我国许多大中城市中,这种以社区性方式存在的“景观”问题普遍存在。

与城中村“景观”问题相关的消极性影响是多层面的,主要有:第一,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社区的空间结构状态,致使土地利用粗放,往往无法实现土地应有的效益。城中村一般地理位置优越,占据着城市级差地租最高的区域,但因空间布局的制约,社区内聚集了大量低价值物业,这些物业的经济产出远低于同地带集约型物业,使得土地潜在价值无法实现。^{[1] P83}第二,从人居生活质量看,由于城中村建筑密度高,且布局凌乱无序,许多房屋采光通风条件差,卫生消防和治安隐患大,环境问题相当突出,该状态下的人居生活,无法保证基本生存和生活质量,更无从实现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第三,从长远看,这种“景观”问题的改造是城市发展中绕不开的一个“结”,但改造涉及的经济社会成本异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建设和谐广州的相关制度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为蔡禾教授主持的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研究”(批准号:05&ZD03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蓝宇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郭志坚,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广东 广州,510275)。

①此为笔者2005年11月5日与广州某中心镇副镇长的谈话记录。

常高昂。以广州石牌村为例，社区内共有各类房产，合计建筑面积近90万平方米，如果全部进行拆迁改造，即使按照村民勉强可以接受的每平方米2500元的补偿价格，算下来也至少需要22亿多的资金。以此测算，如果要进行广州市建成区内45个城中村的全面改造，则大约需要投入近1000亿元的资金，相当于2005年广州全市财税收入的一半。而且，这还没有把改造中的相关配套开支统计进去。如此代价，显然成为政府及各方无法承受之重。

城中村“景观”问题的负面效果，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而且是社会层面的，不仅是短时期的，而且还是长时期的。从先行发达国家的情形看，城市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城市化的初中期，也曾出现了大量具有严重“景观”问题的城市贫民区，并且这些国家也普遍对较早期因自发形成的、具有严重“景观”问题的社区进行过改造。整个过程花费了漫长的时间成本和巨额经济成本，以及诸多无形的社会成本。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城中村“景观”问题不能任其积累。

二、城中村“景观”问题的主要原因透析

城中村“景观”问题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如果放置在更大城市化背景下，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外在景观结构，不过是一个放大的城中村。如果再把视角置于更宏大城市化背景下，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全国城市化的“景观”格局就宛如一个“超级”城中村，具有城中村“景观”问题的某些共同特点。这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中的某些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是诱发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

（一）社会普遍缺乏“内植”的规划先行的现代发展观，这是城中村“景观”问题生成的深层根源

如果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城中村空间“景观”问题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城市空间扩张，村民聚落在物质空间上进入了城市规划范围，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因素，仍然实行的还是农村管理体制，而乡村社区又基本上没有纳入城市规划管理的范围，形成了自发演化的负外部性效应，城中村物质景观问题因此而生。但就理论意义上看，城中村“景观”问题，其实就是传统乡村建筑和物理空间扩展模式自然演化的结果，这种演化方式的突出特点是，自生自发性，以及缺乏足够反思性的理性“嵌入”。这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必然性。

与过去漫长的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反思性，即在理性思维的周密筹划与决策下的发展，而且，这种筹划与决策越“科学”和“合理”，发展的失误或者因失误导致的“成本”往往越小。从自发的发展演化到具有理性参与的、反思性的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事。从根本上说，现代诸多发展规划就是反思性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而现代城市规划也是因此而生、并发挥作用的。城市规划历史从英国颁布城市规划法案算起，到现在不过百年历史。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早期工业城市就是在具有很强自发性基础上形成的，并出现了许多类似我国城中村“景观”特点的城市贫民区。到19世纪末，这些区域还因为建设混乱、居住和生活条件差而受诟病。后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积极干预。1909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住宅和城市规划法，开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城市“景观”问题的先河。反思性、或者说是反身式的发展思路，恰恰成为消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达成问题解决的条件。反思性的发展，既是当今社会发展的特点，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西方尝试反思性的城市发展方式至今，在实践基础上已形成了相当成熟的规划理论体系，而理性规划理论，就是到目前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理论。理性规划理论，简言之就是用反思性的、理性主义的视野和方法去认识和规划城市发展的理论。它所强调的连续性决策，强调规划中一系列环节，包括调查、编制、审查与批准过程的相关技术方法的运用，这些技术层面的精确求解，可以克服自发发展中凭经验行事的自发性特点，减少规划中的主观随意性。^[3]

我国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社会发展、城市化的理念在众多层面上往往还滞留于传统自发发展观的视野中，城市规划的滞后和被动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城市规划体现出的反思性和对城市发展的调控，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但是，大凡论及城中村的建筑景观问题，

笔者调查所到的相关部门，几乎都会异口同声地表示，“政府的规划太滞后了”。缺乏深入的、规划先行的反思性发展理念，这既是城中村“景观”问题形成的一个深度制约，也是我国社会发展规划面临的问题，而实现发展规划的根本转型，就成为化解城中村“景观”问题的重要步骤。

（二）政府城市规划实施的效果“软化”，这是城中村“景观”问题生成的实践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已经逐步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逐步回归到城市规划应有的本位角色中来。到现在，一些城市空间的规划，即使文本意义上堪称完美，但在规划落实的实质性环节上常常遇挫，致使城市规划的实际功能难以发挥，规划实施效果“软化”。突出表现在，执行规划的公共权力往往在单纯经济利益，或者短期利益、个别利益面前缺乏足够威力，导致城市规划停留在“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尴尬境地。

与社会转型期的实践背景相关，诸多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机制均没有理顺，或者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城市空间这一稀缺资源的争夺，具有难以避免的非程序性。在GDP强势逻辑的支配下，不论是政府或者开发商，常常都难以自拔地陷入急功近利的“泥沼”，出于眼前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大凡涉及村落所在的地方，一般都是“绕道”而行的。这种政府或者开发商角度的、暂时的低城市化成本导向，实际上恰恰就给城中村“景观”问题的生成创造了“空间”。

由于仍然受到计划体制惯性力的作用，我国现行城市规划的制订，社会化程度低，基本上是政府在一手“包办”，但政府本身常常错位的“经济人”角色，致使现实的规划常常与社会强势群体的利益相关，甚至成为资本与眼前经济利益的“奴隶”，理性规划中所强调的合理性与公共利益因此淡化。而由于我国众多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因此，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积累社会矛盾。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拥有城市规划及其执行的权力，如何让这种权力真正带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政府城市规划实施中必须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预防城中村“景观”现象必须关注的问题。

（三）城市化农民对城市化利益的个别争取，这是城中村“景观”问题生成的直接原因

当村落居住区域被“绕道而行”的城市包围以后，村庄社区本身不可能“绕道而去”，肯定主动与被动都兼而有之，它肯定要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城市经济社会体系中，参与到城市的市场竞争中。从城中村角度看，城中村“景观”问题，其实又可以理解为，它是城市化农民在传统农村住宅格局的基础上，自发争取城市化利益的结果。^{[3] P350}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形成了对廉租屋的巨大需求。但如果这一需求依赖于市场化运作的房地产公司，则往往由于诸多局限而难以见效，因为一般说来，廉租屋是一种微利或者无利产品，绝大多数房产商都不愿介入。也因此，在许多发达国家，廉租屋供应主要依赖政府操纵和解决。而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政府财力及能力的局限，往往难以及时进入这一领域。因此，该领域的需求和供给出现巨大脱节，恰好为村民利用宅基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创造了机会。

一般而言，城市住宅价格主要有土地价格、房屋开发商的利润、销售商赢利、房屋本身的造价，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土地价格。因此，房屋供给如果依赖房地产商，其成本高昂。相比之下，城中村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屋建设，除建筑房屋本身的造价和需缴纳少量手续费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其他成本，特别是节省了非常高贵的地价、房屋开发公司和销售公司的利润等。宅基地房屋的低成本，决定了村民可在有利可图条件下，向城市推出大量廉租屋，以满足旺盛的求租需要。而廉租屋尽可能大面积的兴建，无疑强化了城中村“景观”问题。

在这一脉络中，可以这样说，城中村“景观”问题是与农民在市场需求强烈刺激下，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城市化利益的动机及结果相关。这同时也表明，不能简单地把城中村建筑“景观”看成是一堆“建筑垃圾”，而应该看到，它是城市化农民利益的凝聚。城中村“景观”问题，或者是城中村改造，必

须充分关注到这一点，并在改造举措中体现这一点，这才是预防与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关键。

三、城中村“景观”问题的应对思路

已形成的城中村“景观”问题积重难返，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问题。那么，如何在实践中预防和超越，这不仅是理论上需要关注的，更是制度及对策设计中必须求解的迫切问题。结合目前的城市化实践，笔者在此拟提几条应对性思路。

（一）力求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为预防城中村“景观”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现有城市规划理论，基本上都是舶来于西方，而在西方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东西，固然有借鉴和启发意义，但难以避免地有隔靴抓痒之嫌。西方城市化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而我国的城市化过程则具有高度时间“压缩性”，留给村庄进行自身城市化的适应，包括建筑景观上的城市化适应的时间非常有限。此外，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预设前提是土地私有制，这与我国乡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事实相去甚远。因此，如何寻求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为预防城中村“景观”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就不可或缺。

西方城市化时期曾经出现的无序景观问题，被认为与土地私有制背景相关，与土地非农化中过于分散的转化形式相关。我国的城中村“景观”问题，又恰好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背景相联系，与不完全所有权的宅基地制度相关。城市环境下，土地是稀缺资源，能够产生稳定收益，而我国农村宅基地的制度规定，其实是让农民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按自己的方式实现宅基地利益的权利，城中村“景观”问题与这种权利利用有关，且一些城中村改造失败的教训也表明，城中村不能交易的土地产权制度是重要约束。总之，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制度，成为城中村聚落形态形成、维系的重要因素。如何利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资源，预防与治理城中村“景观”问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此外，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注重空间形态的设计，对规划的系统性，特别是规划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研究缺乏足够关注。实际上，城市空间既是物理的空间，又是高密度社会载体，城市空间规划虽然立足于建筑学，但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内容。也因此，在新城市空间的建设和发展中，应该特别重视社会规划的内容。^[4]社会规划具有丰富内涵和实践形式，主要包括，公共服务规划，社会目标优先权以及公众参与，核心是，强调综合性规划，关注非经济因素和社会平等目标，同时鼓励公众参与规划和发展进程，藉此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建立在更综合的、城市发展系统研究基础上的城市规划理论，更有实践指导价值。那么，如何实现我国空间规划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既是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消解城中村“景观”问题需要求解的理论问题。

（二）超越物质“景观”层面的关注，城中村“景观”问题的化解需要更广阔的实践视野

城中村表面的物质景观问题，显然与廉租屋的规模性供给相关，而规模化的廉租屋实际上又直接涉及两大利益群体，一是城中村原住民群体，一是聚居在城中村廉租屋的流动人口群体。前者在告别农业生产，进入城市生活以后，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宅基地上的出租屋租金，这种非农化经济生存方式的转变，决定了城中村廉租屋对非农化群体的重要性。这些廉租屋又同时地关联到另一个庞大社会群体，即城中村租屋而居的流动人口群体。在政府仍然还没有推出针对流动人口居住的廉租屋条件下，如果再没有宅基地上低成本廉租屋的及时供给，流动人口的居住就会成为严峻社会问题。这一意义上，与城中村现有居住格局相联系的廉租屋，同时地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对土著居民群体而言，解决了他们进入城市生活以后的基本生存保障问题；二是对流动人口群体而言，解决了他们进入城市后的居住问题。也因此，预防和解决城中村“景观”问题，必须跳出这一问题寻找解决途径，必须把城市化农民的生存发展以及流动人口居住寻求的满足纳入考虑范畴。关于此，待后还会论及。

村庄城市化，不单纯是物质“景观”形态的转变，同时还是经济、社会、文化等整体性的转变过程。现代规划理论强调的综合规划理念就认为，规划要纳入多元化因素，包容更广泛社会文化价值。如，就文化而言，文化具有强化社会凝聚、维系社会形态与社会规则、激发社会发展潜力的作用。因此，规划

新城市空间发展时,不能忽视文化因素。而村落建设或者改造,如果外在景观上完全推倒重来,这种建设和改造方式,就不利于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传承。总之,不宜整齐划一地按一般城市标准建设或者改造已纳入城市建设区的村落社区,要按照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空间形态特点,进行规划和建设。

(三) 在具有基层依托基础上强化政府城市规划的可操作性

在政府规划实施效果“软化”的现实条件下,如果寄希望强化政府公共权力的权威性来强化城市规划实施的权威性,以此预防和改变城中村“景观”问题,恐怕是个“长时耗”过程,为此而增加的未来改造成本将难以估量。因此,眼前更迫切的问题是,在城市规划公共权力运作上,如何寻找更具操作意义的权宜性策略,同样成为预防和消解城中村“景观”问题必须的思虑。笔者认为,对村庄社区本身资源的借助,在城中村“景观”问题的消解中暂时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一般而言,能够或者有望成为城中村的地域,几乎都处于城市扩展的前沿地带,是空间形态、经济方式、社会管理制度完全不同的城与乡的过渡性地带,实际的运作中具有城乡混合性社区特点,既有乡村社区组织的实体及其管理形式,又部分地具有城市空间状态和生活方式的特征,显示出模糊和折中特征,从趋势上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自身消解过程,整体上又显示出城乡二元结构的自我消解和脱乡入城过程。^[3]这些城乡相融性特点和变迁倾向,事实上已为贯彻城市规划,把村落纳入城市发展空间,并与城市整体规划结合起来提供了社区性基础。即,这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特别是居民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已经为城市规划落到实处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村社区组织是经长期历史形成的、并具有良好的村民基础的组织。它在社区公共事务中,拥有广泛认可的合法性权威和诸多其他有利资源。如熟悉“地方性知识”,以及有强大社区经济资源的借助,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能力强,对这种社区组织,只要政府有合理的导向,在社区建设事务上,依靠它们自身,完全能够发挥政府难以企及的功能。

如果从现实激励的角度看,预先的城市廉租屋定位和社区建设,这在利用村庄自主性力量预防和化解问题中,是一条很值得考虑的办法和思路。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应建立在维护各方城市化利益的基础之上。而现代城市的发展,必然存在巨大流动人口群体,这些人因收入普遍比较低下之故,对经济消费、医疗教育、卫生治安水平等公共服务都有相似且比较低的需求,同时,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发展,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因而,更热衷于聚居的居住方式。在这些需求存在的条件下,再考虑到村民宅基地的制度特点,有意把一些村庄预先定位为中低收入流动人口和廉租屋聚居区,这可让村庄和城市化农民在有长远租金回报预期的同时,有动力和积极性去利用自我力量进行社区的长远规划和建设。而对政府而言,规模化廉租屋聚居区的存在,也可相对提升政府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一定意义上减轻政府城市治理的成本。当然,要警惕的是,城市空间结构的过分社会分化,可能会诱发其他社会问题,^[4]因此,开放性社会空间设计的同时兼顾,也要预先给予考虑。

在当下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推进中,本研究不仅希望对几乎失控的城中村“景观”问题的预防和治理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就我国仍然是粗放型城市化的背景而言,希望还具有更普适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 [1] 李俊夫.城中村的改造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 [2] 赵万明,王纪武.中国城市规划学科重点发展领域的若干思考 [J].城市规划学刊,2005,(5).
- [3] 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 [M].北京:三联书店,2005.
- [4] 刘佳燕.国外新城规划中的社会规划研究初探 [J].国外城市规划,2005,(3).
- [5] 刘晖,梁励勤.珠江三角洲城市边缘聚落的城市化 [J].城市问题,2005,(2).
- [6] 杨上广.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J].城市规划学刊,2005,(5).

责任编辑:雨 童

•历史学•

以广东人为主体的晚清中国驻美公使

◎ 梁碧莹

[摘要] 1875年底,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1878年,中国驻美使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设立,这是中美外交史上新的一页。晚清中国驻美公使是一支具有特色且具国际眼光的重要群体,他们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侨胞利益,是近代中国外交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关键词] 驻美公使 护侨 晚清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6)05-0088-06

从1875年12月清政府任命驻美公使到1911年清帝逊位,晚清驻美公使实际赴职者有8人,他们是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桓、崔国因、杨儒、伍廷芳、梁诚、张荫棠。晚清中国驻美公使这一群体走向美国,在中美侨务交涉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活动见证了近代中国艰难的外交。

一、来自广东的驻美公使

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群体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除了崔国因是安徽太平人、杨儒是辽宁铁岭人^{[1] P407}外,其余都是广东人。晚清中国驻美公使以广东人为主体的特点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华工问题的突起是中国把美国作为第一批遣使国家的主要因素。居住在美国西部、秘鲁和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华人,经常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早在中国驻外使节制度建立前,海外华人已向清政府大声疾呼,希望清政府把保护海外华人作为中国的外交决策。而长期以来,清政府一直采取禁海政策阻止华民出洋谋生。直到1858年清政府才明令准许华人自由出洋及定居海外。1860年中英《续增条约》第5款,又明文规定华人可移居海外。^{[2] P118}但是,清政府对华人移民及对海外侨民依然持消极的看法:“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3] P11}直至19世纪中叶华侨问题的突出,使清政府不能不改变对移民漠视的态度,进而采取了保护华侨的措施。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早期旅美华工99%是广东人。^[4] 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淘金热把中国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的中国人卷了进去,大批华人走向新大陆,他们在异地开拓奋斗,在开发美国西部和修筑横贯美国大铁路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排斥的土壤中,以惊人的忍耐和毅力,在绝境中奋争,终于成为美国无法忽视的少数民族的一支。华人和美国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了今日高度发达的美国经济,赢得了美国人民的赞誉。到19世纪70年代,旅美广东籍华人已达十多万人之多。据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记载,1879年旅美华人广东同乡会包括六大会馆:三邑会馆、阳合会馆、冈州会馆、宁阳会馆、合和会馆、人和会馆,共拥有人数约18万多人。^{[5] PP57-77}海外侨胞虽然远离家乡,但依然与祖国血肉相连,休戚相关。当时华侨的家属多数在广东省各地,因此,保护华侨不仅是驻外使节的重要职责,而且也是广东地方当局的重要政务之一。曾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认为,南洋及美国的华侨,他们之中有几十万人的家眷在广东各地,地方官对侨眷,应优予相待,绝不许讹诈他们;而对侨居海外的华侨,中央政府应派员出国,充任领事,专门管理华侨事务,保护他们的利益。

但是,华工旅美史是一部血泪交织的沧桑史。在种族歧视的驱使下,美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排华恶浪,从西部推到全国,从地方推到首都。美国实行的一整套排斥华人的制度,给华人在美国的发展造

作者简介 梁碧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275)。

成极大的障碍。据统计, 1855- 1876年的20年间, 杀害案件达262件。^[9 P5]然而, 美国政府处理排华事件, 完全以国内法为准绳, 将条约置之不顾。如: 地方政府对于排华暴行既不预防, 事发后也不设法平息, 让犯人从容逃走; 或对被捕者审讯时敷衍了事, 宽为开释。联邦政府对中国的抗议、惩凶、赔偿要求, 则以其分权政治, 联邦无权干预司法, 对地方政府也有一定权限为理由, 多方规避。在排华的关键时刻, 华人及其商会组织不断向祖国求救。与此同时, 秘鲁、古巴华人问题也沸腾起来。可见, 华人在海外屡经挫折和惨遭迫害, 构成了中国政府决心派遣驻外公使的重要原因。在选择驻美公使时, 广东吴川人陈兰彬是朝廷的首选, 因为这时的陈兰彬已有3年多在美的工作阅历。1872年, 陈以留学生监督的身份率领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前往美国, 1874年又受清政府的派遣赴西班牙的属地古巴调查当地华人情况, 1875年回国协助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议办华工章程。李鸿章也大力推荐陈兰彬, 说他“识力诚毅, 廉正可靠。驻洋三年筹办要务, 均极精详。”又说:“该员虽年已六旬, 当可勉力一行。”^[7 P13]1875年12月11日, 清政府正式任命“垂垂老矣”的陈兰彬为中国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的首任公使。广东香山人, 曾任第一批留美学生副监督的容闳为副使。

广东又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 在早期中外关系史上具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1757年, 清政府指定广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 粤海关是中国唯一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在洋人汇聚的广东, 人们见闻广远, 他们既热爱祖国, 又有国际思想, 对外来文化既不开拒也不盲目崇拜, 中外文化兼容并包, 取长补短, 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岭南文化。岭南文化铸就了一批懂洋文、识洋务的人才, 也铸就了一批放眼世界的先进人物。大批华人从这里出发到南洋和美洲打工, 大批商人也从这里出发浮游海外经商, 学生从这里出发到海外留学, 士大夫从这里开眼看世界, 探视外洋的奥秘。在这样的环境下, 当清政府考虑遣派驻外使者时, 必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广东沿海地区。曾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指出, 中国自海禁大开以来, 江浙、福建、广东沿海各地士商出外者, 实不乏人, 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 只要各地督抚大臣精心挑选, 必能找到精干的外事人才。

晚清大部分的驻美公使正是在上述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 他们中有些在出使前已出国接受过西方教育。如广东新会人伍廷芳幼时在香港求学, 入读圣保罗书院, 开始接受系统的西方近代文明教育。青年时他留学英国, 入读伦敦林肯法律学院, 精研法学, 并获大律师资格, 后成为香港法庭执业律师。当时中国各口交涉频繁, 又缺乏熟谙西律之人。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看上了他。李鸿章向朝廷推荐他, 说:“久闻其人熟习西洋律例, 曾在英国学馆考取上等, 与其来谒虚衷询访, 俱能指陈窃要, 虽住香港及外国多年, 尚恂恂然有儒士风, 绝无外洋习气, 尤为难得。”又说:“此等熟谙西律之入南北洋须酌用一二人。”^[8 P4349]终于伍廷芳入李鸿章幕, 成为李鸿章的法律顾问参与各项外事活动, 这些经历为他第六任和第八任驻美公使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他以其深厚的法律知识和独特的外交风格在与美交涉中取得显著的成绩。又如广东番禺人梁诚就是留美学生出身的公使。他是中国官方首批派遣留美学生中第四批学生, 1875年10月赴美就读, 1881年被召回, 后在总理衙门任章京, 兼理电信和记录工作。1886年随张荫桓公使赴美, 后升使馆参赞。1897年随张赴英, 奉贺英女皇维多利亚登极60年庆典, 返国后获授直隶候补道。1901年随载沣赴德国, 直至1903年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当然, 也有些驻美公使虽未出过国, 但任职前已懂洋务。第二任驻美公使郑藻如出身在广东被称为“买办之乡”的香山县, 出使前已是办洋务的能员,^[9 P152-158] 办理洋务12年, 工作十分内行。当时, 中国南部的上海和北部的天津是中国办洋务的重要口岸, 郑藻如在这两地办洋务, 不仅增长了洋务知识, 而且在涉外事务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经验。由于他办事总是亲力亲为, 又熟悉情况, 更由于他识略宏通, 使他在洋务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一经历为他日后的出使奠定了基础。广东南海人张荫桓“幼习洋业, 故夷情略悉”。他出使美国前, 曾在山东署理海关道, 筹办海防, 并处理通商事宜, 也曾受命处理过教会交涉。后又随李鸿章参与中外交涉事宜。《南海县志》记载:“时外人换约, 荫桓外顾邦交, 内保国体, 措置裕如, 直隶李鸿章由是奇之。”^[10 P1589]由于清政府急需通晓外国事务的专门人才, 1884年张荫桓被召进京, 授予三品

卿衔，在总理衙门学习行走，成为一名京官。擅长办洋务、办外交的履历使张荫桓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委任为驻美公使。

由此可见，遣使驻外是中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华工问题的突起，促使清政府首批公使进驻美国。地处沿海的著名侨乡广东，以其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中外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一批了解世界的人才，成为清政府选拔外交人才的注视焦点，从而形成了以广东人为主的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群体。

二、护侨——驻美公使的工作重点

晚清驻外公使是在没有前例可循的情况下走向世界的，遣使之初不熟西方外交惯例，派往外国的官员一般以公使的级别驻外；由于人才缺乏和经费不足，又往往采取兼使制，驻美公使往往兼任驻西班牙和秘鲁公使；第一任外交官由正、副使担任，而分工又不明确，正副使之间矛盾频发，影响了外事工作的进行。

当时的国际法曾规定外交官的三种职能：谈判或商议；观察或调查；保护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及应得的权利。虽然清政府也明文规定驻外使臣的多种职能，但实际上驻美公使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侨务交涉上，正如崔国因公使向朝廷汇报时所说：“臣谨按美日秘三国交涉之事，以美国为繁；美国交涉之事，以保护华民为要。”^{[1][P650]}当然，这与美国的排华一年比一年加剧密切相关。

归纳起来，晚清驻美公使的工作集中在建立和完善使领馆制度；与美国颁布的排华法进行抗争；善用法律武器，就侨务问题进行有理、有据的交涉等。

建立使馆和领事馆是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的重要工作。当陈兰彬一行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各地充斥着排华的言论和暴行，美国媒体谈及华人，必备极丑诋，“凡可以欺凌华人者，无不恣意言之”，“间有持论稍平者，究亦视少而诟多”，“令人阅而愤懑，钞已盈篋”。^{[2][P67]}陈兰彬在驻美公使的任职期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保护在美华侨，努力维护华侨的权益上。他首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了中国使馆。据陈兰彬的《使美记略》记载，“容副使偕叶主事源睿往华盛顿租定耶夫街第2925号宅为使署。”台湾学者黄刚对清朝驻美使馆馆址作了考证，他指出后来清朝驻美使馆经过七次搬迁，但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西北区。^{[3][P8]}使馆里的参赞、领事、随员、翻译等外交官，一般由公使调聘。随后，陈兰彬又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建立领事馆。通过一番调查和努力，经朝廷批准，终于在旧金山、檀香山等地设立领事馆，并委派一批领事等官员。第二任公使郑藻如上任后亦把工作重点集中在完善使领制度。他深感这是加强对侨民保护的重要保证，并提名熟悉侨务、又懂外交的黄遵宪出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在加强原有领事馆工作的基础上，他又建议朝廷在华人聚居的纽约建立领事馆，经朝廷批准，纽约领事馆于1883年建立。

无论哪一位公使在其任内，都会付出极大的努力抗议美国的排华法，处理由于排华出现的各种侨案。1882年美国颁布了排华法，它是中美关系史上第一个联邦排华法律，表明排华已成为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它标志着美国自由移民时期的结束，也标志着美国从地方性排华转向全国性排华。从那时起到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除，这60年被称为美国华人史上的“黑暗时期”，对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此时任公使的郑藻如，虽重病在身，仍苦心竭虑尽其力处理侨务。他一再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当然，郑藻如一再交涉无法制止美国排华法的颁布，只是使美国在排华法中作了些微的松动。1885年9月2日，美国怀俄明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石泉（Rock Springs）惨案。28名华工被杀，15名受重伤，几百人被驱逐出石泉，损失财物约值15万美元。^{[4][P101-109]}石泉事件是美国排华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个案，于是郑藻如把精力放在个案的处理上。他把交涉的重点放在惩凶、赔偿和抚恤三大问题上。但他也深知难度很大，因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谈不上能得到法律的公正对待。而且，他的前任陈兰彬在丹佛事件交涉的失败，给他敲起了警钟。他向美国国务卿托马斯·贝雅德（Thomas Bayard）发出一封冗长而极有说服力的正式照会。^{[5][P186-192]}该照会被美国历史学家认为是“最雄辩、最出色”的照会，是在伍廷芳

之前，中国驻美使节所提交的一份“最富于尊严、最具分析力和最合乎逻辑的文件”。^{[15] PP271-272)}经过长期的交涉，美国政府终于同意赔偿华人财产损失，藉以显示美国的同情和体面。但是排华运动却不仅没有中止，且有升级的趋势。不过美国总统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得不下令调派联邦军队前往各地维护治安保护华工，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随着中国人走向世界，一批了解西方又懂外交的专业人员在成长。他们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在逆境中抗争，即使不能根本改变局面，却赢得了舆论的同情，为后人积累了经验，伍廷芳就是其中的代表。伍廷芳办外交有多种特色，发表演说就是他经常采用的手段。他经常在演讲中指出：“美国人一直没有认真研究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人存在许多误解，看问题不全面，不公正。”他一再强调，中国人来美国，是“用劳动换取报酬。他们等价交换，诚实无欺。他们受到排斥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太善良了”。^{[16] PP124-125)}伍廷芳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在排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此外，伍廷芳与许多美国人私交甚笃，他经常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各种交涉，影响美国民众。在驻美公使中，利用民意舆论以左右美国外交政策，伍廷芳是第一人。伍廷芳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有私交。他利用这一私交，每次都向总统表白自己对美国排华政策的态度，以情、以理去游说总统。罗斯福在与伍公使的接触中，对中国有所了解，也私下给伍廷芳一些“优惠”。伍廷芳在与美国交涉中有了转机，这与他的才能分不开，连他的对手也为他的外交才能所折服。

梁诚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在复杂多变的外交风云中，始终坚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树立了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形象，以致西方列强也刮目相看，视他为中国杰出的外交官。留美学习的经历及两年的外交生涯，使梁诚对美国的国情及其文化和法律有更多的了解。在中美交涉中，他往往利用谙熟的国际法知识作为斗争的武器，批驳美国的排华苛例对国际法的践踏。他同时以其留美经历和同学、朋友身份争取一批同情中国的好友，其中不少是美国的知名人士，包括美国外交界朋友和国会议员对其要求废约的支持。他奔走于美国外交部、兵部和工商部，游说议院的议员；他还走出使馆，到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视察和了解华人的现状，并在各地进行演说。由于梁诚以诚感人，使那些“素号开通者固相称善，即向主排华者亦多表同情。近日各党报章议论更觉圆融，论者谓不独禁例可望改宽，而且约章亦可不立。”^[17]在美国一片排华声中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三、如何评价晚清中国驻美公使

翻开晚清外交史的一页，驻美公使是一个重要的群体，驻美公使秉承清政府的政策办事，是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执行者。晚清外交官的派出，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中外交涉频繁形势下的产物。他们走向世界，既体现了中国与西方关系日益密切，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入和变化。作为一个主持外事的群体，晚清外交官是代表中国与驻在国发生关系，他们在驻在国参与各种政治交涉以及经济、文化活动，保护驻在国华人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水平、行为举止不仅影响到国家的声誉，而且也因为他们生活在国外，对外国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科学技术，尤其是对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流派和民主政治的运作，以及文化教育等等都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又成为传播西学，鼓吹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改革的重要人物。

晚清驻美公使群体分属不同的类型，有翰林出身的传统士大夫，如陈兰彬、崔国因；也有接受西学的留学生，如梁诚；有熟悉洋务的士大夫，如郑藻如、张荫桓；也有懂得法律、善用外交艺术的知识分子，如伍廷芳等。不同类型公使的派出，反映了中国在外交上的不断探索和逐渐完善的过程。

驻外使节是清政府中具有国际眼光的群体，他们走向世界，通过实践，逐步学会运用国际惯例和外交手段，在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断增强国际意识，提高对外交涉的能力。同时，他们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中亦起着重要作用。根据《出使章程》的规定，驻外公使必须逐日写日记，按月汇成一册，向清政府汇报。凡有关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各国情况的“虚实”等都要一一记下来。这样，以日记的形式向政府汇报驻在国的情况，成为使馆的一项重要事务。这一做法，既方便

清政府了解外国情形，便于在对外交涉中作出正确的对策，也使中国对世界有个真实的了解。驻美公使中把日记整理成册者不乏其人。如陈兰彬的《使美纪略》、张荫桓的《三洲日记》、崔国因的《出使美国日记》等日记记录了中美关系方方面面的片断，记录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有些日记凝聚了整个驻美使团集体智能的结晶，如陈兰彬的《使美纪略》，除陈兰彬的日记外，也包括其随员陈嵩良、曾耀南、陈善言、蔡锡勇等人的“散记合并参订”而成，是一本完整记录驻美使馆活动和见闻的集体成果，是中国外交官们走向世界的记录。

从素质而言，晚清早期的驻外公使一般未受过外交专门训练。他们中有的是饱读经书，经过科举“正途”而跻身朝士行列，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对外事务了解不够，加上传统的思维和办事方式，使他们在处理对外交涉时，更多的是谨小慎微，往往容易妥协、让步。但也有的长年居留外国，对世界有更多了解，他们在未出国前就睁眼看世界，出国后又实地考察了外国的政俗民情，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侨胞利益。

晚清外交官是封建官僚阶层的一部分，史学界对其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一般既未受过训练，又不精通近代外交知识，也不习外文，对外交涉仅取西方知识之皮毛，掉市井之油腔滑调，美其名为外交辞令，即使丧权辱国，亦云‘欣然同意’，不知外交为何事，国耻为何意。”^[18]这固然反映了近代外交人才总体素质不高，外交意识薄弱，由此造成“一旦发生交涉，无不败于外交官之手，故考我国外交失败之原因，一言以蔽之曰，缺乏外交人才而已”^[19]的情况。另一种看法是：“清季的外交官，在众多官员中总算还是不错的。”清政府的当政者虽则昏庸，“但多年来吃外国的亏吃怕了，对于外交官的选择倒是慎重将事，决不敢贸然派遣毫无学识的官员去充任”。负责“保举使才”的封疆大吏，“没有多方观察，觅得有真才实学的人员，是不敢贸然保举的。”由于清末革命势力高涨，和对清朝官员腐败的痛恨，出了不少以文字鼓吹革命的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把官员描写得漆黑一团，“对外交官的情状更是淋漓尽致，其实是并不公允的。”^[20] PP122-123)

时人和后人对晚清中国驻美公使有不同的评价，但对他们与美国政府交涉，保护在美华人利益的言行则基本都给予了高度肯定。他们称赞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援公法，据商约，侃侃力争”；^[21] P1720) 又称赞郑藻如是“不辱使命的公使”。对于张荫桓，时人称誉他“持大体，蓄远识，滂仁弘义，以惠侨民”，是“绝域使才”。^[22] P1296) 对于汉军正红旗出身的杨儒公使，时为南洋大臣的刘坤一高度评价他的功绩，肯定他在修约废例工作中的贡献，赞扬他对美交涉“慎固邦交，颇资联络，具见诚信感格，坛坫增辉”。^[23] P2128) 在美国迫行苛例，直欲使寓美华人进退维谷之际，杨儒“严词驳诘，力与磋磨，开诚布公以释其疑，修约废例以扼其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并于旧约之外，添入寓华美民注册一条，以相抵制，权衡至当，国体益尊”。^[23] P2533) 人们赞扬得更多的是以法律为武器，为弱国外交争辉的伍廷芳。伍廷芳受命于中国危难之时，他以坚实的法律知识和灵活的外交策略，与美国外交部展开周旋。他还以其见识广远，善于言谈的特长，著文、演说、吐诉不平，呼吁改善华人地位，终于赢得了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同情。美国史学家高度评价他的人格与智能以及其“有逻辑的头脑”，说：“伍廷芳公使的卓越人格加速了一个新的反排斥运动。”^[23] P241) 美国传媒报道，伍廷芳“在美国的荣誉，是因为他出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才干、机智、友善及诚实所赢得”。^[24] 孙中山在其《伍廷芳墓表》一文中肯定伍氏任驻美公使时“保护华侨，力争国体”的贡献。^[25] PP575-576) 总之，历史在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人物，而不同的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活动，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外交可以说是弱国外交的充分体现。近代国际交往遵循的是实力原则，强权政治当道，弱国必须屈从于强国的意志。近代中国外交常常受到强权政治的影响，往往屈从于大国的压力。但是，弱国也有外交，近代外交也有亮点，不过弱国要办外交，比较起强国来当然要艰苦了许多，那就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大的决心。身在异国的中国外交官们始终没有忘记外交公使的职责，他们在加强与驻在国的联系，保护侨民的利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做出了努力和贡献。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在

复杂多变的交涉中据理力争,在“弱国无外交”几乎成为公理的前提下,他们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弱国还是有外交的,弱国也有出色的外交家,具有国际意识、专业外交技能者不乏其人。然而,受到时代的限制,他们虽然尽力尽责与所在国周旋,争取平等地位,但却改变不了中国江河日下的颓势。

近代外交成效不大甚至以失败告终是有其客观原因的。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一场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大规模的工业革命迅速在欧美兴起,拉大了西方与东方的距离,中国的盛世期也随之而去,国力的衰微使中国外交不得不处于弱势。当第一批外交官走向世界时,既要超越只有朝贡而没有外交的传统观念,又要了解和适应当时流行的国际法规。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从被动的外交适应开始走过来的,这是一个艰难的外交历程。

晚清中国驻美公使办外交之路,充满着荆棘和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历程。然而无论怎么挫折、艰难,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历史学家李侃先生说过:“走向世界,这是近代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时代使命。然而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却不是风平浪静、畅通无阻的坦途,而是一条充满了苦痛和屈辱、艰辛和曲折的漫长而坎坷的道路。”^[29]我们透过对晚清外交官群体的研究,对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对他们所留下的足迹和声音,以及所付出的代价有更多的了解,对于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会有更大的启迪。

[参考文献]

- [1] 周谷编著,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 [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1.
- [2] 梁为楫,郑则民主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 [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 [3] 陈翰生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1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 蔡石山.华工与中美外交 [J].美国研究(台北,第1卷第3期).
- [5] 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2帙)[M].台北:广文书局,1964.
- [6] 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 [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 [7]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 [8] 李鸿章全集(七)[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 [9] 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 [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 [10] 郑荣等修,桂站等纂.广东省南海县志(六)[M].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4.
- [11] 王萍主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3辑,第2分册)[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 [12] 黄刚.头一位大人伯理玺天德总统——中美使领关系史上的人与事之述论 [M].台北:培根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 [13]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1886) [Z].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4]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M]. Series II, 1861-1893, Vol. 12.
- [15] Mary R.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M]. New York, 1909.
- [16] 伍廷芳著,丁贤俊、喻作风编.伍廷芳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7] 梁诚文书(缩影资料)[Z].香港大学图书馆馆藏CMF 8175(二、外务部信稿集,第86号).
- [18] 王尔敏.晚清外交思想的形成 [A].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
- [19] 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 [M].上海:华通书局,1930.
- [20] 周劭.向晚漫笔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21] 清代碑传全集(下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2]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刘坤一遗集(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3] M.R.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M]. Taiwan, 1968.
- [24] The Outlook [J]. On July 5, 1922.
- [25]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6]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郭秀文

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 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 陈 超

[摘要] 明末清初, 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 他们为播西方文明而来, 为传中国文化而去, 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双向与相互的,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 既有“拿来”——“西学东渐”, 也有“送去”——“东学西渐”。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解读“东学西渐”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东学西渐 传教士 启蒙思想 影响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6)05-0094-05

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 中西文化的流向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明末清初的200余年间, 我国对外交流史上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 即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在“东学西渐”中, 由于传教士的努力和“礼仪之争”的推波助澜, 17世纪以后, 在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 在以后的岁月里, 这种“中国热”对于欧洲社会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处于劣势, 许多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中, 往往只关注传教士展示给中国的西方先进科技知识, 却忽略了传教士西播到欧洲的中国文化。其实,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 影响也是相互的, 既有“西学东渐”, 也有“东学西渐”, 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说,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东学西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我们中国人不但能够拿来, 也能够送去。”^[1] 鉴此,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 拟就“东学西渐”及“送出去”的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作些探讨。

一、“东学西渐”的时代背景

16-18世纪是世界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转折时期。在中国, 虽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落后于西方了, 但它凭着4000多年文明成果的积累, 仍然在续写着最后的辉煌, 在国家规模、社会规范和文明水平方面还保持着泱泱大国的形象, 在当时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 中国不但不比他们落后, 甚至在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先进, 这就为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而16-18世纪的西方, 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欧洲人逐渐摆脱了落后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阿拉伯文明的状态, 广泛吸收了其他文明的精华, 而向近代社会冲刺, 工商业与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的欧洲处于文化鼎盛的时期, 法国在欧洲的整个科学技术界、人文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中颇具典型性, 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如火如荼。民主、科学、理性的口号深入人心, 崇尚独立精神与学术自由, 对异域文明中的异文化因素持开明的态度。

由于历史的巧合, 中西两种文明在16-18世纪相逢了。中国和西方两大文明开始了持续的和多方面的接触和交往, 西学传到了中国, 中学也沿同一条道路而反向传向了西方。但与“西学东渐”不同的是, “东学西渐”并不是被迫的, 而是主动的。从总体上看, 16-18世纪是中国和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基本上进行平等交往和交流的世纪, 双方都从这些交流和交往中获益多多, 而且就实际效果来看, 欧洲从中受益的程度远大于中国。正如赫德逊所言: “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 使得

作者简介 陈超, 福建教育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 (福建 福州, 350001)。

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267]

二、“东学西渐”的主要媒介

明清之际，“东学西渐”的媒介，固然有商贾、游客和使节，但最重要者则应首推入华传教士们。确切地说，始于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活动，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礼仪之争”，开启了“东学西渐”之门。

耶稣会于1534年由西班牙人罗耀拉创建于巴黎，1540年获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中国耶稣会由利玛窦（1552-1610年）开创局面，到法国五位“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入华掀起高潮，直至教皇解散耶稣会的教谕传到北京为止，历时200余载。这些入华耶稣会士们不但活动时间长，人数众多，而且文化素养较高。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且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古老国度里传教谈何容易。经与中国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接触，耶稣会士发现，中国古代圣贤的诸多思想，似可与天主教宗旨相互发明。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所谓“合儒”的策略，即利用中国文化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教义。为了实现这一策略，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自16世纪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朱熹注的《四书》之后，“中国热”随之兴起，“中国学”也正式成为欧洲的显学。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如《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著作，均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如《中国通史》、《孔子道德论》、《中国人的政府和道德观念》、《中国哲学》等，其影响所至甚至超过中国经典原著本身。

由于中西文明是在极不相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进行接触和交往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碰撞和波折。其中最为持久的一次碰撞，就是由基督教内部“门户之争”而引发的中国“礼仪之争”。传教士出于“礼仪之争”的压力，想通过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以争取欧洲知识界支持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所以写了大量的报告、书信、著作，来宣传他们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和业绩，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的“中国热”和“东学西渐”的势头，增加了欧洲人关于中国和整个东方的知识，开阔了欧洲人的世界图景。自此以后，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不再是通过种种不可靠的传闻而获得的模糊印象，而是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在当时来华的耶稣会士中，起初很少有法国人，但自从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派遣传教士起，法籍会士便很快成为在华耶稣会士的中坚力量。据统计，1687-1773年法籍会士占全部在华耶稣会士的39.5%，位居第一。这些法籍会士大多是饱学之士，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被称为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三大名著”——《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和《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许多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霍尔巴赫、魁奈等人都从中获得很大的收益，法国遂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三、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一）儒家无神论的哲学思想。尽管法国启蒙思想家没有到过中国，但通过阅读来华传教士、商人、使节的著述，以及与汉学家和中国留学生的直接交往，他们对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作了大量深入研究，从中吸纳了儒家无神论的哲学思想，为反对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服务。

法国启蒙思想家，大多是自然神论者。他们“承认一个造物的上帝，把他看作威力无边的存在物”。^[268]在他们看来，孔子的学说恰恰也是一种自然神论，因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最纯真的认识……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269]他们认为，在儒家经典中经常出现的天、道、礼或理，就是这个造物的上帝。它要求人们无论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即理性。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儒教是人类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在欧洲陷于迷信腐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行最有道德的纯粹宗教了”，^[270]因而主张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的宗教”来代替启示的宗教。

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就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它与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伏尔泰把孔子的道德规范作为其自然神论的思想基础，赞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理性的、人道的原则，与牛顿地心引力原则同样具有普遍性。^[19]索柯洛夫指出：“应当作为个人行为基础的主要道德律，被伏尔泰表述为这样一个超历史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道德律，就是‘天生在我们心中’的‘自然道德’的基础。‘自然道德’是和我们的理性的要求相符合的，所以是同文明不矛盾的，而是与它符合的，因为文明的发展，根据伏尔泰的意见，是以人类理性的进步为基础的。”^[20]在这里，天赋与理性、自然神论与自然道德、文明的发展与理性的进步，都在孔子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霍尔巴赫和狄德罗，也都十分推崇孔子思想。霍尔巴赫赞赏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认为“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21]狄德罗认为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总之，“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保护神”。^[22]

（二）德治主义的政治思想。为了构建自己的理想王国，启蒙思想家们无不致力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探索，并希望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汲取实际的经验和智慧。

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推崇备至。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是唯一建立于父权宗法之上的”。^[23]他还认为中国皇帝是开明君主，说康熙“圣怀宽阔”，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美而驰名遐迩的君主”，^[24]雍正则是“世上最公正，最有教养，最贤明的君主”。显然，伏尔泰是以自己理想中的哲学家国王丰富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同时也是以对中国皇帝的赞颂来抨击法国的专制君主。

由于孟德斯鸠的政治理想与中国的开明专制有冲突，所以他把中国划入落后的专制君主政体的范畴。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批判中国君主专制的弊病之后，认真地吸收中国政治制度中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使之成为宣传自己政治理想的思想资料。

中国对欧洲政治制度影响最大的当首推“科举制度”或“文官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令启蒙思想家们大为叹服。魁奈说：“中国无世袭贵族，官爵仅靠功绩与才能获得。”又说：中国的科举制“使工匠的子弟也能当上总督”。^[25]孟德斯鸠的《地理》和魁奈的《中国的专制政体》都对科举制大施笔墨，对诸如乡试、殿试、秀才、举人、进士，以及试题、监考乃至考生中榜后的录用分配等都作了极为详尽的记述。美国学者卜德指出，法国人对中国的热情在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后逐渐消失了，但科举制依然是他们从中国学来的一项重要遗产；许多西欧国家的文官制度均源自于中国的科举制。^[26]

中国的谏议制度，也令启蒙思想家感兴趣，他们认为宫廷设专职谏官是中国突出的长处之一。伏尔泰在《论民族的精神与风尚》中写道，中国皇帝能够倾听下情，甚至在宫殿中设有专门供人写批评建议的地方。魁奈也说：“中国的法律无论什么时候都对劝谏皇帝的惯例都给予鼓励，法官们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无所畏惧地劝谏。”^[27]“大概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像在中国那样自由地向君主进谏。”^[28]

中国官员的监督制度同样为启蒙思想家所称道。魁奈说：“皇帝不时地派遣监察官到各省去，这些监察官从人民中得到情报，然后把它送给正在开庭议论政事的大臣那里。如果某个监察官发现官员有任何不正当的行为时，他立即会出示他的证件，由于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他可以依据法律，马上强有力地惩治罪犯；但如果罪行并不那么严重，他就把他的材料送交朝廷，然后由朝廷来决定对于这件事应采取什么办法来处置。”^[29]透过这些略显溢美的言辞，我们可以体察到启蒙思想家亟思变革神权政治的热望。

（三）融法律与道德为一体的伦理思想。启蒙者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归结为道德问题。出于对法国专制制度和暴君统治的深恶痛绝，启蒙思想家们盛赞中国的法律和道德。他们认为，中国的法律与道德有时很难分清，皇帝和各级官员处理讼案的依据，往往不是法律的条文，而是先贤们的教诲和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们自认为在中国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道德世界。

魁奈说：“中国的法律完全建立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之上……出自被视为圣书的经典，即《五经》。”^[30]伏尔泰认为：“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是道德和法律。”^[31]在启蒙思想家看来，

中国的法律是以“最纯洁的”道德为基础的。这道德主要表现为“后辈对长辈的尊敬”，而这是人类“最合乎自然又最神圣的法则”。^{[11] P395)}伏尔泰说：“孝道是中国政府的统治基础……官员被当作一城一省之父，国王被当作帝国之父。这种深入人心的思想把幅员辽阔的国家组成为一个家庭。”^{[7] P79)}孟德斯鸠虽然对中国的法律和道德持否定态度，但对于中国的孝道他是认可的。他说：“尊敬父亲就必须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7] P315)}这种以道德准则作为法律的基础还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那就是：“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7] P217)}狄德罗称赞中国人“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19] P274)}霍尔巴赫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17] P452)}

(四) 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重农学派是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一支，其创始人魁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魁奈目睹法国社会经济的衰败，认为只有以农为本，改变轻视和束缚农业的思想，才能拯救法国。于是，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攻击重商主义的思想武器——重农主义学说，把经济运作程序的构思从重商主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第一个把经济学科学化及系统化，开创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

重农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生产看作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7] P15)}重农学派这种“自然秩序”思想，渊源于中国的儒家学说。魁奈通过耶稣会士的媒介，了解中国农本主义的自然经济特征，并以中国作为证实“自然秩序”的最好例证。他在《自然法则》一书中把中国奉为按自然法则建立国家的圭臬。他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7] P96)}

重农学派的基本理论是以农为本。这种以农为本，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颇为相似。魁奈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传统，他曾鼓动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以表示对中国重农传统的推崇。魁奈去世后其学生发表的悼辞中，更把他的《经济图表》说成是孔子的“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的一种实践。^{[3] PP286-287)}

此外，重农学派关于实行土地单一税政策的主张，也出于中国古代税制，特别是受《周礼》均田贡赋法的启示。他们认为数千年来中国政府之所以能使自己处于社会安定的局面中，其基本原则是劳动所得税和人头税的征收，中国人一向认为“是不合理和不公允的”，是“不能违反的自然规律之一”。唯一的方法是向土地所有者的纯产品收入征税，以提供国家所需的赋税。^{[20] PP412-414)}

重农学派的另一领袖，是曾任法国财政大臣的杜尔哥。他在研究经济问题和制定经济政策时，注重从中国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和实际范例。例如改革丁税制、改徭役地租为货币地租，提倡谷物自由贸易，建立救济贫农的制度，等等，就是杜尔哥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杰作，与中国中唐以来的经济改革极其相似。而杜尔哥的经济理论又与两个中国留学生有着直接的关联。杜尔哥在担任法国里摩日州长期间，曾与留法青年高类思和杨德望时相过从。与两位中国留学生的友好交往，不仅触发了杜尔哥系统地阐述重农学派理论的灵感，也为重农学派更好地吸收中国思想开辟了新的渠道。杜尔哥在《给两位中国人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指示》中列出了52个问题的调查提纲，内容涉及中国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的方方面面，显示出杜尔哥和重农学派对于中国问题，尤其是与重农学说有关的农业情况的重视程度。

四、余论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主要是悠久而灿烂的中国文化确实有许多优于当时欧洲文化之处，这点必须予以充分的肯定。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华文明进入18世纪已显出疲态，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后于欧洲，特别是启蒙思想家所仰慕的儒家学说、中国的政制和法制等都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了。那么，中国文化作为前资本主义的文化，又缘何成为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渊源呢？这是因为，对于18世纪的法国来说，历史赋予启蒙思想家的重要使命，除

了对传统进行反叛消解的思想解放外，更重要的就是要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化，寻求新的文化路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有别于传统自我的一个参照或一面镜子即“他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所以，当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进入到18世纪的法国时，便无意间成为其启蒙需要的一面镜子，一个“他者”。由于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和向往，始终是以自己的国情或需要为出发点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接纳中国文化的进程中，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强烈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取向。如孟德斯鸠关注中国思想，着眼点立于他自己的政治构想；伏尔泰崇尚儒家学说，是要和天主教教义相对抗。而且他们在接受中国文化的价值、分享中国思想精髓时，又是受各自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及个性特点所制约，因而映照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形象，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异彩纷呈的。但是，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褒扬还是贬低，启蒙思想家都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视为与自身文明相异、魅力无穷的“他者”，都乐于把这个陌生相异的“他者”看作构建自家思想学说不可或缺的精神参照。

当启蒙思想家以这样一种亟思变革与急功近利的心态来阐释中国文化时，中国文化便有了被重新解释的可能。这样，启蒙思想家所说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一些原理、原则，经过他们的“理解”和“解释”后，已然不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本文”了。在这种解释活动中，包含了作为解释活动主体的启蒙思想家们的意识参与和再创造，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误读”。启蒙思想家将中国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误读”为反封建的思想力量，给它披上了理性和理想的外衣，作为他们批判基督教神学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论证新文化理想的根据和证明。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误读”，才使得中国文化在欧洲近代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不仅为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一种文化支援和激励力量，而且也给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 [1] 东方论坛, 2004, (5).
- [2] 赫德逊. 欧洲与中国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3] 伏尔泰全集 (8)[M].
- [4] 伏尔泰全集 (3)[M].
- [5] 朱谦之.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 [6] 葛力, 姚鹏. 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 [7] 瓦·索柯洛夫. 伏尔泰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 [8] 朱谦之. 十七八世纪西方哲学家的孔子观 [N]. 人民日报, 1962-03-09.
- [9] 顾立雅. 孔子与中国之道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 [10] 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 [11] 伏尔泰. 路易十四时代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2] 魁奈. 中国: 欧洲的楷模 [M].
- [13] 卜德. 中国思想西入考 [M]. 华盛顿, 1972.
- [14] 伏尔泰. 风俗论 (上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15]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上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16] 摩利尔. 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 (1)[M].
- [17] 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I)[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9] 利奇温. 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 [20]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责任编辑: 郭秀文

晚清军费政策的演变

◎ 申学锋

[摘要] 晚清时期,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而军队数量则有增无减。为缓解财政压力,推动军事近代化进程,清政府对军费政策进行了几次调整。晚清军费政策的演变虽然有些迟滞,但其发展趋势是符合军事近代化规律的。

[关键词] 晚清 军费政策 演变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099-05

晚清以降,军队数量持续增加,巨额的军费支出对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压力。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先是减扣经制军队的俸饷,嗣后逐步加大裁兵节饷的改革力度,至清末又实行练兵增饷政策。晚清军费政策的演变是个迟缓的渐进过程,但对军事近代化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关于晚清军费问题,前人已有探索性研究,^{[1][2]}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晚清军费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其效应进行深入论述。

一、经制军队俸饷的减扣与欠发

清代前期,国家的正规军即“经制军”包括八旗和绿营两种,二者是政府镇压民变和抗击外来侵略的主要依赖。八旗将领的正俸仅俸银一种,绿营将领货币形态的正俸要多一些。但是,八旗将领除支取俸银外,还享有朝廷赐给的面积不小的旗地,禁旅八旗武官甚至还可得到与俸银数目相等的禄米。若将这些绿营将领享受不到的“福利”转化为货币,八旗将领的收入又远远高于绿营将领。俸薪之外,八旗绿营将领还仿照文职养廉之制支领养廉。武职官员的待遇因旗绿之别、地区之异而优劣不等。总体上讲,八旗优于绿营,京师与边疆地区又优于内地省份。八旗和绿营兵丁每月发给一定的饷银,称为“月饷”,此外遇有婚丧之事,清政府还发给一定的银两以示恩恤,称为“红白事例银”。同将领俸薪类似,八旗兵丁的收入要比绿营优裕。

清代前期,八旗军队有20余万,绿营军队更多达60余万。由于兵额过多,虽然其俸饷并不优厚,但日常养兵费的总额却是天文数字。不仅如此,“预算外”的战时军需耗费更巨。乾隆时期,初次金川之役、准回之役、缅甸之役、二次金川之役、廓尔喀之役、台湾之役等6次战争的军费支出达1.5亿余两。嘉庆年间,仅白莲教之役即耗费2亿两。^{[3] 卷125}巨额的军费支出给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

晚清时期,八旗绿营军队因积弊过深而成无用之师,政府遇有战事,多倚赖地方督抚招募成军的勇营。因此,国家在军费支出方面主要保障勇营饷需,经制军队既成冗兵,待遇自然下降,国家减扣和欠发旗绿俸饷的现象在咸同年间极为普遍。咸丰以后,以太平天国起义为首的农民斗争此起彼伏,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得减扣经制军队的日常俸饷。咸丰四年,户部奏准将京师八旗官弁红白赏银、兵丁红事赏银概行停止,兵丁白事赏银照旧支給,并咨令各地驻防一律办理,“以节经费”。^[4]密云、张家口、绥远等处驻防八旗俸饷,除步甲与养育兵照旧支领外,食俸官员应领俸银核减三成支給,兵饷核减二成支給。^[5]乌鲁木齐满洲营兵饷每月只能按五成实银发放,但实支数目较之原额“不及十分之二、三”。如前锋应领饷银及粟米草料折银85.5两,实支仅18.74两;马甲应领原额73.59两,实支仅15.93两。^[6]

此外,欠发的现象亦非常普遍。咸丰六年,河南旗绿各营官兵俸饷等项,“开封营发过两季,满洲营发过五个月,其余各营有仅发一季者,有全未支发者”。^[7]咸丰五年夏季至十年春季,贵州各标协营兵丁“应支饷银全未支发”,“一年中每兵亦不过借给银一两及数钱不等”。^[8]同治二年四月,曾国藩奏陈兵饷为难情形时称:各营“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亦八、九个月”,结果部卒屡有逃散。^{[9] 卷18}

作者简介 申学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36)。

减扣与欠发经制军队俸饷是咸同年间的基本军费政策，也是无奈之举。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必须有选择地裁减某些支出款项，至于裁留何项，则要视轻重缓急而定。咸丰以后，国家军事行动主要依赖勇营，旗绿各营因缺乏战斗力而被视为冗兵，在财政吃紧的情形下，政府必然裁扣旗绿俸饷。政策出台后，朝廷要求地方督抚与统兵大员认真执行，对于违命不遵者则予以严厉谴责，这点从江北粮台事件便可一目了然。咸丰后期，文煜办理江北粮台，因各省协饷未济，兵饷“每月发五、六、七成不等，余欠之数概以官票找给”。当时托明阿统管扬州军务，坚决要求粮台如数支放俸饷，与粮台形成水火之势。户部对文煜的做法表示赞同，并颇带讽刺意味地批评托明阿：“各路军饷均应力求撙节，通融办理。即如福济、和春、向荣各大营欠发饷糈甚多，均系通融支展。托明阿于欠发款项丝毫不容蒂欠，而瓜洲一隅日久未报克复，劳师糜饷，伊于胡底！”咸丰九年冬，乔松年接办江北粮台后，协饷更不如前，只得推展饷期，约计3个月之中发给两个月军饷。此时都兴阿接统扬州军务，“不计粮台之所入，必欲按月索饷”。统兵大员与粮台之间又生纠葛。在清廷看来，都兴阿无视国家财政拮据情形，违背户部“力求撙节”方针，于是飭令其“以后仍俟粮台凑足一月之饷咨会到日，再行传知各营赴台领饷”。^[10]

清政府减扣、欠发旗绿制兵俸饷，在一定时期缓和了财政危机，解决了军费紧张的困难，但给官兵尤其是兵丁造成巨大损害。兵丁起初尚能“体谅时艰”，时间一久，生计的压力使其再也不堪忍受，于是纷起抗议。咸丰四年冬，甘肃因司库匮乏而搭粮抵饷，兵丁领粮亏折，纷纷恃众闹事，“抗不领粮”。西宁镇标兵丁更“聚众哄闹，几酿事端”。翌年因粮价低减，西宁、宁夏等处请饷滋闹。四月，兰州省城督标出征兵丁家属向藩司恳求支发饷银及应得恤赏，家属妇女数十人又到总督衙门“同声哭喊，纷纷吵嚷”。^[11]出现此等事件，政府亦知理亏，只得竭力劝谕，交口承诺。不过，这种态度只是对付兵丁家属，设若事态严重，甚至威胁到政府统治，则又是一幅面孔。咸丰七年，江南各营兵勇因领饷不敷，遂结盟意欲聚众鼓噪，政府密访后将为首者7名正法示众。不久又有粤兵摇旗索饷之事，亦即择尤惩办。^[12]

咸同年间，清政府面临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费支出急剧膨胀，经常性收入又因战乱而大为减少，财政入不敷出日益严重。此间承担国防重任的已不是旗绿军队，而是招募成军的湘淮勇营，因此政府的军费政策自然表现为减扣经制军队开支，以保证勇营饷需。在这一阶段，清政府的军费思想还停留在节饷养兵的水平之上，根本没有想过裁汰冗兵以节军饷。从心理学角度讲，无论清政府还是旗绿官兵，宁愿忍受扣俸减饷的煎熬，也不肯接受裁兵的“阵痛”。这种保守的思想观念致使旗绿官兵生计维艰，战斗力迅速下降，对清政府的统治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裁兵节饷政策的实施

真正意义上的裁兵节饷政策始于同治初年。当时政府财政压力日重，而军费支出的数额始终居高不下，裁汰绿营兵丁以减轻财政负担便被提上日程。甲午之后，财政几同枯竭，政府决心加大裁兵力度，以省出之饷添练新式军队。晚清裁兵节饷政策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同治初期至甲午前夕为第一阶段，政府裁减绿营并酌增存留绿营军饷，同时裁减部分勇营以节省饷需；甲午至清亡为第二阶段，政府集中力量裁汰绿营，以节省之饷建设新式陆军，并适当提高新军薪饷水平。

同治初年，绿营屡战屡败，基本丧失作战能力，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完全依靠湘淮勇营，清政府便决心大力裁汰绿营。裁兵之初，清政府考虑到日常治安问题，不希望绿营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其政策宗旨是以裁兵节省经费酌增存留官兵俸饷。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奏请减兵加饷，就饷练兵，并在福建实行。其办法是：无论水陆标营官兵，一概裁减五成，以裁节之饷增加存留官兵俸饷，其中马兵每名每月加饷银0.7两，步兵加饷1.05两，守兵加饷1.4两。^[13]卷20此后，浙江、陕西等省援案办理。光绪五年，左宗棠奏拟变通甘肃兵制章程，将该省兵额分别核减，存留各营兵饷酌予加增。^[14]卷104据统计，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九年，绿营军队有明文可考的裁兵共计173121名。^[15]卷181裁兵加饷是政府裁兵政策实施初期的主要特征，反映了统治者思想观念由减饷养兵向彻底裁兵过渡时的矛盾心态。

光绪之后，清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迅速扩张，国家财政日益支绌。清政府在裁减绿营的同时，被迫

开始部分地裁汰勇营。与绿营的裁兵加饷不同,政府裁撤勇营主要为了节省饷需,裁勇之后,余勇并不加饷。光绪四年,浙江裁去留防严州楚军副前营勇丁五成,其余水陆各营均核减一成,共裁弁勇长夫1023名,加之上年所裁红单船广勇,“节省饷需已在十万两以外”。六年,湖南续裁内地陆勇1320名,水军弁勇854员名,“以纾饷力”。^[14] 卷81.110)十一年,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奏准:自次年起,“每省每年各从所支勇营饷下,酌量地方情形,各裁节银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16] P543)这是政府首次对裁勇节饷作出统一规定。谕旨既下,湖南、陕西等省开始酌量裁汰勇营,但多数省份藉口地方防务紧要,丝毫不予裁减。甲午以前,各省主要是裁减绿营,勇营之裁无论数量还是范围均远逊绿营。

甲午之后,朝廷以至民众无不喟叹旧式军队的无用,建设新式军队之议浮嚣尘上。编练新式军队需要巨额军费,而国家财政已跌入低谷,清政府面对空前的统治危机与财政危机,决心大刀阔斧地裁汰绿营和勇营,以节省饷需而编练新军。光绪二十一年,户部以需饷孔殷,拟令各省挑留绿营精壮三成,其余老弱一概裁撤。嗣上谕有云:“著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妥筹,核实裁汰,奏明请旨办理。”翌年,总理衙门请旨飭催各省依照户部奏定办法,将绿营裁七留三,并将裁减兵数及切实办法速行奏明。二十三年上谕又严令各省在一个月将裁减兵勇与节省饷项数目切实复奏。次年正月,朝廷以各省裁兵办理不善,下谕申斥。二十七年八月,户部筹议庚子赔款,再次要求裁汰绿营勇营:“各省水陆勇营、练勇、旧有绿营,率多事涉虚糜,难期实济,拟一律酌加裁汰。”^① 171 总P3633-3634、3906-3907、3946、4048、4725)

虽然清政府在裁兵问题上将绿营和勇营相提并论,但其内心只是希望集中力量裁汰绿营,对裁撤勇营则持暂缓态度。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奏请将绿营和勇营悉数裁汰,总理衙门认为其建议过于激进,全裁勇营会导致国家防务空虚,故不宜施行。^[17] 总P3906-3907)与中央政府相比,掌握勇营队伍的地方督抚不仅不想裁汰勇营,甚至连绿营都不愿裁减。这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绿营虽冗滥无用,但襄办地方治安还是绰绰有余,一旦裁汰,防务稍有闪失则难辞其咎。正因为如此,甲午以后的裁兵,尤其是勇营的裁汰,效果较此前要差得多。当然,裁兵的低效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清政府财政的极端匮乏。清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决定裁兵,但裁兵首先需要将欠发官兵的俸饷清结,这笔费用为数庞大,政府财政无力承受,因此裁兵难行;裁兵效果不佳,政府财政负担便难以减轻,财政困窘情形日重,裁兵仍是当务之急。这就形成了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怪圈。

清政府制定裁兵政策后,多数省份因财政困难而不能补发数额庞大的积欠俸饷,甚至连为数不多的遣散费也只能“借给”,因此根本不可能真正执行裁兵政策。欠饷是晚清各类军队普遍存在的现象。李鸿章所部淮军多为每年发放九个月兵饷,谓之“九关”,甚至还有八关、七关之事。为裁撤淮军,清政府采取追补偿付办法,即每年补发淮军上年以前的欠饷。同治九年至光绪九年,共补发淮军欠饷235.7万余两,但负累依旧存在。^[18] P285-286) 各省因欠饷难清而阻碍裁兵的情形大同小异。河南巡抚严树森明确指出:“挑选精壮必先裁疲弱,而欲裁疲弱必先清旧欠”;豫省“欠发口粮,碍难裁撤”。^[19] 新疆亦面临同样的难题:“欲裁汰必先偿欠饷,再谋资遣。比年协饷解不足数,本省又无款可筹,进退维谷。”^② 20 卷74)

欠饷不能如数补发,政府又亟需裁兵,因此便采取其他措施解决欠饷问题。最常见的办法是士兵报效欠饷,政府或准其报捐,或加广其所在地区学额。报捐的程序为:政府按所欠兵丁饷银数目发给饷票,士兵缴回饷票而报捐请奖,称为“饷票报捐”。通过这种方法,政府无须支付货币,惟一的“开支”只是奖给士兵一些虚衔,如捐监、捐职衔、捐翎顶、捐封典之类。饷票报捐存在于各省、各类军队之中。报效加广学额是指政府按照所欠士兵饷银数目,增加其所在省府州县永久或一年学额。苏浙用兵后,淮军裁汰二十二营,共报效欠发饷银308857余两,李鸿章奏准加广安徽省文武乡试永久中额各一名,庐州府一次文武学额各四名。^[20] 卷10.P28-29)嗣后淮军报效欠饷,“各加广本县学额文武各数名不等”。^[21] 卷4)

清政府采取报效欠饷的办法,目的是通过饷票报捐和加广学额方式解决兵丁欠饷问题,从而扫除裁兵的障碍。但面临生计困难的兵丁迫切需要的不是虚衔和学额,而是实在的货币,他们对报效并无多大兴趣,因此报效欠饷政策未能收到多大效果。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即清政府已意识到裁兵的必要性,

其思想观念已由原来的节饷养兵、裁兵加饷转变为裁兵节饷，这是一个较大的进步，这种政策调整为以后的军队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清末新军饷制变化及其积极效应

清末年间，除了经制的八旗绿营与招募成军的湘淮勇营外，还出现了近代化的新军。鉴于以往军费政策的失误，清政府在建设新军时特别注重饷章的制订，新军薪饷较旧式军队有了很大提高。清末新军饷制的变化影响甚大：军人社会经济地位得以提高，过去一直游离于“四民”之外的边缘阶层逐渐成为与之并称的新阶层；社会风气亦为之一变，踊跃参军成为时尚，人们甚至弃他业而从军。

甲午之后，清政府推行军制改革，着力编练新式陆军。光绪二十七年，朝廷谕令各省将原有绿营勇营严行裁汰，挑选精壮者编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以成劲旅。二十九年，清政府设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开始在全国范围编练新式陆军。为统一管理全国新军，练兵处会同兵部于三十年奏定全国陆军营制饷章，其中不仅指出旧式军队饷制的弊端，也明确表态提高新军待遇。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张之洞的自强军到各省纷纷编练的常备军，其饷章虽不统一，但官兵俸饷数目均较旧式军队为高。全国陆军统一饷章出台后，新军薪饷政策更趋完善，其饷额水平的提高也更为制度化。新军士兵每月不仅可以结存部分饷银寄送家属，亦可存下少量银两，故退伍时“类多购买布匹日用等物，携带还乡”。^{[23] 军事)}由此可见，清政府准备从军费政策本身彻底清除军队积弊，以建立强有力的国防力量。

为直观地比较晚清各类军队的俸饷差异，我们将之编制成两个表格，从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军费政策的大致走势。

晚清各类军队军官月粮饷比较表

军队类别	军官月饷(两)									
绿营	提督 217.14	总兵 167.63	副将 98.12	参将 61.94	游击 52.61	都司 33.45	守备 24.23	千总 14	把总 10.5	
湘军、淮军	步队营官 50	步队哨官 9	水师营官 50	水师哨官 12	马队营官 50	马队哨官 18	/	/	/	
直隶练军	步队营官 50	步队哨官 10	步队哨长 6	马队营官 50	马队哨官 12	马队哨长 9	/	/	/	
防军	多仿效湘淮军，饷额大体相当而略有减低									
北洋海军	提督 280	总兵 132	副将 108	参将 88	游击 80	都司 52	守备 32	千总 24	把总 16	
新建陆军	马队步队统带官 100	马队步队领官 50	马队步队哨官 20	马队步队哨长 15	炮队统带官 150	炮队领官 100	炮队哨官 20			
新军统一饷制	统制官 400	统领官 200	统带官 200	管带官 100	队官 50	排长 25	/	/	/	

资料来源：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51，《户部·俸饷上》；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00，《户部·俸饷·文武外官俸银一》；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61，《户部·俸饷》；罗尔纲：《晚清兵志》第二三四合卷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4页；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63页；皮明勇：《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说明：绿营把总月饷皮明勇先生统计为4.5两，笔者重新核算后应为10.5两。

晚清各类军队士兵粮饷比较表

军队类别	士兵粮饷(旗、绿士兵饷银外另有饷米0.3石,其余仅有饷银,单位为两)									
驻防八旗	马兵 2		步兵 1.5		守兵 1		每人另有旗地 30 亩			
绿营	马兵 2		步兵 1.5		守兵 1		不另给地亩			
湘军、淮军	步队什长 4.8	亲兵、护勇 4.5	正勇 4.2	马队什长 7.8	马勇 7.2	水师舵工 4.8	水师舵工 4.5	头篙、炮手 4.2	水勇 3.6	
其他勇营	张国樑部勇丁 5.4		江忠源部勇丁 5、4.8、4.5 不等			胜保部随勇 4.5		左宗棠部越南 3.6		
直隶练军	马兵 7		步兵 3.6				其他练军步兵约为 2—3			
防军	各省防军勇丁多为 4.2,步兵约为 3									
北洋海军	水手正头目 14	水手副头目 12	水手一等 10	水手二等 8	水手三等 7	练勇一等 6	练勇二等 5	练勇三等 4		
新建新式陆军	新建陆军正兵 4.5			自强军正兵 5.6			湖北护军营正兵 4.2			
陆军统一饷制	正兵 5.1	副兵 4.8	护兵 6	号兵 6	正兵 4.5	副兵 4.2	各补兵 3.3	护兵 4.5	号兵 4.5	

资料来源：魏源：《圣武记》下册，第472、471页；录副档：咸丰七年五月十三日官文等件；《清朝续文献通考》卷74，《国用十二·俸饷》；《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4页；《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63页；皮明勇：《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随着新军薪饷水平的提高，军费所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亦不断增长，军队近代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辛亥革命前夕，各类军队的总数超过100万人，其中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队即新军和海军为15万人左右。新军数量虽不占优势，但他们是最具战斗力的军事组织，其薪饷数额也占军费支出总量的最大

比重。以宣统三年为例。该年政府财政收入约为2.6亿两,军费支出一项即达1亿余两,占岁入的39%,新军、新军学堂和海军又占去军费支出的71%。^[1]从军费支出的对象看,清末军费多半用于新式军队建设,政府的倾力投入推动了军事近代化进程,这是军费政策的一个积极作用。

从军事社会学观点看,军费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必然促使军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晚清处于近代转型期,强国御侮的民族责任与社会动荡的外部环境在客观上使军队建设和提高军人待遇成为迫切需要。清政府在加强军队近代化的同时,通过提高薪饷水平来改善军人生活待遇。清前期,文官收入较同级武官收入为多,这是政府重文轻武原则在官员经济收入方面的折射。自编练新军后,武职官员的收入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名队官的收入与文官知县的法定收入相去不远,管带收入大大超过知州,而与知府接近,镇统薪饷则超过按察使。正如皮明勇先生所言:“清朝传统的武官对文官法定收入的逆差已经彻底改变为顺差了,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2]至于新军普通士兵,经济状况也得到改善,总体上“接近或超过自耕农,与工人中的中上层相当”。其经济地位处于社会中等水平,与下层官吏相差无多,以致有“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之说。^[24] P63-167)萧一山先生曾将清末军人的经济生活与其他阶层作过比较。他认为,就清季社会生活状况而言,最苦的是佃农,农民生活不如工人,官僚商人生活最优,介乎农工与官商之间的为读书人和士兵。普通教书士人每年收入尚不如新军士兵,“故投笔从戎者甚多”。士农工商乃中国数千年来的职业分类,军人属四民之外的边缘人,“自清季编练新军,而行伍之官兵,始与士农工商齐称焉”。^[25] P1069,1617,1611)清末军费政策的调整使军人的经济状况得以改善,军人群体的整体地位获得了较大提高。

[参考文献]

- [1] 沈鉴.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之陆军及其军费[J].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1937-01.
- [2] 皮明勇.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J].近代史研究,1995,(1).
- [3] 食货六[A].清史稿[M].
- [4] 军机处录副奏折(下简称录副档).咸丰四年正月初六日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奏[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5] 录副档.咸丰四年闰七月初十日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奏[Z].咸丰四年闰七月初十日盛坝等奏[Z].
- [6] 录副档.咸丰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倭什琿布奏[Z].
- [7] 录副档.咸丰七年三月十四日河南巡抚英桂片[Z].
- [8] 录副档.咸丰十年正月二十六日贵州布政使罗海瑛奏[Z].
- [9] 曾国藩.近日军情并陈饷细情形片[Z].曾文正公全集·奏稿[M].
- [10] 录副档.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办理江北粮台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奏[Z].
- [11] 录副档.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陕甘总督易棠片[Z].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陕甘总督易棠奏[Z].
- [12] 录副档.咸丰七年和春片[Z].
- [13] 左宗棠.通筹闽省绿营兵额饷项折[Z].左文襄公全集·奏稿[M].
- [14] 清德宗实录[M].
- [15] 罗尔纲.绿营兵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6]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17]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8] 王尔敏.淮军志[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67.
- [19] 录副档.咸丰十一年三月河南巡抚严树森片[Z].
- [20] 国用考十二·俸饷[A].清朝续文献通考[M].
- [2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M].
- [22] 刘声木.蓑楚斋四笔[M].1929年铅印本.
- [23] 东方杂志第4年第10期,1907.
- [24] 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 [25]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杨向艳

新朝与旧主的抉择

——清史馆设置缘起与赵尔巽的就任

◎ 伏传伟

[摘要] 民初开设清史馆,前人多持袁、赵二人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之说,实际情形则大为不同。从清史馆的创设及赵尔巽出任馆长,可见该馆的设置并非一帆风顺,其筹建过程折射出在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复杂关系的背景下,新旧观念的交汇状态,也从侧面反映了前清遗臣在新朝与旧主之间亲疏取舍的矛盾立场及微妙心理。

[关键词] 清史馆 赵尔巽 遗老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104-06

清史稿自刊印以来,可谓众说纷纭、命运多舛。诟病者多以“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①(P228)非之,但也有学者主张“虽非良史,尚无污蔑”、“实无长辂之理”^②“无毁弃此大宗史料之必要”。^③(第3卷第4号)由此看来,作为查禁最重要理由的政治因素,也是见仁见智。究竟孰是孰非,从清史馆设馆缘起及其组织过程考察,应有助于发现其根源所在。清史馆的筹建,民国年间专治清代掌故的大家徐一士最先撰文论述说:“民国三年,内战甫止,袁世凯欲以文事饰治,议修清史。赵尔巽既应招至自青岛,遂受清史馆总裁之聘”,“世凯之设馆修史,本含有藉是延揽胜朝遗老、山林隐逸之用意,犹之清初修明史故智,尔巽以‘援曩例以紮逸贤’之说进,在世凯自属‘正合孤意’,宜其有针芥之契,而优予经费,供‘养士’之用也”。^④对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的刘禹生和《清史稿》编纂后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的朱师辙等也有类似论述。这三人所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对于清史馆具体筹建的过程,都未有详细的论述。如果说清史馆的设置乃袁世凯与赵尔巽“针芥之契”的结果,袁世凯欲设清史馆网罗前朝遗老,赵尔巽则借修清史以报前朝胜恩,确乎合情合理。但前朝遗老对于入民国所设清史馆修清史态度各自不同,甚或截然相反,并未如袁氏所愿尽皆出山,而赵尔巽出任馆长一职过程也多有曲折。从考察清史馆的筹建背景及赵尔巽就任馆长的过程,可以更加深入具体地理解当时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的复杂关系以及后来的变化和差别,进而透示前清遗臣在新朝与旧主之间的微妙心理和矛盾立场。

一、网罗旧臣与议设史馆

(一) 复古招贤与设馆初议。1913年10月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越发专制独裁,11月4日解散国民党北京本部及各地国民党机关,次年1月又正式解散国会。与此同时,政府机构进行重大改组和调整,“改组工作标榜创新,实为复古”,^⑤(P507)各种旧式办事机构不断恢复。在打压进步党人的同时,袁氏不忘拉拢前清旧臣,如用政治会议代替已经停顿的国会,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设置参议院网罗人材等。当时舆论对此报道说,袁大总统对于海内硕学鸿儒及前清时代贵官大僚,皆委人敦请其晋京。^⑥不过,虽然袁世凯有意复古,变革机构名称以便适合前清旧臣出山,但后者对于是否出仕民国态度多有不同,所以预计设置参政职位70人,最后实际到任者不过1/3,樊增祥、瞿鸿禨、唐景崇、严修、丁振铎、锡良等六人还复电明确拒绝。^⑦鉴于参政对于遗老们来说恐有“贰臣”之嫌,袁氏随即又设立了一些名誉机关,如礼制馆、国学馆、考文苑等。设置清史馆,也旨在借编纂清史网罗前清旧臣。“此次参政任命发表,就中辞职最力者为劳乃宣、于式枚二氏,大总统以二君品学兼优,……又以二氏不愿就参政者,……于是拟别设清高之职以示尊礼之意,故急于组织清史馆,以便延聘劳、于二氏云。”^⑧

作者简介 伏传伟,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275)。

为配合网罗遗贤的需要，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国务院早在1914年1月底就提出了设馆修史的呈请：“前清开国以来，文物粲然，纪纲咸飭，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鉴人心之趋向，臻世界之大同。我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室，特颁优待条文，崇德报功，无微不至。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现拟广召耆儒，宏开史馆……。”⁷⁹与此同时，暂居皇宫的逊清皇室也决定编纂光绪德宗景皇帝实录。时有报纸云：“闻清廷现已决定将德宗景皇帝实录于今春开始编纂，以庚续大成，其总裁之任拟特派梁鼎芬、陆润庠。又闻政府对于清代全史亦拟派员修纂，拟派之总裁为徐世昌、陆润庠，惟进行手续尚未核定。”⁸⁰清室拟派梁、陆为编纂德宗实录总裁合情合理。而民国政府拟派名义上都还是清室的官员徐、陆为清史馆总裁，确乎让人费解。因为让他们担任总裁，不像是民国政府修史，更像是清室修史；而所设之清史馆究竟是民国的清史馆抑或清室的清史馆，其性质界定颇为模糊。后来批判《清史稿》的人多由此立论，但从南北和谈及民国创建的具体过程看，民初政府与清室的关系又有不同。

（二）南北议和与新旧递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启用被贬谪的袁世凯，出于自身地位的前车之鉴及当时革命形势考虑，袁氏决定议和，而南方革命军也无充分的武力推翻满清政府。双方谈判持续数月，最后议定清帝退位创建共和，同时颁发一部让隆裕太后及满清贵族较为满意的《清室优待条例》。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⁸¹虽然“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据说是由袁世凯本人或徐世昌后来加入，但由清廷谕旨颁发当即代表其旨意。据此，未来中华民国政府即使不是清廷的延续，也有出自清廷创造的功绩。南京临时政府方面注意到谕文措词不妥，孙中山立刻“致电袁世凯，强调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然而“袁世凯已于本日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袁’之名义向内外大小文武官衙与军警发表文告”。⁸²（P656）当时北方舆论也给人以共和乃清廷谕旨所颁，并非革命党人斗争结果的印象，更有报纸赫然以“恭录共和谕旨”为题，报道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发。

至此，新建的民国与逊清旧朝就有了某种继替关系，原内阁总理大臣做了民国总统，其他追随袁世凯的大小官员也各就其位。民国政府中的前清官僚，更视新旧朝递嬗为清廷“禅让”的结果，身在新朝为官，却恋恋不忘旧主者大有人在。袁世凯领导的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关系也颇为融洽，民国政府每年要给予清室优待经费400万元，并负责其陵寝维修及保护，确实是“崇德报功，无微不至”。1913年3月，隆裕太后死后，袁世凯“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⁸³（P87）由此看来，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的关系，与从辛亥革命及后来国民政府的立场观察大相径庭，与明清递嬗满汉不两立的情形更是大不相同，聘请不愿担任参政之职的劳乃宣、于式枚二人入馆纂修清史，袁氏以为二人当可接受。

二、清史馆的初步筹建

（一）设馆命令与官制草创。1914年2月3日，根据袁世凯的旨意，国务院正式向大总统提出设立清史馆的呈请，具体内容有：首先提出设馆修史的理论依据，即中国断代修史的优良传统：“春秋而降，凡新陈之递嬗，每纪录而成编……。”其次颂扬清代的文治武功和“禅让”之举以及民国报德之功。既而提出纂修清史：“惟是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⁸⁴（第590号，1914-02-05）整篇呈文旨在美化清朝的文治武功，褒扬清廷的“让德”之举，把民国的创建说成是清廷“洞观世运、俯察輿情”的结果。这表明，至少在袁世凯及其政府看来，民国与其说是革命党人斗争的结果，毋宁来自清室的禅让，前者有窃取之嫌，后者则具有正统性。而设置清史馆网罗前清旧臣及老辈学人是袁世凯的既定宗旨，褒奖前清，一方面增强对遗老们出山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昭示民国与清室的继替关系，使遗老们觉得出仕新朝和忠于旧主之间并不矛盾。筹备1月有余，1914年3月9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设置清史馆的大总统令：“查往代述作，咸著史篇，盖将以识兴革之所由，资法鉴于来叶，意至善也。维大清开国以来，文物典章灿然

具备，……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14]（第660号，1914-03-10）

自国务院递交呈文到大总统令正式发布，其间国务院着手进行了一些具体的组织筹备工作，并且迅速拟订了一个清史馆官制草案，内容如下：

第一条：清史馆掌纂辑清史并储藏关于清史之一切材料；第二条：清史馆置官员如左：总裁（特任）、秘书（荐任）、纂修（同上）、协修（同上）、主事（委任）；第三条：总裁一人掌全馆事务，直隶于大总统；第四条：秘书一人，承总裁之命，掌理文书事务；第五条：纂修四人，协修八人分任编辑事宜；第六条：主事二人，承总裁之命掌会计及庶务；第七条：清史馆荐任官由总裁呈请大总统任命，委任官总裁专行之；第八条：清史馆为缮写文件及其它庶务得酌用雇员；第九条：本制自公布日施行。^[15]

该草案在清史馆的具体运作中有较大改动，但据此可以看出设馆之初民国政府对清史馆性质的基本定位。首先，清史馆不隶属于民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总裁直隶于大总统；其次，除总裁一人由总统特任外，其他人员分荐任与委任，而主要职位纂修、协修都为荐任官，需由总裁呈请大总统才能任命，只有主事可由总裁专任。由此可见，清史馆虽不隶属于民国政府的任何机构，不归国务院管辖，但从总裁到纂修、协修，都要经民国大总统同意方能任命，实际还是民国政府的特设机构。后来为了适应延聘遗老的需要，袁世凯不得不对此官制有所调整，并在延聘手续上做文章：“设总裁四人以分掌其事，均由大总统礼聘，不发任命，以示尊崇”，^[16]“赵氏就职后，即要求政府对于清史馆之用人及编纂问题均不得干涉，大总统亦一一允其所请。”^[17]清史馆及其人员的地位日趋尊崇，与民国政府的关系也愈加微妙，有心进入民国的前清旧臣固然为之心动，在旁人和后人看来，不免模糊了民国与清朝的界限而有同流合污之嫌。

（二）馆长人选之难。清史馆明令设置后，首要任务当是延聘修史人才，其中最重要的即为馆长一职。最初袁世凯想请徐世昌或陆润庠出任，但陆较顽固，不肯出仕民国；徐志不在此，且袁氏又有请其任国务总理之意，这二位人选遂作罢。当时学界较有名望的硕学鸿儒当属章太炎和康有为，章太炎正被袁世凯软禁；而康有为似在讨论名单之内，^[18]但清亡后，康氏一直以遗老自居，并和宗社党关系密切，与袁世凯又有复杂纠葛，很难应允其事。另有以梁启超任馆长一说，^[19]梁启超时任币制局总裁，清史馆长一席于其不甚合，因此后来也作罢。此外，在馆长人选考虑之列者还有樊增祥、周馥等人，由于种种原因也都未能实现。^[20]虽然袁世凯想方设法让清史馆和馆长处于清高地位，以显示民国与清室的特殊关系，其所欲争取的前清遗老、硕学鸿儒还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愿就任，因为任民国的清史馆长一席，毕竟有出仕之嫌。由于馆长人选不能确定，所以清史馆也就迟迟未能正式开办。

在各方人选不能落实的情况下，袁世凯想到了赵尔巽，并亲自发函敦请其出山，^[21]（卷7，P27）赵尔巽为清末东三省总督，民初隐居青岛，袁氏对其优待有加，不仅颁大总统令“授以勋二位”，^[22]（第590号，1913-12-24）民国二年底还派人前往青岛，“召前奉督赵次珊来京协议要政。”^[23]赵尔巽此番入京和袁世凯会面，并未答应出山，但就民国政治向袁氏有所建议。徐一士认为“尔巽以‘援曩例以紓逸贤’之说进”，劝袁世凯设置清史馆，似有可能。或有人认为，“赵次珊自奉天都督还朝，不甘野处，自愿编修清史，以酬故君，袁氏即如其意以畀之。”^[24]（P60）揆诸实情，此说当为后人臆测。1914年初袁世凯发函敦请赵尔巽出山，传闻说“赵君复电颇有允意，约不久即当先行来京云”。^[25]由于馆长人选更换频繁，所以舆论对赵氏能否出山还是持观望态度，“现闻政府刻拟以赵尔巽氏承乏斯席，此信恐未必确，而言者谆谆，或者竟有此事耶。志之以观将来”。^[26]果不出所料，未几，赵尔巽以身体不适为由请辞，“大总统前已拟决推任赵次珊君为清史馆总裁，已连电相邀，乃赵君复电以病推辞，并无来京之确期。昨闻大总统以清史馆开馆不能再延，曾亲笔专函敦促赵君来京，并特派秘书王延年赴青岛劝驾云。”^[27]尽管如此，赵氏仍迁延不出。

三、有功新朝与不负旧主

（一）代弟讼冤事件。对于赵尔巽先允出山，后又称病不出，时人颇觉难以理解，舆论有种种猜测。

个中原由，颇耐人寻味：“新政府改组后，前清故吏相继登庸，惟赵次珊为大总统最密契友，竟千呼万唤不能出来，闻其原因非止一项关系。大致一为某大吏之案尚未办结，一为老病衰迈，一为无相当之位置，一为与某当局意见素不甚合之故。”^[29]所列四种原因：老病衰迈无疑是托词借口；无相当之位置亦不确，“清史馆开，属以总裁，公（即赵尔巽）曰是吾志也”；^{[29]（P77）}与某当局意见不合当指徐世昌，徐、赵二人在清末曾有一段纠葛，但徐氏当上国务卿后也曾致函赵氏请其出山，^[29]可谓颜面给足。所谓“某大吏之案尚未办结”，当指赵尔巽之弟、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建祠议恤一事。赵尔丰辛亥革命时在川被杀，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对前清旧臣遗老颇多优待，甚至高官厚禄不减当年，加上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之间“禅让”、“优待”之关系，赵尔巽也想从民国政府方面为其弟平反。1914年1月底，在赵氏旧部的授意下，川民杨隽、魏绍猷等40余人上呈大总统，请为赵尔丰建专祠祭祀。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四川旅京同乡200余人立即在永光寺西街全蜀馆召开大会，商量对策，公推同乡会会长杜德兴为代表向杨隽等交涉，^[29]并向内务部呈请取消此案。杨隽等见事不可行，“亦有悔呈奉内务部，批准取消在案”。^[29]至此，赵尔丰建祠一事遂中止。赵尔巽因其弟昭雪之事未能落实，难免耿耿于怀。

袁世凯得知赵氏本意，立即授意曾为赵尔巽部下的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上呈为赵尔丰议恤立传。接到朱庆澜上呈后，袁世凯特派员赴川调查赵尔丰死事详情，随即颁发大总统令为赵尔丰平反：“查该故督于革职之际，洞明大局，退职安民，赞成共和之心昭然若揭，有功民国确有实证，猝被惨祸，殊堪怜悯。著国务院从优议恤，并著内务部查取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勩。”^{[30]（第675号，1914-03-25）}虽然赵尔丰对于辛亥四川独立确有一定作用，^{[30]（P241）}深受其害的川人当时对于政府此举还是强烈反对，但大总统令已下，最后折衷方案决定议恤照旧，立传暂缓。“援照沈故前督例给予一次恤金七百圆，遗族年抚金四百五十圆，由财政部发给，照章给予三年。”^{[31]（第690号，1914-04-09）}对此结果，赵尔巽仍不甚满意，“昨大总统复以电敦促之，赵亦未表示从违之意思。闻以私函致某要人，必要求政府将某高等武人案圆满解决后，始肯出山云云。”^[31]袁世凯连电催促，赵则托词曰：“因夏日炎热，拟秋后来京云。”^[32]直至6月初，清史馆的开办已经耽搁近3月之久，在袁世凯再三去电敦促下，赵尔巽这才动身北上，“到京后住秦老胡同，系大总统特备之公馆，并派车队四名妥为护卫，可为极优之旷典矣。”^[33]开始赵“对于清史馆馆长一席仍辞不就，闻大总统坚持责其担任，辞不获命，已经应允矣”。^[34]

时人对赵尔巽以赵尔丰案作为出山条件，多有评论：“赵尔巽之于史馆总裁也，曾要求昭雪乃弟，始肯就任，今得二十四日大总统矜悯之令交院议恤，赵尔丰平反，于是赵尔巽得安然就任史职矣。”^[35]以遗老自居的赵尔巽，何以冒犯川人众怒之险而为其弟争一有功民国有罪清廷之虚名，内中缘由，牵连民国与清廷的关系。袁世凯北洋政府中的前清旧臣视民国为清廷“禅让”的结果。既然清廷“洞观世运，俯察輿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36]（第628号，1914-02-05）}那么赵尔丰悬挂国旗，赞成民国，既有功民国也不负旧主。此种解释后人看似牵强，实则正是赵氏之流的前清旧臣在民国初年内心写照，所谓“及辛亥南方革命军起，人心惶惶，恐慌已极，清帝复以救民水火为己任，立建共和，愿行揖让，天下赖以安定，亦无非一念为民而已”。^[36]此外，赵尔巽此举也是为自己出山寻求依据。既然民国与清廷是“禅让”关系，赞成民国并非背叛清廷，那么出仕新朝自然也就不负旧主了。如此一来为新朝修旧主之史，应是有功而非不忠。

（二）遗臣态度各异。赵尔巽就任后，立即在秦老胡同设置“清史馆临时筹备处”，开始着手进行组织筹建。馆员聘请伊始，“每日踵门干谒者，户限几为之穿”，^[37]甚至有老友旧交写信推荐修史人材。^{[38]（P68）}但是赵氏心目中的人选“必须由翰林苑起家，学问渊博，掌故熟悉，或精通满蒙藏各文者方为合格”。^[38]而“是时遗老，有主张修史者，有以为不当修者”。^{[39]（P172）}后来所聘诸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入仕民国再入馆修史，如吴廷燮、王式通、王树枏等；未在民国政府任职但对民国设馆纂修清史一事表示赞同，如夏孙桐、秦树声、姚永朴等；不愿入馆但担任名誉职者，如严修。不愿入馆但对修史之事比较积极，如

于式枚，名列纂修兼总纂，但始终未入馆，不过于修史提出过诸多建议。虽然入馆之人众多，但赵尔巽最看重的一些人物并未出山，“赵氏因拟请皇室派陆师傅润庠为总纂，藉以号召前清翰林院御史台之人物，不料又有他种原因，此等计划复归无效。”^[87]不但如此，一些顽固遗老甚至明确反对设馆纂修清史，如梁鼎芬就致函赵尔巽说：“国号虽更，少帝尚在，当此时代，公然编纂清史，对于现今幼主而直书前皇之遗事，宁非不敬之尤者耶？鄙意斯举请即中止，却为稳当。”^[88]

由此可见，前清遗老旧臣对待民国的心态颇不相同。陈宝琛、梁鼎芬等恋恋不忘旧朝，对于民国政事一概不闻不问；于式枚、严修等人严守名节，虽未出仕民国，但并未怀有敌意；其他诸人则视民国为清廷“禅让”所建，将入馆修史作为报效旧主的表现，同时多少也有融入民国之意。赵尔巽多聘前清旧臣参加修史的主张，以致“新党中人恐该馆撰革命史必多偏袒，且将表明袁总统之大权非于革命后由国民公决予之，乃得诸清帝之禅让”。^[89]遗老一多，则其编纂之时，对旧主有所袒护与避讳也就不可避免。的确，在遗老们的眼中，民国得诸清廷“禅让”已成公识，这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确实视民国为清廷“禅让”的观点相一致。遗老们在新朝旧主之间获得某种程度的平衡，也就不足为怪。

（三）政府经费风波。赵尔巽起初预算清史馆的临时开办经费为1万元，每月经常经费为1.2万元，后来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开办费改为2万元，每月经费追加至2.2万元。就在一切筹备工作井井有条、按部就班之时，突起经费预算风波，以致清史馆之筹建差点戛然而止。此事起于财政部向国务院呈复国史馆所据经费时措词不当，呈文称：“本部详加查核该馆（指国史馆）与清史馆情形大略相同，……其经常费十万零一千六百七十五元，平均每月仅八千四百七十二元，与清史馆经费相较，该馆预算似较撙节。”^[90]清史、国史两馆同时筹建，预算也几乎同时递交。赵尔巽对于财政部将两馆相提并论，且为国史馆抱屈的说法大为恼火，遂上书大总统，呈请清史馆暂缓开办。其时国史馆长王闾运因与馆员意见不合离京回湘，受此影响，赵尔巽萌生退意，“拟即日请假一个月赴胶州调养，将来是否返京就职，察观情形如何再定。”^[91]袁世凯阅其呈请后，为安抚赵氏，当即交谕财政部，将议准清史馆经费速筹的款按数拨给。在袁世凯的一再挽留下，赵答应继续留任，“清史馆开办经费周总长停滞，赵尔巽自请缓办，袁批慰勉并飭速拨，始和好如初。”^{[92]（1914-07-29）}

其时京师各报的舆论，多把此次经费纠纷归咎于财政部，谓其“何必在国史馆文章中而讥讽清史馆”，况赵总裁“此辈老人浮沉政海中数十年，早无一功名富贵之念，与王壬秋八十而仕其滋味不同。经此一番讥讽，遂有抛弃之意”。^[93]舆论把赵尔巽与王壬秋作比较，而对两人的相似言行评价截然不同，似应根据清史、国史二馆的性质不同而定，国史馆为民国政府的正式机构，清史馆“系临时设置机关，迥非国史馆常设机关情形可比”。^[94]所以赵尔巽出任民国清史馆长一职，虽然陈宝琛等顽固遗老视为贰臣，但时人也有认为不算出仕之举。

四、结语

寓居青岛的赵尔巽不怕背负“贰臣”之名出任清史馆长，虽以“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95]（P90）}为自己辩解，又得到一些舆论的谅解，以为“赵君自民国成立后，本无意于仕途，此次之出任清史馆长，且意欲编纂一至完全之清史，以尽其耿耿之心”，^[96]仍被顽固遗老目为不忠。其出山之时，“为其弟尔丰极力辩冤，闻可办到未曾反抗民军而止”，^{[97]（1914-03-14）}甚而证明其有功于民国，表面上对新朝不无趋附之意，实则顺应“禅让”之说，试图在新朝旧主之间求得平衡。如此，赵尔巽任清史馆长为民国修清史，至少在他本人和相当一批遗老旧臣看来，未必是对清廷的不忠。

民国取代清朝，与明清兴替分别甚大，满汉之分，新旧之别，前后相继，交织错综。与民国保持距离者，或是固守传统文化而与守旧者声气相通，可谓文化遗民而非遗老；或在新朝旧主之间谋求出路，绝非不食周粟；有意表现气节者，反而往往被时论讥刺为矫情。所谓遗老，不忘旧主之心相同，报效之手段则各异，赵尔巽甘冒出仕新朝之嫌而修旧主之史的行为，可以从北洋政府与逊清皇室的关系中找到

两全其美的解释,其在编纂清史之时,对于旧主多有曲笔维护也就不可避免。倘若北洋政府一直延续,这些从法理上未必成为问题,尽管舆论必然议论纷纷。随着小朝廷被逐出紫禁城,设馆礼聘前清旧臣修前朝正史的法理依据已经改变,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渊源上实为当年南京临时政府的继续,共和革命与忠君保守的观念再度发生碰撞,立场转换之间,《清史稿》的正当性不复存在,只能成为人们口诛笔伐、鸣鼓攻之的对象。

[参考文献]

- [1] 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
- [2] 容庚.清史稿解禁议[N].大公报·史地周刊,1934-09.
- [3] 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J].北京大学国学季刊.
- [4] 徐一士.《清史稿》与赵尔巽[J].逸经(第2期),1936.
- [5]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 袁总统网开八面[N].盛京时报,1913-12-19.
- [7] 各参政已有辞职者[N].盛京时报,1914-06-04.
- [8] 清史馆组织之丛谈[N].时报,1914-06-15.
- [9] 熊总理拟请设清史馆[N].盛京时报,1914-01-31.
- [10] 清廷编订清史[N].(天津,下同)大公报,1914-02-01.
- [11] 恭录共和谕旨[N].盛京时报,1912-02-15.
- [1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3]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4] 政府公报.
- [15] 清史馆官制[N].申报,1914-02-09.
- [16] 清史馆消息三则[N].时报,1914-07-08.
- [17] 康有为允任修史之传闻[N].大公报,1914-02-08.
- [18] 政府确将开清史馆[N].申报,1914-01-29.
- [19] 赵尔巽有派充清史馆总裁之说[N].盛京时报,1914-03-14.
- [20] 徐有明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Z].北京:新中国书局,1931.
- [21] 赵尔巽氏来京消息[N].盛京时报,1913-12-09.
- [22] 沃邱仲子.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M].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八辑)[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23] 赵次珊有允就清史馆之意[N].大公报,1914-03-16.
- [24] 大总统催促赵次珊来京[N].大公报,1914-03-29.
- [25] 赵次珊不允出山之原因[N].大公报,1914-05-15.
- [26] 爽良.野堂轩文集[C].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7辑)[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 [27] 徐东海函劝赵锡出山[N].大公报,1914-05-23.
- [28] 旅京川人之公论[N].顺天时报,1914-02-03.
- [29] 川人不甘心赵尔丰[N].盛京时报,1914-04-04.
- [30] 黎东方.细说民国创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31] 赵尔巽姗姗来迟[N].盛京时报,1914-05-10.
- [32] 清史馆急于开馆[N].顺天时报,1914-05-26.
- [33] 赵次珊到京后之情形[N].盛京时报,1914-06-09.
- [34] 赵尔巽与清史馆[N].盛京时报,1914-06-12.
- [35] 新评一[N].新闻报,1914-03-27.
- [36] 熊总理请修清史论[N].大公报,1914-02-03.
- [37] 清史馆物色人材之慎重[N].大公报,1914-07-03.
- [38] 杨立强,沈渭滨等编.张謇存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39] 王钟翰.张尔田师谈清史稿纂修之经过[A].清史补考[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
- [40] 梁鼎芬之直言[N].顺天时报,1914-07-16.
- [41] 北京专电[N].申报,1914-06-20.
- [42] 清史馆自请缓办之里面观[N].时报,1914-08-01.
- [43] 赵次珊亦有去志[N].顺天时报,1914-07-31.
- [44] 专电[N].申报,1914-07-29.
- [45] 清史馆筹备种种[N].新闻报,1914-08-09.

责任编辑:杨向艳

•岭南文化•

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背景*

◎ 曾大兴

[摘要] 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分布经历了一个由北而南的转移,唐五代时的粤北,宋、元、明、清、近代的珠三角,曾先后为文学家的分布中心;就粤北、粤西、粤东和珠三角这四个地区来讲,其境内的有关郡、州、路、府之治所,则是文学家分布的亚中心。文学家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变化,有其独特的区域文化背景,而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广东文化之所以能在唐宋时期显露生机,在明清时期大放异彩,一是得益于自秦汉以来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的经济开发,二是得益于北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三国以来北方“谪宦”和“流寓”的影响,三是得益于宋代以来处于全国先进行列的官、私教育。

[关键词] 广东历代文学家 地理分布 文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110-07

一、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分布格局

广东籍的文学家,虽然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家辞典都有记载,但是数量都很少。例如由谭正璧编、光明书局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应该说是一部有影响的工具书,该书收录中国历代文学家达6800余人,其中有籍贯可考者6293人,除去越南、朝鲜和蒙古籍的7人,还有6286人,而广东籍的文学家只有118人,不到总数的1.9%;又如由曹道衡、周祖谟等分头主编,中华书局1992年起陆续出版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收录的文学家大大超过谭编辞典,但是于广东籍的文学家仍然收录过少,例如清代卷,收录文学家达3124人,而广东籍的仅78人,不到总数的2.5%。这就提醒我们,关于广东籍文学家的统计工作,不能仅仅依据大家所习见的各家文学史、各种文学家辞典、各史《文苑传》《艺文志》,以及各个时代的文学总集、书目、纪事之类,而必须借助于广东地方文献。

事实上,广东地方文献所著录的文学家是很多的,有的人有文集传世,有的人文集已经散佚,有的人只留下若干单篇作品或作品片断,有的人没有留下任何作品,只是被某些记载描述为能诗、能文,等等,这就需要有所取舍。笔者的取舍原则是:

1. 元代和元代以后的文学家,必须有文集,方能入选;
2. 元代以前的文学家,曾经有文集,后来散佚了,可入选;
3. 原本就没有文集,只有单篇作品,或作品片断,不入选。

根据这三条原则,筛选出广东籍的文学家共2046人。(见下表)

*本文为曾大兴主持的广州市属高校2004年度科技计划项目“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项目编号:3039)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曾大兴,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405)。

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表

市名	县(市、区)名	人数	汉	晋	南朝陈	唐五代	宋	元	明	清	近代
广州市	番禺区	353			1	1	2		65	180	104
	增城市	14					2		5	4	3
	从化市	5							5		
	花都市	2								1	1
	小计	374									
佛山市	南海区	277	1				5		82	124	65
	顺德区	246					2	1	68	134	41
	三水区	15							1	3	11
	高明区	7					1		6		
	小计	545									
中山市		182						1	18	115	48
东莞市		137					9	1	49	47	31
江门市	新会区	123							39	63	21
	台山市	18						1		4	13
	鹤山市	6								2	4
	开平市	3									3
	恩平市	1								1	
	小计	151									
惠州市	惠阳区	19							5	5	9
	博罗县	8					1		3	4	
	龙门县	1									1
	小计	28									
深圳市		1									1
肇庆市	高要市	20							1	16	3
	德庆县	10					1		3	4	2
	封开县	3	1			1				1	
	四会市	3								2	1
	小计	36									
阳江市	阳春市	3								3	
	江城区	2					1				1
	小计	5									
云浮市	新兴县	7							2	3	2
	罗定市	2								2	
	云城区	1								1	
	郁南县	1								1	
	小计	11									
茂名市	高州市	12							2	4	6
	信宜市	11								2	9
	电白县	4							1	3	
	化州市	2							1		1
	小计	29									
市名	县(市、区)名	人数	汉	晋	南朝陈	唐五代	宋	元	明	清	近代
湛江市	雷州市	5							1	4	
	吴川市	9								7	2
	遂溪县	1									1
	廉江市	1									1
	小计	16									
清远市	清城区	2							2		
	连州市	7				5	1			1	
	英德市	2								1	1
	阳山县	1								1	
	小计	12									
韶关市	曲江区	7				2	1		1	2	1
	始兴县	7				1	2		2		2
	翁源县	2				1			1		
	仁化县	2							1	1	
	新丰县	1								1	
	乐昌市	1									1
河源市	南雄市	1								1	
	小计	21									
	连平县	5								4	1
	和平县	1								1	
	小计	6									
梅州市	梅县	49					1		4	30	14
	大埔县	33							4	13	16
	兴宁市	19							3	9	7
	五华县	10							1	2	7
	蕉岭县	8								3	5
	平远县	5								3	2
	丰顺县	3									3
	小计	127									
潮州市	潮安县	38					4	1	13	17	3
	饶平县	11					1		6	1	3
	小计	49									
汕头市	澄海	11							5	3	3
	潮阳	14							11	1	2
	小计	25									
揭阳市	揭阳	12					1		10		1
	惠来	6							1	3	2
	小计	18									
汕尾市	陆丰	1								1	
	海丰	2							1		1
	小计	3									
未详市县		246		2		1	7		19	114	103
全省总计		2022	2	2	1	12	42	5	442	953	563

说明：1. 定安（4人）、琼山（13人）、文昌（3人）三地，1988年以前属广东，今属海南；合浦（2人）、钦州（1人）两地，1965年以前属广东，今属广西；九龙（1人）一地，1897年以前属广东，今属香港。三地合计24人，本表未予列入；2. 本表所列市、县（市、区）名称，以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5）》所载广东省政区为准。

东汉时，有两位文学家占籍广东，一为苍梧郡封开县的陈元，一为南海郡的杨孚。陈元的文集已佚，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有他的《请立〈左传〉疏》一文，是一篇有文学价值的古文。杨孚著有《异物志》一卷，其中的某些韵语，是有文采的四言诗。晋代也有两位文学家占籍广东，一为黄整，一为王范，文集均已佚。南朝陈代，有南海郡人刘蒯，被时人目为“江左奇才”，《艺文类聚》载其五言诗九首，多音律谐协，对仗工整。然以上这些，都只能算是广东文学的滥觞，尚未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学家的分布格局，也是如此。

广东文学之自具面目，实始于唐代；文学家的分布格局，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唐五代时期，有籍贯可考的文学家共11人，其中粤北（连州和韶州）9人，粤西（封州）1人，珠三角（广州）1人。粤北占了总数的81.8%，而且出了像张九龄这样的开宗立派的重量级人物。这个时期，广东文学家的分布中心在粤北。

两宋时期，有籍贯可考的广东文学家共35人。其中珠三角（广州和惠州）21人，粤西（南恩州、肇庆府、肇庆府）3人，粤北（连州、南雄州和韶州）4人，粤东（梅州和潮州）7人。粤北籍文学家所占比例由唐五代的81.8%下降到11.4%，虽然出了像余靖这样的有影响的人物，但是，粤北的文学人才中心地位已经丧失。珠三角籍的文学家占了总数的60%，而且出了像崔与之、李昉英这样的有全国影响的人物，珠三角取代粤北，成了广东文学人才的中心；粤西在唐代占9.1%，在宋代占8.6%，降幅不大；粤东则异军突起，不仅实现零的突破，而且占了20%的份额，比粤西多11.4个百分点。

元代的广东文学，是唐宋和明清、近代之间的一个低谷，这个时期的广东籍文学家只有5人，其中珠三角（广州路）4人，粤东（潮州路）1人。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地区的文学家仍然占了总数的80%，仍然处于中心位置，粤东占20%，粤西、粤北均为零。

明代，有籍贯可考的广东文学家多达423人。其中珠三角（广州府和惠州府）343人，占总数的81%；粤西（肇庆府、高州府和雷州府）17人，占4%；粤北（韶州府和南雄府）5人，占1.2%；粤东（潮州府和惠州府的兴宁、长乐）58人，占13.7%。珠三角地区仍然是广东籍文学家的分布中心，粤北和粤西所占比例有所回升，粤东虽比宋元时期低了6.3个百分点，仍不失为广东籍文学家的一个亚中心。这个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是广州府的南海、番禺和顺德三县，这三个在地理上毗邻的县份，一共出了215位文学家，占全省的51%，文学史上有名的“南园五先生”（南海孙贲、王佐，番禺赵介、李德、黄哲）和“岭南三大家”（南海梁佩兰、番禺屈大均、顺德陈恭尹）就出在这里。

清代是广东籍文学家出现最多的一个时代，仅从清朝开国至道光末年这23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籍贯可考的文学家就多达839人。其中珠三角（广州府、惠州府和肇庆府的鹤山、恩平）688人，占82%；粤北（韶州府、南雄州、连州和惠州府的长宁）8人，占1%；粤西（肇庆府、罗定州、高州府和雷州府）53人，占6.3%；粤东（潮州府、嘉应州和惠州府的和平、连平）90人，占10.7%。珠三角地区仍然是文学家的分布中心，粤西地区比明代上升了2.2个百分点，粤东地区比明代下降了3.6个百分点，粤北地区比明代下降了0.6个百分点。清代广东籍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仍然保持明代的格局。

近代在这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实际上包括了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和中华民国这两个时间段，大约100年的时间。近代广东有籍贯可考的文学家460人。其中珠三角（省政府直接督察区，专署行政督察区第一区、第五区）共357人，占77.6%；粤北（第二区、第三区）5人，占1.1%；

粤西（第四区、第八区、第九区）29人，占6.3%；粤东（第六区、第七区）69人，占15%。珠三角地区虽比清代低了4.4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宋元以来的中心地位，出现了像南海康有为、新会梁启超这样的领一代风骚的人物；粤西地区和清代一样；粤北地区比清代上升了0.1个百分点；粤东地区比清代上升了4.3个百分点，比明代上升了1.4个百分点。粤东不仅较其它地区发展为快，而且还出现了像嘉应黄遵宪、蕉岭邱逢甲这样的在近代文学史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见下表

广东四大地区历代文学家分布数量升降表

时代	粤北地区人数	百分比	珠三角地区人数	百分比	粤西地区人数	百分比	粤东地区人数	百分比	历代总数
汉			1	50%	1	50%			2
南朝陈			1	100%					1
唐五代	9	81.8%	1	9.1%	1	9.1%			11
宋	4	11.4%	21	60%	3	8.6%	7	20%	35
元			4	80%			1	20%	5
明	5	1.2%	343	81%	17	4%	58	13.7%	423
清	8	1%	688	82%	53	6.3%	90	10.7%	839
近代	5	1.1%	357	77.6%	29	6.3%	69	15%	460
合计	31	1.7%	1416	79.7%	104	5.9%	225	12.6%	1776

说明：1. 虽占籍广东，然未详州县的246位文学家（包括晋代的2位）没有列入；2. 原占籍广东，现属海南、广西和香港的24位文学家没有列入。

这1776位文学家的分布格局，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概而言之，表现为三个层级：

第一，文学家的分布中心经历了一个由北而南的转移。唐代以来，广东先后出现了两个文学家的中心，一个是唐五代时的粤北地区，一个是宋、元、明、清、近代的珠三角地区。粤北地区的优势地位自宋代开始丧失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珠三角地区自宋代开始成为文学家的中心之后，历经千年而保持不变。粤西地区自汉代以后，总在低水平上徘徊，它所占的比例再也没有超过10%。粤东地区文学家的增长幅度虽起伏多变，但总的来讲胜过粤北和粤西。

第二，上述四个地区的郡、州、路、府之治所，成了文学家的亚中心。这类治所和本地区的其它县份相比，往往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具有政治、经济、交通、教育、文化传播诸方面的区位优势，具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因而也就成了文学家的一个渊薮。如番禺县自秦以来、南海县自宋以来，即为历代的郡（州、路、府）之治所，这两个县所出的文学家多达630名，占了珠三角地区的44.5%；又如广信、高要、茂名、海康等县，自汉以来，亦先后为各个郡（州、路、府）之治所，这四个县出了40名文学家，占了粤西地区的40%；而程乡县自宋以来、海阳县自明以来则分别为有关州、府之治所，两个县一共出了87位文学家，占了粤东地区的39%。

第三，就各个县份来讲，文学家族的优势又非常明显。如番禺县的卫氏、王氏、方氏、叶氏、冯氏、史氏、伍氏、刘氏、汪氏、张氏、居氏、屈氏、胡氏、俞氏、凌氏、梁氏、黎氏、潘氏，从化县的黎氏，南海县的伦氏、关氏、劳氏、吴氏、陈氏、招氏、庞氏、桂氏、郭氏、梁氏、谭氏、颜氏，顺德县的余氏、苏氏、李氏、吴氏、张氏、陈氏、罗氏、黄氏、梁氏、温氏，高明县的区氏，香山县的刘氏、李氏、麦氏、何氏、黄氏，东莞县的祁氏、刘氏、张氏、林氏，新会县的区氏、苏氏、李氏、易氏、陈氏、唐氏、黄氏，台山县的陈氏，博罗县的韩氏，德庆县的李氏，高要县的冯氏，电白县的邵氏、彭氏，丰顺县的丁氏，蕉岭县的邱氏，嘉应的黄氏、叶氏，海阳县的吕氏、陈氏，澄海县的谢氏，潮阳县的周氏，揭阳县的郭氏等等，据笔者统计，这样的文学家族不下于80个，被列入表一、表二者，都是有文集问世或曾经有文集问世的。这些文学家族的成员，或为祖孙关系，或为父子（父女）关系，

或为兄弟（姐妹）关系，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他们声应气求，薪火相传，组成了一道又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二、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分布背景

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变化，有其独特的区域文化背景；而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广东文化之所以能在唐宋时期显露生机，在明清时期大放异彩，一是得益于自秦汉以来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的经济开发，二是得益于北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三国以来北方“谪宦”和“流寓”的影响，三是得益于宋代以来的处于全国先进行列的官、私教育。

1. 区域经济背景

文学家的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变化，与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是基本吻合的。如同文学家的分布线路是由北而南、由西而东一样，广东经济的空间开发架构也是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纵观古代广东的经济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唐以前。这个时期，自然经济在广东占绝对优势，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和南部地势高旷、气候干爽、中原移民较多的河谷、盆地之中，包括贺江盆地、连州盆地、坪石盆地、韶关盆地、南雄盆地、英德盆地，以及高雷和广州附近的台地等。最早出现的一批城镇，如曲江、桂阳（连州）、中宿（清远）、博罗、四会、高要、番禺等，主要分布在北江和西江沿岸。当这些地方成为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的时候，粤东地区还相当落后，农业的开发程度很低，城镇也非常少见。经济的发展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保障，文化教育的发展则为文学家的产生提供土壤。我们看唐五代以前的广东文学家，有籍贯可考的共14人，其中粤北出了9人，粤西出了2人，珠三角出了3人，粤东则一个也没有。粤北的发展程度最高，文学家也出得最多。

第二个时期是唐宋两代。随着大庾岭的开通和广州对外贸易的活跃，广东与内地的物质交流和人员往来得到加强，在全国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唐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入居广东者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东江和韩江谷地，以及雷州半岛等地，沿海地区的农业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增加。在宋代，除京畿之外，各路依户口分县为6等，其中广州有望、上、中县5个，韶州6个，连州3个，潮州3个，循州（惠州）3个，钦州1个，廉州1个，其余诸州均以中、下县为主。与人口的增加相伴随，城镇也多了起来，除广州作为广南东路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之外，有影响的城镇还有循州、韶州、连州、潮州、南恩州、雷州、廉州等等。总的情况是，有宋一代，粤北（韶州、连州）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而珠三角（广州、循州）和粤东（潮州）的地位则大幅度提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也是这样。粤北籍文学家所占的比重由唐代的81.8%下降到11.4%，珠三角地区则由9.1%上升到60%，粤东则异军突起，并且占了20%的份额。

第三个时期是元明清和近代。特别是在清乾隆时期，广东的工业在许多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以后，广东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传统的冶铁、纺织等手工业陷于停滞，但是由于地处沿海，广东在吸收新式工业技术方面比内地方便，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省份。这个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和粤东、粤西的部分地区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得沿海之地利，它们在设备、人才、技术、资金、信息、市场乃至货物运输各个方面的优势，都远非处在内陆的粤北所能望其项背。广东境内的地区差异，实际上从明清时期就形成了。在古代的中国，人口数量的升降最能反映出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唐代天宝元年，广东各州郡的人口为109.2万人，粤北地区的韶州和连州就多达31.2万，珠三角的广州和循州（惠州）只有27.1万人，而粤东地区的潮州则只有2.6万人；^{[1] [208]}到了清代雍正七年，广东的人口发展到465.9万，珠三角的广州和惠州多达180.5万，粤东的潮州和嘉应州达96.2万，粤西的高州、罗定、廉州、雷州、肇庆达93.8万，而粤北的韶州、连州、南雄州只有50.7万，还不到珠三角的三分之一。^{[2] [246]}与人口的发展状况大致吻合，珠三角的文学家数量自唐代以后一直占据绝对

优势, 多达1413人, 粤东次之, 达225人, 粤西再次之, 102人, 粤北最少, 仅有22人, 少得不成比例。

2. 区域文化背景——北方“谪宦”和“流寓”的影响

经济是文学发展的物质基础, 然而, 经济和文学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 其间还有一个中介, 这便是文化。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不会因为经济状况的变化而迅速变化。广东文化之所以能在唐宋时期显露生机, 在明清时期大放异彩, 固然是得益于自秦汉以来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的经济开发, 但北方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北方“谪宦”和“流寓”的影响, 也非常重要。

自三国吴时起, 包括广东在内的岭南大部分地区, 就成为朝廷流放得罪官员的地方。郝玉麟《广东通志》卷262《谪宦录》考证:“唐以前得罪至岭南皆迁徙为民, 至唐始谪为宦, 有责授左授之分。”^[3]该志引王守仁《送李柳州序》云:“唐宋时吏其土者或未必尽以谴谪, 而以谴谪者居多。”部分被谴谪的人, 时间久了, 他们或他们的后人, 便成了当地的居民, “是时, 天下已乱, 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 可以避地, 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 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 皆客岭表”。例如唐代名臣刘崇望之子刘浚、太学博士倪曙、宰相李德裕之孙李衡、司农少卿周杰、娴于典章制度的杨洞潜、孔子41世孙孔昌弼等, 均先后迁移岭南。^[4]

《广东通志》卷43“谪宦志”载有从西汉末年到明代万历年间贬谪岭南的98位官员的事迹, 同时附有60位流寓岭南的人士的资料; 另有韩愈、刘禹锡诸人, 因“窜逐之余, 鞠躬尽瘁, 绩有不朽”, 则归入同书卷38“名宦志”。当然, 贬谪岭南的官员并不止这些。这些“谪宦”和“流寓”当中, 有不少是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人。他们为当地文学人才的成长, 做了许多培植的工作。如虞翻徙南海, “虽处罪放, 而讲学不倦, 门徒尝数百人”。郑侠徙英州时, “英人无贵贱, 皆加敬礼。争遣子弟从学”。^[3]卷43刘禹锡在连州, “以词章自适, 而郡中文学日兴。论者多其振作之功”。韩愈在潮州时, “命进士赵德为之师, 自是潮之士笃于文行”。^[3]卷38张九龄是岭南第一位进士, 第一位宰相, 也是第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张九龄走上诗坛, 进而走上政坛, 成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 与为官岭南的王方庆有关系, 与谪宦岭南的北方文学家沈佺期和张说更有关系。《新唐书》张九龄本传载:“张九龄字子寿, 韶州曲江人。七岁知属文。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 方庆叹曰: 是必致远。会张说谪岭南, 一见厚遇之。”^[5]王方庆是咸阳人, 垂拱元年(685)始任广州都督。《广东通志·名宦志》对他评价很高, 称“有唐以来治广州者, 无出方庆之右”。此人不仅清正廉能, 而且“博学好著述, 所撰杂书凡二百卷, 尤精三礼”。^[3]卷38张说于武后长安三年(703)秋九月流钦州, 中宗立(705), 被召还。《新唐书》张说本传云:“(张说)‘喜推藉后进。’‘善用人之长, 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为文属思精壮, 长于碑志, 世所不逮。’”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又据《新唐书》张九龄本传:“弱冠乡试, 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5]

唐五代两宋时期, 占籍广东的文学家一共54人, 其中就有13人出生在粤北(韶州、连州、南雄州), 粤北是受北方文化影响最早也最大的地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仅唐宋两代, 谪宦、流寓粤北(韶州、连州、英州、南雄州)的知名文人就有崔仁师、卢肇、韩愈、窦存亮、刘禹锡、凌准、吴武陵、姚铉、章得象、米芾、苏轼、郑侠、朱敦儒、刘安世、李璆、张浚、张栻、方信孺、朱翼、洪皓、吴元美、吕祖俭、张震发、秦纲等20多人。以韶州、连州、南雄州为中心的粤北地区, 是中原文化进入广东的第一站。秦汉以来中原移民入粤, 多在这一带小作停留, 然后图南。故唐五代时期, 此地文风之盛, 非它处可比。至于其他“谪宦”和“流寓”对粤东、粤西和珠三角地区的积极影响, 如韩愈在潮州, 苏轼在惠州, 秦观在雷州, 等等, 都是大家熟知的事实, 道理是一样的, 限于篇幅, 不再一一列举。

3. 区域教育背景

广东的公私教育, 起步虽晚, 但发展速度惊人。唐代以前, 广东的学校仍不多见, 但到宋代, 广东的州学有15所, 县学有25所, 州学普及率达到100%, 县学普及率达到58%。据美国学者John W.Chaffee所著《宋代科举》一书统计, 当时全国24路中, 州学普及率达到100%、县学普及率达到58%以上的只有七

路,即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荆湖南路和广南东路,广东的官学教育居全国第六位。^[9]至于私人创办或主持的书院,在广东也是非常发达的。据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一书统计,宋代的广东有书院39所,居全国第四位(前三位依次为江西、浙江、湖南);明代发展到156所,跃居全国第三位(前两位依次为江西、浙江)。这些书院,主要分布在珠三角的广州、惠州,粤东的潮州,粤西的高州、罗定州和雷州等地,粤北非常少。清代广东的书院多达242所,居全国第五位(前四位依次为浙江、四川、江西、河南)。^{[7] P202-203}这些书院,仍以珠三角(广州府)为最多,仅香山、南海和新会三县,就有35所。至于官学,则是每一个府、县皆有,普及率达到100%。

官学是政府出资办的,每个州县都有,私学则是民间出资办的,要根据创办人或资助人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真正导致教育的地区差异的,是私学的数量、规模和水平。宋元以后,粤北地区因地理环境所限,经济发展缓慢,私学甚少,影响了整个地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故其文化落后于珠三角,人才也远不如珠三角之兴盛;而珠三角的文化之所以如此发达,人才之所以如此兴盛,说到底,还是由于学校教育成功,尤其是私学,功不可没。

官私学校是培养科举人才的摇篮。据诸史不完全统计,宋代广东被制举、辟荐168人,乡贡250人,进士575人,共993人。这993人的分布情况是:粤北209人,占21%;珠三角336人,占34%;粤东133人,占13%;粤西156,占16%;其它地区159人,占16%。珠三角的科举人才占第一位,粤北占第二位。元代广东的科举人才,大致保持着宋代的格局。据《广东通志·选举表》:有元90年间,广东乡贡119人,进士31人,加上察举者,共422人。这422人中,粤北45人,占10.7%;珠三角145人,占34.4%;粤东67人,占15.9%;粤西51人,占12%;其它地区114人,占27%。珠三角仍然占第一位,粤北则退至第四位。明代广东被朝廷察举618人,举人6437人,进士874人,总共7929人,而珠三角就占了49%,排第一位,粤东占了22.8%,排第二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府的南海、番禺和顺德三县。据记载,明代南海有进士148人,举人563人;顺德有进士99人,举人257人;番禺有进士86人,举人405人。三县进士、举人总数分别占全省的38%和19%,成为著名的南番顺人才之乡。明代的广东出了3个状元,南海1个,顺德1个,还有1个在海阳。海阳是潮州府治所在地,有明一代,潮州中举者多达千人,被誉为“海滨邹鲁”。清代广东的科举人才在总量上不及明代,进士、举人,还有察举,总共才6192人,仅及明代的78%,但是在地理分布上,仍然保持明代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粤东地区的人才剧增。仅仅是一个嘉应州,就多达826人,占了全省的13.3%。^{[7] P142-143}

宋代以来广东科举人才的发达,充分说明了官私学校教育对人才成长的决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科举人才在地理上的分布格局,与上述文学人才的分布格局是相吻合的。在上述有籍贯可考的1776名文学家,有进士、举人、秀才这样的头衔和诸生、贡生这样的资格,以及民国以后有大学学历或海外留学背景的人,竟多达1075人,占总数的61%。这些数据再次说明,在古代,多数的文学家是有科举功名的;在民国时期,多数的文学家是有大学学历的,部分人士甚至还有海外留学背景。这些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学校教育。

[参考文献]

- [1]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2] 司徒尚纪.广东历史地图集[M].广州:广东地图出版社,1995.
- [3] 郝玉麟.广东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Z]本.
- [4] 欧阳修.新五代史(刘隐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Z]本.
- [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张九龄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Z]本.
- [6] (美) John W.Chaffee.宋代科举[M].台北: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5.
- [7] 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责任编辑:王法敏

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商榷

◎ 吴宏岐

[摘要] 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自秦代修建今天广州城前身番禺城以来,广州城址2000多年来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实际上,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灭南越国后,南越国的番禺城曾被毁弃,另于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改置番禺县城,一直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才迁回旧址,其间共计327年,岭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政治中心是在今广州城南的新番禺县城,所谓广州城址2000多年不变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关键词] 广州城 汉番禺城 城址迁徙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117-04

一、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的诸种论断

目前研究广州历史文化、城市发展史或城市历史地理的学者,大多都坚持一种说法,即认为自秦代修建今天广州城前身番禺城以来,广州城址2000多年来就没有发生过变化。这种学术观点可简单地概括为广州城址2000多年不变说。

研究广州历史文化的学者普遍都持着广州城址2000多年不变的观点,或说“自公元前206年越佗在广州建立南越国以来,从来没有衰落过”,^{[1] ① P326-332)}或说“自秦汉以来,广州长期是郡治、州治、路治、府治、省治的所在地,为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枢”,“历经两千多年,广州中心城址一直不变,成就了众多的寻古访幽处”,^{[2] ② P2-4)}更有既说“任嚣始建的番禺城,应是广州地区最早的城。任嚣筑番禺城的年代,应是秦平岭南并在此建南海郡之时,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距今已有2210年历史了”,同时又说“从越佗建立南越国建都番禺起,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清,广州城由小到大,逐年扩展,其间虽然几经沧桑,饱受战火和天灾人祸的侵袭,但是广州城址一直未变。”^{[3] ③ P213-221)}上述诸说之中,关于广州城始建年代虽然有公元前206年南越国建都番禺城和公元前214年秦南海尉任嚣筑任嚣城的争论,但其共同的论断是都认为2000多年来,广州中心城址不变,历久不衰,因而为今天的兼有国家历史名城和三朝(指南越国、南汉国和南明王朝)古都双重身份的广州城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近年来,学者们虽然已多将广州城的始建年代统一论定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但也对广州城址2000多年不变说深信不疑,并力图探索其形成原因、历史影响及其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独特性。如司徒尚纪教授就认为:“广州作为岭南行政中心,虽然肇建于秦,实际上应奠基于南越国。尔后,广州这个政治中枢地位从未间断和动摇”,^{[4] ④ P228-238)}“名城广州即因背倚白云、越秀二山,前临珠江河曲凸岸所形成负阴抱阳聚水格局,加之主次山丘摆布得宜,地势高旷,备用地宽广等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由此选定城市的中心位置即今北京路与中山四路、五路交界地带,二千年未曾有变化,成为城市扩张的核心和依托,极利于城市发展壮大,这在全国名城中是罕见的。”^{[5] ⑤ P350-358)}周霞博士更论述说“广州从公元前214年建城起,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城市,其发展从时间上看没有中断,从空间上看没有转移,城市功能长期稳定且富有特色,是中国城市中不多见的典型案例”。^{[6] ⑥ P1)}

笔者认为,城市的发展演变不仅深受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影响。从中国城市发展史的规律来看,城址不断变化、城市形态与结构不断演变,正是各类城市尤其是古代都城或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果诚如上述学者所说,广州从公元前214年建城迄今的2200多年间,中心城址一直不变,并且历久不衰,那么不仅在中

作者简介 吴宏岐,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632)。

国城市发展史上,恐怕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而重要的现象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历史文献记载、考古材料等方面来看,自公元前214年秦南海尉任嚣筑任嚣城以来的2200多年间,广州城的发展确实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为名城广州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和精神文化遗产,但其间不仅曾经发生多起城市毁坏事件,如汉武帝平灭南越国和北宋平灭南汉国时的焚城、元初的毁城等等。更应引起注意的是,两汉时期的大多数时间,作为今天广州城前身的秦及南越国的番禺城实际上只是一片废墟,当时岭南区域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海郡治番禺城乃是在旧番禺城南50里处的今广州市番禺区境内,其地虽然仍属广州市辖区,但与广州旧城区却毫无关系。这就是说,所谓的广州城址2000多年不变说是颇值商榷的,那种认为广州从公元前214年建城起,“其发展从时间上看没有中断,从空间上看没有转移,城市功能长期稳定且富有特色”的说法,更是缺乏充分历史事实根据的判断。

二、历史文献关于汉番禺县城的记载

番禺县是秦代所设南海郡的治所,当时岭南地区最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所在地。西汉南海郡属交趾刺史部,东汉南海郡属交州刺史部,亦皆治于番禺。关于秦、汉番禺县的治所,历来学者多认为在今广州市旧城一带。如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即说:番禺为“潘虞二音。今广州。”^[7]卷129《货殖列传》(正义),P3269)后来的学者多从其说,在历史地名考证及标识方面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将秦、西汉、东汉南海郡治番禺县均标绘在今广州市旧城区的位置上。^[8]P11-12,35-36,(63-64)然而,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略有不同:“废番禺县,州南五十里,秦汉旧县,属南海郡。”^[9]卷157《岭南道一·广州·南海县》,P8)秦南海郡治及南越国都番禺县应该是在今天广州旧城区中山四路、五路一带,已得到考古发现的不断证实,所以《太平寰宇记》所说的位于旧城南面的秦汉番禺县城,应该是指两汉时期新置的番禺县城。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是在元鼎五年(前112年)秋发兵攻打南越国的,但路途不近,加以南越国军队的抵抗,一年后即元鼎六年(前111年)冬,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才分兵进至番禺城下,“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楼船力攻烧城”。^[10]卷113《南越列传》,P2976)杨仆烧番禺城一事,已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越王宫殿遗址正好有火烧过的炭屑和红烧土层堆积在瓦片层之上,厚达10厘米,反映当日火势很大,也说明王宫是毁于火的。^[10]P214)王宫既被火焚,整个番禺城大概毁殆殆尽,这可能是当年汉武帝在别处另行改置番禺县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汉番禺县城问题,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记载说:“番禺县治,汉始建于郡城南五十里,今龙湾、古坝之间。”^[11]卷28《政事志一·公署上》,P681)但清人顾祖禹则说:“汉平南越,改筑番禺县城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霸(按“霸”为“壩”即“坝”字之误,下同)之间是也,号佗故城曰越城。后汉建安十五年,步鹭为交州刺史,以越城就圯,乃廓番山之北为番禺城,后又迁州治于此,自是不改。”^[12]卷101《广东二·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P656)两说所载里数虽有一些差异,但共同之处是都认为汉番禺县城是在广州城南50里或60里,具体地点则是在“龙湾、古坝之间”。

三、汉番禺县治故址的重新考证

关于汉番禺县治问题,曾昭璇教授同意明人黄佐的郡南50里之说,但又认为黄佐将县治定在今龙湾、古坝间“显然是按里数求得”,并考证应在今广东顺德简岸一带。^[10]P219-225)曾昭璇先生的考证确有新意,但在历史文献依据方面却显得有些不够,所以其说既出,学界响应者不多。

据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记载:“泐水东别迳番禺,《山海经》谓之贲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云: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倘谓番山之禺也。”^[13]卷37《泐水》,P652)其中之“水坑陵”,指的应是多面临水,或被水所环绕的一片高阜地区。^[14]P97-113)但是在今广州旧城区范围内找不到任何与《水经注》所载“水坑陵”直接相关的地名,说明这个历史地名可能原来就不在今广州旧城区。笔者近检上世纪80年代初所编绘的有关地图,广东省番禺县(即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东北、西北方向颇多与“水坑陵”有若干联系的地名,东北方向有旧水坑、新水坑、横坑、坑头、驼背坑、金坑等,这些地名多系村名,大致分布在一个呈南北向的大型洼地内,洼地北向开口,紧靠珠江河道,东、南、西三面地形稍高,为低矮

的丘陵地形；西北方向则有官坑、深坑口等涉“坑”地名，也分布在一个略呈圆形的洼地内，洼地中间尚有一些高地。在这两个洼地之间，也就是市桥正北方向，则有一个相当明显的高地丘陵区，大致呈南北走向分布，其中北部的植地庄一带地势最高，海拔为146米。^{[15] P80}如果细读地图就会发现，这两个洼地过去实际上可能是连在一起的，在市桥北面形成一个大型的洼地区。市桥北面以坑为名的地名比较密集，为广州附近地区所少见，似皆为古时大型水坑（即“水坑”）的地名遗存，如在市桥东北4公里的旧水坑和5公里的新水坑，据说都是“南宋末年成村，因地居山坑水圳的环绕台地”而得名，^{[16] P460}可见年代之久远。历史地名遗存及地形上的种种迹象表明，市桥北尤其是植地庄一带的高地，很可能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古“水坑陵”的所在，也就是汉番禺县治故址大致的方位。

除了历史地名遗存和地形特征外，还有其他一些旁证可支持笔者的这个新推测。

（一）市桥北一带正好在广州南“五十里”或“六十里”，开发历史也相当悠久。《广州市地名志》说旧水坑、新水坑是“南宋末年成村”，但实际上这一带此前即是陆地，近年来番禺区北部已有多处东汉墓群被先后发现，可见市桥镇北一带至少自东汉时起就是人烟密集之地。1997年和1998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对市桥西北的沙头、屏山的东汉墓群进行了发掘，在屏山二村的东汉墓群中的砖室壁中清理出一些铭文砖，其中CMI: 89的铭文为“番禺都亭长陈诵”，这为判断汉番禺县的地址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但研究者据之推测汉武帝时期“南迁的番禺新城应在现番禺市桥、钟村、沙湾镇一带”，^{[17] P161-190}论证略显粗略，因为在番禺区北境珠江水道中的一个江心洲小谷围岛也发现100余座西汉晚期至东汉末期的墓葬，表明东汉时这里也是一处重要的墓区。^{[18] P88-106}可见如将汉番禺县推定在今番禺区北部市桥北一带，与汉墓群的分布形势比较吻合，可能更准确一些。

（二）市桥北一带地处水道要冲之地。司马迁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19] 卷129《货殖列传》，P3269}班固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20] 卷28下《地理志下》，P1670}番禺县城址在元鼎六年（前111年）改置后，商贸仍然如此发达，这显然得益于优越的水上交通条件。市桥镇一带北近沥滘水道，东邻莲花山水道和狮子洋，南有沙湾水道，这些水道历来即为内河水运及海外交通的重要通道，至今仍有通航之利，古时诸水道更为宽阔，交通之利当更为显著，这当是番禺县城虽经迁徙而不致完全衰落的原因所在。

（三）市桥北一带最符合所谓“沮洳难居”的环境。嘉靖《广东通志》称：“初，州治在番禺城南五十里，西接牂牁末流，沮洳难居。（建安）二十二年，（步）骛徙治尉佗故都，筑立城郭，民用绥集。”^{[21] 卷44《列传→名宦→步骛》，P1093}清人仇巨川《羊城古钞》也说：“初，州治在番禺，故城西接牂牁末流，沮洳难居。（步）骛徙治尉佗故都，筑立城郭，民用绥集。”^{[22] 卷5《名宦·步骛》，P382}可见“沮洳难居”的环境，是后来步骛徙治番禺于旧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地说，珠江三角洲地区符合“沮洳难居”环境的地方一定比较多，但必须结合方位、里数、形势等其他条件才能得到确定。笔者认为，若以“沮洳难居”而论，市桥北一带最为符合。一则这一地区旧时本身就是诸多水坑分布区，现在水坑多已湮废，但仍有诸多小河交错其间，古时水网当更为复杂一些；二则如前已述，市桥北一带北近沥滘水道，东邻莲花山水道和狮子洋，南有沙湾水道，这些水道历来即为内河水运及海外交通的重要通道，所以使得番禺虽经改置而不至于衰败，并且还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对于内地政权统治者而言，如从北面的秦番禺旧治即今广州旧城一带南下，则需要三渡珠江河道（今广州市河南地区即海珠区南北皆为珠江河道，海珠区以南、番禺区北境的沥滘水道亦为珠江支津），陆路军事交通方面不是十分便利，此地现在仍然以轮渡或桥梁过人，古时江面更为宽阔，陆路交通之不便可想而知，这可能加强了当时人们从广州南到番禺而产生的“沮洳难居”的印象。

四、东汉末年步骛徙治番禺问题的再探讨

关于东汉末年步骛徙治番禺县城一事，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记述甚详：“建安中，吴遣步骛为交州，骛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鼃鼃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佗因冈作台，北面朝汉，圆基千步，直峭百丈，顶上三畴，复道回环，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台。前后刺史郡守，迁除新至，未

尝不乘车升履，于焉逍遥。鹭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遂用宁集。^{①13} 卷37《浪水》，P652另据《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五年（210年），步鹭“出领鄱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节、征南中郎将。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阴怀异心，外附内违。鹭降意怀诱，请与相见，因斩徇之，威声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宾，自此始也。”^{②21} 卷49《吴书·步鹭传》，P1237可见建安十五年孙权确曾遣步鹭为交州刺史，希望其移治南海郡番禺县，进而控制交州形势，但步鹭似乎次年即建安十六年（211年）才到任上。按照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步鹭绝不可能于孙权委任交州刺史的当年即建安十五年就在南越旧都之地大兴工程以为交州的新治所。依笔者之见，建安步鹭“迁州番禺”可能分作两步，建安十五年（210年）是将交州从其原治所即苍梧郡广信县徙置于汉武帝曾改置的南海郡番禺县之中（此事大概实际上是在建安十六年即211年才落实的），待岭南形势粗定之后，乃采用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的建议，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又将交州治与南海郡、番禺县一道北徙于赵佗旧治处，并在南越国都番禺的废墟之上“筑立城郭”，以为官署之用。

如果上述考证不误的话，那么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灭南越国后改置南海郡治和番禺县县治，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交州刺史步鹭重修番禺城，共计327年间，作为今广州城前身的秦及南越国的番禺县城曾被毁弃，西汉、东汉两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岭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政治中心实际上是在今广州城南50里的番禺区市桥北一带的新番禺县城，所谓广州城址2000多年不变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当然，这只是如实地揭示了古都广州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丝毫不损其“古老性”，因为一则番禺区市桥北仍在今广州市境，二则即使除去两汉时期曾被毁弃的327年，古都广州旧城的建设史仍有近2000年，而这正是现代广州城赖以发展的基础和这座古都之所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中国古都学会，莒县古都学会. 中国古都研究：第16辑 [C]. 杭州：研究出版社、杭州出版社，2003.
- [2]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广州寻旧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 [3] 中国古都学会编. 中国古都研究：第14辑 [C].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 [4] 司徒尚纪. 岭南史地论集 [C]. 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
- [5] 阙维民. 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 [6] 周霞. 广州城市形态演进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 [7] [汉]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M]. 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 [9] [宋] 乐史. 太平寰宇记 [M]. 南京：金陵书局刊本，光绪八年（1882）.
- [10] 曾昭璇. 广州历史地理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 [11] [明] 黄佐. 广东通志 [M]. 广州：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誉印本，1997.
- [12] [清]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 [13] 陈桥驿. 水经注校释 [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 [14] 吴壮达. 《水经注》的“水坑陵”问题——广州历史地理问题研究之一 [J]. 华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2）.
- [15] 广东省测绘局. 广东省县图集（内部使用）[M]. 广州：广东省测绘局，1982.
- [16]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广州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广州市地名志 [M]. 香港：香港大道文化有限公司，1989.
- [17] 考古杂志社. 考古学集刊：第14辑 [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18]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19] [汉] 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0] [清] 仇巨川. 羊城古钞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 [21] [晋] 陈寿. 三国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郭秀文

•教育学•

教育贫困与反教育贫困*

◎ 牛利华

[摘要] 教育贫困是指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和观念等的限制,适龄儿童无法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现象。教育贫困现象的存在已经成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它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相背离,妨碍了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宗旨的实现。教育贫困的消除仰赖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了有效地消除教育贫困,我们应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有差别的免费制度;建立完善的教育救助制度;建立教育贫困人群的凭证制度;规范教育收费;加强农村教育,关注农村受教育人群的发展境遇;确立重心下移的教育投资体制。

[关键词] 小康社会 贫困 教育贫困 教育救助

[中图分类号] G40-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121-04

对“教育贫困”这一概念,教育学界还没有较为统一的界定。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人们对“教育贫困”的界定往往从如下两个角度来进行。

(1) 以教育发挥的功能和教育内部的运行状态为参照,将教育的贫困分为外显的贫困与内隐的贫困。^[1]外显的教育贫困表现为:教育未能真正满足社会大系统的需要,教育未能为每一个不同的个体展示一个崭新的前景;而内隐的教育贫困的典型症候则是:教育系统自身的失序,生源问题和教育死亡率(退学率、辍学率)的日渐升高。上述概念将教育贫困定义为教育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的部分丧失、教育内部系统的失序以及生源的流失。这种界定较为全面,概念的内涵也较为广阔。但问题在于,由于教育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是动态的,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态,教育是否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前景”,是否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发展,这些在实践中不具备可观测性。另外,完全均衡、协调的教育发展状态是理想化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内部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序现象,这也是教育发展的常态。因此,以“是否满足了社会大系统的需要”、“是否为个体提供了崭新的前景”以及“教育内部的失序”为标准来衡量教育贫困,往往会导致教育贫困现象在实际中不易被发觉,不易衡量。

(2) 以每个学生拥有的教育资源(生均经费、师资水平、课程等)来界定教育贫困,它既表现为物质的贫困又表现为人口的贫困。“国家和个人不能对教育提供足够支持,具体表现在教育经费的短缺,教育设施的落后,教育内容的不切实际,以及大众对教育的冷漠”,^[2]这些表现是教育贫困的典型症候。在这种界定中,缺少测度教育贫困的标准,难以提出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将关注点更多地停留在收入贫困上,而教育贫困还没有普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教育贫困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带有明显的现实化色彩,强调走出书斋搜集活资料;有关教育贫困的学理研究比较薄弱,还停留在对教育贫困进行描述的层面,没有有效地揭示教育贫困发生的机制和解决途径;没有划定教育贫困的衡量标准,致使教育贫困在实践中无法测度。

本课题组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到理论上的可行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主张以知识占有为依据来界定教育贫困,认为教育贫困就是低于最低限度的教育标准,以是否有能力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作为衡量教育贫困的标尺。根据具体参照系的不同,教育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前者表现为失学辍学;后者表现为虽在上学,但资源不足,质量不高。具体地说,教育的绝对贫困是指由于家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教育发展目标与指标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批准号为: BAA030013。

作者简介 牛利华,东北师范大学教科院(吉林 长春,130024)。

家庭经济条件和观念等诸种因素的限制,适龄儿童无法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现象;而教育上的相对贫困是在比较的情况下产生的,是指虽然可以维持受教育现状,但在教育资源(师资、教育投入、硬件设施等)的占有上低于国家或地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故而在受教育上处于相对不利的状态。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在表现、影响和救助方式上都有差异,本文中的“教育贫困”主要指涉的是教育上的绝对贫困,是低于最低限度的教育状况,即儿童无力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现象。

一、教育贫困的成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障碍

在教育领域中,致使儿童无力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原因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 经济上的匮乏是导致教育贫困的主要原因。由于这个原因,我国目前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挣扎在教育贫困线上,他们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在贫困家庭中,经济状况与教育形成了一对无法缓解的矛盾:“教育负担过重也是贫困家庭不能脱贫的重要影响因素,贫困家庭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3]而不接受教育则会使贫困代际相传,无法使这些家庭获取走出贫困的手段。

(2) 某些地区由于读书无用论的滋长蔓延,存在政府将教育经费挪为它用的现象。由于看不到知识的力量,很多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不够重视,儿童半途失学、充当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也较为常见。据教育部的统计数字,2003年初中阶段辍学率为2.84%,其中女生为2.43%。由于家庭观念和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还有相当数量的儿童尤其是女童无法按国家规定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但随着教育作用的日益彰显,有经济能力而不愿进行教育投入的现象在致贫的诸原因中并不具有代表性。

(3) 社会救助不力。我国政府虽然高度重视对贫困人群的保护,并致力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但目前还不很完善,还不能较好地承担起保护贫困人群的职能。从社会救助的职能定位来看,政府将救助目标主要定位于保障贫困人群的生活,满足这些人群生存的需求。而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诸如“发展”和“自我实现”作为人的基本需求尚未处在社会保障的视野之内。从社会救助的基本形式来看,政府和社会主要是通过发放救助款或救助物资来体现对贫困人群的关怀和支持,这种救助方式在根本上说是一种维持性救助,而对这些人群的能力提高和受教育状况缺少关注。生存和发展均是人的基本需要,反贫困不仅是增加收入,确保基本的生活条件,而且要对贫困人口实施发展性救助,使其获得基本能力的机会。教育救助是开发性扶贫的一种典型形式。但在目前来看,政府和社会对教育贫困人群的救助体系并不完善,各级政府对弱势群体的辅助主要是针对贫困地区来进行的,受助人数的范围笼统,受助人数也比较有限,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教育贫困人群常常被忽视。

(4) 国家投入的重心过高,也造成了义务教育贫困现象。国家将有限的教育投入分配不合理,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远远低于对非义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额。本末倒置的投入结构致使义务教育投入经费相对匮乏,大面积的危房得不到改造,基础教育设施难以得到有效改善,妨碍了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质量。社会发展的成果应当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具有共享的性质,即“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应当相应地更加得到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应当相应地不断得到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应当相应地持续不断地得到满足。”^[4]但教育贫困现象的存在使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难以获取最基本的发展机会,他们的素质难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其结果往往造成了一部分分享了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另一部分则被排斥在外,并由于无力接受教育而使贫困代际相传。

从教育的社会影响来看,教育这一层次的贫困往往加剧了现存社会和文化观念造成的不平等,给弱势群体雪上加霜。教育贫困会加剧其他贫困,使弱势群体更加弱势化;教育贫困会加重知识分布的不均匀,其结果造成了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不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

二、反教育贫困:社会发展的理性诉求

教育贫困现象的存在有悖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也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原则相

背离。为了实现教育领域内的公正，确保每个国民的受教育权益，本课题组参照目前国内外有关教育贫困的研究成果，探索出如下反教育贫困的策略。

(1) 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有差别的免费制度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年度统计报告，以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为指标，我国到2001年还存在2亿多贫困人口，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困境，是教育最应关注的人群之一。

由于义务教育基数大，我国政府的投入满足不了义务教育全部的办学需求，每年学生需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学杂费以填补经费缺口。但“对于许多贫困家庭来说，学校的学杂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5城市（上海、兰州、武汉、重庆、天津）贫困家庭负担不起学校学杂费的要占60-90%；有50-80%的家庭在教育方面没有能够享受到政府或学校的优惠。”^[9]这种政府与家庭共同分担教育经费的机制，加重了贫困人群的经济负担，不利于普及贫困人群子女的义务教育。据此，课题组认为，国家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一种有差别的教育政策。现阶段由于国家财力资源的限制，还不具备对所有适龄儿童实施义务教育全免费的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区域性的差别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阻碍着世界的发展，那么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竭尽全力教育条件较差的人们，教育农村地区和条件较差国家的人民”。^[9]可行的办法是对贫困人群优先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全免费制度，以保障这些群体顺利完成这一阶段的教育。因为对这一人群来说，“如果不实施完全免费政策，即使在人均年收入800-1500之间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也难得到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实际支持。”^[7]因此，使教育贫困人群享受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享有教育上的完全公共供给是必要的。而对于有能力负担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的非贫困人群，则继续采取现行的对家庭收取学杂费的政策。反教育贫困的当务之急是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在义务教育阶段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教育资源的优先配置。

(2) 完善教育救助制度

教育救助是促进教育发展的安全网，它为教育贫困人群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有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有助于社会成员发展潜能的普遍开发。从教育救助的主体来说，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承担着向贫困人群提供救助的责任。但只靠政府建立正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以应付目前庞大的受教育需要。因此，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人力资源却相对充足的社会，依靠民众的广泛参与去解决教育贫困人群的受教育问题已成为现实的选择。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的教育救助形式（如民间设立的教育基金会、奖学金、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应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但民众对教育救助的广泛参与有赖于政府的积极调动。主要可通过如下途径来鼓励民众参与教育救援：社会表彰，为民众提供精神动力；政治动员，政府积极宣传教育贫困的危害以及民众应承担的责任，号召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教育救助工作；文化动员，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个体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意识 and 互助合作意识，通过传统文化的渗透促使民众自发救助教育贫困人群。通过以上努力，逐渐建立起一个由政府、民间组织机构和民众共同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制度化救助与非制度化救助的密切结合，从而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发展条件能够得到保证。

(3) 建立教育贫困人群的凭证制度

以往政府对教育贫困人群的救助方式以贫困地区为对象，通过教育转移支付直接把物质、财力等资助下放到贫困地区，再由地区下放给各个学校。但目前，贫困地区内部各个阶层之间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上仍有很大差别，因此，在实施教育救助时，存在应保未保的贫困群体，也存在着教育救助资源发放到非贫困人群的现象，造成了教育救助的低效。我们认为应建立教育贫困人群的凭证制度，为无力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个人发放凭证，接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救助。这种做法使教育救助由以扶持教育贫困地区为主转变为以扶持贫困个人为主，在对象上更具有针对性，提高了有限的教育救助资源的利用率。

(4) 规范教育收费

教育收费只是部分地补偿政府机构负担的教育成本,但由于投入不足等各种原因,巨大的经费缺口便只能由家庭来填补,导致了在实际中“学杂费”的边界无限扩大。有些地方则以“建楼费”、“普九费”等形式将巨大的经费负担转嫁到受教育者身上,直接制约了贫困人群的受教育能力。1996年1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联合颁布了《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九条规定“义务教育阶段除收取杂费、借读费之外,未经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联合批准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对超出规定的收费,学生有权拒交。”这对乱收费进行节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有些地方乱收费的现象依然存在,并且不断发展蔓延,直至近年来乱收费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严重损害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损害了教育的社会声誉,甚至使许多贫困家庭的子女无力接受教育。为了消除教育贫困,使所有的适龄儿童都有机会接受义务教育,政府应明确规定出收费标准,加强对教育收费的监管,并制定出相应的惩处标准。

(5) 要特别关注农村教育人口的发展境遇

由于经济和地理环境等原因,农村人口在受教育方面的机会较少,而面临的障碍则较多。尤其是税费改革后,国家取消了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由此造成的教育投入缺口较大,而地方财政无力承担。“据统计,2001年全国30%左右的县,小学生人均公用费不足125元,财政预算拨款不足8元;26个省农村中小学共有4000万平方米的危房。农村义务教育领域发展日趋困难。”^[8]

提升农村教育质量,首先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的基本精神,明确各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责任: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地(市)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并对财力不足、发放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确有困难的县,给予转移支付,对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给予补助;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合理安排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确保按时足额统一发放教职工工资,并负责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安排使用校舍建设和危房改造资金,有针对性地开展助学活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适龄儿童少年入学,通过建立最低教育保障制度,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并且相应地逐级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6) 建立重心下移的教育投资体制

目前国家对非义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仅占总教育投入中很小的份额,这造成了政府教育投入的不合理结构。义务教育是关乎国民基本素质的教育,在各层级教育中其公益性最为突出。政府应全力承担起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这在世界各个国家已形成普遍共识。虽然我国在总体上已实现了普九目标,但还存在着大量失辍学儿童,需要政府的救助。义务教育在质量上也有待提高。在全国范围内还存在着大面积的中小学危房需要改造。在这种形势下,政府本末倒置的教育投入结构不利于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难以达到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因此,政府的教育投入向义务教育倾斜、向义务教育的弱势群体倾斜,将成为今后教育投入政策调整的重要目标。

[参考文献]

- [1] 许小平,马和民.“贫困的教育”和“教育的贫困”——兼论教育改革的方向[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5).
- [2] 田禾.东亚发展中国的教育贫困问题[J].当代亚太,1995,(1).
- [3] 任慧成等.关于城市新贫困问题的探讨[J].兰州学刊,2004,(2).
- [4] 吴忠民.论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J].社会学,2002,(6).
- [5] 唐钧.城市贫困家庭的食物消费实录[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3).
-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 [7] 滕星.应在贫困地区实施免费义务教育[J].求是,2003,(19).
- [8] 农村义务教育投入78%以上为乡村筹集,中央仅补1%[J].领导决策信息,2003,(35).

责任编辑:陶原珂

学校变革:现代学习型学校制度建设研究

◎ 杨天平 陈光祥

[摘要] 学校变革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主题,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则是学校变革的核心内容。现代学校制度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创造性移用,其内容包括现代学校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三方面。进行学校变革,可以从学校与政府关系的重新定位、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以及学校与社会、家庭关系的重建三个层面入手,以构建学习型学校作为学校变革的基本策略。

[关键词] 现代学校制度 学校变革 学习型学校

(中图分类号) G62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125-04

依据学校系统的特殊性,借鉴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我们可以对现代学校制度赋予以下主要内涵:现代学校制度是指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契合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以学校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制度。我国对现代学校制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时黄兆龙在《中小学管理》(1998年第1期)上刊发了《现代学校制度初探》一文。他从现代学校实际出发,借鉴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理论,对现代学校制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现代学校制度是一种适应社会化大教育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以学校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教育管理专家经营为表征,以学校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以及新型的政校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学校体制。此后,关于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呈上升趋势,在理论研究上,对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涵、特征、内容等基础问题进行了探讨,对现代学校制度框架下的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以及学校与社会、社区、家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同时还对现代学校制度背景下学校内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学校的法人地位、产权、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等。在理论研究推进的同时,实践探索也没有停止,如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进行的建立开放式校本管理和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实验,江苏省无锡市金桥双语实验小学引进的ISO900质量体系认证,浙江省长兴县进行的“教育券”和调动民间资本支持教育的实验,浙江省台州市椒江进行的“教育股份制”实验,辽宁省沈阳市部分学校和北京十一所学校进行的学校转制实验,广东省深圳市实验学校进行的现代学校文化建设实验,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中学进行的“以法治校”和“以德治校”相结合的多项实验,北京市西城区实验二小进行的学习型学校建设实验等等。^[1]对于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学校变革内容: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2]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而且学校的发展已经到了要突破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了。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过程中实现传统学校向现代学校的转型,是社会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学校在新形势下更新与发展的关键。在现代学校制度的框架下推动学校变革,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

1. 学校与政府部门关系的定位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重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学校自主办学的激活。我国以往的学校制度在政府与学校角色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淆,即政府在职能上将学校应该具有的职能全部包揽起来,对学校实行全过程、全方位控制,从而使学校失去应有的自主权,出现学校成为政府附属机构的现象。在学校产权制度上,学校投资一般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政府无偿拨款,政府与学校的投资行为混为一体,导致了学校产权结构的不合理和产权制度的不完善。在学校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学校作为政府部门

作者简介 杨天平,浙江师范大学发展与研究室教授;陈光祥,浙江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浙江 金华,321004)。

的附属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上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学校的人、财、物，使学校缺乏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机制，造成了封闭办学、机制僵化、活力不足的问题。

在现代学校制度下，作为公共教育的举办者和管理者的政府需要主动调整与学校的关系，实现政校分离和自身职能的转变，给学校以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要由过去单纯的隶属关系，转变为自主权和行政权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新型关系。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权力下放、重心下移，突出责任和服务功能。政府应主动转变教育管理职能、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将上下级的被动关系转变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将对学校的具体指令性行政管理转变为以宏观调控和以服务为主，通过立法、拨款、中介组织、政策引导、督导、信息服务等各种间接手段对学校进行管理。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可以通过三种手段来达成：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学校进行宏观管理；通过下拨经费支持学校的发展；通过督导机构的督导和中介机构的评估对学校进行监督引导。另一方面，政府在下放权利的同时，还应该尊重学校的法人地位，给学校充分授权，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学校办学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

2. 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

在现代学校制度背景下对学校内部结构进行改革，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其中最关键的是校本管理机制的建立、学校领导制度和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

校本管理机制的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强调政府职能与学校职能的分离，强调政府将该属于学校的权利还给学校。政府权利的下放标志着学校具备了实施校本管理的条件，校本管理的特征就是强调教育管理重心的下移，强调学校成为日常事务的决策主体。校本管理是通过运用分权、授权、协作、团队等组织行为学的原理和技术，来构筑学校与外部（上级主管部门、社区等）及学校内部（校长、教师、学生等的相互关系）的新型关系。^{[3] P249}学校建立了校本管理的机制，也就等于学校改变了职能，即由原来的执行机构变成了决策机构，学校在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也必须为权力的使用及其结果承担更多的责任。建立校本管理机制，需要倡导共同决策，需要将教师、学生、社区、家庭吸引到学校决策中来。建立校本管理机制，还需要改革学校组织结构。有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组织功能。传统科层式的学校组织结构需要变革，以适应校本管理的开展。比如，学校要削减不需要的部门或者合并功能相似的部门；减少学校决策层与操作层之间的间隔层次；改变传统垂直传递信息的组织沟通方式，增加横向联系与沟通；并尽最大可能将决策权向组织结构的下层转移。

学校领导制度的改革。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还需要配合学校法人制度，依据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原则，建立责权明晰的学校领导制度。在传统领导体制中，校委会、党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三者责权模糊、混淆，存在不能很好行使各自权力，甚至越位的现象。而在现代学校制度下，各个领导职能机构应该明确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制衡的协调系统。学校领导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校长传统角色的转变。在传统学校领导制度中，校长既代表学校，又代表政府，不能合理、有效地行使权力，校长只是上级指示的传达者和贯彻者。而在现代学校制度下，校长的角色具有多样性，他不仅是学校目标的开发者和领导者，还是学校人力资源的开发、启动者和协调者，学校理念的塑造者、学校权利的分享者以及学校与外界的沟通者。当前需要做的是加快校长的专业化建设。

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改革。学校人力资源有着其他资源不可比拟的优势：知识性、智力型、教育性。现代学校制度强调学校质量的提高应着眼于开发最具活力的人力资源上，尤其是对教师资源的开发。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学校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规划。从战略角度做出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划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学校人力资源现状分析和学校人力资源的需求分析。二是学校教职工的聘用。教职工的聘用是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的中心内容，聘用高素质的、有潜能的人才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学校应根据学校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的教师资格标准聘用教师。三是学校人力资源培训。教师培训是学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学校创造智力资本的途径。对教师进行培训，尤其是通过校本培训，增强教师的教育教学知识、技能和能力。四是学校人力资源的激励。运用各种激励手段，使不同层次人力资源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促进教职工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工作，为学校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3. 学校与社区、家庭关系的重建

学校是开放的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对学校发展有着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在现代学校制度框架下,构建学校、社区与家庭三位一体的学校教育体系,是学校变革的重要方面。传统学校制度缺少一种开放的机制,学校基本处于闭门办学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将社区和家长隔离在外。在这种情形下,家长和社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选择权严重缺位。现代学校制度强调学校组织的开放性,强调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根据现代学校制度的要求,学校要努力将社区和家庭纳入到学校管理的框架之中,并建立学校、社区和家庭的有效、互动机制。

教育民主化是一直以来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不断探索的一个话题。社区、家庭参与学校的教育发展是教育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学校要引入社区、家庭的参与和监督,必须要主动地公开校务,定期及时地向社区和家长报告学校的发展规划、教育教学情况以及学校政务、财务活动中的重要事项,并随时接受社会和家庭监督。为了获得学校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学校要善于在社会与市场中发现需求,谋求社会和家庭的支持,从而整合各种资源,获得主动发展。学校还可以邀请社会人士、社区代表、家长代表加入学校领导决策机构,参与管理学校的发展,拓宽学校发展的决策视野。为了加强与社区和家长的联系,学校还可以吸纳各领域的专业人士、有技能的学生家长、社区成员,充实学校的教育教学力量。学校还可以运用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各类社会教育资源,使学校课堂向社会生活延伸。在现代学校制度下,学校还要定期接受教育中介机构对学校的评估。教育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具有双向服务、双向沟通特点的中观管理层,在教育活动中发挥沟通、公证、监督和评价功能的机构,如教育的决策咨询机构、信息管理机构、拨款审议机构、督导和评估机构、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等。引入中介组织的目的在于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学校决策和管理,使政府对教育的决策和管理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二、学校变革策略:建设学习型学校

学习型组织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以1990年彼得·圣吉出版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才将学习型组织的研究推向高潮。圣吉在其著作中首倡了学习型组织的理念,认为学习型组织是这样一种组织:“在其中,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并提出创建学习型组织要通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构建组织共同愿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五项修炼来完成。这种学习型组织的理念,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学校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1. 学习型组织的人员。罗伯特·欧文斯和卡尔·斯坦霍夫在分析学校组织时,将学校组织内部结构分为人的子系统、结构子系统、技术子系统和任务子系统四个要素。建设学习型学校也可以从这四个要素入手。^[4]组织结构中人的因素的变化最终都要体现在人的行为上。彼得·圣吉认为学校组织成员在建设学习型学校时要从这四方面对自己不断地加以完善。(1) 突破外在压力,实现自我超越。传统学校组织过分强调对成员的外在要求,把成员看作具有依赖性的个体而忽视了学校成员具有强烈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动机与需要。为了发挥自身的潜力,学校组织成员要实现自我超越,理清自己内心深处最想实现的愿望,集中精力,培养耐心,客观地观察现实,将学校的要求和自己的愿望加以合理的整合,从而突破外在要求,完成自我实现。(2) 改变心智模式,进行系统思考。长期以来我们个人已经习惯了局部或静态思考为主的心智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因此在构建学习型学校时,学校组织成员要检查和修正自己的思维模式,学习在解决问题时要了解整个环境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向以注重互动关系与动态变化的系统思考为主的共同心智模式转换。(3) 转变学习方式,开展团队学习。现代组织的工作单位是工作团体,所以学习的单位也应由个人变为团体。长期以来学校成员一直采取“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忽略了团队学习的价值,也忽略了个体学习与团队学习的整合优势。因此,学校成员要将个人学习与团队学习加以统整,实现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的统一。(4) 转变目标设置的狭隘做法,协调个人与组织愿望。共同愿望是组织成员所共同持有和希望实现的意象或景象。学校组织成员在设置目标时,要打破以个人为中心的目标设置倾向,将个人愿望与组织的共同愿望加以整合,并以共同愿望统帅个人愿望,从而在实现学校组织的共同理想的同时实现个人的理想。

2. 学习型组织的结构。学习型组织的结构不同于传统的科层制和等级制的组织模式，它强调横向联系与沟通，强调授权，同时还表现出富有弹性、反应灵活的特点。因而在建设学习型学校时要根据学习型组织的特征改造和重构学校组织。学校要削减不需要的部门或者合并功能类似的部门；减少学校决策层与操作层之间的间隔层次；改变传统垂直传递信息的组织沟通方式，增加横向联系与沟通；并尽最大可能将决策权向组织结构的下层转移，让基层单位或成员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从而形成以基层为主的扁平化的学校组织结构。通过重构学校的组织结构，可以使学校组织转型为一个相互学习，系统思考，协调合作的更具适应功能的单位实体。学校组织成员在其中可以通过畅通的信息管道，自由地交换意见，实现知识和思想的共享。同时，在学校权力下移的情况下，基层的学校组织成员可以进行自我学习和自我管理，从而提高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帮助个体更好地发展。

3. 学习型组织的任务。学校的组织任务是实现学校组织的目标和愿望的载体；目标和愿望的完成最终都要通过学校任务的完成来实现。对于学习型学校而言，构建学校组织全体成员普遍认可的目标、价值观与信念是学校组织任务变革的关键。因此，在制定学校任务时要将学校的任务与学校的共同愿望有机统一起来，同时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共同愿望与任务的辩证关系在学校中的体现是：共同愿望统摄学校的所有具体任务，所有具体任务的完成是为了实现共同愿望。两者关系处理得好则会有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处理得不好则会阻碍学校的长远发展。学校的共同愿望是在客观分析学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由学校全体成员沟通、探讨和决定的结果，而不是学校领导者强加于学校组织的。学校的共同愿望有关学校的远景规划和宏大目标，因此它直接来源于学校全体成员个人追求的目标而又高于个人追求，它能够凝聚不同个性的人朝着学校组织共同的目标和任务前进，从而达成学校组织的目标。

4. 学习型组织的技术。学校组织技术系统是指学校将输入转为产出过程中学校运转所赖以活动的工具，它包括诸如课程教材、物质设备等硬件设施，同时还包括教学方法、资讯与科技、教育教学工作程序以及其他一些为解决妨碍学校组织目标达成的程序发明等软件设施。学校组织技术是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学校组织的“经营工具”，也是学校是否能够发挥效能的重要变量。在改革学校组织技术系统时要以学习型学校的理念为核心，并围绕着组建更具活力的学习型学校为目的。学校技术的变革内容包括：教育教学设备的更新，教育教学工作流程的变革，教育教学操作程序的改变，教育信息系统的变革以及有利于学校组织达成目标的发明程序的更新，同时还要借助信息技术带动学校教育的网络化以便构建更加开放的学校组织系统。

5. 学习型组织的文化。文化是组织的粘合剂。学习型学校的组织文化应该是开放和民主的。在这个前提下，营造学习型学校的组织文化时应着眼于学校组织价值观念的转换，重造学校组织的使命。在改造学校组织文化时，首先要更新学校的学习观念，推崇共同学习的信念，引导组织成员共同学习。其次要支持并奖励学校成员的学习和创新，提倡组织成员探索、交流和试验；再次要为建立各种团队学习创造条件，创建信任和共同理解的氛围，建立良好的沟通环境和人际关系，为知识和思想的自由流通、共享、使用和创造提供保障，激发成员的学习潜力。在学习型组织研究热浪的影响下，已有许多学校以学习型组织的理念为核心，探索构建学习型学校。学习型学校的价值，就学校组织的层面而言，除了能有效适应环境变迁，让学校组织学得更快、更好，增加生存的竞争力以外；另一个更深远而根本的价值，则是让学校组织内的个人可以活得更有意义。这两个学习型学校的重要内涵，涉及的是一种组织理论的典范转移，而学习型学校之所以值得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它能够以人为主体的，以及以系统的角度思考来处理学校中人的意义，提升组织的运作绩效。这是一种值得加以发展与追求的学校组织型态。

综上所述，从学校外部来看，建设现代学习型学校制度已成大势所趋，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传统学校内部的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学校效能的发挥，阻碍了学校更好地发展。因此，从学校宏观与微观环境来看，实现学校的转型，打造学校成为新型学校，已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 [1] 李继星. 现代学校制度初论 [J]. 教育研究, 2003, (12).
- [2] 杜威. 杜威教育论著选 [M]. 赵祥麟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 [3] 赵中建. 权利下移, 走向校本 [J].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 [4] 杨天平, 张水玲. 学校组织变革与发展策略: 构建学习型学校 [J]. 当代教育论坛, 2004, (4). 责任编辑: 陶原珂

•文学 语言学•

西方近代美学思潮的主导精神和基本倾向

◎ 彭立勋

[摘要] 本文对西方近代美学思潮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了总体审视和综合研究,认为西方近代四大美学思潮以各自独特的理论主张,创造性地提出和阐明了一系列新的美学观点、概念和范畴,实现了美学的近代转型。它们以人的理性作为美学的建构基础和衡量标准,充分体现了以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为支柱的现代理性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美学思潮中始终贯穿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的对立,而最终导向调和,由此形成西方近代美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关键词] 美学思潮 理性精神 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129-06

西方近代美学是在西方近代社会急剧变革中形成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在欧洲许多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成长。特别是在1500年以后,随着海外航行和地理大发现,西欧国家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和贩卖奴隶,西欧各国财富迅速增加,极大地刺激了西欧本土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形成。16世纪的西欧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以及从16世纪到18世纪不断开展的圈地运动等,有力地推进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程。进入17世纪,直到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向前发展。这场发生在西方近代的经济革命,最终改变了全部上层建筑,使西方思想文化包括美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西方近代美学思潮及其特点

西方近代美学的奠基者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始祖——培根和笛卡尔。从他们开始,西欧近代美学发展出现了不同的思潮、倾向和派别。它们或主要在一国形成和发展,或在多个国家发生作用和影响。各美学思潮、倾向和派别之间既彼此对立和区别,又相互影响和联系,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美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同时还结合时代的实践和需要,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新的美学问题,阐明了许多新的美学观点、概念和范畴,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美学思想,为形成西方美学完备的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

17世纪在法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古典主义文艺潮流代表了当时欧洲文艺的最高水平,对欧洲文艺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伴随着这一文艺潮流和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新古典主义美学也因之而成为17世纪欧洲最为人瞩目的美学思潮之一。法国新古典主义文艺与当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和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有密切关系。其作品宣扬个人利益服从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宣扬理性至上,把理性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着重描写一般类型人物,强调各种文学体裁的界限,要求艺术形式完美。和新古典主义文艺实践一样,新古典主义美学思想也是在法国专制王权的影响下,在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代表是高乃依和布瓦洛。高乃依是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美学思想的创始人,布瓦洛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高乃依着重论述了悲剧的社会功用和目的、悲剧题材和悲剧人物,对古代悲剧理论中的净化说和“三一律”等问题也做出了自己理论总结性的解释。布瓦洛的《诗的艺术》则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的法典。它以理性作为出发点,对新古典主义文艺的衡量标

作者简介 彭立勋,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广东 深圳,518031)。

准、创作原则、形式规则、体裁类别以及作家修养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总结，涉及到文艺与自然、美与真和善、理性与情感、典型与类型、内容与形式等重要美学问题。总的说来，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着封建宫廷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文艺理想，具有保守性；另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对文艺新的要求，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它所提出的有关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有利于推动文艺反映时代现实，但它将某些古典主义的形式规则奉为一切文艺的金科玉律，则有碍文艺随时代而发展。所以后来受到启蒙运动美学家的反对和批判。

17-18世纪的英国作为欧洲先进国家，其哲学发展也处于领先地位。由培根奠基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成为欧洲近代两大基本哲学派别之一。和经验主义哲学同时形成的经验主义美学，开辟了西方近代美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成为西方美学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中最早形成的美学思潮之一。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较多，包括培根、霍布斯、洛克、艾迪生、舍夫茨别利、哈奇生、霍姆、荷加斯、雷诺兹、休谟和伯克等。其中，舍夫茨别利和哈奇生受到剑桥柏拉图主义思想影响，而雷诺兹则受到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将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看作是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奠基者，那么，休谟和伯克则是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集大成者和总结者。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将美学研究重点由审美客体转向审美主体，将审美经验或美感问题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并从感性经验出发，着重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对审美经验做了新的阐释，提出了内在感官学说和趣味理论，对审美能力或趣味的性质和特点、趣味的心理构成因素、趣味的普遍标准与个别差异、趣味形成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等进行了全面探讨，促进了西方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转变。它在经验论哲学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对美、崇高、悲剧等重要美学范畴做了新的探讨。对于诗与想象、艺术与摹仿、艺术与道德等艺术哲学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这些新思想、新观点不仅显示出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启蒙性质，而且对法、德启蒙运动美学和稍后的德国古典美学都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但由于经验主义美学片面强调审美的感性特点和情感作用，忽视理性作用，在心理和生理研究中脱离了人的社会实践，因而也有许多局限性。

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形成差不多同一时期，在欧洲大陆形成了理性主义哲学，也形成了理性主义美学。正如经验派和理性派是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的两个基本派别，经验主义美学和理性主义美学也是这一时期西欧美学的两大基本倾向和思潮。理性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产生于法、荷、德等欧洲大陆诸国。除了笛卡尔是理性主义哲学也是理性主义美学的创始人外，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沃尔夫和鲍姆加登等也是理性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布瓦洛的美学实际上也是理性主义美学。理性主义美学家主要从先验的理性原则出发研究美学问题，对美的本质和来源着重从其理性基础上寻求解答，试图用“前定和谐”、“圆满性”、“完善”等理性观念来解释美的存在。他们或者把人的审美能力看作先天的良知良能，或者把审美活动看作不同于一般理性认识的特殊认识形式，力图将审美活动归入认识论范围，确立美学在认识论体系中的地位。因此，他们也较为忽视想象、情感等心理因素在审美和文艺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理性主义美学和经验主义美学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西方近代美学的发展。但由于理性主义美学片面强调理性，注重理性演绎，也和经验主义美学一样陷入片面性。

18世纪在法、德两国兴起的启蒙运动，是反对封建统治、破除宗教迷信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启蒙运动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整个发展来看，启蒙运动美学家几乎都是启蒙运动中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的美学思想是和启蒙运动整个思想倾向紧密结合的，因此，启蒙运动美学具有反封建、反神学的鲜明倾向，充满着启蒙理性精神。启蒙运动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法国是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在德国是温克尔曼、莱辛和赫尔德，其中尤以狄德罗和莱辛成就最卓越，影响最巨大。启蒙运动美学家基本上都是站在唯物主义哲学立场，有些直接受到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影响。他们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和阐明美学问题，对美的本质理论、艺术本质和创作理论、诗学、戏剧和绘画理论等，都做出了新的卓越的贡献。狄德罗的“美的关系”说既肯定了美的客

观基础和根源，又指出了人的主观对美的认识的作用，是以唯物主义观点解决美的本质问题的新尝试，对反对和批判唯心主义美学起了重要作用。狄德罗和莱辛把唯物主义运用于观察文艺问题，创造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的现实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对艺术和现实的关系、艺术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艺术想象和虚构以及艺术的倾向性和社会作用等问题都做了精辟论述，从而使西方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提升到一个新水平。此外，狄德罗和莱辛建立的市民剧理论，莱辛通过诗画比较建立的新的诗学理论，对于扫除古典主义文艺的羁绊，促进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文艺的形成，也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具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并且以普遍、抽象的人性来观察和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所以他们的美学思想也具有与上述问题相关联的弱点。

二、西方近代美学思潮的主导精神

17-18世纪西欧产生的上述主要美学思潮是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与中世纪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所倡导的理性精神。所谓理性，在西方文化中有多重意义。从哲学认识论来看，它是用以表示进行逻辑推理的认识的阶段和能力的范畴；从社会思想上看，它是指人人具有的普遍人性，合乎自然、合乎人性即为理性；从宗教神学看，理性是指有别于信仰的人类理智。康德在解答“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一问题时，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 11 P72)}恩格斯也指出，在启蒙运动中，“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 3 P56)}这都是对近代启蒙理性精神的最好注释。

这种理性精神既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而出现的科学精神的体现。而“欧洲的科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时发生的经济革命。近代初期，西欧的商业和工业有了迅速发展……这些经济上的进步导致技术上的进步；后者转而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受到科学的促进。”^{[3] P249-250)}科学的发展和它带来的新概念不仅对近代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广泛影响了近代思想的形成。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科学的威信是近代大多数哲学家都承认的；由于它不是统治威信，而是理智上的威信，所以是一种和教会威信大不相同的东西……它在本质上求理性裁断，全凭这点致胜。”^{[4] 3 P4)}由此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将欧洲这段历史时期称之为“理性的时代”，也不难看到，科学战胜宗教，理性代替信仰，正是西方近代文化发展的主流。以启蒙精神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其主旨就是要在对神学批判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恢复理性的主导地位，弘扬理性精神，把理性精神变成人生存在的思想根基和行为准则。

这种理性精神深刻地渗透于近代欧洲哲学中。在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各种派别的分野，但各派在提倡理性、限制信仰上却有着很大的一致。这一时期哲学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哲学反对经院哲学和传统宗教神学成为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一方面是政治上反对封建势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发展自然科学的要求。二是认识论在哲学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哲学的注意力集中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方面。这也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向哲学提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指导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使哲学家们对科学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做出哲学上的概括具有了可能。在认识论的探讨中，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倾向或派别。两派虽有区别，但在强调人作为主体的认识能力——理性上则是共同的。培根等人的经验论哲学是以尊重和颂扬人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即与盲目的信仰相对立意义下的广义的理性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称培根是“理性的司晨者”，^{[5] 3 P223)}并将其置于“理性时代的先驱地位”。^{[6] 3 P227)}笛卡尔认为理性是人生而有之的良知，即正确辨别真假的能力。从广义上说，理性是与盲目信仰对立的；从严格意义上说，理性是不同于感觉的高级认识能力。他的唯理论哲学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源泉，只有理性是最可靠的。他运用其所制定的理性演绎法建立起理性主义哲学体系。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对理性原则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把理性当作人的

本质，认为理性就是人的自然性、合理性，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并把是否符合理性当作衡量是非善恶甚至美丑的根本尺度。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康德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认为理性是认识的最高阶段。黑格尔从唯心辩证法思想出发，认为理性是最完全的认识能力，也是思维和认识的最高阶段。他在批判包括康德在内的前人的理性主义的矛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理性主义体系。

西方近代美学是在西方近代哲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主导近代哲学发展的理性精神也必然主导着近代美学的发展。17-18世纪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美学尽管有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大陆理性主义美学、法国和德国启蒙运动美学等诸种美学思潮、派别的分野和更迭，但主导各种美学思潮和派别的人文精神就是理性精神。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的基本精神是理性至上，把理性作为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认为文艺创作只有从理性才能获得光芒和价值，理性是构成普遍人性的核心，文艺需摹仿自然，表现普遍人性。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重视人的感觉经验对美学研究的作用。和中世纪神学美学用思辨将美归结为来自彼岸的上帝完全相反，经验主义美学家通过感性经验的归纳，论证了美的现实存在，认为美既与对象的某种性质和特性相关，又依赖于人心的特殊构造和功能，是人可以认识和把握的。经验主义美学高度肯定了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作用，把审美主体感受和鉴赏美的能力的研究放到突出的地位，提出了培养和提高人的审美能力的途径和方法，并将审美、艺术与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大陆理性主义美学的基本出发点是先验的理性能力，把理性看作人类普遍具有的判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良知良能。理性主义美学家在理性基础上构建美的本质。明确提出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自身的完善，是教导人们以美的方式去思维。审美虽属于感性范围，但却具有类似理性的性质。法国和德国启蒙运动美学用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对不合时宜的新古典主义美学进行批判，将唯物主义运用于美学，认为文艺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同时作家要发挥想象、虚构、典型化的能动作用，使作品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对人起到教育和改造作用。所有这些美学主张，都充分体现了以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为支柱的现代理性精神，显示了近代美学的时代特色。

三、西方近代美学思潮中的两种基本倾向

17-18世纪西欧美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受到哲学认识论转向的影响，贯穿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倾向的对立这条基本线索。由于在实验自然科学基础上对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深入而具体的研究，17-18世纪的哲学家普遍地把理论建立在反省思维的基础上，使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认识论占有显著和重要的地位，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这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一次被称为认识论转向的重要的转折，哲学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这不仅推动了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而且也使西方美学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产生了重要变化。如果说以前美学主要属于本体论，现在则主要属于认识论。围绕认识论，西方近代哲学形成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派的对立。两派之间及两派内部在关于认识对象、认识主体、认识的起源和途径以及认识的方法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和争论。这两大哲学倾向和派别的对立和争论也渗透到美学研究中，直接影响到近代美学的发展，使17-18世纪西欧美学发展沿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立的基本线索展开。不仅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和大陆理性主义美学直接反映了两派思想、观点的对立，而且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和法国、德国启蒙运动美学，也无不受到两派思想、观点的影响。

从认识论本身来看，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派的对立和争论首先集中在认识的起源和途径问题上。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起源于感觉经验，人心原本是一块“白板”，认识必须先从感觉经验开始，然后才能由感觉经验引申出理性知识，因此，理性知识必须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理性主义则认为感觉经验没有普遍必然性。因此，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理性知识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来自理性本身固有的某种“天赋原则”或“天赋观念”。他们虽然承认人的日常知识也大都来自感觉经验，但却否认理性知识须以

感觉经验为基础。至于两派在认识方法上的分歧则是受认识起源和途径问题上的分歧所制约的。经验派肯定了认识必须起源于感觉经验，在认识方法上必然重视经验的归纳法；理性派肯定理性知识不能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只能起源于理性本身，在认识方法上强调理性的演绎法。

近代美学发展中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正是奠基于两者在认识论的基本主张、基本原则上的分歧。经验主义美学家或受经验主义影响的美学家，其基本特点是强调从感性经验出发研究和解决各种美学问题，在方法上重视经验的归纳；理性主义美学家或受理性主义影响的美学家，其基本特点是强调从先验的理性原则出发研究和解决各种美学问题，在方法上重视理性的演绎。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经验主义者重视美的感性特点，强调从审美对象的感性性质和形式因素以及审美主体的愉快情感体验中来解释美。如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亨利·霍姆和荷加斯提出了形成美的对象的各种形式要素；休谟认为美的本质是对象的某种性质适合于主体的心灵结构而引起的愉快情感，简言之，美即愉快；伯克认为美是指物体中能引起爱或类似情感的某些性质，这些性质是单凭感官去接受对象的感性品质，等等。与此不同，理性主义者重视美的理性基础，强调从先验的理性原则出发去寻求美的普遍内容和形而上的意义。如莱布尼茨认为美在于世界的秩序、和谐，它来自上帝的理性和对世界的预先安排——“前定和谐”。斯宾诺莎认为美与圆满性是统一的，所谓圆满性就是实在性，即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事物的圆满与否，决定于事物的本性，与人的愉快感觉无关。沃尔夫和鲍姆加登都把美定义为“完善”，所谓完善，就是指事物符合它按本质所规定的内在目的，也就是对象所体现的目的和意义。虽然这种完善是指感性认识的完善，它需表现于感性形象，但它必须具有理性基础。

在美感和审美主体问题的认识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存在明显分歧。由于西方近代哲学发生的认识论转向，认识主体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成为17-18世纪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伴随着哲学研究重点的转变，西方近代美学的研究重点也由对客体的美的本质的探讨转向对主体的审美意识、审美经验的分析。这在经验主义美学思潮中表现尤为突出，使对美感活动进行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分析成为经验派美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审美趣味或鉴赏力成为18世纪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以至于有的美学史家将18世纪称为“趣味的世纪”。^[9] 围绕着对审美主体的意识活动的分析，经验派和理性派各自从不同的出发点，提出不同的看法。经验派认为美学属情感研究领域，不同于一般认识论，所以着重应用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观点分析美感经验，强调美感中感觉、联想、想象、情感和本能等因素的作用。如艾迪生认为美感是一种来自视觉对象的“想象的快感”，它来源于伟大、新奇和美的事物，具有直觉特点。休谟认为趣味和理性具有不同的功能，理性传达关于真与假的知识，趣味则产生关于美与丑的情感，前者具有客观性，后者则具有主观性、创造性。伯克认为审美趣味是由感官的初级快感、想象力的次级快感以及推理官能的经验三部分组成的，但他强调感官和感觉是一切美感的来源，想象力和情感是美感中最活跃的因素。经验派美学家中还有的指出，“内在感官”是美感的特殊的主体来源，它是一种既不同于外在感官又不同于理性思考的审辨美丑的直觉能力。理性派美学家虽然也不否认美感与情感的联系以及审美趣味和理解力的区别，但他们主要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考察美感活动，即主要是分析美的认识活动的特点。如莱布尼茨认为审美趣味不同于理解力，是一些“混乱的知觉”，是一种“既是明白的又是混乱的”观念。鲍姆加登认为美学是低级认识论，是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即由感官认识到的完善，所以审美活动自然是属于低级认识即感性认识的活动。理性派美学家中也有人认为审美是属于理性活动的，如笛卡尔就主张分辨美丑的能力来自先天的理性，审美和文艺虽然离不开想象和感性，但本质上是理性活动。上述不论哪种看法，都还是把美感当作一种认识。

在文艺观点和主张上，经验主义或受经验主义影响的美学家同理性主义或受理性主义影响的美学家之间存在着更多分歧，涉及到文艺标准和创作原则、文艺中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系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如在理性主义哲学观点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的代

表人物布瓦洛，主张将理性作为文艺的最高标准和创作的基本原则，强调文艺的真和美都必须依靠理性、符合理性，文艺应摹仿由理性统辖的、和真理一致的自然，即自然的普遍性、规律性，尤其是普遍的人性；主张作品塑造类型化的人物和性格，忽视人物的个性特点；轻视内容而过份重视形式技巧，把一些形式技巧凝固化、刻板化，当作永恒不变的尺度和规范。而受到唯物主义经验论影响的法国启蒙运动美学的代表人物狄德罗则与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针锋相对，主张把真实、自然作为对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和衡量艺术作品的基本标准，把真实地反映现实作为艺术的首要任务，认为艺术的美在于“形象与实体相吻合”，与艺术的真实性是统一的。艺术的模仿对象不是新古典主义者要求的理性统辖的自然，而是原始的、粗犷的、动荡的自然。作品中的人物不应当是类型化的，而应当既具有某类人物普遍特点，又具有个性差异。艺术的真实不同于哲学的真实，应重视想象、虚构和情感的作用。艺术的形式、体裁、技巧等应随时代生活和文艺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创新，不应固守新古典主义将之凝固化的某些形式、体裁和法则。

总之，在17-18世纪各种美学思潮、派别和各种美学理论、学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的影响和对立。正是这两种倾向的分歧和对立，使美学中形式与内容、感性与理性、特殊与普遍、主体与客体这一系列对立面的矛盾十分尖锐地暴露出来，而寻求这些对立面的辩证统一也就成为近代美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面临的主要课题，因此，将两种倾向和潮流汇合起来，将上述对立面调和统一起来，便是后继的德国古典美学要做的主要工作。

康德是承担这一历史任务的第一人。他企图在“先验综合”的基础上来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并从哲学、伦理学、美学三方面来实现这个目标。在美学上，康德既不满意经验主义的美即愉快的观点，也不满意理性主义的美即完善的观点，而是企图通过批判将两者结合起来，突出地提出了美感虽是一种感性经验却具有理性基础的思想，形成了美的理想在于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的观点。按照康德的分析，审美判断是对象形式适合主体认识功能，使想象力和知性这两种认识功能可以自由活动而引起的一种愉快感觉，它不涉及欲念和利害计较而本身又是令人愉快的；不涉及概念而又涉及“不确定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目的性而又符合目的性；虽是主观的、个别的却又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对于审美判断上述一系列矛盾或二律背反现象的分析，以及他在美的分析、崇高的分析和关于艺术、天才论述中提出的相互矛盾的观点，都充分说明他比前人更充分地认识到审美问题的复杂性和审美现象中的许多矛盾对立，并试图使对立双方达到调和统一。但康德美学实际上是沿用了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侧重于先验理性的分析，所以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统一起来，而只能达到二者之间的调和。尽管如此，通过康德美学，我们却可以看到西方近代美学所提出的最复杂的矛盾问题，从而得到西方美学史上最为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启发。

[参考文献]

- [1]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M]. 吴象婴、梁赤民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下卷) [M]. 马元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5] 威尔·杜兰特. 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时代 (上) [M]. 幼狮文化公司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9.
- [6] 乔治·迪基. 趣味的世纪: 18世纪趣味的哲学漫游 [M]. 牛津英文版, 1996.

责任编辑: 陶原珂

文学价值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 伍世昭

[摘要] 文章运用文学价值学、美国文学理论家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和刘若愚艺术过程四阶段理论,结合中国20世纪历史文化境遇和西方文化、诗学的影响,对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社会政治意识、精神启蒙、审美感悟、语言形式、学理认知诸价值取向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总体考察,为学界深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问题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框架。

[关键词] 文学价值论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135-05

文学理论批评这一概念,据黄曼君先生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的释义:

文学理论批评是在特定文学观念指引下的文学活动,它包括文学本质规律的反思,文学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对作家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的阐释、评价和规范活动……。另一方面,文学理论批评又是一种运用概念、逻辑来描述、阐释、评价文学现象的理论活动,对于生动的文学实践来说,它具有抽象性、超越性,应该纳入科学体系性的理论思维框架之中。^{[1] P4}

从学理上来说,文学批评应该包括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批评和文学理论批评,但约定俗成的理解告诉我们,文学批评仅指前者;而文学理论批评应该仅指文学理论家、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象的批评。比较而言,黄曼君先生对文学理论批评的解释比起约定俗成的理解,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和逻辑性。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理论在为文学批评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还处于理论建构与实际批评交融的运动过程之中,其探索具有更强的实践性、易变性和不确切性,而文学理论作为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实践的已然总结,则具有理论的纯粹性、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切性。

文学理论批评是在特定的文学观念指引下的文学活动,其价值取向是文学观念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关于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观念的关系,党圣元在《论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一文中说:

文学价值观念包含在文学观念之中,是文学观念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文学观念……从价值与事实区分的角度来看,可以大体上分为价值观念和非价值观念两个部分。其中非价值观念这部分,是关于文学本体及其规律、趋势的整体性认识……。而价值观念这部分,则是关于文学的作用、意义,也就是关于文学价值的观念性认识,它是文学接受主体基于自身需要对于认识对象好或坏、值得或不值得、期望什么或拒绝什么之类的评判……。凡文学观念都有特定的价值所指,而文学价值又无不有一定的观念所依。所以,在实践中,它们往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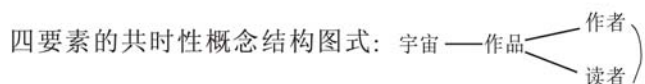
根据党圣元的说法,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定义为理论批评家在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时,所涉及的关于文学作用、意义、功能的观念性认识,它对理论批评家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批评起着导向作用。根据文学观念与文学价值观念相互联系的特点,本文在考察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时,将越出文学价值观念的概念边界,适当地探讨一些总体文学观念层次的问题。

一、文学价值论与文学价值存在的主客观依据

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可以借鉴美国文学理论家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和刘若愚

作者简介 伍世昭,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 惠州,516000)。

关于艺术过程四阶段理论。在探索概括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架的背景上，阿氏提出了艺术



他认为这一图式可概括所有文学批评理论：或强调作品与宇宙—世界的关系；或强调作品与作家思想感情及心灵特征的关系，或强调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或将艺术品看作一个独立自足的统一体，以其自身存在形式所固有的标准来检验。他指出，一个严肃的批评家在承认上述四种关系存在的同时，他还必须特别地注重某一种关系。^[3]阿氏在这里点明了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切入文学现象的视角。依据阿氏这一图式，刘若愚提出了艺术过程四阶段理论，他认为艺术过程应由下述四阶段组成：宇宙影响作者、作者创作出作品、作品影响读者、读者反作用于宇宙。而每一阶段两个要素之间关系的性质便决定了批评家特定的文学观念。当一个理论批评家的专注点在作品本身时，他的切入角度有以下几种可能：或强调创作技巧，或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或关注文学的语言形式，或将文学（作品）视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一定的观察视角亦会带来一定的文学观念。^[4]阿氏与刘氏的理论建基在对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大量考察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的研究是有启发的。但他们的理论并没有讲清文学本身何以具有可供不同理论批评家从不同角度加以考察的价值丰富性和多重性，更没有讲清不同的理论批评家何以选择不同的观察角度，从而形成相应的文学观念。为了说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引入文学价值学理论。

自20世纪法国拉埃埃和德国尼古拉·哈特曼创立“价值学”以来，价值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科学领域，道德、艺术、美学、宗教、经济、政治等统归属于“价值科学”，而价值则成了人文科学的基本范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尽管研究的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如价值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等等，但极大地丰富了价值理论的思想资料，为探索人文科学的价值理论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价值是物化了的社会劳动，因而是客观的。另一方面“价值”又是主观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能力即“本质力量”，是价值实现的主观基础。他指出：“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5]他还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6]音乐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潜能只有相对于“音乐的耳朵”才能实现为现实价值意义。总之，“价值”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按照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文学价值作为一般价值中的特殊价值，也必须置于主客体关系中加以研究。首先，文学作为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客体，其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带有客观必然性。在这里，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观点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是文艺家的社会劳动创造了文学（作品）的价值。这种凝结了创作主体的道德观、情感、认知能力、审美感悟、价值判断、实践经验的精神劳动，由于满足了创作主体及创作主体背后的多方面精神需要，因而作为创作主体创造的艺术客体，其价值先在地存在着。按照文学价值学的观点，文学是一个综合性价值系统，是由人们的多重艺术需要决定的：这里既有普遍需要，即审美需要，具有人类性；也有特殊需要，如政治、科学、伦理、宗教等趋向实际功利、学理认知的需要，具有历史具体性。这种种需要通过创作主体的创造性劳动物化于文艺作品中，转化为文学的特殊价值与普遍价值。作为客体的文学艺术作品既存在着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以个人意识为依据的审美价值，也有着满足社会需要的以普遍意识为依据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认识价值等等。各种价值相互渗透，构成了文艺的多重价值整体。文学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作为对广阔生活的一种特殊把握方式，其价值远不止审美价值可以涵盖。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诸种文学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无疑是审美价值，其他价值处于从属的地位。这是由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决定的，离开了文学审美特性，文学就不成其为文学。前苏联著名美学家列·斯托洛维奇对此亦有过恰当的说明：“艺术可以具有许多意义：功利意义（特别是实用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和建筑）和科学意义、政治意

义和伦理意义。但是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艺术的审美冶炉中,如果它们同艺术的审美意义折衷地共存并处而不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或者有用的物品,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艺术的高度。^{[7] P167}因此,不管批评或欣赏主体选择确认文学的何种价值,他必然会同时注意到文学的审美性,因为他知道,离开了这一点,他所确认的价值是无从实现的。

创作主体带着各种艺术需要创作出文学作品客体,鉴赏批评主体亦带着各种艺术需要,从作品中择取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存在。文学主体的价值存在尽管是客观的,有着客观必然性,但是离开了主体的需要,离开了主客体关系,价值就始终处于晦暗不明状态,无法由价值潜能转化为现实价值。说文学价值是主观的相对的,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1. 隐含于文学中的各种价值潜能有待于主体的发现,方能转化为现实价值,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文学的价值不能成其为对象;2. “价值不是真理”,价值和价值评价尽管不排除理性认识和逻辑判断,但在很大程度依赖于主体的情感经验,文学的价值评价与选择具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感性,文学价值的实现依赖主体的能动性;3. 文学价值评价与选择主体由于价值尺度、审美标准、功利目的、情感经验、趣味爱好、艺术需要乃至生存环境、文化氛围、时代境遇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需要说明的是,主观条件、艺术需要相似的理论批评家有可能选择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在文学功能的认识上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这是由社会历史的复杂因素决定的,带有客观必然性。

二、文学批评“相位”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多元价值取向

文学价值论较好地解释了文学价值的多重性和文学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为研究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提供了理论前提、逻辑起点和方法论基础。当一个理论批评家的主观条件、功利目的、审美追求、历史境遇和他的艺术需要现实地相因成形时,必定有其观照文学对象的特定视角,我们将这一特定视角称之为“相位”。^①按照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和刘若愚艺术创作四阶段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理论批评家观照文学的如下相位:宇宙—作家—作品;作家—作品;作品—读者—宇宙;读者—作品;文学(作品)本身。每种相位的前一因素决定影响后一因素。宇宙—作家—作品相位把作品视为宇宙影响作家、作家作出反应的结果;作家—作品相位将作品视为作家主观精神的外射;作品—读者—宇宙相位着眼于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随之对宇宙带来的影响或改变;读者—作品相位意在强调读者对作品存在、价值、意义的决定性作用,文学作品本身相位强调文学的意义在于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一定的相位带来相应的价值取向。但某些相位因前一因素所指有异,则会呈现一些复杂情况,如在宇宙—作家—作品相位里,当宇宙分别指作为“万物的唯一原理和万物存在的整体”的道或人类社会时,其价值取向前者为形而上的,后者或为决定论的(作家对宇宙—人类社会的显现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或为模仿的(作家的显现或反映是有意识的)。而在文学作品本身相位中,则存在着一些亚相位:或强调创作技巧,或看重文学的审美特性,或关注语言形式,或将文学作品视为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体。不同的亚相位亦带来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果认为只有形式才是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其价值取向便是形式主义的)。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总体上既有文学之外的功利价值、认知价值的诉求,也有文学自身内在规定性和审美价值的坚执。这当然与理论批评家观照文学相位的差异有关。但由于中国自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特殊遭遇,更多的理论批评家自觉不自觉地择取“作品—读者—宇宙”相位作为看取文学的视角,更为关注文学之外的社会功利价值,期望以文学为手段唤醒民众,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难,实现民族国家的自立与强盛。因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贯穿20世纪,成为20世纪中国文

^① “相位”原是物理学术语,《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8卷第556页对此的解释是:“在波动中,某点在最后一次通过参考(或零)位置后,完成一个周期的分额。”“相位的概念也适用于诸如波和振动物所经历的简谐运动。”张荣翼《文学批评学论稿》一书将这一概念运用于文学批评的研究,以探讨本来可用“角度”来说明的批评的视角问题。在他看来,“相位”与“角度”是一对可混用的概念,之所以使用“相位”而非角度,一是突出运动的观点,二是强调其整体相关性,三是它包含运动过程方式的含义,可以引入从同一角度但由不同方式来考察文艺问题。本文也在这一意义上借用的。

学理论批评的主流价值取向。在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向。一是将文学视为政治革命的手段,旨在通过政治和社会的改变,拯救民族危难,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强盛;一是将文学视为思想革命的手段,旨在通过个体和群体思想的改变,提升民族的精神素质,实现民族国家的全面复兴。前者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价值系统,后者称之为精神启蒙价值系统。就主要倾向而言,执着于前一种价值取向的理论批评家主要有梁启超、茅盾、钱杏邨、成仿吾、洪深、瞿秋白、郭沫若、艾青、毛泽东、周扬、邵荃麟、陈涌、秦兆阳、张炯、雷达等,坚持后一种价值取向的理论批评家主要有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胡风、钱谷融、巴人、李泽厚、刘再复、王元化、王富仁、钱理群、王晓明、汪晖等。

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家常常择取“宇宙—作家—作品”相位以观照文学。这一相位将文学作品视为宇宙影响作家、作家作出反应的结果。理论批评家虽然看到了作家反应的特殊方式(如形象思维、审美性),但其宗旨则是作家的创造能否与客观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生活取得对应,因而真实性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常规标准。这种观念导致了两种结果。1.由于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取得了对应,是真实的,于是文学被当成了知识的来源,文学是否有价值,要看读者是否能从作品得到教益、收获知识,所谓“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所谓文学的认识作用(价值),指的就是这种价值观。2.由于作家的反映是真实的,可以与广阔的社会生活比照从而加以确认,于是作品便成了科学认知的对象。理论批评家往往从科学实证的角度把握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在思维理路、语言表述、入思方式、论证模式、学科体系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迥异的现代性特征。我们将这一价值取向称之为“学理认知系统”。就主要倾向而言,坚执于这一价值取向的理论批评家主要有王国维、胡适、余上沅、吴宓、梁实秋、钱钟书、李长之、陈铨、何其芳、陈瘦竹、严家炎、钱中文、谢冕、杨义、陈思和、刘小枫等。

从文学作品本身看取其价值存在,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家观照文学的另一个相位。这与西方唯美主义思潮、形式批评理论、结构主义学说及中国审美主义理论传统的影响有关,强调的是作品的自性,即文学的形式创造和审美力量应该达到的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给读者带来形式自足感和审美愉悦,而无意关注作品之外的其他功能。由于前述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特殊遭遇,文学本身相位常常处于被遮蔽状态,其价值取向亦相应地受到遏抑,仅在20世纪初、末两端呈现出活跃态势。站在文学本身相位观照文学的理论批评家强调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其价值取向由此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偏向:一是强调语言形式的自足性及对文学存在的根本意义,一是重视文学的审美特性及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感悟。前者我们称之为“语言形式价值系统”,后者则称之为“审美感悟价值系统”。就主要倾向而言,前者包括李金发、穆木天、刘呐鸥、张爱玲、袁可嘉、唐湜、洛夫、王蒙、郑敏、吴炫、陈晓明、李劫等理论批评家,后者包括王国维、宗白华、欧阳予倩、闻一多、朱光潜、李健吾、侍桁、沈从文、童庆炳、苏雪林、南帆等理论批评家。

社会政治价值系统、精神启蒙价值系统、学理认知价值系统、审美感悟价值系统、语言形式价值系统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价值取向,都是对文学客观价值属性的体认,在常态上没有好坏高下之分,都有存在的合法性。由于上述五种价值取向是对文学客观价值属性不同方面的体认,因而它们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诸价值取向之间的相关性,首先表现在它们都涵盖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表现方式,区别仅在于社会政治价值系统、精神启蒙价值系统、学理认知价值系统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表现方式作为实现其外在目的的中介。理论批评家之所以以文学为手段,正是看到了文学以情感人、形象生动、优美动人、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而语言形式价值系统和审美感悟价值系统则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表现方式视为文学的自性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规定。其次,受时代影响,这一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语言形式价值取向与审美感悟价值取向,除个别理论批评家的理论批评外,从来就没有像西方理论批评一样走极端,陷入语言形式、审美自性本身而不能自拔,而总是处于“入”与“出”之间。

当他们强调“有意味的形式”时，形式指向了意味；当他们倡导以审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时，审美导向了终极关怀。“能入”而“能出”，这一特点与社会政治、精神启蒙、学理认知价值取向无疑是相通的，区别也仅在于前者的功利目的是彰显的、直接的、现实的；后者的价值指向是隐晦的、间接的、超越的。上述五种价值取向所涉及的理论批评家是就主要倾向而言的，而实际的理论批评活动则要复杂得多。有的理论批评家并无固守的价值准则，在选择某一主导价值取向的同时，可能并不拒斥他种价值取向（如胡适、陈思和、刘小枫等）；有的理论批评家则在长期的理论批评实践中，其价值取向和理论主张发生了明显变化（如郭沫若、茅盾、周作人等）；有的理论批评家则由于学养深、才分高、涉猎广而成为多种价值取向的肇始者（如王国维）。因此，在我们的探讨中，有些理论批评家和他们的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重要理论主张必然会在不同价值取向系统内出现。

[参考文献]

- [1] 黄曼君主编.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上）[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 [2] 党圣元. 论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J]. 学术研究，1996, (3).
- [3] [美] M·H·阿布拉姆斯. 镜与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4] [美] 刘若愚. 中国的文学理论·导论[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7] [苏联] 列·斯托洛维奇. 审美价值的本质[M]. 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陶原珂

•学术动态•

《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在广州首发

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和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珠江文化丛书》（含黄伟宗著《珠江文化系论》、朱崇山编《珠江文化的历史定位》、周义编《海上丝路的研究开发》、司徒尚纪著《泛珠三角与珠江文化》、黄启臣著《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罗康宁著《粤语与珠江文化》、张镇洪著《岭南文化珠江来》、洪三泰著《珠江诗雨》、谭元亨著《珠江远眺》和戴胜德著《珠江流韵》十部），已由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于3月22日在广州首发。该丛书作者和有关专家学者怀着弘扬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历史使命，在两广接壤的封开发现了岭南文化发祥地，在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徐闻发现了汉朝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广东的南雄梅关以及封开、怀集、贺州等地发现了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在云浮、郁南、罗定发现了南江文化，填补了岭南文化研究上的空白，为广东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依据。在考察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珠江文化”的理论体系，确认了珠江文化的始祖为舜帝，珠江文化的哲圣为惠能，使珠江文化跟以黄帝为始祖、孔子为哲圣的黄河文化，以炎帝为始祖、以老子为哲圣的长江文化并列；展现了以珠江文化来涵盖、延伸岭南文化的思想内容，从而彰显其“江海一体”的特色。“珠江文化带”及其覆盖区域跟泛珠三角的范围大体一致，说明泛珠三角不仅是一个经济区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区域概念。

该丛书从文化学、历史学、经济学、考古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十个学科的视角，聚焦珠江文化和丝绸之路文化，材料丰富，立论坚挺，论证充分，且各分册自成体系，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总体气势宏大。该丛书剖析珠江文化的成分和结构，考察珠江文化的历史和定位，挖掘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和意义，描绘泛珠三角区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探古寻幽之中提升地方文化品味，持有现代区域文化建设情怀，谈论文化转变为生产力的真知灼见，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而成系统的佳作，具有把珠江文化推向世界的宏伟气魄。（周 义供稿）

责任编辑：王 可

高本汉与贺登崧对汉语方言研究的不同学术路向

◎ 刘新中

[摘要] 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高本汉的研究在共时和历时方面对汉语方言研究都有开创性,贺登崧的研究则主要是地理语言学,他们的方法可以互为补充。贺登崧所提倡的语言地理学注重语言事实的挖掘,展示与分析语言现象在地理上的分布;高本汉则创造性地将欧洲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全面运用到汉语研究中,较好地结合、吸收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成果,他的成果、方法又反过来影响了一批中国的语言研究者,使他们在音韵学和方言学等领域产生了大量成果,这是贺登崧不能相比的。

[关键词] 高本汉 贺登崧 对比 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140-04

一、理论背景与方法

汉语方言研究从杨雄算起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则是近代的事情,尤其是20世纪引进了西方语言学理论之后才开始发展起来。1786年威廉·琼斯在加尔各答皇家亚洲学会上的论文确立了梵语与拉丁语、希腊语和日尔曼语的历史亲缘关系之后,人们发现了足以说明语言之间亲属关系的大量现象,划出了语言的谱系。拉斯克 [R.Rask]、格里姆 [J.Grimm]、博普 [F.Bopp]、施莱歇尔 [A.Schleicher]、梅耶 [A.Maillet]、索绪尔 [F.Saussure] 的研究在这个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9世纪前后在西欧兴起的歷史语言学,基本信念是语音演变的规律性,也就是语音演变没有例外,如果有例外一定是因为另外有一套规律。按照这条原则,有亲属关系的一系列语言或方言之间共同词汇的声韵会有一套对应关系,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寻求这种对应关系,以便建立这一系列语言的亲属树 (family tree),并拟测祖语 (proto-language) 的音系和词汇。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进行比较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从比较中揭示普遍规律,一种是从比较中找出历史情况。^[1]索绪尔之后出现了结构主义以及代表性的三个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结构主义。这些思想和方法对汉语方言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调查开始于1910年,写作于1915-1926年,历史比较语言学高度发达和现代语言的草创时期。贺登崧的调查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是结构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强调对语言的描写和分析,他的调查研究虽然与美国结构主义的描写有相似之处,但是主要集中在语言地理学。贺登崧在学习日叶龙的方言地理学时,看过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但是他基本上不认同高本汉的调查研究方法,尽管贺登崧与高本汉使用的方法都有相同的地方。他们共同的欧洲学术背景所带来的实证方法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新局面。重实证,他们都使用了仪器研究汉语;重视田野调查,他们都选择了山西、河北等地作为调查地点,这是巧合还是山西及其附近地区有其特殊之处?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第2卷关于“现代方言的描写语言学”引论中,讲了五个问题:(1)确定方法,(2)选择音标,(3)调查地点,(4)试验的仪器,(5)普通语音学概念。高氏汉语方言学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总纲后来在我国学界,无论专为研究普通语言学,还是专为研究汉语方言,都得到贯彻。从方言学的角度看,高本汉的古音研究,是用历史音韵证方音,从历史语音学看,是用方音证历史音韵。而两者都要求能看出从中古音到现代方音的历史演变,有许多见解是十分精辟的。

作者简介 刘新中,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广东 广州,510632)。

贺登崧对高本汉、赵元任、刘复等学者的研究颇有微词，但是高本汉却没有予以回应，因为高本汉觉得这些说法不值得一驳。对此，易家乐曾说：“贺登崧立足于‘新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的基础，批评了高本汉的‘青年语法学派’的方法。例如，批评高本汉用提问调查表对发音人进行方言调查，而不是根据自然语言。但是实地调查的目的确实是想借以弄清某些字在以前的某些韵书中的读音。贺登崧的方法也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只是性质与高本汉的截然不同。高本汉深知口语读音和书面读音并列的重要性，他在方言字汇表中在许多情况下记下了这两种读音。”^{[3] P53-54)}

地理语言学要求对地图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分布情况进行解读：(1)因历史变化而形成的连续层中的新旧层次，(2)一种变化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传播的形态，从这两个方面探究方言的历史。^{[3] P6)}贺登崧等也指出因为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反映了其历史变化过程，如果画出的地图不能让我们得到历史考察的新结论，那么只能算是在地图上列出的词汇对照表。光是罗列语言特征的分布情况而不加以历史解释，并不是语言地理学。

高本汉的研究从方法到内容都有现实和历史两方面非常丰富的研究资源，而且他的研究可以将贺登崧所进行的纳入其中。就解释的功底而言贺登崧的就相对单一。高本汉的则是古今中外当时方言的材料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他所开始的几个方面的研究足以聚集大量的历史语言学人员进行多向度的研究；贺登崧在地图制作方面非常精致，表现的词语分布也十分清晰，而且在对一些词语差异的解释借助书本文献之外的材料如碑文、地理交通等都有了独到的发现，但是他对高本汉依赖中国固有文献的做法作出批评的同时，似乎对参照中国古代文献进行方言调查充满了怀疑。高本汉和贺登崧在方法上的差别主要是因为对利用何种材料进行调查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不同。

二、调查工作

先看调查内容。高本汉的目的是想要搞清楚汉语的历史，搞清楚现代中国语言的各个方面，因此他结合了古典文献和活的方言两个方面的材料，调查的项目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计的，调查的内容是字音。高本汉呈献出“方言字汇”3125字的方言读音及其中古拟音，还列出汉字的“高丽”、“汉音”、“安南”读音。贺登崧调查的重点是词汇，他拟了一个195个农村词汇组成的调查表，在1948年徒步调查了河北宣化420个村庄中的115个，他的调查成果制成了9幅地图。

其次是调查者和调查对象。贺登崧界定的调查者和调查对象最值得称道，他认为在中国理想的调查者一是中国人，二是对农村的生活习惯有相当的认识；被调查者（发音人）的条件是：a.40岁以上的农民，b.没有受到书本知识的影响，c.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d.家庭至少在本地居住了三世代，e.大半辈子在本村度过，外出较少。他还强调在中国避免利用女发音人，原因是母亲一般都是从外村娶来的，女性的语言性质不稳定。^{[3] P11-14)}高本汉要求调查者是具备相应能力的语言学者，至于调查对象，“用不着说，在广州、上海、开封、太原，那些大城市里是没有完全内部一致的读音的。所以我就用了现在语音学家中通用的方法。我挑选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所要研究的地方生长并且是在这个地方受教育的，还得经我详细考虑过后才断定他可以代表这个地方的读音。我详详细细的把他的读音写下来，就可以表现他本地（如广州等）土音的概略。”^{[3] P144)}就调查对象的限定而言，贺登崧比高本汉清晰、明确。贺登崧的要求与人类学家的要求类似，这需要调查者在当地进行调查时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调查有相当的深度才能做到。高本汉对调查对象的要求没有贺登崧那样严格，这种调查适合短时间内进行一个方言的语音面貌的调查，对于词汇和进一步的语法调查则显得远远不够，其调查的深度和精确度远不如贺登崧要求达到的程度。

再次是调查的方言点。《方言字汇》(1926)总论主要讲解方言字表的情况，强调了域外方言高丽话、日本话对佐证方音，共研中古音的作用。各韵的字表下有文字注释，补充说明调查中所遇到的其他问题，如又读、例外、读音分化、未译音说明等。由字表极易查到代表字在各方言点的读音。字表既标古音，又有各点方音，从对照中可清楚地看出古今韵母的演变规则和条理，反映了历史演变的逻辑抽象。

贺登崧的调查,包括张家口、万全93个村庄,第二年调查范围扩大到宣化县。在这之前他还调查了大同附近70多个村的方言。贺登崧所做的是成片高密度的调查,因此对平面的描写是十分精确的。而高本汉的调查紧扣他的写作任务,只要能说明问题就可以,不再作深入而过细的调查。这对于时间紧、任务重的调查者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深入调查研究来说是不够的。

三、主要著作及其影响

高本汉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著述非常丰富,我们只谈《中国音韵学研究》。它是高本汉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影响非常大。它陆续发表于1915年-1926年间,中译本是由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共同翻译的,在翻译中三位学者加了注释和补订。中译本原稿的版本在“一二·八”战火中被毁,这部译著几经周折才得以问世,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9月初版,1948年再版,1975年2月第4版(台湾),1994年缩印本(北京)。此外还有日语译本。书中有傅斯年和高本汉的序。《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大致结构是:第一卷“古代汉语(关于古音知识的书本上材料、古代汉语的音系、古音字类表)”,第二卷“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第三卷“历史上的研究”,第四卷“方言字汇”。这本书是以中古音构拟为基点的汉语历史语音学。它实际上讲了汉语语音史概论、现代方言研究中的描写方法和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共时描写、历史语言学中的历史解释方法、方言字典编纂法。和传统的小学相比,这完全是不同质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系统。

贺登崧的《汉语方言地理学》,由石汝杰与岩田礼翻译成中文,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与原文单篇论文面世时间已隔半个多世纪。在日本,岩田礼和桥爪正子编译了贺登崧的有关论著,使它成为整体感和系统性都很强的专著,定名为《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东京好文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文译本由此而来。全书分为4章。第一章有关汉语语言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介绍了方言地理学的基本观点、方法以及中国文化的背景知识。第二章大同市东南部方言的方言边界线。第三章大同市东南部方言中地域性语音变化举例。第四章宣化地区的语言地理学。原著只是一些论文,不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系统性著作,是实地调查记录的汉语方言地理材料及其学术上的分析。但这些调查指出了对汉语方言进行科学研究的另一条重要道路。它们记录了贺登崧在20世纪40年代的调查。调查的内容不但是具体的发音与词汇,而且还包括民俗内容、庙宇、碑刻、交通情况以及地方志。他不但用同言线来进行方言分区,而且还参照文化因素对分区加以说明。不过这些著述半个世纪以来被重视的程度远不如高本汉的有关著述。

贺登崧除了自己的研究,1950年贺登崧的学生王辅世提交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含地图35幅,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于1994年出版,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做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之后今天又重提贺登崧?因为当时时机尚不成熟。现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工作,调查材料的积累使得语言地理学的发展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因此在20世纪末贺登崧所倡导的方法越来越受重视。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不但在外国人研究中国音韵学的论著里是一部集大成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所作的音韵学通论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伟著”,^[3]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和方言学的开端。解放以后袁家骅等的《汉语方言概要》基本上遵循高本汉的著作,1962年《汉语方音字汇》和1964年《汉语方言词汇》虽然在资料上增添了高本汉书中所没有的新资料,整个框架却还是在高本汉所设定的框架之内。高本汉从《切韵》的反切出发,从方法论的角度确立了系联法的重要地位,使之成为语文学提取音类和分析音系的一种经典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建立起中古音系(切韵音系)的音类框架之后,高本汉就将其作为构拟对象,把中国境内的30多个方言点的读音和几种域外方言的音值作为比较的材料,全面地构拟出了中古的声母、韵母系统,其中采用的方法是典型的历史比较法。高本汉运用的是语文学和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方法。这种结合是方法论上的一个进步,两种方法各有运用的领域,各自揭示了古音的一个方面。不过,从根本上说,高本汉考订古音的方法以语文学的方法为基础,历史比较

法作为补充。但这作为补充的历史比较法给中国音韵研究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将之引向一个广阔的领域。

贺登崧将方言地理学引进中国，主张从基础地图的制作到对地图的解释都严格采用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针对高本汉重视古典，轻视口语的理论和方法，贺登崧自己拟定的调查表，根据调查表展开地毯式的调查，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制作了很专业的地图，在此基础上又结合历史、文化、地形、交通等因素对地图作了较深入的解释。这些工作都有其独特的意义。

高本汉在他的书中明确指出了自己的目的，这也就是他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1)把中国古音构拟出来，用作系统的现代方言研究的起点；(2)把中国方言的语音作一个完全描写的说明；(3)用音韵学的研究指明现代方言是怎样从古音演变出来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为完成这一宏伟蓝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经过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董同龢、张琨、李荣等的研究补正，高氏研究中的一些疏漏得到了改进和修正，使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日趋完善。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主题是从世界学术界的高度审视汉语音韵学的。它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很多启示：全书庞大的方言学体系，不仅表现在对30多个方言点的共时描写，形成描写方言学系统，更重要的是由共时描写而引向历史研究，解决历史音韵研究中最重大的问题——中古语音系统的构拟；对上古韵部参照方言所作出的等韵审析，为上推上古韵部准备了方法论的条件；他的32声纽方音表以等呼开合为纬，以方言点为经，实际上是新式等韵图表，它的深层含意是把共时方音和它标示的历史音韵纳入了一个纵横坐标结构的逻辑系统；编制的若干表目无不与方言调查成果及中古音比较有关，它们是可供查检的语音工具。高本汉并没有结束中古音研究，重要的是，他把若干现代科学方法引进了传统音韵学，并首次构拟其音值，为上推古音、下证今音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音值的精确度上准备了条件。

四、历史局限

高本汉和贺登崧的研究都还有不足之处。高本汉带来的问题：(1)他所使用的“新方法”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中国的历史语言学是从他开始的；(2)他用北欧当时流行的“构拟法”来给《切韵》拟音，不接受稍后出现的音位学理论，问题是《切韵》、韵图之类是音位性质的，目的是为诗文写作确立一个公认的、便于查询的标准，而拟音则是以音值为目标，其目的是重建古代未记录下来的语言，两者的观念是不同的。高本汉调查过的方言详于西北而略于东南，精于声韵而疏于声调。高本汉自认为是肯定无疑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广泛的修正，这些广泛的修正者包括：赵元任、王力、陆志韦、马丁、蒲立本、河野六郎、纳格尔、董同龢、包拟古、欧德里古尔、亚洪托夫、周祖谟、周法高、李方桂、龚煌城、张琨、本尼迪克特等。

贺登崧的问题是由于反感高本汉的文献学方法而对其研究的文献与语言现实的关系处理得不是很好。中国是拥有悠久文明的古国，而他对于那些珍贵的文献材料视而不见，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最好的办法是文献与实际的发现相互印证。语言学中使用的任何一种方法都必须与语言本体研究有密切关系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高本汉和贺登崧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不同命运，就是很好的说明。

[参考文献]

- [1] 梅耶 (Antoine Meillet). 岑麟祥译.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中译本)[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 [2] 易家乐 (Sen Egerod). 林书武摘译. 高本汉的生平和成就 [J]. 国外语言学, 1982, (1).
- [3] 贺登崧 (Grootaers, Willem). 石汝杰、岩田礼译. 汉语方言地理学 (中译本)[C].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4] 高本汉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中国音韵学研究 (中译本)[C]. 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5] 罗常培. 介绍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J]. 图书月刊, 第一卷, 七一八期, 1941.

责任编辑: 陶原珂

·书评·

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 管 华 管 林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5-0144-02

2004年12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是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的奠基之作。该书作者郭延礼教授是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出版的专著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新探》、《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以及“秋瑾研究”、“龚自珍研究”等专著八种。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就介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80年代后一直从事该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这些都为他完成《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它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将其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开创期、拓展期、繁盛期。并分设三章论述每一阶段的研究概况和主要特点。下篇为“学术论争与研究的深入”。选择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中有争议、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论争与研究的深化，进行评论，展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不同阶段的面影，以及变化发展的态势，从而揭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希望有助于推动21世纪近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开展。(参阅该书作者《后记》)

该书立足于21世纪，回顾我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情况和变化，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述全面，颇多新见，是至今第一部全面介绍、评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当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或爱好者不可不读之书。综观全书，我们觉得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两结合”的编写体例。学术史著作如何剪辑、编排学术史料，即关乎体例问题。一种较好的学术史体例，一般要做到两点：一是能容纳所论述学术史的内容，不应把该记载的内容遗漏了。二是尽可能出现各时期的特征，显现出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让读者感受到学术发展的趋向，并领会历史的经验、教训。我国学术史体例繁多，有纪传体、编年体、学案体、师承体、概论体、章节体、混合体等。该书采用的体例基本上属于混合体，是演变史与专题史两结合的编写体例。上篇分三阶段评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状况，每一阶段的第一节概述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代表作者、研究特点与不足等。接着几节评述重点作家、著作或突出现象。对开创期(1919-1949年)和拓展期(1950-1979年)，因研究的作者和论著数量较少，该书尽量收入，而且较详细评述。对于繁盛期(1980-2000年)，由于作者较多，论著丰富，如要像前两期那样评述，篇幅不容许。加之这一期离成书之时最近，许多论著还未经时间检验，所以，在“概说”之后分类评述。如：“学术队伍的扩大与学术意识的确立”、“研究方向的相对集中及专门研究家的出现”、“多种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一次新的飞跃”。这样的安排，是从实际出发的。该书下篇是专题史，共八章，分别论述80年来，学术界有关桐城派、林纾、刘鹗与《老残游记》、谴责小说、梁启超、鸳鸯蝴蝶派、王国维等的争论和研究情况。这部分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从中可使读者清晰地了解近80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论争的详细情况，以及经验和教训。由于学术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其内涵的隐蔽性，加上各种体例自身的局限性，如果采用单一体例来反映某一学术历史的变化和总结它的发展规律、经验教训等，实在难以做到全面和准确的。演变史容易反映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及其前后因果，较具系统性，但不易突出重点和解决难点。专题史不易反映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缺乏系统性，但能突出重点和展示难点。将两者结合，取长补短，能更好地完成学术史的重任。

(二)两种表述类型的交替使用。该书以描述型表现形态为主，适当运用阐释型表现形态，相互渗透吸收，形成既有较细致准确的描述，又有较深刻精辟的阐释。如上篇第一、二、三章的“概说”，先大篇幅描述该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代表学者，然后归纳阐释该时期研究的特点与不足。在“概说”之后的代表学者与论著的评论中，也是在大量列举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言简意赅的评论。如对胡适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在作了较详尽的介绍后指出：“在‘五四’之后不久，这篇长文的出现，对于近代文学的研究确实有奠基的意义。再加上他为几部有代表性的近代小说重印时写的序和考

作者简介 管华，广东省干部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管林，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校长(广东 广州，510631)。

证,构成了胡适对近代文学主体部分研究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当然,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及有关近代文学的评论也是有缺点的,最明显的还是前面已提到的,他以白话、文言来区分‘活文学’、‘死文学’的文学史观。”(该书第54页,下边引文只注页数)对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介绍它值得注意之处和一些不足之后,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史》批评方式虽旧一些,著者的评论也相对少些,但该书史料丰富,旁征博引,重视知人论世,有些评论也很有见地,颇具‘史识’。该书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对旧派文学研究有一定的贡献。”(第64页)下篇第五章“由对林纾的批判到认同他在翻译文学上的贡献”,详细描述了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界对林纾由批判到认同的曲折过程,在描述过程中插入不少评论,例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像林纾这类人物,实际上也是一个悲剧,他们开始还能顺应时代的潮流,拉车走在前进的大路上,也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过相当的贡献。但当历史要跨越一个时代,要求他继续前进的时候,他却开倒车,硬要逆历史潮流而动,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一部分守旧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第215页)该书还在史论结合、夹叙夹议中,提出21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某些重要课题,给研究者以导向。如第244页指出“林纾的研究还有可以开拓和深入的领域,如林纾的小说理论、古文理论、林纾与比较文学、林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问题虽已有涉及但多未能深入,值得进一步探讨。”又如第289-291页指出60年代中期对近代谴责小说的论争中值得反省和检讨的三个问题:(1)以作家的政治态度判定作品的思想倾向;(2)以作家所属的政治派别来论定小说成就的高低;(3)以改良派的政治属性来推论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在此总结了上世纪60年代近代文学研究的诸多教训。

(三)参与论争,独抒己见。作者不仅在材料安排剪裁等方面显示褒贬,而且在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上直接提出新见。如第192-202页,谈到长期被一些学者视为桐城派的严复和林纾时,以较充分的根据指出严复和林纾并非桐城派作家。第254-260页,在简单介绍张毕来的《〈老残游记〉的反动性和胡适在〈老残游记〉评价中所表现的反动政治立场》之后,用了较大的篇幅批评了张文中的某些明显的错误,指出:“小说中的寓言和说教并不完全等同于作者的思想”;“张文再次认定刘鹗是‘汉奸’并斥责胡适是为刘鹗的‘汉奸’罪行辩护,是没有根据,无中生有的”;“张文说老残这个人物形象‘是很丑恶的’,这不符合小说描写的实际”。该书作者还往往在回顾研究历程中,有机地插入经验教训性的议论。如第29页指出:“这次关于近代谴责小说的论争,暴露了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内容上的许多问题:突出阶级分析,片面地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或唯一,论争主题的泛政治化,均可看出当时极‘左’思潮的泛滥影响。至于在参加论争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错误观点以及研究方法上机械的形式逻辑推论,主要还是当时学术大环境的影响。”这些议论紧密结合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的实际,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体会,颇具启迪。

该书立足于千年之交,对80余年来我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资料进行检视、梳理、评判,按发展阶段进行描述,对重点问题、流派、作家作专章论述,并将其放置在不同时期的学术背景和中国文学研究的总趋势下来考察,史论结合,点面结合,试图以史为鉴,促进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展,不失为我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奠基之作。

正因为是奠基之作,它具有拓荒、开创的意义,为后续者打下根基,对近代文学研究贡献颇大;也正因为是奠基之作,它自然难以完美,必然还存在一些错漏和不足。如上篇第一章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1919-1949年),没有提到罗家伦的《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是一个疏漏。该文刊于1920年9月出版的《新潮》第二卷第5号,比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问世还要早一年半。虽然该文落笔的侧重点是在“文化运动时代”和“国语文学”,但它将近代中国时势的变迁按历时性线索划分为四个时代:鸦片战争之后国人观念仍未真正开放之“闭关时代”,洋务运动及维新前期之“兵工时代”,立宪时期及民国初年之“政法路矿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之“文化运动时代”。罗氏认为:“每个时代文学思想的变迁,正是符合着某个时代政治社会的背景。”所以近代中国的文学也相应地呈现为四种类型:“华夷文学”、“策士文学”、“逻辑文学”、“国语文学”。又如第112页谈“50与60年代之交大学生集体编著的文学史对近代文学的评论”,没有提到北师大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九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间文学(1840-1919年),第十一编第三章近代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这些都是属于应予评述的内容。至于行文上的错漏也有一些。如第439页“(三)叶嘉莹的近代词学研究”,下文的论述不对此题,应改为“(三)叶嘉莹对王国维的研究”。第297页引用列宁的话与我们查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原文有出入。第444页谈到:“其中有著名女学者罗香林珍藏的黄公度致胡晓岑函与山歌稿。”按,罗香林(1906-1978年)是男性,广东兴宁人;1932年后,历任广东通志馆纂修,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暨南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1949年7月迁居香港,1978年4月病逝。该书在篇章结构方面,也有值得修改补充之处。上篇论述“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却不把港澳台的近代文学研究情况列入,而在下篇的“学术论争与研究的深入”中,把“港澳台及海外的近代文学研究”作为第十一章列入,这一章的内容,既不是学术论争,也很难说明研究的深入。不如把其中港澳台的近代文学研究情况分散到上篇有关章节中评述,而将其中有关“海外华人学者的近代文学研究”作为全书的“附录”。这样,可能更加名副其实,更加切题。另外,该书若能在最后用一定的篇幅写一“结语”,概括地阐明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发展变革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存在的问题,预示发展的趋势和跨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任务,将会使该书更加完整。

责任编辑:王 可

•学术动态•

走向多元化的古代文学研究

——广东省古代文学、古代文论2005年学术研讨会简述

◎ 夏 晴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5-0146-01

近2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随着学术研究繁荣期的延续,研究课题重复、研究格局狭窄也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使古代文学研究走向多元化,在湛江师范学院召开的“广东省古代文学、古代文论2005年学术研讨会”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古代文学要扩大研究范围,更新研究方法,必须要有敏锐的眼光和自觉意识。吴承学的《清代文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指出,清代文学研究有非常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地位,清代文章与清代的政治、学术、教化、风尚等关系密切,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根基。在传统的研究领域,清代是一个不被瞩目的时期,与其文学的丰富、复杂相比,当前研究狭窄单调,相当薄弱,这一研究课题的深度挖掘,极大地拓宽了视野,无疑有一种引导作用,甚至有可能产生一些研究的“热点”。魏中林《古典诗学的学问化问题与清诗研究》也同样关注清代文学,指出清诗研究无论在文献整理和理论阐释方面都甚有空间,要拓展与深化,尤为重要的是视野、视角的开拓转换。清代诗歌和诗学思想都集学问化之大成,正可以从这个角度展开全新研究,这一研究思路抓住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某种民族个性,对于传统的清诗乃至宋以后的诗歌研究观念都是一大启发。邓乔彬认为,西学之后,现代学术走向专门化,造成通人通儒很少,这局限了研究的深度,他提出可以从宏通的文化视野入手,加强文学与各种文化关系的研究。宋俊华则结合新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开掘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维。他认为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仅仅注意到遗存下来的文本形态即“物质文学遗产”,而忽视非文本形态、活态形态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代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由此可开拓出新路子,如加强口述文学、表演文学、至今仍存活的文学的研究,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接传承方式的研究,重视文学与周围环境的关联的研究,加强古代非物质文学的功能的研究以及物质文学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核心思路是改变固守文本形态的文学研究方法,展开对以活态形式存在的传统文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对学界惯性的传统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来说,不啻为一种新的尝试方向。

文学演进过程中的本质和相关因素是如此错综复杂乃至遮蔽不清,仅靠传统的经典研究远远不够,对非主流、非传统的文学及现象蕴含着的文学发展演变因子的挖掘,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因而,本次年会较多论文的关注点转向了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看似隐性的、不太起眼的、外围的现象,拓宽研究空间,摆脱简单、表象的描述性批评,从大文化角度揭示文学立体的生存状态及演变规律。戴伟华《唐代〈春秋左传学〉别论》便将文学研究与学术(经学、史学、子学)研究相结合,考察春秋左传学在唐代的影响。张海沙《唐宋文人对〈金刚经〉的接受》也是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文学以外的文化形态,梳理《金刚经》对唐宋文人的影响。彭梅芳《〈襄阳乐〉述论》虽是一个不热门的个案研究,却颇有价值。乐府民歌和古代音乐有着密切关系,该文则将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文化背景,通过对对象的历史生成、流变环境的分析,结合文献材料的梳理比照,合理推论,解决了《襄阳乐》在产生、流变诸问题上含糊之处,也提供了一条研究南朝乐府的思路。沈金浩《宋代文人的拐杖》通过梳理大量提及“拐杖”的宋人诗词资料,以及与“杖”相关的文化在历代的不断演变,认为早已符号化的“拐杖”在宋文人笔下习见,是文化传统与宋人心理交汇的结果,有关杖的种种文学实际就是宋人生态态度、理想生活、审美情趣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中国文学史的传承是一种生态态度和审美意识的有选择传承,由“拐杖文学”的演变,可以看到文学史发展演变的相关作用因素。该文以新颖的话题、独特的视角,以及考证归纳的批评、审美的批评、历史—社会文化的批评等方法的融通运用,丰富的文化信息的整合,形成选材小而格局大的研究特点。郑瑞侠《中国早期文学社会边缘角色的界定及特点》则从原型研究的角度对早期文学中出现的社会边缘角色进行概念界定,认为他们属“艺成而下”的社会低层次角色,但又以富哲学意味的要言妙道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从中也可以看出早期哲学具有人生审美观照色彩的民族特色。

小说戏曲研究大都约而同地选择了社会—文化的综合研究方式。这两类文体生成较晚,蕴含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信息,多元的研究某种意义上更能揭示其特征和文学规律。如纪德君《民间说书与古代通俗小说文体兼容之关系初探》将通俗小说文体兼容的研究从案头文本研究扩大到动态存在的民间文艺、民间说书,以及它们与通俗小说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民间说书在演艺发展过程中为增强吸引力而汲取其它表演形式的艺术成分,使脱胎于“说书”的通俗小说出现文体兼容现象,而通俗小说与“说书”之间的循环互动,也造成了文体兼容。将已定型的文本放在活动变化的演艺文化下考察,这种动态的思维和诠释手段,应该说更贴近古代通俗小说的本真形态,似乎也印证了前文宋俊华所提出的新研究思路。又如田若虹《图腾文化与古典小说中的怪力乱神》运用神话学、图腾学、西方人类学、弗洛伊德心理学和考古发现以及多种文献资料,讨论与“图腾”相关的“怪力乱神”现象,周玲《元剧中所体现的市商经营方式》从探究民俗文化遗存的角度,考察元剧中涉及的多种市商经营方式,都体现了这种研究思路。

视角广阔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抓住了文学属于文化现象、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近些年来也大大推动了古代文学的学术发展。不过,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其自给自足的属性和发展逻辑,有些问题,靠外部影响、人文背景的因果反应式研究是难以解决的,特别是将文化学的研究泛化时,就很容易导致变成其它学科的研究,使文学研究显得空疏或不伦不类。回归文学本体,永远是一条恰当的研究途径,因而,在本次年会上,也有相当的论文专注于文学本体的批评,如对文学观念与理论、文体特点、艺术技巧、审美趣味等的探讨。

责任编辑:王法敏

Main Abstracts

Managing Transformation and Its Idealistic characteristics

Cai Maosheng 8

The economic society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s causing a new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problem nowadays, because the foundation and condition of traditional strategic decision causes grave variety, and current organization's structural appearance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cannot adapt to the new surroundings.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background descend the main direction of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ormation management are innovation, fusion, and in dynamic state.

Study on Multinationals' Investments, Disinvestments and Reinvestments in China

Liu Yangchun & Mao Yunshi 27

Large amou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into China during its reform and opening, over its huge market size and great market potential. Many multinationals, after thorough investigation, have entered the market of China, and engaged in large-scale investment. Meanwhile, there exists a phenomenon that some foreign companies withdrew capitals from China, however, sometime later, they reentered the China market. This article proceeds from the view of foreign companies' direct investment process to probe multinationals' investment process in China, esp. focused on their disinvestments and reinvestments, and concerned their hidden motives and mechanisms of these actions.

A Query to Some Problems Raised from Textbooks of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Yang Shoukan 45

The paper concerns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some essential points in Marxism. The textbook has some specific material formation, which was used to explain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by ancient native materialists as the concept of material in ancient time. It also considers modern natural scientists' explanation of the materials structure as the material category in modern time. Both of them are inappropriate. With regar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movement, the textbook treats all movements as material ones, and thus denies spiritual ones. It is a vulgar view that puts 'material' alone. The textbook explains development only as a movement of uprising or advancing, and a dying out of old things. It neglects the fact that development is actually a dialectical process which involves the integration of rising and falling progress and retrogression, new and old. On the relativity of the opposites, the textbook provides a traditional explanation, which says that the two opposite sides depend on each other. If one is over, so is the other. However, it is not a proper explanation logically, because all the contradictions must have two opposite sides, otherwise, they would not be called as contradictions. The textbook lumps together the absolute nature of truth and the absolute truth. Human's knowledge can only be unceasingly approximate absolute truth forever. If someday an absolute truth was attained, human's knowledge would not develop any more.

An Analysis of Marx's Thought of the Value of Leisure

Xu Doudou 55

Faced with the new phenomenon of social leisure which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analyses social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s of philosophy,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t holds that leisure should be showed the core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all-round perspectives, and be one of lifestyle from Marx's thought, although the definition of leisure concept is different in the world. Free labor is a precondition for leisure, but it is not leisure itself. The essence of leisure should be embodied on treatment and handling free time. Leisure is a question of value's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It is a question of views of existing value, so it finally is a possible expression of human's development.

A Sociological Thinking of the Problem of Villages within City as a Landscape

Lan Yuyun and Guo Zhijian 83

Urban village is a problematic phenomenon in a view of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widely exists among large and middle cities throughout out country. The negative influence brought by this issue is not only at economic level but also at social level, and is a short term as well as long term issue. Some institutional and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social structure, such as the view of preferential planning development lacked an 'inter-plantation', a 'softening' effect of city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an individual endeavor of countrymen for urbanized profit, are major sources in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the issue. Therefore, a main way to dissolve the issue lies in striving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surmounting the attention at physical 'sight' level and strengthening the operability of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grass roots.

On the Chinese Ministers in USA Mainly from Guangdo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ang Biying 88

In late 1875, the Qing Dynasty appointed Mr. Chen Lanbin to be the first China's minister at USA. In 1875, China's leg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American capital, Washington, which means a new page in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The China's ministers assigned to US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an important and featured group with international insight. They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maintain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overseas Chinese interests, and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in modern China's diplomacy.

The Cause of Setting up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Qing Dynasty History and Mr. Zhao Erxun's Taking the Post of Its Director

Fu Chuanwei 104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Qing Dynasty History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4 was easy, because president Yuan Shikai and director Zhao Erxun both wanted to set up it for their own goals. However, it was not true. Judged from the process of its establishment and Zhao Erxun's taking his seat of director, we could kno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was not smooth. At that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royalty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so complex,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did not only reflect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ideas, but also the choices of the dynasty's officials between the two different governments in the new era.

O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Literators in Guangdong in the Ancient Dynasties

Zeng Daxing 110

The author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 data of Guangdong 2046 writers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classifies them into three levels and four location parts. He considers that, Guangdong's literature had a glorious appearance because of the long economic exploitation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nd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since the Qin Dynasty, the influence of northern culture, especially that of relegated officials, and the advanced public as well as individual education flourished in Guangdong since the Song Dynasty.

The Leading Spirit and Basic Trend of Western Modern Thoughts in Aesthetics

Peng Lixun 129

By surveying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odern thoughts in aesthetics, this paper holds that four of the major thoughts raise and expound a series of new aesthetic viewpoints,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creatively, and thus accomplish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esthetics through their respective unique theorie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times, those thoughts are based on reason, embodying the modern rational spirit through that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 Following the turn of epistemology in modern philosophy,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are always two opposing trends in the thoughts in aesthetics, which leads to reconciliation finally. Thus the basic clue of western modern aesthetics comes into being.

Methods of Bernhard Karlgren and Willem Grootaers in Studying Chinese Dialects

Liu Xinzhong 140

The study of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and Willem Grootaers affect the far-reaching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e, which include their theoretical mode, their regular and systematic way of study, magnum opus, their investigated locations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In the same time, we must know rectification about their deficiencies.

《学术研究》读者评议表

尊敬的读者：您好！

《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您的支持和帮助,为使我们的刊物能够更好地满足您的要求,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您对我们刊物的评价和建议。请将以下问卷填妥后寄至: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学术研究》杂志社(邮政编码:510050),或(Fax)020-83846177。联系电话:020-83846307、020-83846163,电子邮箱:bjb@gdskl.cn

我们将不定期邀请热心读者召开座谈会,对刊物的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的读者,我们将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本刊将予以保密。

姓名: _____ 单位全称: _____
地址: _____ 邮政编码: _____
电话(请务必填写): _____ 手机: _____
传真: _____ 电子邮箱: _____

- 1.在本刊所有学科中,您最关注的学科是: _____
- 2.在本期您所关注的学科中,您最喜欢的文章是: _____
- 3.在您所关注的学科的文章中,您在其选题意义、文章内容、学术价值、研究的创新程度上的评价是:

指标	评价
选题意义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文章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学术价值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创新性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 4.您认为本期《学术研究》在栏目设置、校对水平、版式设计和印刷质量方面做得如何?

指标	评价
栏目设置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校对水平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版式设计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印刷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 5.您认为今后《学术研究》还应该增加哪些栏目和内容,或是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 6.您认为《学术研究》的特色主要应表现在哪些方面或今后应该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请继续关注《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编辑部

2006年5月

佛山梁园与梁氏家族



梁园博物馆正门

见。其各种“庭园”的组景，不拘成法而富于创意，一峰则九华千寻，一勺则太湖万里，营造出动静结合、疏密有度的园林景观。庭内巧布太湖、英德、灵璧等奇石，或立或卧、或俯或仰，位置妥贴，极尽丘壑之胜，堪称岭南庭园之一绝。梁园既有岭南古园少见的大型水面，又有小巧玲珑、轻盈通透的岭南临水建筑。“韵桥”等小景引发人们对琴韵的遐思；湖中石、石舫、水蓊坞等景点的组合，通过绘画构图般的提炼和层次组织，给人以“浪接花律、路通蓊坞”的联想。梁园内古木蕴秀、庭园幽深。通过对树形的选择裁剪和对建筑物的巧妙利用，形成“漏日无隙”的意境。

梁园的建造，经过了梁氏两代人近40年的努力。嘉庆年间，梁玉成继承父亲梁国雄1000两银子，以盐商致富，数年家产增加百倍，从此开始了梁氏购地建宅、聚族而居的过程。其弟梁嵩如，进士及第，官至内阁中书，辞官归故里后，于嘉庆末年也在松桂里筑“无怠懈斋”。但是梁园以奇石著称



梁嵩如像

佛山梁园是“粤中四大名园”之一，是清代佛山大盐商梁玉成及其后人的私家园林的总称，由“十二石斋”、“汾江草庐”、“寒香馆”、“群星草堂”等四组不同地点、特色各异的园林群体组成，夙以奇石姿态神妙、内涵丰富而名扬粤东。相传园中有奇石400余块，因此有“积石比书多”之美誉。

梁园总体布局精妙，宅第、祠堂、园林浑然一体，形成一个居住环境良好、园林景观开阔的建筑空间体系。这种融入“聚族而居”生活习俗的造园手法，不仅在广东即使在国内也不多见。



半边亭

“群星草堂”，以奇石环列左右。终日延客赏花品石。其兄梁九章亦建“寒香馆”于汾水之曲，“古梅奇石，环列左右”。当时士大夫皆以一睹梁氏兄弟所藏奇石为幸事。

梁园藏书甚富，设有私塾。梁嵩如、梁九图、梁九华、梁九章等均精通国学字画，常与时下俊彦竞相酬唱，形成“家学”传统。梁九图素号“人伦风鉴”，珠江三角洲大户人家以求得梁九图字画为荣。梁园家塾培养出探花李文田、进士梁宝僧、解元梁冠澄、抗英乡绅梁应琨等名士，仅民国《佛山忠义乡志》所收录的梁氏人物达15人。曾以“一毛不拔”的牙刷广告名满天下的“梁新记”，至今享誉中外的梁厚甫、梁荣，亦是梁园的后人。

图/文 罗一星(佛山梁园博物馆)

的文化特色，却是在梁玉成的儿子辈手中打造。梁九图，精诗画，喜山水名胜。尝游衡山，得黄腊石十二。遂建“十二石斋”和“汾江草庐”，将诸石错杂于朱栏绿竹间，每日品石于斋前，“仿佛巫峰烟鬟缥缈”，趣味无穷。自号“十二石山人”。其兄梁九华则建



日盛书屋



石舫桥湖心石组合



美人照镜石

Academic Research



梦故乡——从化古建筑系列 李桂深 作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址: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编: 510050 电话: 020-83846163

排印: 广州市官桥彩印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010349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网址: www.gdskl.cn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刊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内总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发代号: 46-64

国外代号: M268 (北京399信箱)

期刊基本参数: CN44-1070/c*1958*m*大16*148*zh*P*¥8.00*3200*30*2006-05